

山河破碎 被撕裂的灵魂

内容简介

关于《山河破碎：被撕裂的灵魂》，描述了一群人。他们曾经力挺袁世凯又反对袁世凯。他们有袁世凯的欲望，学习袁世凯的手腕，品尝袁世凯的孤独。

他们主要有三种人：政客、军阀、文人。

所谓政客，如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名义上是政府最高领导，理应为国谋划，实际却陷入派系斗争中不能自拔。

所谓军阀，如张作霖、曹锟、吴佩孚、张勋，希望征服天下却又无法征服天下，看似强大又不够强大。坏事干过不少，也顺带干好事。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讲原则，如吴佩孚宁死不当汉奸。

所谓文人，如梁启超、杨度、章太炎，他们有知识、有才华、有品格，心系苍生，有家国情怀。然而他们干了很多荒谬的事，说过很多荒谬的话。他们是坚定的，也是善变的。他们是温柔的，也是无情的。

他们有各自的梦想，如段祺瑞和吴佩孚一直要武力统一中国，如杨度痴迷君主立宪。

他们有各自的追求，如张作霖想逐鹿中原，如章太炎寄希望于强者。

他们有人坚信帝国梦，有人坚信民国梦，有人在帝国梦和民国梦之间摇摆不定。要弄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必须理解山河破碎之中个人灵魂被撕裂的痛。只有理解了这一切，方才能弄清民国，弄清中国近代史，弄清历史周期律之下的沧桑变迁，喜怒悲愁。

但不论如何，他们都将退出历史舞台。推动他们退出的那个人，叫蒋介石。

不算序言的序言

本人认为，迄今为止对袁世凯描述最为准确的言语来自袁世凯的遗书：“恨只恨我，读书时少，历事时多。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

这是袁世凯的自我总结。“读书少，历事多”是他一生的写照，既锻炼了他精明的个性和高超的处事手腕，也造成了一个难以克服的缺陷：临死之前方才意识到体制更迭过程中没有捷径可走。要么像曾国藩和李鸿章那般，为旧日破船（帝国）鞠躬尽瘁；要么就像日后的革命党，重新再来，另造新船。

所以近代历史上，袁世凯既是旧人又是新人。

袁世凯有些像近代曹操，但比曹操幸运（有革命党帮他推翻帝国，无需扭扭捏捏地挟天子以令天下），又比曹操不幸（曹操没有强如列强那般的外敌）。

袁世凯临死之前，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很多人对这样一副挽联莫名其妙。《二十一条》就是袁世凯签的，“共和”也是袁世凯亲手毁掉的。袁世凯有什么理由认

为自己是日本人的“劲敌”？其实这个很好理解。日本真正的劲敌不是袁世凯，而是中国，确切说是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那个时候，最有可能给中国带来统一的人，就是袁世凯，可惜他走错一步棋，所以他要“看中国再造共和”。

帝制行不通，只有共和了。

共和也要靠人执行。袁世凯选择了三位继承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临死之前，段祺瑞和徐世昌前来探望。袁世凯拉着徐世昌的手说：“我被群小所误，以至于有今日。幸亏国事有依法承继之人，可以不必担心了。宋卿(黎元洪)虽没什么雄才大略，但若兄和芝泉(段祺瑞)象周公、召公夹辅成王那样，收拾时局，应非难事。”

不难么？很难，因为袁世凯身后是一个烂摊子。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从副总统的位置上转正。但黎元洪大总统和袁世凯大总统不一样，袁世凯可以乾纲独断，黎元洪只是政治玩偶。因为袁世凯的总统为实力所得，黎元洪的总统是北洋实力派的恩赐。因为民国恢复了内阁制，段祺瑞为内阁总理，掌控实权。

黎元洪是“老好人”，却也抵挡不了权力的诱惑，开始和内阁总理段祺瑞较量。吃了几颗雄心豹子胆之后，黎元洪罢免了段祺瑞，却招引大军阀张勋入京搞复辟。无奈之际，黎元洪抹了几滴眼泪，灰溜溜辞职走人。

段祺瑞再次上台，收拾完张勋，又把冯国璋从南京忽悠到北京充当盖印机器。

冯国璋同样抵挡不住权力的诱惑，走上和黎元洪同样的道路，和段祺瑞不和，接下来让段祺瑞下台。冯国璋有地盘、有军队、有钱、主意多，但只是“军人”，政治上玩不过段祺瑞，又被迫请段祺瑞上岗，自己生闷气。

段祺瑞玩政治的手腕很不错，却是一位“狠人”，主张以武力讨伐西南派。冯国璋是军人，却主张和平统一。双方相互拆台，北洋系统内部分裂。最后段祺瑞操纵国会把冯国璋轰下台，徐世昌走上大总统的座位。

徐世昌只是一个“闲人”，凡事搞出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实力甚至不如黎元洪，但依然抵挡不住权力的诱惑，走上和黎元洪、冯国璋同样的道路：和段祺瑞争权。他一方面对西南捣乱系释放善意，一方面拉拢曹锟和张作霖对付段祺瑞。

冯国璋死后，曹锟成为直系军阀的新领袖。曹锟的台柱子是吴佩孚，吴佩孚崇拜冯国璋，在讨伐西南捣乱系的过程中停了下来，自己和段祺瑞捣乱。几个回合之后，直皖战争开打。直系胜，段祺瑞下台。

这就是所谓的“府院之争”，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斗争。在他们斗争的过程中，日本一日千里，并且在中国攫取了更多利益。

是不是够乱？当然是。还有更乱的。

直系的后台是英美，皖系和奉系的后台都是日本。但是在直皖战争中，奉系帮助直系打皖系。战争打完，拉拢直系和奉系的徐世昌被迫下台，因为他的总统是皖系人马选上去的，不合法。徐世昌灰溜溜地走人，接下来黎元洪再次坐上总统宝座。

老好人黎元洪再次面临权力的诱惑，忘记了上次的不快，毅然走进那个熟悉的地方。然而很遗憾，等待他的将是更为不幸的结局——遭遇兵变。

曹锟是个混不吝，什么事都不怕，什么事都想尝试，自然对大总统宝座想入非非。黎元洪之所以能再次上台，完全是吴佩孚的主意。直皖战争是吴佩孚打赢的，曹锟依赖吴佩孚，只好暂时克制欲望，但从第一天开始就给黎元洪使绊子。经过一番动作之后，黎元洪再次下岗，再次抹眼泪。曹锟通过一种比袁世凯当皇帝更过分的方式当上了大总统。

这还没完。皖系失败之后，奉系和直系的矛盾不可调和。吴佩孚虽然弄倒了段祺瑞，实质和段祺瑞是同一种人，主张武力统一全国。面对咄咄逼人的吴佩孚，张作霖开始拉拢皖系，妄图入关逐鹿中原。既然如此，只能以战争解决。

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战胜张作霖。第二次直奉战争，犬牙交错之际，正如段祺瑞对西南用兵，吴佩孚倒戈一样，直系大将冯玉祥倒戈，曹锟完蛋，吴佩孚的人生走向低谷。

然后张作霖和冯玉祥又有了矛盾。几经周折，又把段祺瑞抬了出来。此时段祺瑞已经没有实力，却决心和老对头孙中山搞合作。

经历清帝国灭亡和袁世凯失败之后，孙中山存活下来，并且在南方立足，已经是巨头级别的人物。然而很遗憾，孙中山虽然立足，却从来不稳。西南捣乱系对他爱理不理，连老革命陈炯明都要对他开炮。

孙中山被南方的军阀折腾得心力交瘁，决心和段祺瑞合作。

然而合作尚未开始，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蒋介石登上历史舞台。原本混乱的乱世更乱了。

好吧，这就是那段往事。看似乱哄哄的，实际上规律非常之清晰。

规律之一：凡是在台上掌权的，都很臭。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不论总统还是总理，没有一个平平静静地把任期干满，无一例外地被轰下台。

规律之二：凡是走红的，必然变丑。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无一例外地遭遇各种失败，遭遇各种势力攻击。张作霖身在关外，稍微好一点，不用通电下野，最后却惨死于日本人手中。吴佩孚原本有机会统一中国，却一败涂地。冯玉祥甚至没来得及施展。

规律之三：不论是掌权的还是走红的，倒霉之后都变香。看看黎元洪，把总统和副总统反反复复干了好几遍。看看段祺瑞，四度担任总理，有“三造共和”之美称。看看吴佩孚，即使败走四川时，仍然得到复出之机遇。

乱象和选择

正常国度，那些规律不应该存在。

正常时代，那些规律不应该存在。

如何解释这些东西呢？有两个简单的答案。

简单答案之一：尚未稳固的国家权力崩溃。

简单答案之二：历史周期律运作。

两个简单答案结合成一个答案：尚未稳固的国家权力在历史周期律作用下的崩溃。这样说起来似乎有些严肃、难以理解。那么好吧，后面慢慢分析。

纵观人类历史，政权更迭已经足够复杂。涉及到体制变更，那就更难以说清。

以英国人为例，宗教改革之后的两百年，经历了多个王朝更替，经历处死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的复辟，经历多次战争之后方才稳固在君主立宪制上面。

以法国人为例，处死路易十六，经历了形形色色的短命政权，经过拿破仑的成功和失败，经历若干次帝国和共和国，方才稳定。

英国和法国，在历史周期律第四层次占得先机，提前进入工业时代。它们的制度变革之时，伴随着全球掠夺财富。尽管如此，尚且浪费如此之多的周折。再看看德国，工业化稍微晚了一点，再想全球掠夺，却引发世界大战。

中国在被人掠夺的情况下实施体制转变，既幸运，又悲哀。

所谓幸运，前面有参照物。

所谓悲哀，在被掠夺的情况下，自己的事，自己做不了主。

孙中山和袁世凯的对手戏诠释了历史周期律第三层，引发体制变更，前面已经说了很多。接下来应该讲历史周期律第二层。但是仔细研读清末民初历史就能发现，还有一帮人绝对不能忽视，那便是文人。

根据历史周期律第三层，体制更迭律，任何体制的运行轨迹总趋势也是走向毁灭，但是在它诞生或毁灭的过程中，除必然包含前两个

周期运转之外，还必然涉及思想变更。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次体制变更，都有两条路，一条为文，另一条为武。

谈论国家权力，谈论历史周期律，离开任何一条，如同追求一条腿走路，都是瞎扯。

好比正常人变成精神病，行为混乱的前提是思维混乱。

国家或民族的混乱首先是思想上的混乱。

任何历史周期律之下的混乱，首先是思想的混乱。中华帝国史上那种数百年的春秋战国史有些遥远。看看近代欧洲人，体制变更过程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各种启蒙运动，可谓乱象丛生，不一而足，但从历史周期律中看就很有序。

所以要解释中国近代之混乱，必须首先解释国人头脑之混乱。

带给国人现实之动荡，是因为军阀。他们是迷惘的一群人，行为如同怪兽。

带给国人头脑之混乱，是另外一群迷茫的人，他们号称大师，却找不到出路，犹如老古董一般，价值很高，实用性有限。他们占据了国人的思维。他们是如何迷茫的呢？看看几个几个例子便知。

实例之一：王国维式。

王国维生于一八七七年，和杨度、梁启超同时代人。他出自书香世家，视野开阔，学术上造诣很深，东西方学术均有涉猎。

王国维对东方文化的理解，在《人间词话》中写得很清楚：“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困惑迷茫）。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执着追求）。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顿悟开朗）。此第三境也。”

但王国维并不是一个保守之人，他试图把西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与东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结合，实践创新，取得惊人成就，胡适、顾颉刚等人均问教过他。这样一个人不论在任何时代，个人生活都可以过得很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选择自杀。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号，五十岁的王国维照常起床、盥洗、吃早饭、去办公室批改试卷，之后向朋友借了两块钱、雇人力车夫去颐和园，在昆明湖畔抽了支烟，投水自尽。他留下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后人猜测王国维自杀的原因，版本五花八门。其实原因很简单：绝望。

王国维的内心受过多次伤害。一九一二年清帝退位时，王国维很受伤。一九一六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王室赶出北京城，王国维再一次很受伤，要自杀，被家人劝阻。日后虽然去清华大学任教，依然请示溥仪。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北伐，横扫南中国，旧时代没有指望了。随后国共分裂，新时代继续杀戮。五十岁的王国维蓦然回首才发现，他是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看不到希望，对于有良知和品格的精英而言，活着等于屈辱。

看看清廷那模样，为王国维不值。

实例之二：辜鸿铭式。

辜鸿铭生于一八五七年，比王国维年长二十岁，和康有为算同一时代的人。如果说王国维的行为很难理解，那辜鸿铭只能用怪异来形容。

论学问，辜鸿铭和那个时代的大师们一样熟读经史子集，不仅如此，他还熟读西方各种经典著作，文如莎士比亚，理如培根。他熟悉精通九种外语，从英文、德文、法文到希腊文、拉丁文，无所不包，可以无障碍阅读西方各个文明段的书籍。如果他愿意， he 可以把西方任何流派的思想引进，成为鼎鼎大名的学者。

这样一个人，在他了解了西方文明之后，却坚守东方文明。他没有像胡适那般把自由主义奉为至宝，也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信仰共产主义，更没有像王国维那般自杀。他试图把《论语》等著作翻译到西方世界，向西方宣扬东方文明，并收获了热烈的掌声。辜鸿铭对学生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辜鸿铭认为：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

面对低谷，辜鸿铭选择了坚持。

但辜鸿铭的学问和才华不足以影响那个时代。因为按照辜鸿铭的想法，他除了喜欢孔子那一套，他还喜欢娶小老婆，还喜欢小脚女人。所以当他拖着长长的大辫子在北大校园遭到嘲笑时，反击：“我头上

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言辞虽然精彩，但仅此而已，更像老古董逗乐而已。

实例之三：竺可桢式。

竺可桢生于一八九零年，浙江人。

竺可桢学习很好，很有才华，为中国近代气象学和物理学做出很大贡献，大师级人物。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当了十几年的校长，培育人才无数，和蔡元培、蒋梦麟、罗家伦并列为民国四大高校校长，名头很响。

这些不足以彰显竺可桢的风骨，他的风骨体现在那次“文军长征”上。

淞沪会战开始，日军袭击杭州，浙大已经难以正常上课。竺可桢把浙大新生搬迁到天目山，继续上课，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号。

会战失败，浙大再一次面临危机。竺可桢再次把学校西迁到（浙西）建德，继续上课。

日军西进，国民党迁都，竺可桢带领浙大师生从建德出发，途径金华、兰溪、常山、玉山、南昌，到江西吉安，继续上课。

一九三八年，江西不再安全。竺可桢再次带领师生西去，搬迁到广西宜山，宜山宜水不宜人。师生们毫无怨言，继续上课。

一九三九年，宜山不再安全，竺可桢再次带领浙大迁移，出广西，入贵州，在遵义、湄潭落脚，继续上课。

两年多的时间，竺可桢带领浙大师生辗转于浙江、江西、湖南、

广西、贵州六省，行程五千里，名副其实的文长征。他们没有交通工具，全凭自己。他们不仅仅是走了，还要搬运大量的实验器材和书籍。不仅如此，他们还帮助相关单位转移文物，比方说参与转移《四库全书》。他们没有退缩。

沿途风餐露宿，条件艰苦，很多人生病，还有人死去。竺可桢的结发之妻就在那个时段死去。但是他们没有退缩，坚决前行。

日军曾经针对迁徙中的浙大师生丧心病狂地轰炸。但是他们没有退缩，没有被吓倒，坚决前行。他们坚定的脚步摆脱了阴影，锻造了自己的风骨，最终迎来光明。他们诠释了中华民族为何可以抗击风险、存留至今。队伍中的一些人日后名动海内外，比方说苏步青。

竺可桢，无所畏惧。他的行为，带领大家看见了希望。

从自杀的王国维、到坚守的辜鸿铭、到无所畏惧的竺可桢，可以看出，中国真正的精英在蜕变。不论是哪一种人，都付出了很大代价，内心充满煎熬，灵魂接受考验。

如何描述这些大师们呢？我想到一个词，古董。

目录

第一篇 大师和古董

一章 所谓大师-----	1
二章 奇人杨度-----	8
三章 大师的梦想-----	20
四章 梁启超这个人-----	28
五章 章太炎骂人-----	42
六章 不幸和幸运-----	53

第二篇 大总统和玩偶

一章 老好人的世界-----	62
二章 克星-----	72

三章 权力的模样-----	83
四章 大老粗·梦想·戏剧-----	96
五章 总统和枪-----	110
六章 缺陷和致命缺陷-----	123
七章 刀俎和鱼肉-----	135
八章 多余的人与大总统-----	148
九章 曹锟的世界-----	162
十章 买与卖-----	175

第三篇 总理和怨妇

一章 特殊的战争-----	191
二章 特殊的段祺瑞-----	202
三章 廉价的共和-----	214
四章 段祺瑞谋国-----	226
五章 手腕和决心-----	239
六章 被遗忘的大事件-----	253
七章 悲剧-----	266

第四篇 军阀和怪兽

一章 乱世奇葩-----	278
--------------	-----

二章 历史和战争-----	291
三章 梟雄模范-----	302
四章 次危机-----	314
五章 宿命轮回-----	327
六章 理想和现实-----	340
七章 转折和暴力-----	352

第一篇 大师和古董

一章 所谓大师

所谓知识，便是人类对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知。

所谓知识分子，便是探寻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的那些人。

知识分子通常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人类社会的良心。它有崇高的一面，也有卑微的一面，因为良心有好有坏。知识分子的世界，便是崇高和卑微交织的世界。

如何描述那个世界呢？一个字，俗。

这个俗，并非指知识分子本身很俗，而是指知识分子的世界也是一个江湖，充满各种真实和谎言、忠诚和欺诈、合作和斗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永远都是龙蛇混杂。普通人常常难以辨认，有时把龙当成蛇，有时又把蛇误以为龙。

在知识分子的世界，有人用知识改变世界面貌，推动世界前进；有人只知道招摇撞骗，并且以先知的模样行走于世，欺世盗名。有人用知识造福自身和他人；有人只想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相对于妓女卖身，他们出卖灵魂。

知识分子中有人铮铮铁骨，如文天祥、谭嗣同；也不缺乏汉奸走狗，如秦桧、汪精卫。

要理解这些“是与非”不难，难在理解另外一类知识分子，他们总是在“是与非”之间徘徊。他们有时候像救世主，另一些时候像恶魔；有时候如贞洁烈女，有时候又像来自于风尘之地。如此这般，在近代史上表现尤其明显。

知识分子有不同档次。

读过两本书便指点江山、咋咋呼呼，如此行为和泼妇骂街一个档次，门外汉。

真正的知识分子，会静下来研究学问，要么钻研理论，要么把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他们的工作即使无法推动社会前进，至少也能提升个人修养。他们是真正的精英，和那种号称“把水变成油”的知识郎中（伪精英）有本质的区别。

精英中的精英，升华为大师。精英和大师的区别，便是一般儒生和曾国藩的区别，便是普通大学物理教授和斯蒂芬·霍金的区别。

大师还可以进一步升华为宗师。在人类历史上，宗师级别的人物，凤毛麟角。

真正的知识分子会有自身的需求：主心骨或大腿。

所谓主心骨，精神寄托或理论支点。比方说搞科研，就难以绕过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人，他们是科学界的图腾，是很多人的精神寄托，即使不崇拜他们，也离不开他们的理论。比方说研究宗教，重要围绕耶稣、安拉、佛祖，即使没有信仰，也脱离不了他们的言行。比方说研究伦理规范，总是离不开孔子。比方说研究哲学，总是绕不开老子、柏拉图等人。他们都是宗师级别的人物，在各自领域内有着不

可撼动的位置。即使岁月流逝，依然色彩不减。知识分子需要他们，人类需要他们。

——一直白点说，就是脑袋如何思考。

所谓大腿，现实选择。个体总是要站队、拉帮结派、搞关系，即使不愿意，往往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世界是现实的，研究也好，实践也罢，都需要很多现实条件。任何人都无法免俗，都需要妥协，都需要有立场。大腿的选择很多，可以是达官贵人，也可以是超级富豪，或者某个派别的领袖，或某个领域的大师。无外乎权、财、名三个字。

——一直白点说，就是屁股坐在哪边。

究竟是屁股决定脑袋还是脑袋决定屁股？这是个问题。

同一个团队内部，有人屁股决定脑袋，有人脑袋决定屁股。要分清哪些人的屁股重要，或脑袋重要，很难。更难的是，即使是同一个人，有时候屁股决定脑袋，有时候脑袋决定屁股。比方说要区分康有为的不变和梁启超的善变，就很难。

所谓大师

知识分子也好，大师也罢，一代宗师也罢，都需要土壤，很独特的土壤。宗师级的人物数量有限，说说大师级别的人物吧。

大师土壤之一：民族。

能产生大师的民族必须能生存延续下来。古往今来的民族，多半

都消失了，他们的大师何在？甚至有没有出现过大师？是谁创造了玛雅文明？曾经显赫一时的契丹人哪里去了？

能生存延续下来的民族，也未必能诞生大师级人物。看看那些大山里和沙漠中的民族，他们需要的是救济。

时至今日，盛产大师级人物的民族主导世界话语权。

大师土壤之二：时代。

历史上大师级别的人物有不少。如今主要国家，都诞生过很多大师级的人物，要一一描述基本不可能。但是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大师级的人物，绝大多数诞生在历史周期律第三层（体制变更律）和第四层（物力转移律）运转的时期，也就是传说中的乱世。

以欧洲为例，大师级人物主要诞生在十七世纪之后，那时中世纪的宗教统治解体，向资本主义过渡，属于历史周期律之体制变更范畴；也是农耕时代和游牧时代向工业时代过渡，属于历史周期律之物力转移律的范畴。看看牛顿、莎士比亚、达尔文、笛卡尔、伏尔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些人，如果在之前的时代，很可能会享受布鲁诺的待遇。

要论乱世，中国乱世最多，因为中国历史延绵不绝，从古至今，经历体制变更的次数最多，大师级的人物也很多。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发现，他们基本上集中在体制变更时代。

春秋战国之际，奴隶制度解体，封建制度建立，属于历史周期律第三个层次；与此同时，农耕文明划时代进步，属于历史周期律第四个层次。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或乐山、或乐水，积极思考，上下求索，

诞生了百家诸子。

伦理道德方面，有孔子和他的粉丝们。

哲学宗教方面，有老子和他的粉丝们。

军事战争方面，有孙子和他的粉丝们。

如此这般，中华帝国方能在农业时代名列前茅。

两千年之后，中华帝国解体，再一次到了体制变更之时。乱象丛生之际，山河破碎之际，国破家亡之际，又到了大师们的时代，又到了知识分子和大师们灵魂展露之时。

民国大师们学问够大、名头够响，但是和春秋诸子比起来，均有那么一点不足。如何解释这个因素呢？先看看他们的传承。

曾国藩醉心于帝国梦和大清帝国，为此不惜自我搞臭。

曾国藩的老乡兼幕僚王凯运醉心于帝国梦，但已不再相信大清帝国，想要曾国藩自立门户，遭到呵斥之后，转身教学。他教出来的学生，已经是戊戌变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王凯运的得意门生，杨度不但不再爱大清，连帝国梦都淡了。他追求君主立宪制，但是在君主立宪的泥潭里上不来。因为君主立宪制的核心有两个，君主和立宪。辛亥暴动之后，君主没了。所以杨度要实现梦想，首先要找到一个君主，所以他才死缠着袁世凯不放。袁世凯之后，杨度还在找能当皇帝的人，所以才感叹蒋介石不愿意当皇帝。但是立宪，已经在修改帝国政体了。

再看康有为，目空一切，以圣人自居，却也想改变政体，实施君主立宪。当然康有为是老古董，比杨度还顽固。杨度好歹还知道变通，

康有为死守皇室不放。

梁启超作为康有为最得意的弟子，十几年沉浮之后，舍弃君主立宪，赞同共和，并不惜和康有为决裂。

梁启超学富五车，但他的学生之中，最有名的却是蒋百里和蔡锷，两个军人。好吧，二人文学功底也不错，勉强称为儒将吧。

蔡锷和蒋百里的学生，如唐生智，如李宗仁，都是将军、统帅。

完全变了味。

能想象孔子、老子、墨子的学生放弃手中的笔，变成将军么？当然不能。因为那意味着传承断绝，意味着后继无人。

原因其实很简单：百家诸子身处体制主动变更之大潮，完全是主动探索；近代大师们面临体制被动性变革，完全是被动应对。诸子百家的思考，被粉丝们传承下来，传承了千年。近代大师们，基本都摇摆不定，君主立宪也好，共和也罢，政党政治也罢，都是奉行“拿来主义”。

立场和结局

站在民国初期看，要论大师，首推康有为。

康有为自称圣人，行为更像狂人，不论如何，其历史地位无法否认。他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通过重新解析孔子而掀起近代史上第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横扫千军如卷席，把知识分子的脑袋从中华帝国的泥潭里拉了出来。

康有为的梦想就是通过重新解读孔子完成体制升级，即围绕爱新觉罗家族（君主）推行精英政治（立宪）。

思想界的康有为，如同政治界的袁世凯，旧时代最后一人，新时代第一人。

正是康有为的工作，才有了梁启超、杨度、章太炎、严复这些人，他们是第一场文革（戊戌变法）的受益者，又成了第二场文革（五四运动）的革命对象。

同样站在民国初期看，要论老古董，首推康有为。

从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一六年，二十年过去了，皇帝没了，帝国没了，康有为还是康有为。

一九一六年的康有为依然主张设立孔教对抗基督教，防止西方世界给国人洗脑，美其名曰守护思想阵地；依然以孔子第二、儒教教主自居，让国人对她顶礼膜拜。

一九一六年的康有为和袁世凯一样处于众叛亲离的状态，章太炎、严复等江浙的大师们和他作对也就罢了，曾经的追随者杨度都不能合作，最得意的弟子梁启超都与之决裂。相比袁世凯，段祺瑞和冯国璋还是只反“帝制”不反“袁”。和袁世凯不一样的是，康有为虽然也很恼火，但生活很不错，在杭州养老，还娶了一个年轻的小老婆；时不时骂一骂梁启超忘恩负义；闲情雅致之余，和辜鸿铭探讨一下帝国时代女人“可爱的小脚”。

那么鼎鼎大名的康有为怎么会成为老古董呢？

因为那个时代变化太快。辛亥暴动之后，康有为还死守爱新觉罗

家族（老古董）和君主立宪（按照他的理论，那是通往大同世界的第二个层次）。当爱新觉罗家族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康有为沦为老古董。

辛亥暴动之后，还有大师级的人物死守君主立宪，但和清王室作对。他便是杨度。

辛亥暴动之后，还有大师级的人物从死守君主立宪到反对君主立宪。他便是梁启超。

辛亥暴动之后，还有大师级的人物主张暴力革命。他便是章太炎。

然而所谓的大师们，选择各不相同，立场各不相同，梦想各不相同，但结局和康有为一样，均沦为老古董。他们不想沦为古董，却不可避免地沦为古董。

弄通了大师和古董的关系，也就搞懂了那个时代。

这是怎么回事？首先需要了解几个人和他们的梦想。

先从杨度的事开始说吧。

二章 奇人杨度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

“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比起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热情洋溢，充满悲凉。

湖南人，从曾国藩、左宗棠到黄兴、宋教仁、到毛泽东、刘少奇，勾勒出中国近代史的脉络和风景。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设计变法时已做了最坏打算：如果中国遭列强肢解，汉人将退到湖南修生养息，保持种苗，再图兴起。杨度写《湖南少年歌》，恰好是戊戌变法失败，东渡日本避难之时。通篇充满危机感：“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杨度，另一个湖南人，奇人，有奇才的奇人。

杨度才思敏捷，写文章一流，诗词功夫一流，书法一流，还懂点绘画。另外，他还精通法学。这种人放到现在，专家学者的头衔满身都是。但杨度并没有打算依赖自身的才华讨生活，他有自己的品格和追求。

杨度生于一八七五年。他的祖上都是军人，大老粗。

杨度早年的特长是学习，效率非常高。一八九二年，十七岁的杨度考中秀才。一年之后，便高中举人。但杨度并不是书呆子。他有个老师叫王凯运，此人堪称湖南大儒，却一点也没有儒生的迂腐，早年曾为曾国藩幕僚，劝说曾国藩反清自立为帝，被曾国藩呵斥为“妄人”，后专心讲学，教出很多人杰。戊戌六君子之中的杨锐和刘光第均出自他的门下。

王凯运传授的学问有三项：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功

名之学就是科考之术，代表人物有很多。诗文之学，既能修身，也能有一技之长谋生，伟大的齐白石便是其中代表。王凯运认为，最高学问是帝王之学，只有聪明绝顶之人方能学习。那种学问很玄，好听的说法，叫安定天下之计策，难听的说法，叫唯恐天下不乱。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解释。有兴趣者，可以参考诸葛亮、刘基、姚广孝等人干的事。总之都是绝顶聪明之人干的事。不够聪明的话，粘上就会倒霉，搞不好就要身首异处、身败名裂。

王凯运自视甚高，却亲自跑到杨度家招他为学生。王凯运认为只有杨度方有资质学习帝王之学，视杨度为衣钵传人。

学成之后的杨度虽不如康有为那般狂妄，却也自信能与王者为伍，“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杨度一辈子，都在试图和王者为伍。在那个过程中，杨度成了一部近代史。要弄清这一切，先看看杨度的人际关系。

杨度的同学和朋友

王凯运门下，杨度的同学有杨锐、刘光第那样的革命志士，也有齐白石那样的伟大画家。戊戌政变之后，杨度不顾王凯运的反对，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日本，杨度几经辗转，遇见若干同学，其中有三个非常有名。

杨度的同学之一是汪精卫。两个很有才华之人走到一起不奇怪，两个很有才华但追求不同的人走到一起就有些奇怪。汪精卫是热血革

命者，杨度是铁杆立宪派。如此两个人走到一起，只能说那个年代很有趣。日后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被抓，袁世凯上台之后赦免了汪精卫，除了对革命党示好，另外就是杨度出了力气。随后杨度充当北京政府议和参赞，汪精卫为南方议和参赞，二人为南北和谈出了力气。十年之后，汪精卫任国民党主席，杨度在北洋军阀张宗昌麾下讨生活，二人又成为政治上的对头，但私交依然很好。如果杨度多活几年，面对当汉奸的汪精卫，不知会是什么态度。

杨度另一个很有名的同学是蔡锷。两人一文一武，都是留学生中的尖子，关系非常好。每逢节假日，杨度总是和蔡锷一起过。尽管两人日后因信仰不同各奔东西，但并没有影响私人情谊。袁世凯搞帝制，让杨度去游说蔡锷。蔡锷忽悠杨度，跑回云南讨伐袁世凯。帝制失败，杨度被列为祸首，只有蔡锷为杨度辩护。

杨度的第三个有名的同学是黄兴。两人一见如故，在一起干了很多事。对杨度而言，黄兴最重要的事是给杨度介绍了一个朋友，孙中山。

当时的孙中山政治上已经成熟，提出了三民主义，组织了同盟会，正网罗人才，准备干一番事业。杨度鼎鼎大名，自然是招揽对象。然而任凭孙中山使出全身解数，始终无法说服杨度加入同盟会。据说两人谈了三天三夜，大战成千上万回合。杨度表示钦佩孙中山的见识和胆识，但更相信自己的主张。杨度对孙中山说：“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两人虽然志不同、

道不合，但始终没有相忘。

日后孙中山遭遇陈炯明叛变，想到了杨度，让他劝说曹锟不要率军南下夹击自己。曹锟也是杨度的朋友，杨度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曹锟。事后孙中山感叹杨度很够朋友。

杨度还有很多朋友，比方说杜月笙。但杨度眼中，杜月笙分量太轻。就在那个时候，杨度结识了人生最后一个重量级朋友，那个人就是当时化名“伍豪”的周恩来。

一九二九年，中国共产党最低落的时候，杨度成为一名党员，入党介绍人正是周恩来。他的责任是负责收集情报，和周恩来单线联系。即便是后世，也没有几个人能想到，君主立宪制的杨度会成为中共地下党员。

杨度就是这样一个人，政见和所有人为敌，私下和所有人为友。

所以要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界，要理解那个时代大师们的脑袋，就要从杨度入手。杨度是理解那个时代的钥匙。他处于节点上，是连接各个派系的核心人物。

常言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杨度就有一种魅力：可以和志不同、道不合之人交朋友。

要解释这样一个人很难。可以看看杨度另一篇短小诗歌《黄河歌》：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

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

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从这首歌里，能读到一种力量，一种雄心。古往今来，凡是拥有雄心和力量的人，总是独具魅力。然而纵观杨度的一生，他虽然朋友很多，却迷茫无助，晚年落魄到依靠杜月笙讨生活，可谓郁郁不得志。

那么杨度的志向是什么呢？一九三一年，杨度去世前夕，和章太炎等人一起吃饭，谈到时局，谈到蒋介石。杨度高声说：“可惜得很，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祖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

好吧，皇帝便是杨度一生的梦想所在，也是他迷茫的根源。

杨度和袁世凯

杨度一辈子都在做一个梦：在皇帝身边当时代弄潮儿。想做弄潮儿的人很多，但是能在皇帝身边做弄潮儿的人，从来就很难。特别是当皇帝不再是绝对权威之时，更难。

他想继承发扬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等人的光辉传统，做一个

从“龙”之人。那是自古以来大多数想干一番事业的知识分子的梦想。

龙，华夏之象征。

悲哀的是，他生活在乱世，历史前所未有之变局，一个“龙灭”的时代。

欣喜的是，他生活在一个离龙灭不远的时代，他有机会实践梦想。

纵观杨度一生，唯一的机会来自袁世凯。

辛亥革命之后唯一有机会当皇帝的人只有袁世凯。杨度和蔡锷、汪精卫、孙中山的关系，基本是私人关系，政治追求上是对头。唯有对袁世凯，杨度倾尽毕生心血和才情。杨度从袁世凯身上看见“君主立宪”成功的希望，看见从“龙”的希望。

一九一二年夏天的“二次革命（或暴动）”之后，袁世凯用两年多的时间改变民国体制，以不流血的方式把“共和”改回“帝制”。除袁世凯手腕高超之外，关键是通过了一项手段，一项欺骗性很强的手段，简而言之，合法手段。

袁世凯每走一步，都有法律依据。尽管那些法律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然而那个时代，本身就是创造法律的时代。我们现代人不认可它们，但当时国人对它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孙中山才会“继续革命”，继续当“通缉犯”。

袁世凯每一步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杨度。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给袁世凯称帝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个文章很长，水平很高，把近代屈辱史讲了一遍，论证了君主专政的屈辱（大家都知道），也论证了共和制（皇帝退位之后）的屈辱。一把鼻涕一

把泪地讲道理，很有感染力。

杨度得出结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君主专制不行，共和也不行，只有折中调和（君主立宪）才行。

杨度开出药方：“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对于如此这般惊世骇俗的观点，杨度特意表态：“予之宗旨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虽举国反对，予必一人坚持，无论何种利害祸福皆非所计。若反对仅出于文字语言，更不必计较。”是不是很有种？

更有种的是，杨度特意在报刊上发文章：“君主立宪本为予平生唯一之政见。”

还嫌不过瘾，杨度特意发布个人声明：“至于鄙人宗旨，于‘君主立宪’四字，一字不可放松。立宪而不君主，必不足以固国本，鄙人所反对也；君主而不立宪，必不足以伸民权，亦鄙人之反对也。设使国民研究之结果以改为君主为宜，则鄙人实可预知将来宪政必能成立，即他日鄙人一身无论在朝在野，皆必以确定宪政为终身之目的，为一生之责任，以定成平日之宗旨，且以之对我国民亦主张君主者所当然应负之义务也。故自鄙人意见论之，欲救中国，非立宪不可；欲立宪政，非君主不可。予在前清固抱此旨，证以民国政象而自信益深，以为救国图存之法无过于此也。”

袁世凯看到《君宪救国论》之后，大笔写下“旷世逸才”四个字，

秘密送给各省的官吏、官僚、官奴们看，让他们发表意见。大家一看明白了，老头子原来想要如此这般。

杨度的筹安会，帮助袁世凯称帝挂羊头（探测舆论）卖狗肉（制造舆论）。

杨度的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把伪造民意和烘托气氛的事干到极致。

袁世凯称帝的每一步都有杨度的身影。甚至最后的推戴书，都是杨度执笔。在那之前，袁世凯受过很多赞誉，包括老对手黄兴，包括蔡锷，都曾极力赞誉袁世凯为当世英雄。至于追求者肉麻的吹捧，更是数不胜数。但是这些赞誉加在一起，都不如杨度这篇推戴书质量高。杨度用他的生花妙笔把袁世凯夸得如同花朵一般纯洁完美，又如天神一样孔武有力。相当于硬生生地把土、肥、圆描述成高、大、上，把袁世凯乐得合不拢嘴。

可以很肯定地说，没有杨度，袁世凯也许依然会走向帝制，但绝对是另外一种方式。究竟是什么方式，好吧，那是谜。

所以袁世凯死后，杨度光荣地登上“帝制祸首”的位置。

据说袁世凯死时说：“杨度误我！”

杨度给袁世凯送的挽联很能说明问题：

共和误民国，民国抑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是是非非，任人评说，但谁能说清楚？

唯一能说得清的是，杨度和袁世凯，是一对活宝。没有他们，近代史将失去很多趣味。

作为才子的杨度，才高八斗。身为政治人物的袁世凯，手腕出神入化。他们原本应该是黄金搭档，却沦为笑柄。以二人的才华和能力，如果早十年搞君主立宪，成功概率会大增。如果早二十年搞君主立宪，也可能中国现在还在君主立宪之中。如果光绪皇帝有袁世凯的能力，那么大清皇室可能今天还在。

不禁要问，君主立宪究竟是什么东西？很简单，秩序。

所谓君主立宪

所有的体制，都是一种秩序。

秦始皇之后，中华帝国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君主专政，并由此发展起来伦理道德（儒家）、法律法规（法家）、精神探索（道和佛）、人才选拔（科举制）。大家在那种秩序里面生活了两千年，自我感觉还不错。但是到了十七世纪，欧洲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农业帝国看起来是那么的愚蠢落后、可笑可悲。

民国初年精英们追求的共和制，也是一种秩序。就是不要皇帝乾纲独断，精英在一起协商解决问题。这个制度看起来很不错，但民国时代，精英们常常谈不拢就动手。特别是大老粗谈问题，经常室内文艺片布局尚未完成（桌面上还没谈），室外已经开播战争片了。

所以就有一部分人想要一个人做大家的精神象征（君主），精英们掌控实权（立宪），这样一种秩序。他们认为，这样既可以发挥众人的力量，又不至于闹分裂。

君主立宪制是一种妥协，一个曾经徘徊在华夏大地天空的幽灵，吸引了很多人，葬送了很多。戊戌变法那会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康有为和梁启超已经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依然失败。

从戊戌变法到袁世凯称帝，前后二十年时间，君主立宪怎么就没成功呢？事实上当时的世界，君主立宪制最成功的是英国。英国是超级大国，世界头号强国，其他国家都要看它的脸色。如果大清帝国能够像英国那般满世界抢劫，让各方势力都得到足够的利益，也可以成功。如果袁世凯和杨度能做到这一点，也能成功。问题是，他们行么？

英国人尊重君主，是因为在君主的领导下（维多利亚女王），帝国走向巅峰。中国的君主，不论是光绪（战败）还是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带来的都是耻辱。

再看立宪。英国国会那帮人，都可以通过海外势力获益，受苦的是全世界。中国的那些人，想要钱，只能搜刮老百姓，受苦的是国人。如何立宪？因为老百姓一旦参与，他们搜刮的难度会变大，利益会损失。不论保守派和革命派如何你死我活，但是在对待老百姓的问题上没有本质区别。保守派并不想改变千年以来的愚民政策，革命派不准老百姓参加革命。真正能解决问题的那个人此时还是一个莽莽撞撞的年轻人、心中还存留着许多幻想、生活还没着落；经过辛亥革命前后

的彷徨之后，他决定重回学校学习；若干年之后，他登上了历史舞台，让天下英雄黯然失色。他也是湖南人，也唱《湖南少年歌》。

疑惑

杨度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品格足以和所有人做朋友，他的梦想足以和所有人为敌。他是如此有能量又如此孤单。

实际上杨度并不是君主立宪的最后一个信徒。君主立宪的旗手原本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人应该是杨度的盟友，然而在那紧要关头，他们都是杨度的敌人。

当杨度和袁世凯搞君主立宪时，康有为已经是过时的老古董。但康有为终究是康有为，即便成了老古董，还是“康圣人”，还是主张君主立宪。但是很遗憾，康有为眼中的“圣主”是光绪皇帝，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实际上是“光绪立宪”。光绪皇帝死了，康有为认为，君主应该是和光绪最近的人，即使光绪没有后代，也绝对不能接受光绪的敌人当君主。袁世凯恰好是光绪皇帝的敌人，也是康有为的敌人。在康有为眼中，就算接受阿猫阿狗，也不能接受袁世凯。所以康圣人宁愿和张勋之流为伍，也不愿和袁世凯和解。

梁启超当初和康有为一样效忠光绪皇帝，视袁世凯为仇敌。和康有为不同的是，梁启超选择和袁世凯和解，在袁世凯的政府上班领工资，服从袁世凯的领导。袁世凯搞君主立宪，为寻求梁启超的支持，特意送去二十万大洋（巨款）。梁启超也不客气，收下。

按道理说，收钱要办事。梁启超收钱之后，转身就骂，把杨度和袁世凯一起骂。

袁世凯称帝之初，义愤填膺者虽多，却没人愿当出头鸟。反袁，始于梁启超的骂声。梁启超是与众不同的，只骂人的事他不干，他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的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和杨度的《君宪救国论》针锋相对，击溃了“君主立宪”的法理基础。

梁启超是一个活动能量很大的人，他鼓动蔡锷起兵反袁，亲自南下策动冯国璋和蔡锷等人遥相呼应，气得袁世凯吹胡子瞪眼、拍桌子骂娘、病来如山倒。

梁启超这是玩无间道么？当然不是。

梁启超是转向革命派么？也不是，他和孙中山依然不相往来。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一心和段祺瑞合作，段祺瑞主张武力讨伐革命党。

如何理解梁启超的选择呢？很容易，也很难。

很容易的部分：梁启超变了。

很难的部分：梁启超为什么会变？

要理解这一层，必须绕一个圈子，弄明白大师的梦想。

三章 大师的梦想

梦想这个东西，很俗，也很雅。

俗就俗在，叫花子也可以做梦。雅就雅在，大罗神仙也需要讲点

梦想。何为梦想？都能说两句，但几乎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因为在梦想和现实之间，能实现的梦想和不能实现的梦想之间，在梦想实现的标准上，几乎难以说清。唯一能说清的是不同的人，梦想不同，追梦的方式也不同。鉴于此，多啰嗦几句吧。

街头叫花子想多要几块钱，有朝一日可以来一个华丽丽的转身；菜场大妈想多赚几块钱给儿子买房讨老婆；街头古惑仔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当光鲜亮丽的大哥，完成屌丝逆袭。这些都是梦，初级的梦，被忽视的梦。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梦想都很初级，想着升学、就业、买房、结婚。为了念书，要花费十几年的时间，为了住上自己的房子，又要花费同样多的时间。这样人生过了一半。为此奋斗，可能成功，也可能不太成功，冷热酸甜自知。这是大众的梦想。

商人梦想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官员想要升官发财。这些都是梦想，中级梦想，被多数人羡慕嫉妒恨的梦想。只要想去做，很多人都有机会触及到，但是真正成功者不多。毕竟在任何社会中，能在金钱和权力之中游刃有余之人都不太多。

高端的梦想，那是要掌控天下。由于道路狭窄，多数人只能望而生畏。实际上凡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乱世之中，这条路上的人，通常会背上恶名。比方说段祺瑞、冯国璋、吴佩孚等人。他们的事，后面再说。

相比这些，还有一种人的梦想比较特殊，知识分子。俗话说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知识分子也有一个梦：成为主心骨或大

腿。

想要成为主心骨，也就是一代宗师，只有一条路：在科学、政治、军事、宗教、伦理的思想（注意这个词）领域有着非同一般的贡献。没有任何捷径可循，没有任何关系可走。因为考验宗师成色的不再是某人、某派、某个政权，而是时间。狂妄如康有为，一心想成为康圣人，无非是想继承孔子的衣钵，成为别人的主心骨，如同过去两千年孔子为儒生的主心骨一般。这是人类历史上难度系数最高的挑战（之一）。

说起大腿，总会想起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人，他们让很多人升官发财，又让很多人人头落地。知识分子也可能成为大腿。比方说儒家大师曾国藩，除了学术上的造诣，他的湘军集团同样让很多人升官发财，又让很多人人头落地，也是大腿。

当然喽，缔造一个军事集团的大师毕竟有限。大师们也没必要去带兵。如同康有为用一支笔掀起一场风暴，同样成为一条大腿。有人因为康有为出名，有人因为康有为得利。康有为之所以沦为老古董，是因为他不满足于当一条大腿，他要做主心骨，以不合时宜的方式。

不论什么人，只要有足够的权势、金钱、名望给他人带来利益，终究会吸引一帮人，成为一条大腿。所谓大腿，即为名利，所以知识分子也可以成为大腿。大师级的人物，都有资格充当别人的大腿，因为他们有名望，有关系，有社会资源。

杨度一心君主立宪，也就是想成为一条大腿。如果袁世凯成功，

杨度将因此而名利双收，成为立宪第一人（参照伊藤博文），正如失败之后沦为帝制祸首一样。

清皇室失败，梦想以爱新觉罗家族为“君”实行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沦为老古董。

袁世凯失败，华夏大地上最后一个可能成为“龙”的人消失，君主立宪再无成功的可能。毕生追求君主立宪，梦想“从龙”的杨度沦为老古董。

那么从尊爱新觉罗家族到反爱新觉罗家族，从信仰君主立宪到反对君主立宪的梁启超怎么也沦为老古董了呢？因为梁启超也有自己的梦想。

梁启超和杨度

梁启超和杨度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神童，都是天才，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甚至连年龄都相当。他们生在同一个时代，彼此争艳。两人的关系恰好诠释了天才之间彼此质疑、合作、分裂的经典桥段。

戊戌变法那会，天才的梁启超和杨度并不友好。当初梁启超和谭嗣同在湖南讲学，很有名。杨度认为梁启超名不副实，故意去现场刁难。除了争论知识，杨度还与梁启超论辈分：康有为向王凯运的一个学生（和杨度平辈）讨教过一点知识，相当于比自己低一辈，要喊自己师伯；梁启超低自己两辈（如同小孩子过家家），应该喊师伯祖。

梁启超听了当然很来火。

戊戌政变之后，《湖南少年歌》和《少年中国说》的作者流落异国他乡。虽然落难，却并不悲戚。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之际，奋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两人关系迅速升温，彼此写得一手好文章，相互吹捧映衬，惺惺相惜。两人均鼓吹君主立宪，看似合作前途无限的两位天才却闹翻了，为什么呢？答案很俗，也很不俗。

很俗，闹翻的原因在于争夺领导权。当时在日本，梁启超和杨度身边还有一批人。梁启超和杨度讨论建党，结果杨度撇开梁启超拉了一批人单搞。梁启超很不满，和杨度疏远。

很不俗，两人都是大师级别的人物，都是有梦想的人。杨度梦想成为从龙之人，梁启超也有自己的梦，和杨度很不一样。

要解释他们梦想的区别，首先要了解两人之间一个不被现代人注意的特色。

杨度的特色：喜欢给人写挽联。不论是敌是友，只要有人过世，杨度总会送上一副挽联，总是写得精妙绝伦。袁世凯之死，杨度的挽联就清晰地勾勒出二人的关系。

恩师王凯运死时，杨度写挽联：

旷代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生平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亦敌（公理）亦友（私友）的黄兴死，杨度挽联：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亦敌（公理）亦友（私友）的蔡锷死，杨度送挽联：

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亦敌（公理）亦友（私友）的孙中山死，杨度送挽联：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亦敌（公理）亦友（私友）的梁启超死，杨度送挽联：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政治立场上看，他们和杨度都是敌人。私底下，他们都是朋友。杨度的这些挽联，均能绝妙地映衬出彼此的关系。杨度的这些挽联，既可以显示出那个时代大人物之间的交情（无论怎么斗，都是朋友），

也可以展现出他们之间的悲哀（无论怎么斗，都无法实现梦想）。这种关系在杨度给自己的挽联中得以充分展现：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这就是杨度，临死之际终于明白，旧时代的那一套（帝国、帝制、帝国梦）已经过去了，自己的事业和梦想也如明日黄花，新时代属于新人，大彻大悟。这点大概是他晚年加入共产党的动机吧。换个角度看，杨度的追求即使成功，也就是一个“大腿”。

梁启超的特色：喜欢评价历史人物，把所有人都评价一遍。从这些评价之中，可以看到梁启超的心思之微妙、追求之微妙。

梁启超评价曾国藩：“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梁启超评价左宗棠：“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曾左李三人均为近代史上的大人物，也是帝国时代的人物。梁启超毕生都在试图改变帝国的一切。理论上讲，他们是梁启超的敌人，然而梁启超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历史贡献。尤其对曾国藩和左宗棠，梁启超非常敬重。如果仅仅如此，我们会想，梁启超的那支史笔是不是过于大度了。然而接下来就不同了。

康有为是梁启超的恩师、伯乐。宏观历史上看，康有为的历史地位（君主立宪中国化）并不输于曾左李（工商业主义中国化）。但梁启超给康老师的评价很有趣：“先生是最富有自信力的人，他所坚持的主义，无论任何人都不能摇动。在学术上是这样，做事情也是这样，从来不肯为了做事而让自己的主义有所迁就，但却每每曲解事实来迁就他的主义。”直白翻译过来，三个字就够了：老古董。

这不再是理性的评价（没有视野和高度），更像感情的冲动。为何对曾左李如此慷慨，对恩师却显得苛刻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是对比梁启超评价孙中山，答案便逐渐明了。

孙中山逝世时，梁启超写道：“我对于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梁启超认为：“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便死去了，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孙中山一辈子有很多朋友，也有很多敌人。有时朋友变成敌人，有时敌人变成朋友。但在孙中山逝世那会，不论朋友还是敌人，都不否认他的历史价值。如梁启超这般，说他搞革命“本末倒置”，而“无从判断价值”之人，尖酸刻薄程度仅次于章太炎。

要弄清这一切，先看看梁启超的故事。

四章 梁启超这个人

戊戌变法时代影响最大的三个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大多数文章都会把他们同时介绍。本人看来，他们三个人差别很大。

康有为是帝国史上最后一位思想家。他的历史作用就是推动戊戌变法，推动近代史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

谭嗣同是历史绝命者：以身殉法，推动汉人精英和清王朝决裂。

梁启超是另外一种人：善变。用他自己的话说：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

善变通常是贬义词。善变的人通常被鄙视，但善变的梁启超却是受欢迎的。这点恰好折射出那个时代。梁启超，最能体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痛苦的大师之一。

杨度和所有人私下做朋友，公理上做敌人。梁启超和所有人均有合作，最后都闹翻。

梁启超，生于一八七三年，广东人。博学多才、博闻强识、博古通今，近人罕有匹敌。

大凡在历史上露脸的人物，都有一个特殊的童年，要么叛逆啊，要么受苦啊，要么狂妄无边啊。梁启超的童年是金色的。

梁启超家境并不算富有，典型的耕读世家、汉族知识分子之家，追求内圣（有圣人品质）外王（讲究王道）。家风淳朴、严谨，但并不古板。

梁启超的爷爷非常宠爱他，一边陪他玩耍，一边给他讲故事。在那个游戏和娱乐匮乏的年代，有一个会讲故事的爷爷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而且老人家也不简单，对宋明理学理解很深，常常把深刻的道理融入到历朝历代的故事中，于无声处就把梁启超的小心灵引向对知识和时事充满兴趣的方向上。

爸爸教育梁启超：不要太辛苦，不要忘记节俭。

妈妈知书达理，是非常贤惠的一个人。只要有会，她也会教梁启超一些诗词歌赋。

也就是说梁启超在全家人的精心呵护下享受了现代人期盼的素质教育。所以梁启超性格相当温和，感情异常充沛，这些都是童年家庭教育的功效。梁启超本人五岁读四书，六岁学五经，七岁写诗，八岁就能写文章，可以说在快乐的童年中飞速成长。日后梁启超用同样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子女，结果梁家孩子个个人杰，学业有成，生活美满。梁启超的学生，个个都不简单。好吧，育人，当看梁启超。

所以梁启超十二岁就考中秀才，而且是全县第一名。想想洪秀全辛辛苦苦那么多年，人和人的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康有为年长梁启超十五岁，梁启超先于康有为中举，因为梁启超十七岁就考中了举人。

当时主考官叫李端芬，想把梁启超变成自家人。他有一个堂妹叫李端慧，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待字闺中。李端芬就请副考官王仁堪做媒人。王副考官心里叫苦不迭，因为他也想把梁启超收了当女婿。有才之人就是吃香啊！此后李端慧成了梁启超的夫人，她年长梁启超四岁，性格比较坚硬，成为梁家的主心骨。她的手掌笼罩在梁家上空，

梁启超对她心悦诚服，惟命是从，光荣加入精英妻管严俱乐部，和前辈杨坚、房玄龄、戚继光、严嵩，晚辈胡适、戴季陶、汪精卫，国际友人苏格拉底、林肯等人成为知音。

要说康有为去搞变法，可以理解，他很狂、很执着、很自信。家境尚可、性格温和、人生顺利且妻管严的梁启超怎么就没有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呢？这个问题前面已经在黄兴身上讨论过了，不同之处在于，黄兴碰到了孙中山，梁启超遇见了康有为。

在康有为和孙中山之间

一八九零年，在陈千秋的推荐下，十七岁的梁举人拜三十二岁的康秀才为老师。

梁启超拜师康有为的时候，康有为制作的那些“深水炸弹”还没有问世。康有为的名声仅限于一八八八年以秀才身份上书皇帝博得的那点。梁启超虽然性格温和，但是自视甚高，不会无缘无故拜师的。

康有为真正征服梁启超的，是真材实料，是才华。

就个人资质讲，梁启超并不比康有为差。就读书能力上讲，梁启超也不比康有为差。论写文章水平，梁启超也不比康有为差。但梁启超还是被康有为彻底地征服了。

拜师之前，梁启超亲自去康有为那里考察了一番。因为陈千秋（英年早逝）是梁启超的学长，性格高傲，为人嚣张，且才华横溢，很少对谁正眼瞧一瞧，唯独对康有为赞不绝口。梁启超就很纳闷，想看看

康有为到底是何方神圣。

梁启超是以神童的身份见康有为的，见面时自然要竭尽全力显摆一番。等到梁启超显摆完毕，康有为给他好好教育了一番。梁启超服了，两个月之后拜倒在康有为门下。日后梁启超回忆起初次见面时的场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

那么康秀才当时到底对梁举人说了啥呢？细节已经难以知晓，大意还是可以推断的。

康有为肯定不会说那些老古董。因为梁启超本人就是神童，对那一套已经学得滚瓜烂熟。而梁启超向康有为卖弄的才学，恰好就是那些老古董。

康有为会对梁启超说，孩子，你被别人洗脑了，你学的那些东西都是教科书上的旧观点，是经过人为包装的，培养奴才的，没用。

——真理在本秀才这里。你那举人也白考了。

康有为会对梁启超说，孩子，睁眼看看国家现状，到处被人欺负，为何？就是因为教科书上那些东西是骗人的鬼把戏，是洗脑用的。正因为孔子的原始道统失传，所以国家才落到如今这个地步。把道统弄丢的，就是上层那些尸位素餐的家伙。

梁启超会睁大眼睛看着康有为，怎么办？

康有为很淡定却不失激情地对梁启超说，孩子，办法是有的，只要我们还原孔子道统，就能解决问题。解决方式就是变法。

大致过程大概就是那样子。一八九零年的康有为，三十二岁，思想已经完全成熟。他把自己的大致思想描述一遍，足够征服梁启超。

之后的十年，印证了二人之间的关系。梁启超全心全意给康有为打下手，无怨无悔。康有为的大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有陈千秋和梁启超的贡献。

为啥梁启超会相信康有为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大话”？说白了，还是时局很烂呗。混乱的时局下，任何一个热血青年都会想办法改变的。梁启超虽然性格温和，但血也是热的，比大多数性格偏激之辈的血还要热。

说得更直白点吧：康有为是领袖型人物，梁启超是辅佐型的人物。

所谓领袖型人物，就是不管局势如何艰难，但心中自有韬略，敢想敢干敢闯敢拼；淡定地玩着一切，不论客观环境如何，认定了，就不回头，如洪秀全。所谓辅佐型人物，能认知世间的一切，但缺乏开创性的魄力，能排除艰险、把领袖的意志完美地诠释实践，如冯云山。

戊戌变法前后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如同拜上帝教时代的洪秀全和冯云山。只不过洪秀全和冯云山是在现实世界起义闹革命，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在思想界起义闹革命而已。

康有为永远是康有为，如同岁月之河的顽石，永远不会变质的老古董。但梁启超只是岁月之河的雪团，会被融化掉。谭嗣同的血，没有动摇康有为，却引起梁启超的沉思。恰好在那个时候，孙中山伸出橄榄枝。顽固不化的康有为对孙中山不屑一顾，善变的梁启超和孙中山见面了（介绍人正是杨度）。

两人是广东老乡，老家相距不远。孙中山年长梁启超七岁，当时名气不如梁启超大。

梁启超对孙中山很有好感，他在孙中山身上看到了谭嗣同的果敢和决绝（谭嗣同比孙中山大一岁）。如果谭嗣同不死，成为孙中山第二也说不准。

所以两人打得热火朝天，在小屋里漫谈，甚至讨论合作建党。接下来义和团起义爆发。孙中山回国搞革命，失败。康有为和梁启超策划起兵勤王，失败。

之后两人似乎走得更近了。

梁启超表示去海外“发展革命”。孙中山以为梁启超已经转向革命，投入自己的怀抱，把自己的海外关系介绍给梁启超。梁启超到檀香山之后，得到孙眉的热情招待。孙眉还让自己的孩子拜梁启超为老师。

梁启超海外之行，大获成功。他那斯文的外表、温文尔雅的谈吐、出众的口才、非同一般的才华让他大获成功：筹款十多万（一大笔钱），吸引粉丝一大群。

一位华侨女才子表示愿意跟随梁启超到天涯海角。梁启超看着佳人怦然心动，想起家中威严的李夫人便理智起来，挥剑斩情丝，辜负了佳人一番美意。

然而梁启超和孙中山的关系却因此而决裂，然后再和恩师康有为决裂。

金钱和主义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好，大师也罢，都有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毛病：

爱钱却又装作不爱钱的样子。有时候很可爱，有时候很让人讨厌。

孙中山和梁启超反目，后人总是强调二人“主义”不同。像孙中山和梁启超那种人，朋友多，敌人也多。有时候朋友变成敌人，有时候敌人变成朋友。比方说梁启超和袁世凯，原本是死敌，后来也能合作。比方说孙中山和段祺瑞，原本也是死敌，后来也能合作。孙中山和梁启超决裂之后，老死不相往来，在民国非常罕见。

之所以如此，只因彼此伤害太深。二人并没有兵戎相见，如何伤害呢？答案，钱。

主义纵然不同，但可以改变，可以妥协，美其名曰政治需要。

钱是实实在在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革命是烧钱的买卖。特别是孙中山那种革命方式，没钱寸步难行。辛丑年之后那几年，是孙中山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光之一，革命失败，流浪日本，被通缉。凡事都需要钱，同志们吃饭要钱，办学校要钱，组织人马要钱，买军火要钱。总之，需要钱。孙中山一辈子都缺钱，那段时间最缺钱。孙中山原本希望和梁启超合作，借助梁启超的名气去海外募捐，缓解一下实际困难。

然而梁启超筹得的钱归了保皇党（主张围绕爱新觉罗家族实施君主立宪），没有孙中山的份。梁启超的粉丝，加入了保皇党，没有孙中山的份。赤裸裸的挖墙脚。孙中山很气愤。

孙中山更气愤的是，孙中山接下来去海外筹款，宣称融资十万，革命成功之后还百万，十倍的利润。他用尽所有力气，仅仅筹得了两千元！两厢相比，高下立判。孙中山认为，梁启超在自己的地盘（孙

中山视海外华人为自己的地盘）宣传君主立宪，迷惑华人。

最让孙中山气愤的是，梁启超继续宣传君主立宪，打压孙中山的革命派。

在孙中山最困难最需要钱的时候，梁启超不仅没有为朋友兼老乡两肋插刀，还反过来背后来一刀，不要说孙中山，任何一个人恐怕都难以忍受。

只能决裂。

两人回到日本，带领一帮人论战。

那是史上最壮观的论战之一，双方拿笔当剑，用口水当子弹，或冷嘲热讽，或破口大骂，全方位对掐。水平之高，达到对国体的顶层设计。水平之低俗，不乏揭对方老底，顺带人身攻击。三教九流的功夫，统统用一遍。

孙中山：要改变，不要皇帝。

梁启超：要改变，要皇帝。

论战持续了好几年，最后孙中山占据上风。毕竟晚清政府表现得太过无能。孙中山的日子也不好过，一次又一次的起义，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辛亥年到来，皇帝垮台。要说孙中山从此战胜梁启超，那也不对。

江南半壁之所以宣布独立，是因为乡绅和商人的大力支持。光复长三角之人，并不是孙中山依赖的陈其美，而是乡绅和商人。他们原本都是支持君主立宪的，只因为朝廷过于笨拙无能，方才转向革命。当乡绅和商人转向，意味着爱新觉罗家族完蛋。康有为瞬间石化，成

为一个价值很高的老古董。但梁启超转的很快。

就在孙中山赢得论战之际，梁启超也在悄然转变，和康有为分裂，告别君主立宪。

康有为和梁启超，亦师亦友，正如曾国藩和李鸿章亦师亦友一样。但李鸿章继承发扬了曾国藩的事业，梁启超却和康有为分裂。原因是梁启超善变，康有为不变。这只是台面上的原因，还有一个隐含的因素：和梁启超与孙中山决裂的隐含因素一样，钱。

当初康有为和梁启超拥有广泛的支持，筹集了很多资金。他们把那些钱在海内外置办产业，投资、开矿、办医院等，五花八门，妄想钱生钱。

这个世界是现实的：钱是一种现实，用钱生钱是另外一种现实。

康梁二人的知识水平没话说，谈起主义，那是一套接一套，一张嘴和一支笔就行。但钱是另外一个概念，要知道牛顿和丘吉尔也曾在股市上血本无归。

康梁本质是书生，没有理财的概念，自己不动手，让别人去操作，结果所托非人，损失巨大。可怜那都是海内外华人的血汗钱啊，白白糟蹋了。

康有为自称圣人，从不认错，对梁启超不满。梁启超在中间受了很多委屈，对康有为不满。因为不论什么主义，都需要钱。当然喽，以他们的地位和追求，绝对不会承认是因为钱闹崩，只会因为“主义”闹不和。

辛亥暴动，康圣人再一次大发议论，感叹纲常沦陷，痛斥人心不

古，对革命党心怀不满，对袁世凯耿耿于怀。梁启超却做了另外的选择：选择和袁世凯合作，成为北洋政府和革命党之间的温和派。表面看，梁启超并无太大的政治实力，但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梁启超的政治诉求和舍弃朝廷的乡绅商人再一次契合。

帝国时代，乡绅是国家的基础，得乡绅者得天下。所以未能得到乡绅认可的李自成成了历史的炮灰。民国时代，商人的地位空前提升，大城市之中的商人就是大爷。乱世之中，不论乡绅还是商人，都不想乱。乱了，他们利益会受损失。所以二次革命时代，孙中山才会败得如此迅速彻底，因为乡绅和商人抛弃了他。

但梁启超代表乡绅也好，代表商人也罢，把乡绅和商人一起代表了也罢，空有巨大的名气，却没有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因为他夹在康有为和孙中山中间，梁启超向左，是搞革命的孙中山，向右是保皇的康有为。

不论左或右，梁启超都是大师级。

不论左或右，都是辅佐型的角色。梁启超不愿接受那样一个角色，他有新的追求。那么一个如此善变有追求的梁启超，怎么会沦为老古董呢？因为袁世凯。

梁启超和袁世凯

袁世凯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曾是所有人的希望。康有为希望他帮助光绪皇帝完成变法；孙中山希望他完成三民主义之民权建设；梁

启超希望把他推向共和。他同样是所有人的噩梦。他背叛了康有为的圣主；他背叛了孙中山的民国。

如果搞一个敌人排行榜，康有为在民国最大的敌人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让清王室退位。康有为的第二敌人是梁启超，因为梁启超从效忠皇室到背叛皇室，并用一支笔乱写乱画。孙中山的最大敌人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把好端端的民国折腾得鸡犬不宁，民权和民生建设无从谈起。孙中山的第二敌人便是梁启超，因为梁启超是第三股势力，不肯为孙中山所用。

从这个排行榜可以看出袁世凯和梁启超的关系：扯不清。

梁启超和袁世凯原本没有关系。戊戌政变之前，梁启超对袁世凯期望甚高，之后便是死敌。之后十几年，两人是敌人。但是辛亥暴动之后，两人突然联手。

如果梁启超依然追随康有为，那么也将成为老古董。然而他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到时局的转变，重新成为乡绅和商人的代言人。康有为没有看见（或许不愿意看见）梁启超转变的妙处，孙中山也没有看见，但是袁世凯看到了。所以当康有为和梁启超由亦师亦友渐行渐远之际，当孙中山和梁启超彻底翻脸之际，袁世凯很巧妙地 and 梁启超和解。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号，袁世凯刚刚复出，和革命党谈判尚无眉目，就任命身在国外且与自己处于长期敌对状态的梁启超为内阁司法副大臣。梁启超没有接受，但托人向袁世凯传音：“兵事项城任之，言论自任。”都是聪明人，名义敌对，私下暗通曲款。接下来袁世凯对梁启超展开猛烈攻势，亲自发电报吹捧梁启超：“抱天下才，负天

下望。”接下来又以朝廷的名义劝梁启超回国。

面对袁世凯隔三差五如此这般的猛烈追求，梁启超心动了，向朋友透露心思：“吾自信，项城若能与吾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

心动很快变成行动。梁启超为袁世凯策划：“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行开明专制之实，以公之明，于此中消息，当已参之极熟，无俟启超词费也。”

好吧，那个时代最有实力的人和意见领袖联手了。

宋教仁改组国民党之时，以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正式形成。袁世凯急需一个为自己效命的党派平衡国民党和共和党。梁启超应时而动，组建第三党，民主党。

国民党和共和党的宗旨都是角逐最高权力，梁启超的民主党自我标榜不争权，难倒是搞慈善？当然也不是。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国民协会与共和建设讨论会以中国政党萌芽伊始，国民政治观念尚形薄弱，如仅有二党，恐党争日烈，国家异常危险，故决计发生第三党，主张最公平之言论，不竞争政权，专注全力以普及政治智识，传播政治信条。”这个理由听起来很高尚，实际上很扯。政党如果如此纯洁，就不应该存在，改为科普机构算了。事实上，梁启超是和袁世凯合作。共和党站在国民党对立面。

袁世凯之所以能战胜孙中山，主要是因为拉拢了两个人：黎元洪和梁启超。拉住黎元洪，相当于拉住革命党的一面大旗；拉住梁启超，

相当于拉拢乡绅和商人。

那个时候，梁启超是袁世凯的肱骨。然而随着黎元洪被袁世凯拿捏在手，宋教仁被刺杀，梁启超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当袁世凯走向帝制之际，梁启超从肱骨变成鸡肋。如果梁启超学杨度那般帮助袁世凯，至少还能从鸡肋变回排骨。

一九一五年之前的梁启超并非醉心于共和，他脑袋上的标签依然是“君主立宪”。正常情况下，他应该拥袁。但他却是反袁，而且是第一个站起来反袁。这是近代史上一个谜题。

如何解析这个谜呢？当初孙中山干革命之前上书李鸿章也是个谜，但谜底就在那封书信中。同样，梁启超的谜底在梁启超本身。

有人出于利益和野心反袁，看清局势之后反戈一击，比如“二陈汤”，纯粹为了捞好处。

有人出于利益和道义反袁，比方说段祺瑞和冯国璋，共和比帝制对他们更有利。

有人出于匡扶正义反袁，比方说蔡锷，为了争取民权。

但第一个站出来反袁的梁启超是不同的。日后梁启超回忆：“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为了“正气不灭”和“人心不死”

这话听起来像作秀，但我相信这是梁启超当时的心声。因为反对一个全国最有势力之人的毕生目的，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没有人会如此作秀。

梁启超虽然性格温和，常常改变主张，但并不懦弱。之前冒风险推行戊戌变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如何解释之前追求君主立宪和如今反对君主立宪呢？答曰，国体。

在梁启超看来，国体没有高下之分。君主体制之下，可以通过“立宪”的方式弥补“专制”之不足。共和体制之下，可以通过政党制衡的方式实现精英统治（接近宋教仁的主张）。总之，所有体制都可以群策群力，把国家搞好。

所以他不反对任何国体，但他反对现行国体之下鼓吹另一种国体。

所以君主制之下，他不主张共和，并为此不惜和孙中山决裂。当暴力革命推翻君主制之后，他接受了共和，不主张回到君主制，为此不惜和袁世凯决裂。

国体为天下重中之重，不可轻易改变。每一次国体变更，都会带来深重的灾难。从君主到共和，带来无尽的灾难。如果再一次变更，只会增加灾难。如果执行不顺，反复更改，那么天下将永无宁日。那么原本虚弱的“正气”就会减少，“人心”就会慢慢死去。

所以梁启超的梦想：不要当帝师，不要当从龙之人，要当国体守护者。凡是试图改变国体现状之人，梁启超均反对。从这个角度就能理解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评价了。

以梁启超的敏感聪慧，应该在任何国体之下都能游刃有余，怎么就成为老古董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解释另外一个人，章太炎。

和康有为、杨度、梁启超一样，章太炎的学问在那个时代同样出

类拔萃，同样名噪一声，同样沦为了老古董。

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杨度沦为老古董是因为旧世界必须淘汰，那么章太炎可是革命者，是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孙中山可以在那场论战中战胜梁启超，就是依靠章太炎。那么章太炎怎么会沦为老古董呢？答案很简单，骂人。

五章 章太炎骂人

章太炎是这样一个人，他很萌，有时候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据说他只认识五元钞票，干什么都掏五元出来。章太炎嗜烟如命，大学课堂上，一手拿粉笔，一手拿香烟，常常拿香烟当粉笔用。他是一个读书很多的人，但并不是书呆子，相反有时候很时髦。比方说他是最早写征婚启事的名人：“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他的标准：“大家闺秀；性情开化；要通文墨，精诗赋，双方平等，互相尊重；夫死可嫁，亦可离婚。”看看这段，写得极有个性。征婚十年，也未有结果，最后还是朋友介绍认识才女汤国梨。但是在婚礼当天，四十六岁的章太炎却把左右脚的皮鞋穿反了。

这样一个人，有时候很有趣，有时候看起来很怪。这些趣事怪事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影响他的时代和历史的人。

和那个时代的大师们一样，章太炎学富五车，了解百家诸子和西学，对佛学和医学也有深刻研究。由于性格古怪，对生僻字情有独钟，时不时拿出来显摆一下，享受一番让对方发窘的乐趣。他有四个女儿，他给她们每个人找了一个生僻字（字典查不到的那种）当名字，只有能读懂的人才会有资格当他的女婿。

章太炎的学问有多大呢？看看他教出来的学生吧：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曹聚仁、傅斯年、顾颉刚等等，个个鼎鼎大名。

但才华只是基础，许多有才之人都当了狗腿子或汉奸。之所以能影响历史和时代，章太炎依靠的是另外两样东西：风骨和骂人。他一生七次被捕，三次坐牢，但秉性不改，可见风骨。至于骂人，更是一绝。伟大的鲁迅经常骂人。但鲁迅的骂人和章老师比起来，算小巫见大巫。上至大总统，中到权贵名人，下到狗腿子，章太炎一视同仁、该骂就骂、逮谁骂谁。

杨度和所有人交朋友，梁启超和所有人合作，章太炎骂过所有人。

清廷权贵，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章太炎骂。

北洋权贵，袁世凯、段祺瑞、曹锟，章太炎骂。

革命元老，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骂。

名流名人，康有为、杨度，章太炎继续骂。

由于章太炎骂人太多太狠，得了平生最传神的一个绰号：章疯子。既是疯子，议论骂人当然是疯话。然而“章疯子”才华过人，笔扫千军，骂人很特别，很能吸引人。所以章太炎每次骂人，京城报刊便一字不露照刊不误，只是题目特别。骂自己阵营的人，报纸便登：“章

疯子大发其疯”；骂到反对党头上，报纸便登：“章疯子居然不疯”。

要解读那段历史，必须解释章太炎为何骂人。

开启骂人时代

章太炎，生于一八六九年，浙江余杭人。他的家庭条件比梁启超和杨度都好，但却是天生的民族主义者。两百多年前，狠人多尔袞入关后推行剃发易服，在江浙一带杀戮太狠。仇恨的种子在江南潜伏下来，有节气的士大夫暗地里视满清为蛮夷，章太炎的爷爷便是其中之一。章太炎很早就接触并接受“华夷”论，视满清为中国近代没落之罪魁。章太炎一辈子，所持观点很多，反复变动，动辄骂人，唯有“华夷”论不曾更改。

章太炎十六岁那年参加童子试，题目为：论灿烂之大清国。他却在试题中呼吁：“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我中华也”，吓得考官脸色发白，比孙中山还激烈。

孙中山上书谈改良那会，章太炎支持维新变法。孙中山的目的没有达到，转而变成革命党。戊戌政变之后，章太炎光荣地成为通缉犯，失望之极，正式和朝廷决裂，开启骂人时代。

一九零四年，慈禧七十岁生日，再次大肆庆祝，官奴狗腿子们再次献殷勤。其中一副马屁对联“一人有庆，万寿无疆”甚得慈禧欢心。章太炎气愤之极，因为日俄即将在中国领土上开战，他提笔写下一副讽刺对联：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
只余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
每逢万寿祝疆无！

这副对联太犀利了，不仅讽刺慈禧不理政事，而且把二十年前失去琉球群岛，十年前失去台湾的事抖了出来。当然喽，那个时代不满慈禧太后的人很多，骂的人也不少。章太炎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在监狱里写下的这个对联。要知道，那可是专制年代的监狱。按道理，这副对联足以让他没命。但他却活得好好的，而且在两年之后出狱，继续骂人，太牛了。

如此牛的人怎么会坐牢呢？原因也是骂人。

戊戌政变之后，章太炎看不惯康有为。不仅因为康有为太狂，更因为康有为死保爱新觉罗家族，便写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他在书中特意直呼光绪皇帝之名，说皇帝是五谷不分的小丑，把康有为气得脸发紫。朝廷为此第七次通缉章太炎，前六次都没抓住，这次终于如愿以偿。章太炎主动迎着抓捕者说：“别的人都不在，要拿章太炎，

就是我。”

有种。

一般情况下，他那种人被抓，基本上没有活路。但大清当时气数已尽，上海租界是洋大人的天下。清政府就在洋大人的法院告章太炎

（本身就很滑稽），章太炎因此避开迫害。

法庭之上，章太炎用三寸不烂之舌把原告（清政府）代表驳得体无完肤：“你们堂堂大清政府，竟然跑到租界的小法庭控告我一个老百姓，国家被你们败坏成这般模样，还有何脸面出席？”那代表气愤之下脱口说出：“我和你无冤无仇，何必如此辱弄？你还有什么话快说！”旁听观众哄堂大笑，情形堪比莫里哀的喜剧。

但结局依然是章太炎有罪，入狱三年。

出狱之后的章太炎依然对朝廷极尽讽刺谩骂之能事。保皇派的头子康有为也成了章太炎的重点照顾对象。鉴于康有为名气很大，学问很大，章太炎决定骂出自己的风格和水平。

这个世界充满各种谩骂，如果骂人也分档次，那么章太炎骂康有为的那副对联绝对是最高档次。《中庸》有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论语》有言：老而不死，是为贼，博学多才的章太炎把两者结合成一副对联：

国之将亡必有，

老而不死是为。

不仅把“有为”二字嵌入联尾，又含而不露地骂康有为是“妖孽”和“老贼”，堪称大师骂大师之典范之作。章太炎晚年讲学，门上贴着纸条：康有为的门徒不得入内。

骂袁世凯

章太炎骂人一辈子，最有喜剧效果的是骂袁世凯。他的身份虽然是国学大师，但常常喜欢扮演政治家，所以常常被政治家忽悠。袁世凯忽悠过很多人，忽悠章太炎的过程相当于上演了一出戏，轻松幽默滑稽又不失大度，效果非常好。

辛亥革命胜利后，章太炎自海外归来，准备大干一番事业。鉴于之前骂孙中山太狠，又主张解散同盟会，质疑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所以和革命党那边搞不到一起。章太炎天然的盟友应该是立宪派的共和党，但是之前骂梁启超太狠，入党不久又被开除。他挺黎元洪，但黎元洪没什么作为。想干事业，只有帮袁世凯抬轿，于是他主张袁世凯当大总统，赞同定都北京。并亲自撰写《致袁世凯论治术书》，出谋划策“当今急务，盖有数端：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镇之术，安慰荆吴。大端既定，然后政治可施”。袁世凯回信，说章太炎的策略“至理名言，亲切有味”。

袁世凯认为章太炎本质上是名士。忽悠名士，袁世凯的策略是给一顶高帽子和一笔钱，让名士一旁消遣。给章太炎的高帽子是“东三省筹边使”。应该说袁世凯的眼光很毒，看透了章太炎的本质。然而袁世凯的眼光又不够毒辣，没有看到章太炎和一般名士不同，能折腾。

章太炎以为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高高兴兴地带着袁世凯给他的一万元办公经费去东北，筹划施政蓝图。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竟

然没有一人前来迎接。章太炎怒了，以上司的身份传见吉林西南道孟宪彝和长春知府德养源，准备威风一把。结果两人不理他。章太炎更怒了，亲自去找吉林都督陈昭常说：“本使是国家堂堂官吏，他们被传不到，就是目无本使，就是目无共和国家！”陈昭倒是很客气，又是请客又是送钱，把章太炎送出东北了事。

章太炎怒火中烧，但还没有骂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又给章太炎送了一顶高帽子“勋二位”。什么官职就不用介绍了，反正和玉皇大帝忽悠孙悟空差不多。章太炎得到勋章之后很高兴，以为又有了施展空间。其实袁世凯当时打算武力解决革命党，把章太炎忽悠到北京，就是要看管起来，让他不要乱说话。

章太炎的高兴劲还没过，就发现有军警监视自己，也不客气，边打边骂，特高调。军警换上便衣，始终不离左右。章太炎很烦火，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摆脱监视，准备从天津逃走。走了也就算了，章太炎自认为是名士，临走之前约朋友给自己壮行。无奈几个朋友已经成了袁世凯的狗腿子，他们在壮行宴上陪着章太炎骂袁世凯。章太炎高兴之下，忘了时间，错过火车，逃跑计划泡汤。看看这名士，逃跑都与众不同。

袁世凯称帝，章太炎的愤怒达到顶点，便在大庭广众之下骂袁世凯。但袁世凯就是不理他。章太炎把袁世凯颁发的勋章做成扇坠（表示轻蔑），跑到新华门袁世凯的总统府，要和袁世凯当面理论。袁世凯还是不理他。卫兵说大总统在忙。从清晨到晚上，章太炎都没见到袁世凯，自尊心受到深深的伤害，于是开骂。把总统府从上到下骂一

遍再骂一遍。袁世凯还是不理他。愤怒之下，章太炎抡起拐杖，把能砸的东西都砸了。

如此情形，换成别的时代，不死也要脱层皮。但袁世凯依旧不理他。最后陆建章出面把章太炎骗到军营关了起来，后转移到龙泉寺软禁。章太炎又坐牢了，但和上一次不同，这一次坐牢非常有特色：有厨子和佣人伺候着，每月有五百块工资可以领（军警每月只有四块）。

章太炎整天无事，便喝得酩酊大醉，然后用各种字体写“袁贼”，再烧掉，大呼“袁贼已烧死”泄愤。有朋友来看他，便大骂袁世凯。袁世凯依然不理他。

现在看来，袁世凯对章太炎宽容雅量之极。当时有人不解，暗中询问袁世凯的秘书：“大总统拥兵几十万，何惧一书生，何不放他了事呢？”袁世凯会怕章太炎？当然不会。那秘书回答：“此公文笔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

这大概是史上最有趣的一段牢狱史话之一。从中可以看到袁世凯的气度，能容常人所不能容，所以才能在清末脱颖而出；也可以看到章太炎的傲骨，疯也好，傻也罢，骨头还在。如果后来的蒋介石也有此肚量，白色时代就不会那般暴力。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恢复自由，成为反袁英雄。但这样一个英雄，怎么会沦为老古董呢？因为他骂孙中山太狠。

骂孙中山

戊戌政变之后，汉族精英和朝廷决裂，大多以通缉犯的身份流落日本。杨度结识了孙中山，但没有和孙中山走到一起。杨度把梁启超引荐给孙中山。梁启超和孙中山有合作，最后闹分裂。梁启超把章太炎引荐给孙中山，章太炎和孙中山走到同一战壕。一九零五年同盟会成立，章太炎以光复会元老的身份加入同盟会。

当时的孙中山有两个依靠：枪杆子靠黄兴，笔杆子靠章太炎。黄兴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章太炎担任革命党主编的《民报》主编，用一支笔为武器，向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频频发炮弹，逐渐占据上风，战果喜人。

章太炎的名声大噪，广收门徒，鲁迅就是在那个时候投入其门下。他创造了“国学”和“中华民国”等词汇，一直沿用至今。成果越来越大之际，章太炎和孙中山却闹翻了。因为章太炎本质虽然是书生，也是革命者。加入同盟会之前，章太炎和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创立光复会，志在反清。光复会和孙中山的兴中会历来矛盾重重。私人层面上看，陶成章和徐锡麟看不上孙中山；战略层面上，光复会成员认为，革命应该从长江流域的江浙地带搞，可以直接威胁到朝廷心脏。孙中山却想从两广先搞，把经费用于南方。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身亡，造成光复会成员对孙中山更为不信任。

章太炎等人得知日本政府资助孙中山钱后，认为孙中山“受贿”，被日本人“收买”，便怒火爆发，一气之下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大幅照片撕下，批注“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孙中山当然也很恼火，专门写信辩护。章太炎并不罢休，硬说孙中山贪污自肥。

孙中山的生活作风虽然不是很严谨，但贪污的事还干不出来。章太炎仍不过瘾，联络同盟会成员提议罢免孙中山，由黄兴接任总理。黄兴选择信任孙中山，拒绝之。

此后孙中山和章太炎的关系日渐疏远。孙中山在新加坡创办《中兴日报》，取代东京的《民报》，砸了章太炎的饭碗。《民报》经费紧缺，逼得章太炎啃麦饼。无奈之际，章太炎只好硬着头皮请孙中山接济。一封信接着一封信，孙中山或者不回，或者说好，但不给钱。当然也不是完全不给，心情好时，孙中山会寄几百块，如同施舍叫花子。章太炎除了生气，也没辙。这事充分说明了两件事：一，有钱是大爷；二，孙中山肚量不如袁世凯。

让章太炎更恼火的是，孙中山借《民报》从日本搬迁美国之际，剥夺了章太炎主编的地位，以汪精卫取而代之。要知道《民报》是在章太炎的手中发扬光大，如今被排除在外，岂肯干休。他亲自撰写《伪民报检举状》，攻击孙中山“忘本背初”，小人。孙中山反击说章太炎为“陋儒”。两人正式分裂。章太炎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

辛亥暴动之后，陈其美和蒋介石刺杀陶成章，让章太炎和孙中山彻底决裂。

此后章太炎逢孙必反，不问是非。当革命党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之际，章太炎则说：“论功当推黄克强（兴），论才当推宋教仁，以德当推汪精卫。”言下之意怎么也轮不到孙中山。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成立，章太炎质疑其合法性。孙中山和袁世凯对立，章太炎支持袁世凯，支持定都北京，并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到袁世凯政府上班。

不仅如此，章太炎用笔把革命党人骂了一遍。总之，能损孙中山的事，章太炎都干。

二次革命之际，章太炎骂孙中山和黄兴是“祸乱天下之元凶”。

孙中山去世时，梁启超说难以估计其真实价值，已经很过分。唯一比梁启超更过分的便是章太炎，他亲自为孙中山撰写了好几副挽联，极尽嘲讽之能事，恶毒无比。

其一把孙中山和魏忠贤相比：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其二把孙中山和孙权（暗指分裂国家）相比：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
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其三把孙中山和洪秀全（当时洪秀全名声很差）相比：

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
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如此三幅对联，是非不分。即使满清遗老，也不会骂得如此恶毒。

现在回到之前那个问题上：章太炎为何会沦为老古董？答案已经明了。章太炎把孙中山骂成那样，把革命党人骂成那样，又拒绝改变，政治前途已死，革命前途已死，只剩下学术意义上的生命。然而在五四运动中，章太炎拒绝革新，除了沦为老古董，还有别的可能么？

如何解释章太炎发疯骂人呢？其实很简单。

他是一个“华夷”论者，前半生致力于和清王朝作对，为此愿意付出任何代价。骂朝廷权贵，那是分内事。然而很遗憾，清王朝（蛮夷）退出，汉人掌权，局势依然没能好转。所以章太炎很失望，看谁都不爽。所以他骂袁世凯，骂孙中山，骂所有人。总之就是谁当政他骂谁，谁掌权他骂谁。

只能说爱之深与恨之切有时候真的说不清。

他不是政治家，却被卷入政治中。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除了无与伦比的才华，还有傲骨。那个时代，所有有傲骨之人，都会卷入政治中。因为那是乱世，天下兴亡之际，匹夫尽责之时。那也是一种悲哀。

第六章 不幸和幸运

每当回忆往事，总有这样那样的惋惜和感叹。回顾民国，通常会惋惜当初袁世凯走错一步路导致身败名裂，导致民国前半段内乱不休。

内战，内耗，团体的悲哀，政党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

近代中国的悲哀在哪里？就在无穷无尽的内战中。当中国内战不休之时，日本正在工业化道路上一日千里。二十年之后，觊觎华夏大地千年的大和民族终于得到一个机会，数千万国人因此而丧失生命。

内战原因无非有二：利益分配不均，思想高度分裂。

利益的事，后面说。这里先谈谈思想分裂。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大师们的梦想和追求。

康有为的梦想：围绕爱新觉罗家族实施君主立宪，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然而很遗憾，当爱新觉罗家族被淘汰之际，帝国时代最后一位思想家沦为老古董。如果生活在帝国时代，以康有为的才华和意志，他应该像孟子、朱熹、王阳明那般把儒学推陈出新。

杨度的梦想：依靠袁世凯实现君主立宪，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然而很遗憾，绝顶聪明的杨度看到了帝制的缺陷和共和的缺陷，却没有看见君主立宪已经臭大街。所以当袁世凯被世人抛弃之际，杨度沦为老古董。正常情况，以杨度的才学，可以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功。

梁启超的梦想：守护现有政体，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然而很遗憾，任何政体最后均抛弃了他。君主立宪不成功，共和也没有他的份。因为他太在意过程。因为过程，他和孙中山一直敌对。

章太炎：无梦可做，醒醉不分。

他们是迂腐的，很多言行极为可笑，因为他们已经老朽。他们的老朽虽然和时代有关，但更多源于他们自身。他们博学多才，但他们的才学来自帝国时代。帝国时代的一切，包括伦理道德、思想体系、

政治经济军事都是围绕农耕文明建立的，正是那些东西导致中华帝国深陷农耕世界而无法自拔。面对工业世界的冲击，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

康有为改儒家为孔教，对抗基督世界意识形态的侵袭。但农业帝国的落后，恰恰是独尊儒术的结果。如果儒家一统天下，那么只会更落后。基督世界之所以进入工业世界，正是因为政教分离的结果。所以康有为注定是笑柄。

杨度死守君主立宪，却没看到在一元论的思维方式之下，君主和立宪很难平衡。

梁启超本能地守护现有国体，却始终不成功。当他守护君主制，共和来了。当他守护共和，袁世凯复辟了。

章太炎信奉的“华夷”论，更站不住脚。

他们各种妙招，各种良策，始终无法容纳孙中山。康有为认为孙中山是莽夫；杨度不与孙中山合作；梁启超认为孙中山不择手段；章太炎各种难听的话都骂了。如果一个人和孙中山搞不来，可能有很多原因。大师们都和孙中山合不来，就是孙中山的原因。

孙中山虽然生在中国，但求学在西方、成长在西方，思维方式基本西化，而且是基督徒。从意识形态、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上看，和浸淫东方文化的大师们都是对立的。所以他们本能地排斥孙中山，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站在马后炮的立场看，孙中山的革命依然是精英革命，还不够彻底。至少孙中山不敢发动农民和工人，不准阿 Q 们参加革命。所以当

他们连孙中山都无法接受时，注定要沦为老古董。因为农业帝国已经落后，围绕农业文明的一切都已经落后，都要更改。

他们是勇敢的，敢于走出书斋面对天下。

但他们更是悲哀的：他们必须以学术大师的身份涉入政治之中。

更大的悲哀：他们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头脑、意见领袖，言行足以左右舆论走向。他们都有一批追求者，影响力巨大。他们的迷惘，意味着一大批人的迷惘。当社会充满迷惘之人的时候，休说发展建设，不出乱子就很不错了。

最大的悲哀：他们之间彼此矛盾。梁启超和康有为闹翻；章太炎和梁启超闹翻；杨度和所有人政见不合；章太炎骂所有人。迷茫的人群可能会造成动荡。迷茫人群之间有矛盾时，动荡将不可避免。

通过这些沦为古董的大师们，我们大致能够明白第三层历史周期律带动第二层历史周期律的因素，我们大致能理解头脑的混乱导致时局混乱。

千年变局

下面这一段有些繁琐，不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跳过不看。

任何政权更迭，都是利益分配不均的结果。任何涉及到体制的变更，必然涉及到思想分裂。中华帝国解体，原本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精神分裂。确切地说，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秩序解体。所谓秩序，包括经济、军事、政治、伦理道德、文化习俗。每一种秩序的重

新洗牌都意味着巨大的变革动荡。

经济秩序：工业文明诞生以来，任何秩序的变迁，首先是经济利益。近代中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农业帝国遭受工业帝国的冲击。不论是合情理的工业品还是不合理的鸦片，说到底都是经济贸易问题。即使没有鸦片贸易，中英之间迟早也会发生别的战争。原因无它，两个文明体系中，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完全不同。

经济较量实际上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当大家都想要白银时，最后还是升级到战争。毫无疑问，除非在特殊状态下，农业帝国远非工业帝国的对手。就算没有鸦片，就算是早期的满清八旗，也不是洋枪洋炮的对手。所以大清帝国的战败在所难免。战败，就要改变。

军事秩序：满清战败，内乱爆发，被迫让汉人练兵，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就这样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可以安内却无法攘外，甲午战争再次一败涂地。此后袁世凯练兵，练出北洋军，一支基本上由汉人掌控的军队。军队，国家的暴力机器。一个失去军队的政权，迟早会解体。解体之前，会导致政治秩序变更。

政治秩序：甲午战败，整体改变已经在所难免。康梁变法应运而生。但变法本身同样漏洞百出，矛盾重重，失败也在情理之中。康梁的失败，导致革命党的兴起。此后十几年，中国完全成了各种政治思想的交汇所。等袁世凯再次试图以强力重拾君主立宪之际，它早已臭大街，成了一具令人讨厌的干尸。

道德伦理秩序：相比经济、军事、政治，伦理道德秩序的变法并非一蹴而就，却极为艰难。从洪秀全试图引入基督主义开始，就在冲

击农业帝国固有的伦理道德秩序，所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和洪秀全素昧平生，却要坚决消灭他。这也造成另外一个结果，曾国藩和李鸿章想要改变，又不敢迈大步子，所以洋务运动虽然和明治维新同时进行，甲午年之前，洋务运动仅限于工商业，明治维新却完成了政改。康梁虽然想要政改，却又死守儒家不放。就为要不要设孔教，精英们争论了十几年。

接下来该怎么办？抛开帝制、君宪、共和、内阁这些花花绿绿的政体不谈，重建国家秩序的前提在于政令统一：统一于“车同轨”，统一于“文同书”。

没有统一政令，任凭天国、理想国、桃花源描述得天花乱坠，都是镜中花与水中月。

要么统一于宗教，政教合一。这个选项已经被抛弃。

要么统一于军事，走军国主义路线，如德国和日本。国人想走也没那实力，硬件设施（身体素质和工业力量）就跟不上。

要么统一于经济，如同英美那般。中国数千年重农抑商同样深入骨髓，工商业主义不是那般容易植入中国。

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统一于政治。

这个选项，就是由一个强人驾驭一个强大的团队把各方面的力量汇集到一起，形成国家权柄核心，然后教育人民、发展经济、建设国防。袁世凯原本是合格的人选。他的力量，他的手腕，他的谋略都是第一等，可惜搞错了方向。

看看吧，如此秩序交织纠缠，即使百年后的今日都难以理清，百

年之前的局中人更是迷茫无助。如此多的繁琐变化、如此多的利益纠缠导致了一个致命的现实问题：国家权力摇摇欲坠。要理解国家权力，必须从一种人入手：国家元首。

民国的国家元首有一个很拉风的称谓，叫大总统。

它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称谓——玩偶。

第二篇 大总统和玩偶

绵长的中国历史基本是一部集权史。不论强势或衰弱，最高领导都有自己独特的权威。只有死亡才能让最高领导失去权威，或者说失去权威的最高领导将面临死亡。

潮起潮落的过程中，历史的车轮来到短暂的民国，规律被打破了。

大总统，一个刚刚离开百年的名词，在国人心目中比皇帝还要遥远。很少有人记得，民国三十八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大总统的统治之下。短短十余年时间，一共经历了六位大总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代）、徐世昌、曹锟。

总统就是总统，为何前面要加上一个“大”字？只为听起来霸气么？众所周知，国土小的国家喜欢在前面加个“大”字。例如日本人喜欢自称大日本，讨厌别人说小日本。美国从不会自称大美国，也没人会称之为小美国。大总统听起来固然霸气，实际则很心虚。帝国时代的皇帝从不会自称大皇帝，现在共和国的总书记也不会自称大总书记。因为皇帝也好，总书记也好，权威实实在在。那个时代的大总统，除袁世凯之外，没有一个有实权。

唯一有权威的袁世凯因为走错一步郁郁而终。接下来八年之内出现了四位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四位大总统，四种人，四种性格，四种手段，同一种结局。

黎元洪试图以老好人的智慧推崇中庸之道。

冯国璋以军人身份寻求平衡点。

徐世昌用尽各种方式刷存在感。

曹锟性格混不吝，手段也是混不吝。

他们共同的结局：台上臭，台下香，任期未满，灰溜溜走人。

为何如此这般？因为大总统有另外一层含义：玩偶。

正如民国大师们沦为老古董一样，民国大总统无一例外地沦为玩偶。

堂堂大总统，国家元首，为何会沦为玩偶？答曰国家元首是权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权力拥有四个支点：权威性、力量基础、法理性、正义性。丧失其一，国运将会转变；丧失其二，国体将会动摇；丧失其三，天下大乱；丧失其四，没有不亡的政权。

任何人在国家元首的位置上，丢掉权力特性的任何一种，都将沦为玩偶。

对照大清帝国的灭亡，外战失败，丢掉帝国权力的权威性，所以内乱兴起。军阀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崛起，使得帝国机器的力量基础——军队——丢失，中央逐渐空虚。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没有法理基础，皇帝成为玩偶。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导致皇权失去正义性。权威的专制帝国尚且如此，新生的半生半熟的民国更是如此。

袁世凯之后的四位大总统丢掉了民国权力的四层特性，完美诠释了历史周期律第二层的前半段，即权柄周期迅速变更。他们是如何把大好的江山丢掉的？待我慢慢道来。

一章 老好人的世界

章太炎用一张嘴和一支笔骂尽了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但从不骂黎元洪。论权威和贡献，黎元洪不如袁世凯和孙中山，但章太炎把袁世凯和孙中山骂得狗血淋头。论学识才华，黎元洪和那个时代的大师们没法比，但章太炎把那个时代的大师们反反复复地骂。

章太炎怎么就把黎元洪漏掉了呢？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本人反复思索，最后想到三个字：老好人。正是老好人的特征，让黎元洪避开了章太炎的毒舌。

老好人的黎元洪存在感很强，总会在关键点上出现，但很少干“恶”事，对知识分子礼贤下士，对章太炎本人相当客气。章太炎在东北没人理，南返之际得到黎元洪的热情招待。

老好人的黎元洪地位很高，从不摆架子，当大总统时仍然像平民那般去看戏。

但历史早就告诉我们，一个好的领导者，尤其是大国领导者，如李世民和朱棣，未必是好人；一个好人未必能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尤其是大国领导者，如建文帝。

不论好人还是好的领导者，都是那个时代锻造的结果，尤其是乱世。黎元洪的老好人标签就是被那个时代锻造出来的。

说不尽的命运

黎元洪，生于一八六四年，湖北黄陂人，出身寒微。如此出身在那个时代意味着挨饿、讨饭、给人家放牛。黎元洪也是幸运的，他爸爸是当兵的，虽然没钱，却见过世面，把他接到天津，想办法让他念书。

没钱怎么办？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有奖学金。黎元洪读书很努力，半年之后便可以用外语和教官交流，一年之后成为优等生。这事充分说明，穷人的孩子早懂事。黎元洪聪明又肯学，意志坚定能吃苦。如此人物，有当英雄的潜质，只可惜那不是英雄的时代。

黎元洪北洋水师毕业之后，由李鸿章推荐到广东水师上岗就业。甲午战争开打，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的哥哥）派三艘国产铁甲舰前往支援，黎元洪服役的“广甲号”便在其中。战争开打，管带吴敬荣决定当孬种，不战而逃，广甲号触礁搁浅。吴敬荣决定把孬种进行到底，自己上救生艇逃生，把当英雄的机会留给了黎元洪（让黎元洪守船）。黎元洪陷入绝境，维护尊严的唯一途径只能是跳海自杀。黎元洪投海自尽，和邓世昌一样勇敢。然而很遗憾，海浪把他送到岸边，活了过来。于是三十岁的黎元洪成了逃跑主义的代表，以狗熊的姿态进入监狱，半年之后以狗熊的姿态出狱。黎元洪很窝囊，也很无奈。当然比起被斩首的方伯谦，黎元洪很幸运。他的运气一直不错，但这也造就了他日后“惧外”的主政状态。

艰难的生活和严酷的时局磨平了黎元洪的棱角，也让他的心智更

加成熟。他明白，国家是衰弱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他更懂得保护自己，喜怒不形于色。

乱世之中，英雄和狗熊都是相对的。甲午战争之中，因为和李鸿章不和，手握南洋舰队的张之洞（为中法战争李鸿章不理睬福建水师报仇）不仅没有参战，而且购买军舰扩充力量。黎元洪投奔张之洞，再次抄起本行，人生际遇就此改变。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下决心编练新军。北方由袁世凯在天津编练北洋军，南方由张之洞在武汉编练南洋军。

袁世凯编练北洋军有三杰，张之洞编练南洋军的左膀右臂为张彪和黎元洪。两支军队经常比划，北洋军指挥官是段祺瑞，南洋军（副）指挥官便是黎元洪。

日后中华民国前半期成为北洋军的天下，南洋军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关键因素就是张之洞早死。如果张之洞还在，清王朝不会在辛亥年灭亡。张之洞死后，南洋军失去主心骨，成了没爹娘的孩子。晚清动乱，南洋军被调往各处救火。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号，武汉城内的南洋军只剩下工程兵，枪声一响，星星之火成了燎原之势。暴动开始，张彪和黎元洪的命运走向分水岭。张彪试图组织力量扑灭革命军，扮演反面角色。黎元洪也试着努力，但无济于事，而且落到了革命军手上。据说是被革命军从床底下拉出来的。后来又有人考证，不是从床下，是从帐幔后面把他揪出来的。按常理，黎元洪应该被当成朝廷走狗处死，如同狗熊一样死去。然而命运再次反转，他成了英雄。

命运就是如此无常，当他想如同英雄一样死去，却成了狗熊；当他应该成为狗熊时又当了英雄。一切都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这样？

武汉这地方

在中国历史上，武汉并不如西安或北京那样显赫。在中国现实中，武汉也不如北上广那般显赫。但是武汉有它自己的价值和定位。

中国有两条大河，长江与黄河，支撑起华夏文明。

翻开地图看一看，长江流经的那些重要地段，从重庆到武汉、到南京、到上海，加上中间的宜宾、荆州、九江、安庆、芜湖等地，相当于跨越整个巴蜀地带和长三角地区，基本上就是从西向东横贯中国中心地段的一条坐标。

武汉，相当于那条坐标的正中央，向西穿过三峡就可以抵达巴蜀地带，向东顺流而下就可以直抵长三角。不仅如此，向南可出洞庭湖逼近两广，向北更可以窥视中原大地。

现在的中国地图是一只大公鸡，台湾和海南是鸡脚，西藏是鸡尾，东北是鸡头，武汉大概就相当于鸡心的那个位置。正因如此，武汉成了中部的经济文化中心。正因如此，才会兵家必争、战火必烧、血必流。

越到近代，武汉的地位越重要。洪秀全闹革命前两年一直没有多大进展，在广西和湖南被赶得没地方跑，还损失了支柱型人物冯云山

和萧朝贵。直到一八五三初拿下武昌（武汉的一部分）才稳住脚，接下来三个月沿江而下，一口气拿下从武汉到南京的所有沿江城市，横扫江南半壁江山，随后和清政府在武汉附近几经争夺，死伤累累。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武汉被增设为通商口岸。凡是被外国鬼佬看上的地方，也必然被生病的中央政府看上。清帝国为了续命，就让洋务派大佬张之洞去武汉“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此武汉成了事故多发地带，热闹程度超过西安、洛阳、郑州、开封等一大堆古都。

当年孙中山编写《建国方略》时，把武汉描述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铁路系统中心，全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在未来的中华民国中，武汉之于中国犹如纽约之于美国或伦敦之于英国。只能说孙中山对武汉的感情太深。整个国民党都对武汉的印象太深，所以北伐时代，北伐军刚刚拿下武汉，国民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广东迁移到武汉，最后闹到国民政府分裂，一番口水唾沫、流血一大片之后才重新融合。

共产党同样对武汉印象深刻，刚建国就把武汉列为直辖市。那可是新中国第一个直辖市哦，连北京上海都没资格的，直到一九五四年才取消直辖市，降为副省级。

张之洞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列为晚清四大名臣，四个人共同的特点都是位高权重且弟子满天下。比起曾左李，张之洞很不同，他原本打算为大清培养的人才很多成了大清的掘墓人，比方说黄兴、宋教仁、蔡锷都是张之洞发掘举荐的人才，黎元洪也是。为了培养黎元洪，张之洞三次派他去日本留学。

被英雄

毫无疑问，黎元洪不是革命者，他赶上了历史的焦点，被英雄。

后人说起黎元洪，经常说起他被革命党人揪出来的事，感叹一番命运无常了事。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看似荒唐的事情背后都有迹可循。

一个人被历史抛弃或接受，最终要看其行为是否和历史潮流契合。如果不是，即使英雄如楚霸王，也只是落得乌江自刎。

张之洞编练的新军中，黎元洪的地位次于张彪（硬实力），但影响力大于张彪（软实力）。黎元洪学过海军，再进入陆军，属于跨专业复合型人才。东南各省的人才经常到湖北新军观摩，和黎元洪接触比较多。

但个人行为是否契合潮流，关键要看是脑袋决定屁股，还是屁股决定脑袋。朝廷死忠或革命者，屁股坐在哪边都很明确，脑袋怎么思考也很明确。

论屁股，黎元洪并不激进。对比黄兴、宋教仁、蔡锷，黎元洪三次东渡日本却没有成为革命者，划归保守派也不为过。论脑袋，黎元洪对各种激进的思想也不怎么感兴趣，说保守派也行。但他绝不是保守的老古董。

搞革命也讲热血的。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那会儿，除孙中山即将四十，其他骨干都很年轻。但孙中山干革命之初，也就三十岁。黎元洪当时已经四十一岁，过了不惑之年，老成持重。血气方刚的年代，他

还想着为朝廷当英雄呢（尽管没当成）。革命党人各种幼稚激进的策略和稳字当先的黎元洪并不合拍，但这并不意味着黎元洪和革命党人划清界限。如果他要和革命党划清界限，在武汉的日子将非常不好过，因为武汉革命党暗潮涌动。

同盟会三支力量，黄兴和宋教仁的华兴会骨干来自两湖。特别是湖北新军，基层军官均加入秘密组织。发出第一声怒吼的金兆龙、打出第一枪的程定国、大队长熊炳坤都是振武学社和共进会成员，也是黎元洪的部下。

如果说黎元洪对他们的秘密结社活动不知道，那是瞎扯。事实上那个时代的革命党行事非常高调，振武学社的行动经常暴露，黎元洪只是把暴露者礼送出去，既不惩罚也不追究。黎元洪亲手提拔的刘静庵就是革命党人，经常和黄兴书信联络，暴露之后，黎元洪只是让他托病辞职。被黄兴牵连的革命党入狱，黎元洪保释。甚至手下有人剪掉辫子，黎元洪也是闭上一只眼，假装没看见，配合异常默契，且把老好人的名声发扬光大。

如此黎元洪，在革命党的印象中形象良好。早在暴动之前，革命党人就在议论：暴动成功之后，让黎元洪出任军政府大都督。他们的理由如下：黎元洪有知兵之名，壮革命军威，威慑朝廷，这是第一；第二，黎元洪是湖北人，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同时不至于把革命果实让给孙中山；第三，黎元洪平时和革命党沟通愉快。

所以黎元洪“被英雄”，并不是革命党心血来潮的举动，而是策划在先。那些人属于同盟会之华兴会系（如蒋翊武）和湖北本土势力

（如张振武），他们决定把黎元洪拿出来挂羊头，至于狗肉怎么卖，随机应变。

了解了这一层之后，黎元洪“被英雄”一点也不奇怪。

武昌暴动前后，黎元洪更是把老好人的形象发挥到极致。

暴动前夕，武昌的气氛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满人都督瑞澂连续开会，与张彪、黎元洪商讨应对之策。武昌城内最重要的地方是楚望台军械库，守卫者正是革命者遍地的工程兵第八营。瑞澂不放心，提议用忠诚度较高的满族旗籍士兵换防。瑞澂的建议合情合理，黎元洪则坚决反对，说如果革命党人真的人数众多，少数旗籍士兵也无济于事，因此挑起满汉矛盾，反而落下革命煽惑的口实。上升到民族矛盾，瑞澂屈服了。

十月十号晚，枪声响起，理应组织军队平叛的黎元洪带领正在开会的将领留在会议厅内，发布命令：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退去则不追击。实际就是按兵不动，静观其变。革命党趁机攻占楚望台。如果拿不下军械库，暴动很难成功。

当然喽，为了表示自己是朝廷的将领，黎元洪杀掉了闯入会议厅大喊大叫的周荣棠。但随后又让会议厅的军官各找出路，而不是让他们平叛。他本人躲到了参谋刘文吉家。

十月十一号，革命党宣布胜利，马荣奉担任临时起义总指挥部司令，带兵闯入刘文吉家，揪出黎元洪，让他当英雄。黎元洪再次摆出老好人的模样，推辞说“莫害我”，情形和五年之后推辞袁世凯的“武义亲王”头衔一样。但革命党不管那些，霸王硬上弓，直接以都督黎

元洪的名义发布命令。

接下来三天，黎元洪端坐着，一动不动，如同一尊泥菩萨。仿佛又回到十五年前的甲午海战，回到那艘触礁的破船上，想要寻死。此时的黎元洪再次想到了死，因为暴动如果不成功而自己又卷入其中，就成了成为朝廷的叛徒。但形势发展给他吃了定心丸：革命党很快光复武汉三镇。黎元洪的心思悄然发生变化。但如果一直不理革命党人，那么只有死路一条。加入其中，还有一条活路。拼了。

革命党人又来找黎元洪，又是逼他就范，又是以子弹威胁。

黎元洪慷慨表示，剃光头。

剃完头的黎元洪立即以都督名义训话：“元洪不德，受各位抬举，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前天未下决心，昨天也未下决心，今天上午也未下决心，现在是已下决心了。无论如何，我总算军政府的人了。成败利钝，生死以之。”

随后黎元洪接见美国驻汉口领事说“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

十月十七号，革命党人设立祭坛，祭天誓师。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大都督的名义宣读誓词：“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我五洲各国立于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

好吧，或许这一段才是黎元洪一直埋在心底的话。山河破碎，华

夏沉沦，大家已经受够了爱新觉罗家族。汉人精英，不论是否说出来，绝大多数都或多或少成了民族主义者。所以像康有为那般死守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会沦为老古董。

鉴于黎元洪的势力是张之洞遗留的军队。

在革命党眼中，黎元洪虽然是半路出家，但很好合作，还要继续合作。

在守旧派眼中，黎元洪参加革命是迫不得已，可以拉拢。

如此一来，黎元洪成了香饽饽。所谓香饽饽有两层意思，第一，被所有人争抢；第二，不论被谁抢到，都可能被吃掉。所以不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在争抢黎元洪。如果孙中山争取到黎元洪，革命党将控制长江流域。如果袁世凯争取到黎元洪，不仅控制华中，还会把革命党挖走一半。所以那个时代的黎元洪成了第三巨头。

透过老好人的形象可以发现，黎元洪很不简单。那是一个竞争极其激烈的年代，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任何一点东西都有人去争抢。王权衰落，袁世凯的北洋派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黎元洪从不强求任何事，也不拒绝任何事，低谷时期和任何势力都能保持关系。他的一切都是水到渠成。这是一种极高的政治智慧。

如果拿到历史上看，如此行事风格，很有点汉高祖刘邦的味道。然而很遗憾，对比刘邦，黎元洪相差甚远。刘邦有萧何把身边琐事打理得井井有条，黎元洪身边没有萧何。刘邦有张良出谋划策，黎元洪没有。刘邦有韩信包打天下，黎元洪没有。

好吧，黎元洪勉强算刘邦的山寨版，民国刘邦吧。

即便是原版刘邦，走上最高领导岗位尚且经历腥风血雨，尚且需要装孙子克服重重难关，上台之后尚且不稳，上演了许多悲喜剧。作为刘邦的山寨版，黎元洪的剧情更夸张，悲剧更悲，喜剧更喜。

二章 克星

突然之间成为那个时代第三极的黎元洪没时间欢喜。他本来就是被人家挂出来的“羊头”，地位与那个飘摇不定的时代一样。

历史早已告诉我们，权位是毒酒，会上瘾。不喝会渴，喝了会更渴，忍不住，便只能继续喝，饮鸩止渴。如果不喝，可能会死得更快更惨。

黎元洪的优势在于，暴动的士兵都是他的部下，金兆龙、程定国都是工程兵。

黎元洪的劣势在于，暴动原本和他无关，他的大都督还是被别人用枪指着脑门顶上去的。

武昌暴动功劳归蒋翊武、孙武、张振武。他们三人合称“首义三武”，彼此不合，派系不同，暴动之前和暴动之后矛盾重重。

蒋翊武生于一八八五年，湖南人，同盟会之华兴会系统，黄兴和宋教仁的追随者。

孙武生于一八八零年，湖北夏口人，三武之中名气最大，江湖地

位最高，角色最诡异。他曾东渡日本学军事，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了一系列反政府组织。为了打响名声，孙武自称孙中山的弟弟，和哥哥孙文一起干事业，在湖北一代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但是必须承认，他干革命的实力很一般。武昌暴动前夕，他在自己的住所造炸弹，手艺不精，炸弹爆炸，引来官军搜捕。他自己倒是跑掉了，同志们的名单却落到了官军手上，导致若干人头挂上武昌城头。暴动成功之后，孙武三百六十度大转身，背弃哥哥孙文，转而支持黎元洪。

张振武生于一八七七年，湖北罗田人，为湖北本地革命派。要说知识分子中的章太炎等人是头脑里的“华夷论”者，那么张振武和徐锡麟一样，是行动上的“华夷论”者，讨厌满清。武昌暴动之前，孙武制造炸弹惹麻烦，张振武临机应变，联络革命党，继续革命。和孙武不同，张振武是理想派，他不喜欢黎元洪，而是支持孙中山。

黎元洪面临的局面：如果能把湖北革命党抓在手中，那么就能稳坐华中，看孙中山和袁世凯南北斗法，时不时发表一个和平倡议，把老好人进行到底。否则，湖北势力有可能被吃掉，自己也可能遭殃。

支持孙中山的张振武就成为黎元洪最现实的威胁。更大的威胁来自于张振武不知消停，还要继续革命。武汉号称首义之地，大兵们以功臣自居，多半喜欢折腾。但有一点，出了湖北，黎元洪啥也不是。继续革命，要么把湖北人带到外省，要么把外省革命者带到湖北。南边的湖南是黄兴和宋教仁的起家之地，东边的江西有孙中山的铁杆支持者李烈钧。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动摇黎元洪的根基。

为了权力，为了继续当老好人，必须除掉张振武。要么让他离开

湖北，要么杀掉。

要做到那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张振武是武昌暴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明里下手肯定不行，会把自己赔进去，必须玩阴招。其基本要诀是，暗地里收集搞臭对方的证据，诸如贪污受贿乱搞男女关系等等。如果证据不好收集，那就泼脏水。

张振武的证据太容易收集了。搞革命原本就是铤而走险，继续搞革命，险上加险。为了继续革命，张振武带着大笔钱去上海买武器。如果仅仅是买武器也就罢了，张振武秉承了那个时代革命者的一贯作风，有机会就自我宣传。

所谓宣传，就是请客吃饭交朋友，要花钱。按现在的话说，那些钱对不上帐。

黎元洪本就看不爽张振武，又见他拿公款自我推销，就派人去查账，并电告上海都督陈其美，监视张振武的行动。张振武得知消息后怒而返回湖北，面质黎元洪，并声称查账可以，要查大家一起查，孙武的帐和黎元洪的帐都要查。当然，大家都不干净。

黎元洪继续当好人，一边道歉，一边解释说是孙武的意思（洗脱自己又挑拨了孙武和张振武原本不友善的关系），心中杀机更盛了。但要杀掉张振武，即使有证据，也是技术活。黎元洪手捧大光头陷入沉思，穷尽平生智慧，某时某刻想到一个老掉牙但非常有效的招数：借刀杀人。借袁世凯的刀，杀张振武。袁世凯也很厌恶那些能折腾的革命者，但时机未到，不能撕破脸皮，就让张振武担任蒙古调查员，调虎离山，伺机动手。

八月十一号，张振武抵京。

八月十三号，黎元洪给袁世凯一封密信，罗列张振武的种种不是，要求袁世凯把张振武除掉。黎元洪知道袁世凯对张振武不爽，也知道袁世凯在拉拢自己。这是一个很腹黑的想法。

黎元洪与袁世凯有类似的经历，都是练兵起家。区别在于，袁世凯很早就有独当一面的经验，黎元洪在武昌暴动之后方才出头。玩阴谋，黎元洪铁定不是袁世凯的对手。

袁世凯接到信后，略一思索，决定让黎元洪如愿，让陆建章和段芝贵处死张振武。

抵达京城的张振武连续请各界人士吃饭，全然不知大祸临头。十五号请的宾客中，坐在首席的段芝贵怀里揣着处决张振武的命令。宴会结束之前，段芝贵找借口提前离场。张振武在回程中被捕，陆建章把他立即处决。

自古以来，英雄总是败于阴谋，张振武也不例外。

张振武之死引起风暴。面对汹汹而来的口诛笔伐，袁世凯很淡定地把黎元洪抛出来，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黎元洪身上。黎元洪暴露在风口浪尖，赶紧接连发电报罗列张振武的种种罪证：什么贪污受贿了，什么私下结党反对共和了，如此这般罗列了十几条，依然挡不住议员们的滔滔口水。除黎元洪外，愤怒的议员还要弹劾陆军总长和国务院总理，甚至波及到袁世凯身上。

袁世凯当然不愿意背黑锅，让陆军部电复黎元洪：“奉大总统令，真电悉。张振武起义有功，因当曲予优容；破坏共和，倡言不轨，实

属扰乱大局，为民国之公敌。副总统为保全治安起见，自有不得已之苦衷。为民除害，足以昭示天下。请予处分，应勿庸议。”相当于让黎元洪承担责任，背黑锅。

无奈之下的黎元洪被迫表态：“自请大总统量予处分者，实因上负大总统，下负国民，既不能烛照于机先，惟冀补直于事后。”八月二十七号，张振武的遗体运回武汉，黎元洪再次以老好人的形象出现，扶棺大哭，表演甚为卖力。

八月二十八号，黎元洪去张振武灵堂，再次大哭一番，并送上亲自写的挽联：

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

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不负故人。

同时又给了张家两千块（当时是一大笔钱）的抚恤金。

如此惺惺作态一番，完全是猫哭耗子假慈悲。有人认为黎元洪无辜，有人认为黎元洪阴险。其实玩政治，阴险还是无辜，都是围绕着利益转。为了利益，老好人可以变得阴险；为了利益，政客也可以看起来很无辜。二次革命之后，蒋翊武在江西被抓。黎元洪命令，就地处决。

张振武的死，再次呈现出革命党的悲哀和虚弱。他是孙中山的支持者，可是在革命党内，除了黄兴发电报表示一下之外，其他人竟然无动于衷，沉迷于和袁世凯和解（继续逍遥快活）的幻觉中。张振武

尸骨未寒，孙中山带着一张笑脸去北京会晤袁世凯。按照后人理解，孙中山体现了伟大革命者的胸襟。而袁世凯看到的不是革命党的胸襟，而是决心不够，实力虚弱。所以北京的袁世凯放心大胆地忽悠孙中山。

袁世凯能战胜孙中山，主要是因为成功拉拢了黎元洪和梁启超。梁启超倒向袁世凯，意味着商人和乡绅认可袁世凯。杀掉张振武，除了除去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试探了革命党，更是斩断了黎元洪和革命党的联系。

黎元洪倒向袁世凯，意味着一半革命者归了袁世凯。正因如此，武昌暴动的那些人最后基本都没有好下场：张振武和蒋翊武这样的领袖人物死得很窝囊；发出怒吼的金兆龙沉尸江底；打响第一枪的程定国郁郁而终。

乱世，就是如此。所以才凸显和平之珍贵。

黎元洪的处事风格像刘邦，但和刘邦相差甚远。袁世凯犹如近代曹操，但并不比曹超差。面对袁世凯，黎元洪还是太天真了。袁世凯一辈子都在利用别人，何曾被别人利用？

袁世凯，黎元洪的克星。

囚徒的抗争

近代史异常混乱，每一个崭露头角之人都有各自的故事。有人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取胜，如康有为（掀起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孙中山（走上革命之路）。有人以无与伦比的决心取胜，如曾国藩（不灭

太平军誓不罢休)、谭嗣同(为变法流血)、宋教仁(坚持政党政治)。有人以权谋取胜,如李鸿章(游走在国内外各种势力之间)、袁世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黎元洪不能说没有权谋之术,不能说不腹黑,但最主要的标签还是运气好。黎元洪大概是近代史上运气最好的人。甲午战争投海不死,当了狗熊反而飞黄腾达。辛亥暴动,黎元洪以为陷入绝境,三天过后成了暴动的领头人,三个月过后成了副总统,如梦如幻啊。

命运难以预测,可以让人生的走势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也可以如同过山车一般颠簸。黎元洪的命运,两种兼而有之。黎元洪运气虽好,却在每一次好运之后都会经受一次磨难。

张振武死后,黎元洪彻底稳住了湖北,地位稳固了,同时也危险了。地位稳固之前,他是袁世凯争抢的香饽饽。袁世凯的胃口很大,想要鲸吞天下,必须吃掉黎元洪。黎元洪以首义元勋的身份身兼副总统和湖北都督坐镇武汉,如同一块顽石卡在长江中游。

袁世凯取代了孙中山,黎元洪还是临时副总统。袁世凯当选为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袁世凯让黎元洪当参谋总长,黎元洪接下。袁世凯给黎元洪送去一副亲笔题词“民国柱石”,黎元洪收下。袁世凯给黎元洪一百万大洋,黎元洪装入口袋。袁世凯让黎元洪到北京,黎元洪磨磨蹭蹭、磨磨唧唧,就是不动。

黎元洪明白,在湖北,他是全国二把手。到了北京,只是理论上的二把手,所以坚决不去。

袁世凯看他很不顺眼,但也不能硬来。在孙中山和黄兴光荣走上

通缉榜之后，黎元洪成了袁世凯政府之中象征革命党的一个招牌，不能丢。换成别人或许没办法，但袁世凯是黎元洪的克星，他微微一笑，计上心头。袁世凯让段祺瑞去武汉，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把黎元洪骗上火车，直接送到北京，然后把湖北忠于黎元洪的军队彻底改编。时间是一九一三年。

二十年之后，黎元洪再次回到湖北，彼时已经在棺材里躺了五年。

袁世凯用接待孙中山的方式热情接待黎元洪。袁世凯从不做赔本的买卖。孙中山的欢迎仪式刚刚过去，就成了通缉犯。黎元洪更不幸，直接住进了中南海瀛台，那是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之所，一个风景很好的牢房。孙中山在海外好歹还有自由。

当然喽，能住进瀛台的囚徒都是特级的。不论是光绪皇帝还是黎元洪，都能享受绝大多数国民难以想象的生活。为了表示两人关系密切，袁世凯让自己的儿子娶了黎元洪的女儿，两人结为儿女亲家。表面上二人结为一体，实际上黎元洪成了陪衬。

对黎元洪而言，去北京如同飞鸟入笼。好处是不用劳心权力纷争问题，又可以做老好人了。入京前三年，黎元洪基本是隐形人，还不如处于低潮期的孙中山自在。

对袁世凯而言，瀛台的黎元洪如同一只长相很丑但很娇贵的金丝雀，需要显摆时就拉出来亮亮相。当时的袁世凯是天下第一人，还有什么需要黎元洪的呢？称帝需要。

关起门当一个人的皇帝和当全天下的皇帝，区别在于前者只有自己认可，后者需要天下人认可。袁世凯要当皇帝，首先需要身边的人

认可。对袁世凯而言，所谓身边人，并不是那群擅长争风吃醋的姨太太，而是副总统黎元洪、陆军总长段祺瑞、地方巨头冯国璋等人。第一个需要的支持者，便是副总统黎元洪。

袁世凯曾经试探过黎元洪：“近来很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怎么看？”黎元洪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

想做从龙之人的杨度拜访黎元洪，话没说完，黎元洪就表态：“我身为民国副总统，对此违背民国事，非愿所闻。”

袁世凯称帝的过程，黎元洪的战术是非暴力不合作，软磨硬顶，决不表态支持，但也不会站出来反对。那情形和武昌暴动的前三天一模一样。

但该来的终究会来，袁世凯不会为了一个沦为摆设的黎元洪放弃最终目标。袁世凯知道黎元洪是一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只要把生米煮成熟饭，黎元洪就会就范。袁世凯称帝之后，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唯一的亲王。

让袁世凯吃惊的是，黎元洪并没有就范。面对众人逼迫，黎元洪表态：“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神明。愿为编氓，终此余岁。”这话可谓大义凛然，一副为了维护共和不惜牺牲的模样。但是把时光倒退五年，黎元洪对清政府同样信誓旦旦。

原因很简单，袁世凯没能把生米煮成熟饭。如果袁世凯真的能搞定天下，黎元洪最终就会接受武义亲王的头衔。正如武昌暴动之初，

如果清政府能够迅速控制局势，那么黎元洪还是清政府的将领。袁世凯称帝，西南战争爆发。袁世凯无法迅速搞定蔡锷，情形和武昌暴动何其相似。身在高层的黎元洪也明白，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同样不支持帝制。

所以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整个护国战争期间，中西部各省乱哄哄一片，湖北动静并不大。即使袁世凯众叛亲离之际，四川的陈宦、陕西的陈树藩、湖南的汤芑铭都反袁了，湖北依然没什么动静。要知道湖北可是黎元洪的老巢，尽管黎元洪不在了，影响好歹还有。

黎元洪看似一副泥菩萨模样，内心却相当清醒。因为他没必要孤注一掷。如果袁世凯胜，黎元洪还是黎元洪，副总统或武义亲王，理论上都是二把手。如果袁世凯败，那么副总统转正，成为理论上的一把手，也好。所以他只想要含糊其辞，既不接受册封，也不和袁世凯翻脸。他还是老好人，懂得在最合适的时候做最有利选择的老好人。

苦水

如同辛亥暴动一样，黎元洪再次迎来命运的垂怜。众叛亲离之下，袁世凯郁郁而终。反对袁世凯的人都成了英雄，得到一次重新瓜分权力蛋糕的机会。

这个世界由各种利益交织而成。每个单位团体，都有这样那样的利益。所有的单位团体组成国家，国家相当于一个极端精密复杂、利益交织的组织。一个组织内部，如果小虾米遭殃，没有人会正眼看一

下，因为对大家都没好处。如果一把手倒了，很多人都能官升一级，有人还能跳跃升迁。袁世凯被众人推倒之后，有机会走上一把手岗位的有好几个，经过一番复杂的算计之后，黎元洪从副总统的位置上转正，成为国家元首，理论上的一把手，和之前帝国时代的皇帝一样。时间是一九一六年六月七号。

黎元洪美滋滋地上任了。但很快他陷入了人生的灰暗之中。犹如武昌暴动一样，经历命运垂怜的黎元洪再一次经受命运的考验。回顾黎元洪一生。童年时代生活固然艰辛，但仍然有很多乐趣：放牛的乐趣，读书的乐趣。当兵时代的生活相对简单，虽然最后当了狗熊，但死里逃生的快感还是有的。辛亥暴动更是经历了从自杀边缘到天下英雄的快感。然而当了大总统，理论上到了人生的巅峰，却发现脚下是无底深渊。

原因无他，到了人生巅峰，掌控天下之权，就要接受权力的考验。

权力简单之极，复杂之极。

有人举手投足之间操控天下，举重若轻，看似非常简单。有人忙忙碌碌一辈子，累死在办公室，也可能落下国破家亡的结局。黎元洪介于两者之间。

权力高尚之极，卑劣之极。

有人掌控权力平定天下，教化万民，留名青史。有人玩弄阴谋诡计一生，杀人无数，最后只是带来更严重的杀戮。黎元洪介于两者之间。

权力宏大之极，渺小之极。

古今中外很多书籍描述它，汗牛充栋，延绵无期。如果你愿意，可以写更多的书来描述它，同样没有尽头。但是也可以用极为简单的两个字描述：利益。

三章 权力的模样

如果你一无所有，那么好吧，你的权力只限于管理自己，只要管理好自己就行。如果你还有更大的能量，可以去村里（假设你是农村的）参加选举。在自身努力和一丝运气的关照下，你成了村长；那么恭喜，你进入了行使权力的世界。你要把村子管理好，按照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你需要让村民和谐。和谐的内容包括：调解邻里纠纷，改善孤寡老人的生活，给乡亲们修路等等。这些都在你的权力范畴之内。

如果你很能干，升为镇长，权力变大了。但是很多事却不能亲自去做了。管一个村子，凡事可以亲力亲为。管一个镇，即使你想要亲力亲为，那置下面的村长于何地？所以你必须学会指挥村长干事。但并不是所有村长都如同你那般热爱村民，他们可能整天想着打麻将，或者把修路的钱贪污掉，搞得大家怨气很大。另外小镇上会游荡着年轻的“古惑仔”，时不时惹麻烦捣乱。这些都是考验你智慧的时刻。如果你干得很好，又有些机遇，将再次高升为县长。

县长的位置上，权力再一次发生变化。一年之中，你只有少许的

时间到基层看看，而且未必能看到真实情况。你基本上无法直接管理村长们，因为每个乡都有很多事。在县长的位置上，你将面临新的挑战：贪污受贿的诱惑。县长的位置，会牵扯到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奸商无孔不入。这个世界上，只有奸商能和贪官比恶。奸商会想办法让你变成贪官，让你上贼船。你在村长的位置上，有人会送你几只鸡；在镇长的位置上，有人会送点土特产，一般都在人情范畴之内。但在县长的位置上，贪污的数额可以很大，可能身败名裂。俗话说，贼船好上不好下，与贼为伍就要跟贼走。这些都在你的权力范畴之内，你需要谨慎处理。

如果你把县长的权力使用得很好，又有好运气眷顾，你将再次高升一步，行使省长的权力。那么好吧，你的考验将增大。除了更大的贪污诱惑，你还要防止下面的县长们贪污腐败。因为他们在下面干坏事，不仅让老百姓受害，还可能波及到你身上，直接损害你的利益。防止他人贪污，比自己抵挡贪污的诱惑更难。到了那个层面上，还要面临新的考验，就是各种利益集团。他们会为了自身利益使用一切手段对付你，捧杀或棒杀，无处不在。如果你抵挡不住，那么好吧，你将成为他人谋利的工具。

如果你成为国家元首，那么好吧，除了以上所有问题，你还要处理国际关系，还要面临军方系统。所有人都看着你，所有人都试图和你接近，所有人都试图从你那里得到利益。你理论上有很大的权力，事实上你可能成为玩偶。因为每一项权力都需要有人去实施，而你身边未必有可靠的人帮助你。尤其是乱世之时，你将举步维艰。黎元洪

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名义上是国家元首，实际上是孤家寡人，有权没人实施，只是玩偶。即使是帝国时代，皇帝也常常可能是摆设。皇朝末年的皇帝且不说，强悍的秦皇汉武登基之初都经历过被人架空痛苦，何况运气成分很大的黎元洪。

对多数人而言，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对权力求而不得。

对少数人而言，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不是对权力求而不得，而是离权力近在咫尺却咫尺天涯，怎么也拿不到。

对黎元洪而言，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不是离权力近在咫尺却拿不到，而是明知道权力就是自己的，却不能使用，还要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黎元洪的烦恼

成为大总统的黎元洪忽然发现，周围没有值得信赖之人。所有人都是北洋系统，都是袁世凯带出来的。袁世凯末期，他们分裂成袁世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袁世凯的人，不可能支持黎元洪。反对袁世凯的人之中，小鱼小虾，不管用；大鳄，黎元洪用不动。至于革命者，自从张振武和蒋翊武死掉之后，除了章太炎，基本上都成了黎元洪的对头。

想接近黎元洪的人，都是想捞利益。当时到处都要钱，国库空虚，军饷没着落，公务员工资没着落，还有洋大人的各种债务需要偿还，可谓头焦额烂。他仅有的那点湖北势力，已经被段祺瑞瓦解。他相当

于孤家寡人坐在国家元首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基础，

袁世凯死后，恢复旧国会，恢复《临时约法》，但做决定的人不是黎元洪。

黎元洪的施政方针就是没方针。如果非要找一个方针，就是老好人方针。所谓老好人方针，就是捣浆糊，把各派糊弄好。为什么要捣浆糊呢？因为袁世凯武力征伐失败的教训就在眼前，而黎元洪也没有武力征伐的资本。从另一方面讲，黎元洪虽然是练兵出身，但除了甲午战争那半天和辛亥革命那三天，基本上没上过战场。他的智慧、他的成功法宝就是当好人。

在黎元洪看来，老好人智慧既然能让自己从寒微之士变成大总统，也可以以此治理天下。

透过这一切，黎元洪想要塑造一个和谐的局面，让国民修生养息，搞一段时间的无为而治，如同汉初那般。如果能成功，再好不过。

理想可谓相当丰满，但现实很骨感。黎元洪忘了，汉朝初年的无为而治，是在削平军事巨头（如韩信、彭越、英布）之后的事。黎元洪时代，皖系军阀嚣张跋扈，直系军阀难以管辖，奉系军阀无法无天。另外还有反袁战争中兴起的西南军阀，蔡锷死后，唐继尧基本上独立为王。广州的孙中山，也建立了根据地，嚷嚷着北伐。和平年代捣浆糊能行，面对一帮乱世军阀捣浆糊，相当于扇自己耳光。但他们还不是黎元洪最大的障碍。

当然黎大总统也可以很舒服，只要他干好本职工作，拿着大总统印章，在段祺瑞需要的时候盖印即可。说到段祺瑞，黎元洪就来火。

黎元洪提倡的老好人政治，最大的障碍就是段祺瑞。“临时约法”时代是责任内阁制，段祺瑞恰好是内阁总理。黎元洪面目和善，段祺瑞整天板着脸。黎元洪平易近人，段祺瑞随时准备骂人，两人天生就没法做朋友。看见段祺瑞，黎元洪就很不舒服。

更让黎元洪不舒服的是，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和自己“捣浆糊”的策略背道而驰。

最让黎元洪不舒服的是，段祺瑞是北洋系统的新领袖，有人有枪有势，说话嗓门大、有分量。让黎大总统盖印也就罢了，还把他当盖印机对待。段祺瑞自己把黎大总统当盖印机也就罢了，段祺瑞身边的人也把总统当盖印机。

最后所有的矛盾都聚焦在徐树铮身上。

徐树铮是一个极为独特的人物，趁机收回外蒙的功勋可以和左宗棠收复新疆相比。如果在一个相对安定的时代，他将成为民族英雄。但因为乱世，又因为外蒙得而复失，又因为他死得不明不白，就被历史忽略了。他的事后面再说。在黎元洪眼中，徐树铮极为可恶。

徐树铮号称“小扇子”军师，鬼主意极多，为段祺瑞的心腹。行事风格和段祺瑞相当，倨傲狂妄。但段祺瑞是北洋元老，狂妄骂人也就算了，资历摆在那里。徐树铮当时只有三十多岁，毛头小子一个，怎么能行？但徐树铮的风格就是很狂，在袁世凯面前也有三分狂劲，面对黎元洪就更加毫无顾忌了。当初段祺瑞去湖北骗黎元洪上火车，徐树铮拿枪在车上顶着黎元洪，让他去北京成为笼中鸟。黎元洪很讨厌徐树铮。

段祺瑞担任总理之后，徐树铮被提拔为国务院秘书长，经常去总统府和黎元洪打交道。和段祺瑞一样，徐树铮也把黎元洪视为盖印机。徐秘书经常拿着公文找黎大总统盖章，一言不发，一副很酷的模样。正常情况下请人办事还要陪三分笑脸，何况还是面对大总统。

黎大总统一次不去计较，两次视而不见，三次忍气吞声，四次怒火中烧。忍无可忍之时，黎大总统决定不再忍。某日徐秘书再次拿公文找黎大总统盖章，黎元洪端起架子，表示材料放在那里，等审阅。眼见盖印机发脾气，徐树铮很不耐烦地说：“总理那边已经定了，总统就不必看了，只管盖上章就行了。”

好吧，国务院秘书长敢如此对大总统说话，够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使真菩萨也未必能忍。黎元洪拒绝再见徐树铮。光绪皇帝也没有如此窝囊，黎元洪的反应可以理解。

总统和总理的矛盾浮出水面，府院之争拉开大幕。此时黎元洪仅上台数月。

总统是国家元首，理论上行使最高权力。但当时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理才是干事的。总统和总理斗争，相当于争夺权力，相当于把国家一分为二。

更大的悲剧在于，矛盾纷争，短时间内难以解套。

当初孙中山在南京当选临时大总统，要搞总统制，让位袁世凯时又推行内阁制，造就了总统和总理两头并列。袁世凯上位之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集权，最后却在称帝的道路上粉身碎骨。袁世凯死后，局势再次回到双头并列时代。中国从来都是天无二日。即使如今，依

然是一国一党一领袖。分裂只会造成混乱，混乱从来都是文武两支。

先看文

离开湖北后，黎元洪被解除所有武装。即使当上大总统之后，支持者也没有几个。但是当他和段祺瑞的矛盾公开，支持者多了起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投机取巧之政客尤其多。支持黎元洪，可以获得很多东西，比方说话语权，比方说可以和段祺瑞谈价钱。

尤其是前国民党议员，原本奢望靠嘴皮子吃饭，抛弃孙中山投靠袁世凯，没想到兔死狗烹，被袁世凯赶回老家。如今恢复旧国会，又有了卖弄嘴皮子投机钻营的机会。内务部长孙洪伊（请愿专家，打嘴仗高手）就是其中之一，他支持黎元洪与段祺瑞斗争，要求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这就是典型的官僚祸害。

黎元洪不愿见徐树铮，但徐树铮会见黎元洪。徐树铮找到孙洪伊的把柄，拟定撤销孙洪伊的公文，找黎元洪盖章。黎元洪拒绝盖章。盖章？不盖！让你盖？偏不盖！

闹到后来，段祺瑞找到黎元洪，表示不撤孙洪伊，他自己就辞职不干。最后还是北洋大佬、未来的大总统徐世昌出面调停，让孙洪伊和徐树铮同时下岗。府院之争由此升温。

这事只是冰山一角。类似的议员好几百人，都是兴风作浪的好手。他们自认为肩负监督政府为民请命的神圣使命，之前选袁世凯为终身大总统，之后又被曹锟贿赂。他们在报纸上夸夸其谈，争名夺利。他

们喜欢风花雪月，喜欢美酒美人。他们什么都不怕，就怕闲。一旦闲下来，就会失去存在感，失去曝光率，失去吃花酒、讨小老婆的资本。

几百名国会议员分成若干派系，但只有两种主张：有人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之策略，形成强力有效的中央政府；有人支持黎元洪的捣浆糊策略，和谐生活。

大家都是斯文人，一开始在报纸上发表观点，分别列出一二三四五，论战。

论战的结果就是没结果。

接着就在国会扯开嗓门争论，结果还是没结果。

那就吵，还是没结果。

常言道君子动口不动手。当动口没有结果，只能动手，或者说边动手边动口。口水和拳脚同时出动，有时还能见点血腥。如此环境下，即使饱学宿儒或者新派新锐也常常耐不住寂寞，争吵之时忍不住施展拳脚。温文尔雅的议员一转眼变成菜场大妈。

动手的结果就是上报纸、搏头条，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增加知名度。那年头，没吵没骂没打过，都不好意思说混国会。

然后呢？我已经尽力了，为民请命完毕。

再看武

文已经够乱了对吧，武更乱。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暴力支柱。当支柱四分五裂，便是乱世。

所谓混乱或太平，很大层面上就是军队混乱还是有序的问题。春秋战国为什么乱，就是周王室衰落，军阀各自为战。大清帝国退出历史舞台，不仅仅是爱新觉罗家族不在了，更主要的是所有军阀都失去了约束。袁世凯在世，勉强能维持和谐。袁世凯之后，军阀们看到争霸天下的希望，时不时有人登高一呼，总有人喝彩。

笔杆子打打闹闹，是茶壶里的风波。枪杆子闹事，总会祸害一方。世界的本质是，有钱的人需要更多的钱，有名的人需要更大的名，有枪的人需要更多的枪和更大的地盘。所以，失去束缚的枪杆子极为可怕，更何况那个时代的军阀们还有闹事的借口。

段祺瑞要武力统一全国，黎元洪表示不需要武力。但不论是否需要武力，都要各省督军（军阀）的认可。没有枪杆子，一切免谈。

枪杆子，恰好是黎元洪的软肋。黎元洪和段祺瑞均起于练兵，南洋军已经烟消云散，天下是北洋军的。段祺瑞是北洋军领袖，既然黎元洪不听话，既然笔杆子干不倒不听话的黎元洪，那就不用枪杆子干掉他。当然不能直接去干，要间接操控。他决定鼓动军阀倒掉黎元洪。

段祺瑞主张使用武力的借口有两个，国内和国外。

国内借口：西南各省还在闹独立，东南的孙中山要北伐。如此情况，以正统自居的北洋政府自然要有所表示。掌控实权的段祺瑞要彻底消灭南方，建立丰功伟绩。黎元洪原本一无所有，还指望赢得南方的同情，故坚决反对。

大军阀张勋很起劲，要打倒南方，上蹿下跳，搞得黎元洪很难受。

段祺瑞眼高于顶，原本看不上张勋，但张勋让黎元洪难受，便假装支

持张勋。

段祺瑞的外部借口是欧战。

袁世凯机智无双，行事谨慎，最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搞帝制，就是看准欧洲列强正在恶斗之缝隙。袁世凯称帝的时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契合。袁世凯死，黎元洪上台，经过马恩河试探，凡尔登绞肉机之后，英法德三个基督教之新教国家在马恩河一带进行最后的决战。

双方分别投入上百万的兵力，依靠壕沟进行绞杀。此次会战英法进攻，德军防守，双方动用了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历时半年。虽然英法没能赢得战略性胜利，但战争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同盟国处于劣势，特别是德国，疲态尽显。

这事直接影响了东方的中国。段祺瑞主张参战，黎元洪表示继续“严守中立”。其实捞到战胜国的头衔，有利无害。黎元洪反对参战的原因有两个：反对段祺瑞；谋求美国的支持。

参战胜利，段祺瑞的威望将更高，军阀们将更难以约束。

列强在欧洲打仗，日本支持奉系和皖系在中国扩张势力，日本支持段祺瑞参战，是想趁机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也没闲着，也想寻找合格的代理人，试图和日本对抗。美国人选择支持黎元洪。但美国当时着眼西方，在中国无法单独和日本抗衡。马恩河会战那会，美国也看到德国日薄西山，打算参加欧战分享胜利果实。美国原本支持中国参战，但是看到日本也支持中国参战，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对中国参战。黎元洪敢于和段祺瑞叫板，除了想拿回权力，也有美国支持的原因。

看到了吧，这就是中国的悲哀。仅仅内斗，已经很可悲了。内斗又无法摆脱外部势力的干涉，那是双重的悲哀。更大的悲哀在于，悲哀的内斗不会停止。

段祺瑞密电各省督军，寻求支持。黎元洪则密电全国名流，寻求支持。

段祺瑞召开督军（军阀）会议，给黎元洪和国会增加压力。

军阀进京，惹出一系列麻烦。按照常理，各省督军未经邀请是不应该参加内阁会议的，但军阀们认为，既然如今民主共和，人人当家作主，那他们作为各省代表，参政理所当然！

特别是安徽督军倪嗣冲，人称倪大炮，开口放炮：“赶紧加入协约国，越快越好！”其他几个督军表示赞同。内阁很快通过“对德宣战提交国会案”。段祺瑞对督军们表示感谢，同时又暗中使用激将法：担心黎元洪那边盖章有问题。倪嗣冲拍胸脯保证：“总理放心，这事包在我们身上。”时间是一九一七年五月六号。

五月九号，督军们兴高采烈地去了总统府。倪嗣冲打头炮：“中国必须参战，不然无法在国际舞台上立足。”老调重弹，喋喋不休。黎大总统脸色原本是晴天（有微笑），逐渐转阴（笑容凝固），最后闪电雷鸣（发怒）。黎元洪拍桌子斥责说：“你们这些人，身为地方军政长官，如何擅离职守跑到北京来了？还闯入国务会议干涉国政，实在是岂有此理！”

大家印象中的大总统是泥菩萨，这般“金刚怒目”还未曾见识过，一时反应不过来。黎元洪乘势指着倪嗣冲的鼻子说：“听说你们这些

人还擅自去拜访外国使节，这是你们应该做的吗？糊涂！你们这是在干涉国家外交！”

黎元洪如此发泄，自然很痛快，但后果很严重。他伤害了大老粗们敏感的自尊心。要知道，袁世凯都不曾对这帮大老粗如此大吼大叫。大老粗心里想，老子在清朝的级别就是统制，你黎元洪才是个协统，如今如此猖狂，撒泡尿照照先。

军阀们离开北京，张勋召集大家去徐州开会，商讨对付黎元洪的办法。

与此同时，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矛盾上升到顶点，府院之争进入白热化。

所有矛盾都要解决。常规矛盾用常规手段，不可调和的矛盾就用非常规手段。对一般人而言，非常规手段也就是拳脚相加，狠一点的亮刀子。对身居高位者而言，非常规手段要动枪杆子。鉴于没有枪杆子，黎元洪决定先下手为强，免除段祺瑞的内阁总理职务。

黎元洪致电各省：“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以上各件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负责。”

段祺瑞离职后去了天津，等着看黎元洪的好戏。徐州那帮大老粗炸开了锅，拍桌子、跺脚、摔板凳，痛骂黎元洪。倪嗣冲跳得最高：

“黎元洪曾对我说，不经国会通过对德宣战不合法……什么他妈的法！总理是责任内阁的领袖，总理说的话就是法！他不经内阁副署，就免去总理的职务，他合法吗？辛亥武昌之变，他听到枪声吓得钻到了床

底，由此才走运当上的总统！现在好，他身居高位，优柔寡断不说，竟然妄自尊大，以开国元勋自居，谁他妈的来拥戴他！”大家鼓掌，表示骂得好。

倪嗣冲趁热打铁：“我现在就回去，马上宣布独立，大伙也都这么办！看他怎么收场！”

张勋听后趁机鼓动：“老倪说得好，要给黎元洪一点颜色看，他太不把我们北洋系放在眼里！咱们不但要宣布独立，而且还要出兵北伐，把黎元洪赶下台！”

大老粗们说干就干，多人宣布独立，连东北的张作霖也表态要南下。

段祺瑞是北洋系统的新领袖。黎元洪的算盘：得罪段祺瑞一个，但不得罪北洋系统，另请北洋元老出来代替段祺瑞。

黎元洪找到徐世昌，摆出老好人的面孔。徐世昌是北洋元老，不掌兵。黎元洪希望他取代段祺瑞。但徐世昌是人精，不愿意也不敢得罪段祺瑞，回赠黎元洪一个老好人的笑脸了事。

黎元洪找到王士珍，再次摆出老好人的面孔。王士珍也是北洋元老，号称北洋三杰之首，但生性闲散，不掌兵。黎元洪希望他可以做内阁总理，取代段祺瑞。王士珍同样摇摇头。

黎元洪去请冯国璋，答案同样是不行。黎元洪到处送笑脸，毫无结果。堂堂内阁总理，国家二号人物，掌控政府实权，一般情况会有很多人争抢。然而黎元洪愣是送不出去。没办法，那个位置是火山口，谁也不愿坐在上面。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还是找到一个勇敢的人出来当总理，他叫李经羲，李鸿章的侄子，典型的世家公子哥，眼高手低的代表。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北洋军出自淮军，淮军祖师爷是他叔，他自己是北洋军的前辈，能摆平所有人。

然而刚刚到北京，就有几个大老粗宣布独立。李经羲赶紧躲到租界，连就职仪式都没来得及举行。此情此景，黎元洪再次回到那种熟悉的状态——绝望。

跳海可以生还，武昌暴动的剧情可以反转，当了总统却毫无办法么？就在黎元洪内心发出这样的“天问”之时，一双温暖的大手伸了过来。黎元洪以为转机出现了，却不知另一个更大的陷阱在等着他。

因为送温暖的人叫张勋。

四章 大老粗·梦想·戏剧

民国是一个被误解的时代。

一个被误解的时代注定有很多被误解的人。

提到民国，总是看到被人欺负，总是联想到鲜血和眼泪。提到那个时代的人，总是各种军阀、政客、地痞流氓。总是习惯性忽略一个词，梦想。

民国的血中有梦，民国的泪中有梦。民国的梦并不明确，是矛盾的，断裂的，含糊的。

一九一一年，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崩塌，两千多年的帝国体制分崩离析，但昔日的帝国梦依然残留在很多人的脑海。所以民国那年月，依然有很多人心怀帝国梦，对帝国的一切恋恋不舍。比方说王国维，最后还是自杀了。比方说严复先生，一生忠于帝国的一切。张勋是另外一个，他把王国维和严复的思维诠释在行为中。

张勋生于一八五四年，江西人，成长于洋务运动时代。那个年代出身的人，很少有激烈的革命行径。张勋家境一般，父亲早逝，参军是为了有口饭吃，所以对军营有归属感。

那个时代的军人多半在混日子，但张勋作战勇敢，参加过中法战争，享受到清末军人仅有的荣耀。他在甲午战争中吃过败仗（主帅太烂），战后在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中担任营管带（营长），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升为总兵，溥仪继位后升提督。张勋经历过清末所有战争，战绩过硬，每次升迁都是靠军功。

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军很快光复江南半壁江山，仅在南京遇到激烈抵抗，军民伤亡严重。抵抗者正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张勋。张勋出身寒微，知恩图报，拿朝廷俸禄替朝廷分忧，分内事，不必过于苛责。如果军人都像张勋，清末战场表现不至于如此寒酸。

但清朝灭亡之后，张勋脑袋上仍然拖着大辫子，为民国两条著名的大辫子之一（另一条在辜鸿铭脑袋上），这就让人费解了。要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张勋也算袁世凯的兵，袁世凯都成民国大总统了，张勋依然留辫子，说不过去。不仅如此，他手下的士兵同样拖着大辫子，号称辫子军，表示忠于清王室，非常刺眼。凡有点心眼的

将军，都不会明目张胆地忠于前朝。张勋自诩张翼德第二，其实非常精明，为何如此呢？

张勋心底里看不起袁世凯，对袁世凯的话爱理不理，但是对革命党作战热情极高。二次革命期间，张勋的辫子军攻入徐州，大肆逮捕革命党，大开杀戒。此后按照军阀的标准，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给自己建生祠。这事好像只有魏忠贤才干得出来。但张勋的目的不止于此，他把孔子的后人请去，大肆祭孔。之后又和老古董康有为走在一起，担任孔教名誉会长。

张勋不仅爱爱新觉罗家族，更爱孔子。

也就是说张勋和曾国藩李鸿章是一路人，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都是围绕着帝国转。尽管已经到了民国，但他们的灵魂还在帝国。

现代人说起张勋，总是说军阀，老顽固，怪胎，怪兽。其实张勋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他只是怀有一个过时的梦而已。但过时的梦，也是梦。对于有梦想的人，我们可以不认同他们的梦想和行为，至少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要不然历史就变成了各种标签脸谱，很无趣。

张勋时时刻刻都梦想着恢复清王朝，那样他就功德圆满了，说不定还能名垂千古。所以段祺瑞武力讨伐西南，张勋很积极。因为西南虽然是捣乱派，也是清王朝的死敌。

段祺瑞和黎元洪势成水火，张勋看到了趁机恢复清王朝的机会，正如袁世凯从欧战中看见恢复帝制的机会一样。当然张勋各方面能力均不如袁世凯，眼光和手腕相差甚远，所以行事看起来更为鲁莽可笑。为此张勋做了文武两手准备。

文的一手：把号称孔子第二的老古董康有为请到徐州，一边祭孔、一边搞舆论宣传。

武的一手：在徐州召集各位大老粗召开“都督会议”，前后四次，钱花了不少，笑脸送了不少，鼓动各位大老粗闹独立。当然收获也很大：大老粗们对张大帅的行为表示由衷的支持，甚至尊他为十三省“盟主”。张勋一时飘飘然，颇有些春秋霸主的感觉。然而他哪里知道，大家正准备看他出洋相。

要恢复清王朝，首先要到北京。徐州离北京很远，如何去北京呢？张勋表示：调停大总统和总理之间的矛盾。

张勋对段祺瑞表示：咱们北洋正宗，不能便宜外人。

张勋又对黎元洪表示：衷心拥护大总统，段祺瑞是我的小字辈。

张勋的那点小心思，天津的段祺瑞看得出来，但并不点破，甚至暗中鼓动张勋，不惜让徐树铮到徐州帮张勋抬轿子。段祺瑞明白，张勋到了北京，黎元洪必然遭殃。南京的冯国璋看得出来，也不点破。因为张勋是冯国璋的敌人，一直惦记着打回南京。张勋北上，冯国璋求之不得。冯国璋本人也有角逐最高领袖的心思。曹锟和吴佩孚也看得出来，他们先到徐州给张勋撑场面，再到保定准备看戏。唯独黎元洪没有看出来。或者说黎元洪假装没看见，他只看见别的军阀宣布独立，张勋无动于衷。

绝境中的黎元洪太需要枪杆子了，他想赌一把。

一九一七年六月一号，黎元洪痛骂督军团干政不到一个月，便自扇耳光，派专使到徐州迎接张勋北上调停（干政），并发电把张勋夸

奖一番：“安徽督军张勋来电，历陈时局，情辞恳挚，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之官，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与心左，慨歉交深。安徽督军张勋功高望重，公诚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跂予望之！”

可谓情真意切啊。

可悲的大总统

一周之后，张勋如黎元洪所愿，统帅马兵、步兵、炮兵五千人北上，驻扎天津。

黎元洪突然意识到，这是引虎驱狼。如果张勋真心调停，没必要带大部队进京。想想张勋后脑勺的大辫子和同行的康有为，黎元洪突然意识到了张勋的目的，赶紧找徐世昌发电劝告张勋“从简入京”。张勋的回答很干脆，让黎元洪三日之内解散国会，否则后果自负。

图穷匕见，张勋无需再伪装。

黎元洪脑袋嗡的一声，各种诅咒骂人的词汇呼啸而过，他想揭露张勋的阴谋，又怕酿成大祸。权衡之下，黎元洪决定妥协。之前黎元洪面对段祺瑞曾多次表示，宁可不当总统，也不解散国会，相当硬气，赢得不少支持。

面对张勋这样的愣头青，黎元洪理应坚持原则，但贪权的缺点害了他。

黎元洪把部分议员请到总统府，让他们委曲求全，自行辞职，讨

好张勋。议员们大失所望，觉得被黎元洪忽悠了。有人不甘心，有人偷偷溜走，有人不买账。

张勋得知黎元洪讨价还价，大骂黎元洪优柔寡断，催促赶快解散国会，同时把辫子军开到北京天坛和农坛驻扎下来，表现相当粗鲁。黎元洪可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依然没能满足张勋的胃口，完全没了主意。大总统当到这个程度，窝囊。

更窝囊的是，满腹委屈的黎元洪偏偏又不敢发作，还得想办法讨好张勋，打掉牙齿和血吞。张勋六月十四号到了北京，却摆起架子，偏不见黎元洪。

最窝囊的是，要解散国会没内阁总理签字。当初袁世凯解散国会，好歹有熊希龄背黑锅。黎元洪找李经羲签字。李经羲表示自己没就职，不能签。黎元洪厚着脸皮找段祺瑞帮忙，段祺瑞表示自己已经下岗。黎元洪找外交部长伍廷芳代理总理，伍廷芳表示，我要辞职。黎元洪到处送笑脸，竟然没人理会，情形之凄惨堪比八大胡同里过气的风尘女子。

最后步兵统领江朝宗自告奋勇，愿意当“瞬间总理”，签字解散国会。江朝宗并不是同情黎元洪，而是想赶快恢复帝制。

张勋见目的达到，出现了。黎元洪依然在做最后的努力。张勋提出要求：把优待清王室写入宪法，尊孔教为国教，辫子军扩军。

黎元洪表态：好说。只要还没有把皇帝推出来，一切都好说，毕竟张勋也是黎大总统召入京城的嘛。然而黎元洪很快就失望了。

七月一号，张勋入京半个月，准备一番之后把十三岁的溥仪推了

出来。张勋派人把早已拟好的奏折“还政于清”送到黎元洪面前，让他签字盖章。

黎元洪彻底绝望了，同时也清醒过来，绝不签字。

清醒过来的黎元洪决定实施反击，他命人从上海（北京被张勋控制）通电全国：“天不悔祸，复辟实行。闻本日(7月1日)清室上谕，有元洪奏请归政等语，不胜骇异！吾国由专制为共和，实出各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它。”

一句“始终民国，不知其它”断了张勋的念想。

七月二号，黎元洪出新华门，绕道至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寻求庇护。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他险些死在日本人手中。二十年后他成为国家元首，还要求日本人庇护，可悲！可怜！但黎元洪没有时间感叹，在日本使馆接连发出两道大总统令。

命令之一：依照《临时约法》相关条例，任命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务。

命令之二：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举兵讨逆。

二十天之前，冯国璋和段祺瑞都是黎元洪讨厌的人。军阀和大总统作对之际，坐镇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一言不发，等着看好戏。段祺瑞的可恶就不用说了。但段祺瑞和冯国璋也就是恶人而已，张勋却是一头蛮不讲理的野猪。

泪水在黎元洪眼眶里打转，失望、委屈、不甘心等各种滋味一股脑涌上心头。此时离他入驻总统府仅仅一年又二十三天。他随身携带一支勃朗宁手枪，再次泛起自杀的念头。

黎元洪先生，莫要伤心，你还会回来的。当然到那时你需要流更多的眼泪。

一场戏

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六十一岁的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红顶花翎，率一帮遗老遗少跪在十三岁的溥仪面前，高呼万岁。张勋上奏折请皇帝重新登基，溥仪表示年少无才，不足以担当大任。张勋则说圣主康熙也是年少继位，溥仪表示勉为其难。

溥仪颁布诏书宣称“共和解体，补救已穷”，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随后各种封赏。他们共同上演了帝国史上最后一场戏。帝国两千年已经上演了无数大戏，悲剧喜剧曾经无数次撼动人心，最后一场则是轻松幽默的滑稽戏。

要复辟，需要最基本的两件东西：龙旗和大辫子。从辛亥年算，满清也灭亡了六年，龙旗已经降下六年，保存下来的龙旗很少。但京城人家还是想方设法拼凑，应付了事。各种正规的、山寨的作坊同时开工，生意极好。旗帜可以赶制，大辫子就不好弄了，要知道头发并非一朝一夕能长出来。那么就弄假发，一时间京城假发成风。

好吧，复辟仅有的好处就是带动了旗帜和假发制造业的发展。

要问复辟滑稽在何处？很多很多。一一例举不可能，但看一下老古董康有为，便可略知一二。康有为是爱新觉罗家族的骨灰级粉丝，但复辟那会，康有为光秃秃的脑袋上只有六七寸长的头发，还乱得像

老母鸡窝。康有为自我辩解：“自从戊戌年后亡命海外，不得不剪发易服。自从辛亥国变后，这才返回祖国，重新蓄发，距今五年有余，所以长不盈尺耳。”有人问：“辛亥年后，别人都剪发，为何你反而要蓄发？”康有为得意洋洋地回答：“我早料到必有今日也！”

康有为不仅头发剃过，胡须也剃过。复辟大功告成之后，康有为希望获得首揆(首席内阁大学士)一席，瑾太妃表示“本朝从未有过没胡子的宰相”。康有为得知后极为懊丧，赶紧从药店买来生须水，一小时内抹上两三次，还是没效果（假冒伪劣产品害人啊）！

现在谈谈复辟的主角张勋。前面说过，他和康有为一样，爱大清帝国也爱孔子，是帝国梦的传承者。康有为爱孔子，是因为想和孔子一样当圣人，爱大清帝国，是因为光绪皇帝对他有知遇之恩。那么大老粗张勋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张勋对清朝的感觉也不错，是朝廷给了他当兵升官发财的机会，使他从一个居无定所、衣食无着的贫困之人变成有专人做燕窝的权贵。张勋怀有感恩之心。

张勋生性耿直，是帝国时代的典型武夫。他知恩图报，憎恨叛徒。在他眼中，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包括死掉的袁世凯都是受皇恩的叛徒。所以除非征讨革命党，否则他们很难调动张勋。在张勋看来，欺骗黎元洪那是对他背叛大清的惩罚。

张勋有抱负，要建功立业。别人问他为何要复辟，张勋回答：别人把帝制变成共和，便是元勋。如今我一人把共和变成帝制，盖世功勋。

所有人都想建功立业，但张勋表现得非常可笑。复辟之后，张勋给自己印了个名刺：长约九寸，宽约四寸。功能等同于名片，上面刻有如此一串头衔：“前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前江苏都督、前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现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钦命御前议政大臣、晋封忠勇亲王张勋。”别人觉得可笑，张勋认为很拉风，清朝两百多年独一无二。

但是张勋没能得意几日。

黎元洪通电之后，孙中山、段祺瑞、冯国璋纷纷通电讨伐张勋。前不久在徐州把张勋捧上天的大老粗们立刻换了一张脸、表示要和张勋划清界限。各界媒体报刊，更加不吝谩骂嘲讽。跟随张勋已久的秘书表示不愿意再次下跪当奴才而辞职。张勋的老婆反对复辟，说了一系列难听的话。张勋的侄子表示反对复辟。

忽然之间，张勋有一种被兄弟们（大老粗们）玩弄、被天下抛弃的感觉，但也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顶着。段祺瑞的讨逆军接近北京城，张勋的辫子军一触即溃。直到此时，张勋方才清醒过来，不应该逆天而动。

局势无法挽回之际，张勋向皇帝辞职。皇帝问张勋去哪儿，张勋表示带部队回徐州，并让皇帝给他万两黄金当辛苦费。皇帝表示：“复辟破产，民国每年优待的四百万岁币都要葬送在你手里，还好意思要钱？”张勋黯然退去。实际上他已经回不了徐州，已经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变成一个不值钱的古董，等待死神来临。

张勋有梦想，但行为更像怪胎小丑。综合起来看，极为滑稽可笑。

但有一点要表扬张勋，复辟的动作比一年前的袁世凯干净利索。然而论智谋和手腕，张勋和袁世凯相差甚远。所以袁世凯好歹坚持了七十多天，张勋仅仅坚持了十几天。

张勋按照自己的理想演了一场戏，虽然短暂，好歹过了把瘾。对比别的军阀，也算是轰轰烈烈了一番。对于一个大老粗，人生至此，也不虚度。但张勋复辟造成两个后果。

张勋复辟后果之一：国家权力的权威性（尊严）在黎元洪手中沦丧，所以黎元洪沦为玩偶。因为任何一个人导致国家权力的任何一种特性丧失都会沦为玩偶。国家权力特性损失其一，国运便要转变。黎元洪沦为玩偶，也是北洋政府崩溃的开始。

黎元洪的结局

黎元洪是一个老好人，并凭借老好人的智慧带来一系列运气。他原本打算继续使用老好人的智慧在最高舞台上施展手脚，却碰得头破血流。他不是没有智慧韬略（参照武昌暴动前后表现），不是心不够狠（参照除掉张振武和蒋翊武），只因他手中没有枪杆子。

枪杆子，国家权力的基础力量。没有基础力量的元首，如同生活在空中楼阁。但权力是世上最毒的药。毒性不在于穿肠封喉，而是基本上没有人能拒绝，深入骨髓和灵魂。如果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从副总统的位置转正合情合理。那么一九二二年，直皖战争结束，直系战胜皖系，又把黎元洪拉出来当大总统。黎元洪明知曹锟和吴佩孚是

想把他拉出来过渡一下，让他当傀儡，还是屁颠屁颠上任了。如果说第一次当总统还能安心当盖印机，那么第二次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黎元洪上任不到一年，就被大老粗、军警、兵痞、流氓无赖反复折腾蹂躏，最后几乎在兵变中灰溜溜地离开总统府，逃往天津。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三号，五十九岁的黎元洪乘专列从北京去天津的路上，被曹锟鹰犬王承斌拦截。王承斌问黎大总统意欲何往，黎元洪表示你管不着。身为军人的王承斌悍然说：“你个人行踪我管不着，但我关心印信的下落。”王承斌是来要总统印信的，那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张勋复辟，黎元洪偷偷派人把总统印信送给南京的冯国璋，帮冯国璋顺利转正。此次曹锟多了个心眼，无论如何要把总统印信搞到手，所以让王承斌半路拦截。

心力憔悴的黎元洪再次表示不用你管，王承斌笑着告诉黎元洪：“你已经没必要保管印信了。”好吧，一个将军敢用如此口吻和国家元首说话，可见黎大总统衰到了什么地步。可笑的是，就在几个月之前，黎元洪复职之际，王承斌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表示衷心。

黎元洪只能气鼓鼓地说：“我还是大总统，还没有退位，不要逼我。”王承斌翘起二郎腿，笑得很开心。黎元洪被困，寸步难行。入夜，黎元洪再次陷入绝望，再次想到了死。黎元洪虽然是老好人，但最后时刻总有血性。当初张勋复辟，黎元洪最后时刻坚持了原则。此次黎元洪再次想到了抗争。上次和张勋抗争，尚有可恶的段祺瑞和冯国璋可以依靠，这一次已经完全绝望了，他个人绝望了，民国也绝望了。要抗争，只有一条路，死。

愤然之下，黎元洪拔枪自杀。好在旁边有人，抓住了黎元洪握枪的手，子弹贴着头皮飞过，只造成轻伤，包扎一下即可。自杀未遂的黎元洪彻底崩溃了，说出印信的下落。第二天，王承斌笑着出现，拿出一张公文让黎元洪签字，那是辞职报告。

黎元洪用颤抖的手签名之后，对王承斌说：“你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历史会记住你。”王承斌冷笑着回应：“好吧，总统，一百年后见。”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号，黎元洪死。一九三五年，蒋介石的民国政府给他举行国葬，遗体归湖北。黎元洪的一生，老好人的一生，也是玩偶的一生。

王承斌帮曹锟夺得印信，一年之后又伙同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大总统，以同样的姿态去寻找印信。要说王承斌是孬种，也不见得。至少鬼子进中国，他就不当汉奸。如此情况，只能说，全乱了。

张勋复辟的后果之二

国家权力的基础是军队。军队的覆灭或者说溃烂，便是国家权力崩溃的开始。绝大多数国家灭亡（苏联是例外），都是从军队战败或溃烂开始。清亡之后，袁世凯以北洋军班底重建民国，如果经营得当，或许可以有所作为。

民国处在历史周期律的夹缝中（每一层都有炮灰），原本就举步

维艰。相比于体制更迭时的秦和隋，北洋系统在武力和威势上相差甚远，主要依赖袁世凯出神入化的权谋手段整合。威猛强大的秦和隋都成了历史周期律中的炮灰，加上袁世凯最后走错一步棋，民国正在沉入深渊。但要彻底崩溃，必须要有北洋系崩溃。张勋复辟，则是北洋系崩溃的开始。

张勋虽然是大老粗，也是清末军队的精英，更是北洋系统的精英。张勋玩复辟，相当于背离北洋军。段祺瑞讨伐张勋，相当于北洋系内乱，极大削弱了北洋军的威望和实力。而这仅仅是开始。老好人黎元洪的遭遇固然可悲，但代理大总统冯国璋绝非弱者。

当初武昌暴动，革命党人在冯国璋手中吃足苦头。不论黎元洪还是黄兴，均没有在冯国璋那里讨到便宜。二次革命之后，冯国璋坐镇南京，控制东南。

对比黎元洪，冯国璋更有实力。

黎元洪没有枪杆子，是北洋系统之外的人；冯国璋有枪杆子，和段祺瑞一样是北洋元老。

段祺瑞把没有枪杆子的黎元洪当盖印机，也把有枪杆子的冯国璋当盖印机。

没有枪杆子的黎元洪不甘心当盖印机，和段祺瑞争权夺利（府院之争）；有枪杆子的冯国璋愿意当盖印机？当然不愿意。

事实上除了枪杆子，冯国璋和黎元洪还有很大的区别。他更为年轻，更能折腾，心思更为慎密，鬼点子更多，更会为人，更会来事；但却输得更惨：代理大总统不仅未能转正，且任期未滿，最后郁郁而

终，为何？

五章 总统和枪

摇篮和传承

乱世枪杆子盛行，将军辈出。西点军校号称美国将军的摇篮，但美国并不是年年打仗。民国在大陆三十八年，没有一年不在打仗。要问民国将军的摇篮在哪里？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黄埔军校。对，也不对。黄埔军校确实培养了很多将帅，但只是篮子之一。黄埔军校之前还有两个篮子。

中国近代史，就是全方位摆脱农业帝国的历史。农耕帝国的标志之一便是人治，皇帝是天，金口玉言，以人代法。军事也一样，杰出的军队总是围绕着杰出的统帅，难以形成延续性。近代一些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着手改变。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李鸿章。

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刚刚结束，李鸿章在天津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军校——天津武备学堂。它最初开设步兵、马兵、炮兵、工程兵四个科目，学制一年；后增加若干科目，学制延长至三年。毕业生由李鸿章亲自考核推荐。

武备学堂聘请德国教官任教，为淮军培养骨干。但因为淮军已经腐烂，学堂毕业生没能挽回淮军在甲午战争的失败。此后八国联军入

侵，直接把武备学堂给轰了。加上李鸿章死，学堂不复存在。但学堂毕业生还在。

袁世凯新建陆军的骨干基本来自武备学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均为武备学堂毕业。后期北洋巨头曹锟、李纯、王占元、吴佩孚，也是武备学堂毕业生。可以这么说，北洋军阀内战，就是武备学堂内战。武备学堂，近代第一个将军的摇篮。

武备学堂毕业的精英撑起了北洋集团。他们掌权之后经营保定军校，培养出一系列精英，比如蒋介石、孙传芳、白崇禧、蒋百里、陈诚、阎锡山、叶挺等人。可以说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保定军校的内战。保定军校，第二个将军的摇篮。

保定军校毕业的精英又经营了黄埔军校，培养出徐向前、林彪、陈赓、杜聿明、陈明仁、郑洞国、黄维、范汉杰。可以说国共内战，某种程度上就是黄埔军校的内战。

看到了吧，把这三个篮子弄清楚，纷乱的近代战争也就清晰了。当三个篮子全部打破，华夏大地从大清帝国演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清军演化为解放军。

这也是一种传承。在这种传承中，冯国璋和段祺瑞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冯国璋于一八五九年生于直隶（河北）河间一个名叫“西诗经”的村子，据说风水很好。冯家原本是地主，随着大清帝国的衰落而衰落。但冯国璋本人的学业没有落下，读过私塾和书院，中过秀才，但难以更进一步，辍学回家。他并不甘心继承破败的家业。

一八八四年，二十五岁的冯国璋瞒着家人去大沽口，投奔淮军。

既然文没有出路，那就改行，选择武。冯国璋，一个有抱负的人。

一八八五年，李鸿章创办天津武备学堂，冯国璋成为第一批学员。他文化功底不错，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因学通各种阵仗而留校任教。那年他三十岁。但冯国璋骨子里不安分，想要建功立业，便离开军校到聂士成部队去当幕僚。

甲午战争之前，随聂士成勘探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地形，赢得聂士成的赏识。

甲午战争之中，淮军陆军因为有叶志超那样的老鼠屎导致全军溃败。冯国璋在败军之中连滚带爬回国，险些丢了性命，狼狈程度和黎元洪不分上下。

战后冯国璋以朝廷驻日公使随员的身份赴日。那段时间内，冯国璋一门心思想考察日本军事，结交日本军界朋友，阅读军事资料，整理成兵书。回国后，他把兵书交给聂士成，聂士成又把它转给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正在筹建新建陆军，得兵书，如获至宝，随后把冯国璋挖到天津小站。在那里，冯国璋结识了段祺瑞、王士珍等人。他们一起编写练兵教程，一起促进北洋军壮大，开启了人生腾飞之路和彼此斗争之路。袁世凯在世，他们围绕着袁世凯争斗争宠。袁世凯倒下，他们站在擂台上直接较量。

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并称北洋三杰，分别号称龙、虎、狗。除段祺瑞的“虎”字比较贴切之外，另外两个均不准。王士珍号称北洋之龙，确实才智过人，但他本人生性恬淡，不太热衷权力斗争，更

无领袖群伦的气魄和决心。至于冯国璋的北洋之狗，有点无厘头。冯国璋并无狗最显著的属性——忠诚。他虽然看起来满脸忠诚，实际上心思机敏；看起来人畜无害，实际上野心勃勃。他更像狼，而非狗。

所谓狼，永远有自己的野心。所谓狗，只会向主人摇尾乞怜。狼可以在野外生存，狗离开主人只能是惶惶然丧家之犬。所以满清覆灭，那些忠实的走狗们，要么寻找新的主人，要么捧着大辫子对着镜子顾影自怜。而出身底层、经历战争考验的冯国璋则脱颖而出。

性格决定命运

冯国璋的性格多谋善断，机敏有余而缺果敢，有狼心而缺虎气。

王士珍号称北洋之龙，和冯国璋都是直隶人，王士珍的才智不在冯国璋之下，威望还在冯国璋之上。但直系首领是冯国璋而非王士珍，因为冯国璋有一项特质：善于搞关系。

八国联军的炮火摧毁了天津武备学堂。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之后，在保定另建速成武备学堂（保定军校前身），让冯国璋担任督办。学校不少权贵子弟，冯国璋用各种办法和他们成为“知心朋友”，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他会常常去做家访，向权贵们夸奖小王爷如何聪明了得，大少爷如何品学兼优，把昏庸的权贵们糊弄得团团转。

当时社会送礼成风，凡是重要节日，学生们都会想办法巴结冯督办，期望将来有好前程。冯国璋照单全收，并把其中一部分送给需要孝敬之人，很会来事。但冯国璋并没有被钱财遮住眼睛，某日某权贵

子弟嫖娼抽鸦片被抓，冯国璋表示宁愿丢官也不放过，赢得不少赞誉。

所以冯督办混得风生水起，满清权贵如铁良等人都要拉拢他，试图用他制衡袁世凯。

冯国璋确实表现得模棱两可。当初载沣罢免袁世凯，冯国璋对袁世凯避而不见。袁世凯离京之时仅有四个学生相送，凄凉至极。

将军总是要上战场的。冯国璋练兵出身，统兵大员，实际战场实践并不多，甲午溃败和镇压义和团都是配角，唱主角是从进攻武汉开始的。辛亥暴动之初，荫昌无能，所以改派冯国璋统兵，是因为朝廷权贵比较信任他而已。冯国璋上战场之前，首先去项城和袁世凯交换意见，吐衷肠。如此谋事手腕，很有袁世凯的味道。

冯国璋到武汉之后连下两城，朝廷给他加官进爵，把他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发誓赌咒报效朝廷。事实上冯国璋一直在发誓赌咒报效朝廷，就在他发誓赌咒报效朝廷之际，袁世凯命令他停止进攻，随后用主和的段祺瑞取代冯国璋。

如果冯国璋真心报效朝廷，他有机会选择一口气拿下武汉三镇，把首义革命党赶尽杀绝。那样会造成如下后果：袁世凯和革命党秘密和谈破产，双方撕破脸皮斗到底。只要不和谈，朝廷就不会退位。那是冯国璋报效朝廷的最好办法。当时冯国璋拿下武汉三镇易如反掌。黄兴、黎元洪、宋教仁等巨头大佬已经撤离武汉，实际已不抱希望。但冯国璋没有那么做，他选择观望算计。在他的算计中，朝廷如同即将倾覆的大厦。把自己和朝廷绑在一起，相当于置于死地、后生机寥寥。还不如和袁世凯在一起，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此时他的心中只有狼的野心，而无狗的忠诚。

冯国璋的算计很准，朝廷已无能人。冯国璋回京之后，权贵们依然把他当自己人，让他带禁卫军，真可谓有眼无珠，失败也该。日后袁世凯顺利取代朝廷，和冯国璋掌握禁军有很大关系。

冯国璋和袁世凯

冯国璋和袁世凯同龄，但因为出身和机遇不同，发展方向不同。冯国璋投军那会，袁世凯已经在朝鲜独当一面。甲午战争之时，袁世凯巧妙地避开失败，冯国璋跟随败军回国。袁世凯始终领先冯国璋一个身位。袁世凯在前，冯国璋在追。

袁世凯小站练兵，冯国璋追随。

袁世凯山东镇压义和团，冯国璋追随。

与此同时，朝廷权贵也在拉拢冯国璋，为何没成功呢？从马后炮角度讲，朝廷气数已尽。然而武昌暴动之前，袁世凯并没有快速取天下的征兆。本人认为，其实很简单，钱。

满族权贵都是收钱的主，李鸿章搞关系都要袖子里藏着银票。铁良拉拢冯国璋，也就是官样文章，各种假大空。朝廷给冯国璋的实惠，也就是早已贬值的空头衔。相比之下，袁世凯经常以各种名义给冯国璋银子，手段非常巧妙。比方说南北会操之后，铁良去慈禧那里告袁世凯的状，冯国璋把消息透漏给袁世凯。袁世凯拿出一袋银子对冯国璋说：“兄弟啊，听说你把老太太接来了，这点钱表示下晚辈的心意

吧。”冯国璋假意推辞，袁世凯假装发怒：“不是给你的。”

在一个腐朽的时代，银子比任何道理都有用。冯国璋恰好有贪财的毛病，袁世凯恰好是送礼高手。或者说袁世凯看透了冯国璋，所以冯国璋攻打武汉之前拜会袁世凯之时，袁世凯并没有把全部心思吐出来，只是嘱咐他“慢慢走，慢慢瞧”。两个月后，取代冯国璋的段祺瑞就明白袁世凯的全部心思。两者的差别，只有局中人才能体会。

毫无疑问，冯国璋对袁世凯很重要。袁世凯非常关心他，给钱只是最基本的，除了钱还给地盘。二次革命之后，冯国璋和张勋联合攻陷南京。袁世凯让冯国璋驻扎南京，张勋很不爽。明清两朝，南京地位仅次于北京，是整个南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驻扎南京掌控东部最富饶的地带，是很多非领袖人物的梦想。冯国璋在南京发展壮大，隐隐有“江南王”之风范。

袁世凯还关心冯国璋的婚姻生活。政治和婚姻经常连在一起，袁世凯的儿女，很多都是政治婚姻。袁世凯拉拢别人的手段，常常与对方结为儿女亲家。比方说袁世凯和黎元洪，就是儿女亲家。袁世凯把干女儿嫁给段祺瑞，又把家庭教师嫁给冯国璋。

女教师名叫周砥，民国才女，眼界甚高，三十大几还没嫁人。某日袁世凯三太太和周老师聊天，周老师透露心声：“吾终身事，非执掌大权之高等军官不嫁。”颇有日后孔家二小姐之风采。袁世凯得知后撮合她与冯国璋相亲。见面之后双方感觉良好，周砥对袁世凯三太太说：“冯先生一表人才，老而不衰，吾喜也！”冯国璋则表示：“若说起容貌来，亦不能比得西施、王嫱，可是人家学问实在高上，我一

个武夫，又年过半百，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事。”

婚礼非常隆重。袁克定带着庞大的袁家亲属充当“娘家人”，一路护送到南京。迎亲阵势按照迎接国家元首的规格鸣炮，婚前仪式便轰动了南京城。婚礼当天，南京万人空巷。场面之盛大壮观，堪比十几年之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大婚。

当然这只是仪式。让人欣慰的是，两人婚后相敬如宾、和谐美满，并无政治味道。遗憾的是，美满生活只有三年，一九二零年，周砥病故。去世前，周砥问冯国璋可知她今年几岁，冯国璋说四十二，周砥说只有三岁。三年幸福，一世人生。周砥，不仅才女，也是痴女。

忠于谁的问题

袁世凯关心冯国璋，但从不把最隐秘的心思告诉他。辛亥革命时如此，称帝时也如此。冯国璋从南京跑到北京追问，袁世凯还是忽悠了他。

袁世凯称帝之前已经把冯国璋和段祺瑞晾在一边。原因很简单：二人羽翼已经丰满，如果反对，称帝势必困难；如果赞成，成功之后实力会更大，尾大不掉。特别是冯国璋，入驻南京之后就不愿出来，实力越来越强。

冯国璋的实力如下：以江苏都督的身份坐镇南京，控制中国最富有的地区。江西都督李纯是冯国璋的铁杆兄弟。黎元洪进京之后，湖北都督变成王占元，也是冯国璋的兄弟。他们号称浙江三都，以三人

为骨干的直系，是北洋军中最强大的派系。他们控制长江流域，相当于控制半壁江山兼经济命脉。袁世凯只要看地图都会觉得后背发凉。

那种情况下，冯国璋已经不可能忠于谁。无论忠于谁，都是被削减的对象。他的处境如同当年的袁世凯，到了忠于别人只会葬送自己的地步，所以冯国璋只能忠于他自己。事实上，冯国璋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从来只会做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当初朝廷需要忠诚时，他选择袁世凯。如今袁世凯需要忠诚，他已经无法忠诚。这叫形势比人强。

所以袁世凯称帝，冯国璋绝不会支持。一旦袁世凯集权成功，就要削减地方势力。事实上袁世凯正准备那么做，只是没成功。冯国璋如果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只有一个办法：掌控最高权力或不被最高权力束缚。

冯国璋亲自到北京探听袁世凯的口风，实际上就是制定应对之策。袁世凯选择忽悠冯国璋，是因为早已看透了两人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后来冯国璋发现被忽悠了，很生气，假装生病，实际策划反袁。但冯国璋不能反对袁世凯，因为他是袁世凯带出来的人。但他可以鼓动别人反对袁世凯。确切说，就是鼓动梁启超师徒。如果没有冯国璋电报暗示，唐继尧不会贸然举旗反袁，蔡锷孤掌难鸣，护国战争就不好办了。

袁世凯从密探那里得知冯国璋的电报之后，非常气愤，派检查组到南京兴师问罪。冯国璋双手一摊，表示不知情。检查组把电报稿摆在冯国璋面前，白纸黑字赖不掉。冯国璋叫来秘书长胡嗣瑗，问怎么回事。胡秘书长很镇定地说，这是潘若海秘书的字迹。但潘若海已经

留下“电报系我所发”的字条逃之夭夭。

好吧，无头公案。

冯国璋痛心疾首地对检查组表示，自己平时懒散，不看公文，被小人钻了空子，请转告大总统，请求处分。

胡嗣瑗马上表示，这事和冯将军无关，是他这个秘书长没干好，请辞。

袁世凯恨得牙痒，也没法子。

袁世凯让冯国璋讨伐蔡锷。冯国璋表示，生病中。

袁世凯派人去查，冯国璋表示因为不被大总统信任而得的心病。

其实冯国璋的心病不是袁世凯，而是想要大总统的位置。为此冯国璋玩起四年半之前袁世凯的招数：一面给袁世凯送密电，表示应该和平（明知不可能）；另一面通过梁启超和西南军阀通信，暗通曲款。与此同时，又劝说四川都督陈宦和湖南都督汤芑铭（要袁世凯命的“二陈汤”主料）不要和护国军作战。

这只是第一步。

如此一来，坐镇南京的冯国璋就形成南北对战之间的第三极，犹如辛亥暴动时期的袁世凯，举足轻重。但冯国璋的行为比当年的袁世凯更为赤裸裸。当初袁世凯好歹还和革命党打几场意思一下。当曹錕率军入川和蔡锷作战，梁启超派人到南京劝说冯国璋反袁，冯国璋立刻响应，只是表示不反袁，反对帝制。第二步完成。

冯国璋如此辩解：“我是他（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而又比较亲信的人，我的电报对他是个重大打击。我们之间，不可讳言是有知遇

之感的。论私交我应该拥护他的，论为国家打算，又万不能这样做，做了也未必对他有好处，一旦国人群起而攻之，受祸更烈。所以，我刚才考虑的结果，决计发电劝袁退位。”

一九一六年四月份，冯国璋先后两次公开通电劝袁世凯退位，把袁世凯气的两眼冒金光。当然也没啥新意，和袁世凯当年逼迫朝廷交权一样。

——狼心完全暴露。

但是袁世凯成功取代了朝廷。冯国璋不仅未能取代袁世凯，还惹了很大麻烦。如此好的局面却被他自己玩砸了。当时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尚未独立的各省代表开会，讨论全国局势。当时大家对袁世凯很失望，但也不认可唐继尧和蔡锷，这正是冯国璋大展身手的好机会。

冯国璋心眼很多，如意算盘啪啪响。他想仿照辛亥革命时各省代表在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的办法，选出临时总统，然后召集国会，产生正式总统。如果那样的话，根据双方形势，最有可能在博弈中获胜的就是冯国璋，那样取代袁世凯就顺理成章了。

为了实现那个美好的理想，冯国璋寻求张勋和倪嗣冲的支持。但现实非常骨感：张勋一心复辟，宁愿继续支持袁世凯（袁世凯的权力从朝廷那里继承，返回去容易点）；倪嗣冲是袁世凯铁杆。冯国璋很郁闷。为了总统梦，他决定孤注一掷。

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五号，两次劝袁世凯退位之后，冯国璋以个人名义通电未独立的省份，提出八条主张。它们是冯国璋绞尽脑汁想出来的锦囊妙计。袁世凯刚骂完冯国璋白眼狼，旁边的杨度就笑了。

杨度笑完，袁世凯也笑了。袁世凯表态，支持冯国璋。冯国璋自己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铺天盖地的骂声淹没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一、关于总统问题。冯国璋主张，大总统和副总统同时走人，重组国会，重新选举。

——看似公正，却得不到南方的认可。按照《临时约法》，袁世凯走人，应该黎元洪转正。如果重新选举，意味着继续执行袁世凯的《民国约法》。不论是唐继尧、蔡锷，还是东南的孙中山，都不承认袁世凯的《民国约法》，挨骂。

其二、国会问题。冯国璋主张，凡以金钱运动及政党中暴烈分子，一概不许加入。

——看似公正，却得罪人众多。按照那两条，旧国会议员和南方护国军议员均没有资格参加，相当于反对既得利益的嘴皮子笔杆子，不挨骂才怪。

其三、宪法问题。冯国璋主张，暂时以《临时约法》为标志，但此项约法不合国情，先将使用条款宣布，再酌情修改。

——看似公正，实际既不用孙中山的约法又不用袁世凯的约法，明显想另搞一套。

后面还有关于军事、经济、惩办帝制祸首的内容等等，都有骂点。仅前面三条已经足够引起各方面谩骂。漫天骂声中，冯国璋得到“野心家”、“骗子”、“袁世凯第二”等响亮的绰号。袁世凯和杨度搞帝制也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收获如此多的骂名。最狠的是在上海的全国知名人士联合签名反对冯国璋。多少人呢？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一人。

好吧，收集这么多普通人的签名都难，何况是名人！

任何时候让全国统一反对某件事都不容易。冯国璋做到了，一辈子就那么一次。

袁世凯笑了，那是他临死之前少有的笑容。可以说北洋系统内，袁世凯最后时刻最恨冯国璋，犹如光绪皇帝恨袁世凯。袁世凯的继承人名单分别是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没有冯国璋的份。这三个人无论哪一个上位，要么放任冯国璋不管，要么和冯国璋翻脸。如果放任不管，那么冯国璋必然继续做大，最后还是翻脸。总之都要翻脸。

黎元洪是老好人，但也爱权。只因段祺瑞近在眼前，所以和冯国璋的矛盾没有浮出水面。

袁世凯倒台之后分蛋糕，冯国璋成为副总统。坐在江苏都督的位置上当副总统，比当初坐在湖北都督位置上的黎元洪还刺眼。当初袁世凯可以强迫黎元洪进京，把他囚禁在瀛台。黎元洪面对冯国璋可没有那份魄力。黎大总统苦苦哀求冯副总统进京，冯副总统假装没听见。大老粗张勋逼迫黎大总统，冯副总统假装没看见。等到黎大总统躲进日租界，把总统印信送到南京，冯副总统才表态。

此时，冯副总统变为代总统。时间是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号。

冯国璋登上权力巅峰，但人生就此陷入黑暗，体会到了之前黎元洪的痛苦。但黎元洪的痛苦只是个人痛苦，冯国璋的痛苦把北洋系统的命运拖入黑暗，同时也给华夏大地带来深重的灾难。因为冯国璋可以触动国家权力的第二个特征：力量基础，也就是枪杆子。

冯国璋不是黎元洪，他有枪杆子。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枪杆子的好处在于，有可能给国家带来稳定兴旺。坏处在于，有可能造成更大的分裂，甚至大规模内战。究竟是好处还是坏处，说得玄乎点，只有命运安排。但从历史角度看，和国家元首本身的素质有很大关系。

冯国璋有很多优点，心思缜密，能拉人搞关系；却有两个缺陷，一个一般，另一个致命。

第六章 缺陷和致命缺陷

冯国璋身上最明显的缺陷是贪财：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之后，发现中南海有很多鱼又肥又大，赶紧派人去捕捞，运到市场买个好价钱，美其名曰“总统鱼”。冯大总统此举过于雷人，引来文人骚客讽刺：“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如果说这一切看起来有些可笑的成分，那么下面的事就可悲了。近代屈辱史起于鸦片。从林则徐开始，有志之英豪都提倡禁烟。袁世凯政府也是禁鸦片的，但冯国璋担任江苏都督时却因为利益涉入烟土（未熬制的鸦片）交易之中，惹得骂声一片。冯国璋没法，又是送礼，又是找人疏通关系，勉强糊弄过去。这个已经不是敛财能形容，只能说贪婪。

爱财之心人皆有，敛财之心人皆有。

爱财不是缺陷，敛财不是缺陷，但贪财是缺陷。

一般人贪财不算缺陷，身居高位的冯国璋贪财是缺陷。

对于一个志存高远的大佬级人物而言，如此低级的错误，非常可悲。

那个时代很乱，有枪杆子捞钱很方便。但到了大总统的位置上，捞钱可能会亏本。黎元洪第二次当选总统时，在某次宴会上感叹：“这总统真他妈不是人当的，上个月我就赔了三万，一年就需要赔三十多万啊！”冯国璋可没有黎元洪那么好脾气，他不想自己亏钱，代理大总统之前和段祺瑞提条件：崇文门监督一职要挂在自己名下。那是肥缺，每月有二十万的商业税。冯国璋万贯家财，何必计较那点钱呢？还是贪。

一九一七年八月一号，张勋失败两周后，冯国璋专列开到北京，除家人、奴婢家丁、幕僚团队之外，还带了十五师官兵近万人充当总统卫队（这支队伍日后坑了段祺瑞和张作霖）。如果黎元洪当初有一万总统卫队，张勋就没法复辟。当初冯国璋还是满清大臣时，曾为朝廷制定策略“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如今到了大总统的位置上，冯国璋认为大展身手的时刻来了。他下定决心要依靠自己的魅力和手段征服所有人，为国为民做点事。

冯国璋刚到北京，就让人通知清皇室，民国政府给皇室的优待不变，不追究他们在复辟中的责任。既报答了当年朝廷的恩泽，也给为数不少的遗老们吃了定心丸。

未进总统府，冯国璋先去拜访黎元洪，表示对前任的尊重。

入驻总统府之后，冯国璋还是使用之前的班子，并没有大换班，以示大度。北京政府原本要举行各类盛大的欢迎仪式，冯国璋手一挥，免了，理由是节俭。

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传递一个信息：和为贵。

他的施政战略核心归结为一条：和平统一。

之前黎元洪也想和平，用老好人策略和稀泥，失败。冯国璋能成功么？至少他的主意比黎元洪多，手里有枪杆子，所以他有资本去尝试。他信心满满，对所有人都和和气气。

冯国璋这一系列动作，赢得很多人的好感。前清遗老对冯国璋感觉不错，之前围绕在黎元洪身边反对段祺瑞的力量开始向冯国璋靠拢。冯国璋本身是北洋元老，在军中有威望。加上和西南派关系不错。一时之间，民国新一代领袖呼之欲出。

只要那个人支持，冯国璋就能整合各方面势力，把所有人团结在自己周围。那人就是冯国璋二十多年的老朋友、结义兄弟、冤家段祺瑞。

段祺瑞还是主张武力统一全国。

较量

八月二号下午，冯国璋拜访段祺瑞。兄弟哥俩好，掏心窝子的话说了一大堆。

冯国璋对段祺瑞说：“新的府院之争不能再有，也不该再有。咱

们不要分什么总统、总理，应该是同窗兄弟。”说得可谓情真意切。

段祺瑞回应冯国璋：“四哥（段祺瑞称冯国璋四哥）说得对，今后有事要商量着办。我们都是这么大岁数，半截身子入土了，还有什么争头？我这人脾气不好，说话办事太直，四哥勤敲打着。”说得也是真切感人。

那一刻，两位老人家仿佛不是大总统、总理，而像好久不见的兄弟在喝酒。然而这世界最难调和的事之一就是政见之争，特别是有实力之人的政见之争，他们背后有整个利益集团。

就在热乎之际，冯国璋想把眼前的急事办了。冯国璋说：“芝泉，我想让李纯接任我的江苏空缺，让陈光远代李纯当江西督军。两人是咱北洋派，可靠，你看如何？”冯国璋进京，最要紧的事是保住大本营。除他自己之外，最信任的就是李纯。这事办成，相当于保住老家的命根子，不至于像黎元洪那样去北京丢了湖北。应该说冯国璋挑的时机很好。

眼见冯国璋如此有心眼，段祺瑞很来气。但二人刚刚相见，心窝子还没掏完，不能把关系搞得太僵，便答应了。冯国璋很高兴。段祺瑞补充：“我想让傅良佐当湖南督军，让吴光新当四川查办使。两人是咱北洋出身，可靠，你看如何？”这是乘机在冯国璋的地盘钉楔子。冯国璋暗骂段祺瑞狠毒，但也没办法。

这是两人第一回合的较量，在笑谈中完成，平分秋色。

对冯国璋而言，考验才刚刚开始。段祺瑞给冯国璋送来新一届内阁成员的名单，清一色皖系人，赤裸裸的揽权，一点伪装成分都没有。

冯国璋气得拍桌子，但木已成船，强行更改不仅浪费时间精神，而且要得罪人，和自己苦心经营的形象不相符，忍了。

不管冯国璋如何忍让，他和段祺瑞之间有三道坎必须过。

坎之一：对德宣战。黎元洪就因为这个问题被轰下台，现在这个问题摆在冯国璋面前，而且局面更糟。黎元洪好歹有国会拖延，现在国会已经被解散，冯国璋连拖延的借口都没有。而且孙中山反对对德宣战，冯国璋和孙中山之间关系还不错（都反段祺瑞）。但形势比人强，没法子，再输一局。

坎之二：国会被黎元洪解散之后，议员们的口水仗暂时告一段落，一部分人不甘寂寞，跑到西南依附西南派，组成非常国会，天天骂段祺瑞。段祺瑞很烦那帮人，根据《临时约法》成立临时参议院，把反对自己的人排除在外。如此一来，冯国璋就不要指望赢得口水仗了。他的政治处境甚至不如黎元洪，毕竟黎元洪还有国会的一群笔杆子帮忙。没法子，再输一局。

但是第三道坎，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因为牵涉到西南派。

绕不过的坎

西南地处帝国边陲，存在感不强。洪秀全之后存在感加强。袁世凯死后，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当初反对袁世凯称帝，蔡锷等英豪在西南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然而蔡锷死后，唐继尧在云南称王称霸、不思进取。西南真正的核心是广西的陆荣廷。

陆荣廷生于一八五九年，广西壮族人，早年生活艰辛，当过乞丐、流浪过；成年后当过基层公务员，熟悉官场，后因不堪一名法国佬的侮辱毒打而杀掉对方，落草为寇。

成为土匪的陆荣廷不抢中国人，经常到越南境内抢劫，后碰见清军招兵，开始军人生涯。他的早期军旅历程和张勋类似，只是在辛亥暴动之后宣布独立，随后势力逐渐扩大，控制两广和湖南一部，野心也在增加，他不甘心偏居西南，想在舞台中央露脸。

冯国璋要实施和平统一策略，必须得到陆荣廷的支持。

两人一拍即合。

然而冯国璋刚到北京，却任命傅良佐为湖南都督（和段祺瑞交换条件）。傅良佐名义上是湖南人，实际在北方长大，只是户籍在湖南，是段祺瑞的心腹。陆荣廷有些受伤，忍了。不能忍的是，傅良佐原本说不带兵入湘，可是傅良佐前脚进去，冯国璋的二十师就跟了过去，损害了陆荣廷的核心利益。不能再忍，打电报给冯国璋，要求解决问题。

冯国璋急得团团转，一番苦思之后想到一个妙招，把难题推给段祺瑞。反正是“责任内阁”嘛，掌权也得背黑锅。如此一来，矛头指向段祺瑞，冯国璋可以到处打哈哈，当好人，暗地里给段祺瑞添堵。比方说湖南名流询问情况，冯国璋暗示他们可以组织抗议。

段祺瑞要实施武力统一，必须消灭西南派。他原打算先拿下西南派实力较弱的湖南，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想要动手。但冯国璋表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动手为好。

段祺瑞让冯国璋签发讨伐令，冯国璋拒绝。段祺瑞直接让范国璋进军。

西南派针锋相对，组织西南军政府，把孙中山抬出来当大元帅。孙中山也不客气，甩袖子上任，号召议员南下，在广州召开国会。由于南下议员不足，仅仅召开“非常国会”，并试图组织军队北伐。冯国璋乐了。段祺瑞怒了。

段祺瑞派人找冯国璋，要求冯国璋下令通缉孙中山。冯国璋故伎重演，使出“拖”字诀，表示研究研究。段祺瑞再派人催，冯国璋表示正在研究。段祺瑞打电话催，冯国璋表示正在仔细研究、深入研究、仔细深入研究。

冯国璋这样一下子研究了七八天，但又不敢和段祺瑞翻脸，最后灵机一动，让总检查厅起诉孙中山。得知冯国璋的研究成果，段祺瑞气得脸色铁青、再变红、再变黑成猪肝色。等到繁琐的司法程序走完，孙中山都打到北京了（如果有实力的话）。

虽然把段祺瑞气得半死，冯国璋的日子也不好过。段祺瑞有权调动军队，没有冯国璋的命令也能打仗。西南派组织护法军，决心要和北洋军一决雌雄，大战一触即发。冯国璋急得如同热锅蚂蚁，一边和段祺瑞周旋，一边派人到西南让陆荣廷冷静。

段祺瑞得知陆荣廷组织护法军，暴跳如雷，又拟公文罢免陆荣廷，让冯国璋盖章。冯国璋再次推脱。冯国璋就算牺牲孙中山也不能牺牲陆荣廷（参考之前不顾孙中山反对和德国绝交）。孙中山有名无实力，只是一个偶像；而陆荣廷是西南派货真价实的核心。

冯国璋的棋盘：和平统一。

所谓和平统一：由他自己代表北方为大总统，陆荣廷代表南方为副总统。要达到如此理想状态，必须让段祺瑞屈服。段祺瑞不是轻易屈服之人。冯国璋的如意算盘就是拖，把段祺瑞拖垮、拖疲惫。然而他想不到，因为有狼心而无虎气，先倒下的却是他自己。

段祺瑞决心出狠招：操控督军团，由原来攻击湖南升级为“征湘、平粤、讨滇”，对西南全线进攻，饮马珠江，一举荡平西南派。

眼见段祺瑞下决心，冯国璋脑袋转了一圈，赶紧派人到南京找李纯，授锦囊妙计。

随后李纯带领长江三督公开通电反对战争、呼唤和平，和段祺瑞唱反调。其实是冯国璋对段祺瑞亮剑。事情到此，如果是黎元洪当总统，估计就没什么办法了，但冯国璋有枪杆子。

段祺瑞这一次没有生气。他终于意识到，武力统一的最大障碍不是西南派和孙中山，而是冯国璋和他的直系。他把进攻西南的计划搁置，专心对付冯国璋。

交锋

冯国璋破坏了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还没来得及高兴，就陷入危机之中。他会接到莫名其妙的来信：“想想光绪和黎元洪……”或者是电话：“大总统好景不长……”，他还收到一份神秘礼物：一颗有毒的子弹。这些还是小儿科。京城部队经常神秘调动，兵变传闻时隐时现。

时不时有幕僚提醒他“注意”、“当心”。

那年头行刺是普遍现象，伊藤博文就在朝鲜被刺杀。冯国璋虽然有枪杆子，但人在北京，在别人的地盘里。冯国璋很紧张，能呆在房子里绝不外出。屋漏偏逢连夜雨，周砥病危、死亡。冯国璋受到巨大打击，极为消沉。此时他仅仅上任几十天而已。

冯国璋精神最为低落之时，段祺瑞出现了。段祺瑞指望趁机压服冯国璋，冯国璋也想让段祺瑞放弃主张。两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唇枪舌战。

段祺瑞指责冯国璋背后捅刀子，鼓动别人反对他，冯国璋不承认。

冯国璋指责段祺瑞监视他，段祺瑞不承认。

双方如此这般，如同小孩子过家家，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最后吵得差不多了，表示两人对外还要维护和谐形象。提到和谐，段祺瑞又来气了，说开战十几天，大总统讨伐令怎么还不发？冯国璋仍然以“和平”应对。段祺瑞说为何不通缉孙中山？冯国璋表示“在研究”。

段祺瑞指责冯国璋和西南派有默契。冯国璋觉得让段祺瑞出丑出得差不多了，决定缓和一下，表示愿意下达讨伐令和通缉令。然而段祺瑞并没有因此而满足，还进一步要求罢免陆荣廷。冯国璋没有打太极，表示不行。

段祺瑞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知道你不会同意，陆荣廷是你的心尖子！”

冯国璋强硬回击：“我是考虑国家大局！”

段祺瑞的脸上布满杀机：“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管。”

冯国璋大惊：“什么意思？”

段祺瑞冷冰冰地说：“你心里清楚。”

这话什么意思呢？根据前段时间的表现，段祺瑞很可能采取极端手段。抛开个人安危不谈，如果那样的话，休说和平统一，北洋内部必然分裂，必然战火连连。

冯国璋原本并不高大的身躯萎缩了，他表示可以考虑撤掉陆荣廷。段祺瑞不给他时间玩新花样，逼他当场写了罢免令。有趣的是，段祺瑞离开之后，冯国璋又把调令要了回来。第二天段祺瑞再次出现，把调令拿走自己发。

冯国璋屈服了。所谓和平统一，也暂时毁于一旦。冯国璋比段祺瑞有主意，更会为人，枪杆子也不差，但关键时刻缺乏决心。

评，冯国璋，坚韧而不坚决。

反击

但冯国璋的屈服只是暂时的。因为他虽然没决心，却有韧性。冯国璋避开和段祺瑞正面冲突，另外寻找反击手段，毁掉段祺瑞的武力统一，逼迫段祺瑞走人。

段祺瑞进攻湖南，排头兵依靠王汝贤的第八师和范国璋的第二十师。二人虽然是段祺瑞的心腹，但他们的部队是南方人，厌战情绪严重。冯国璋决定给段祺瑞背后来一刀：策反王汝贤和范国璋：他派心腹告诉二人，过来跟直系混，有好处；跟段祺瑞混，大胜也捞不到湖

南都督或省长，损兵折将而已，因为段祺瑞已经有人选了。

那个时候的将军都是“自由主义者”，那里有好处就往那里钻，今日忠于段老大，明日就可以忠于段老大的死敌，所谓有奶便是娘。王汝贤和范国璋果然被说动了，掉头发了一封通电，要和平不要战争。二人罢战，吓得湖南都督傅良佐跑人。

西南军乘势进攻，北洋军兵败如山倒。

段祺瑞的计划再次破产，冯国璋再次乐了。

段祺瑞再次出现在冯国璋面前：“大总统，你干得好事！”冯国璋卖萌。

段祺瑞赧然：“不要演戏了，你干的事你自己清楚，看不上我段祺瑞，我可以辞职，不用背后捅刀子。”冯国璋心里偷着乐。

段祺瑞又去了天津，冯国璋心里更乐了，轻松不少。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段祺瑞打垮，但很快便迎来更大的烦恼。段祺瑞又在天津重演了对付黎元洪的那一套：召集督军团开会，拆台。各位大老粗再次为段总理打抱不平。

冯国璋马上感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他想抓军权，恢复袁世凯时代的“陆海军大元帅办事处”，皖系军阀通电表示如此“名字”不合法。冯国璋把名字改合法，军阀依然通电反对，表示如此“做法”不合法。一个牌子换了好几遍，上上下下反复折腾，还是没挂上。

最难的问题还是内阁总理这个职位：没人敢接。之前黎元洪免了段祺瑞，没人敢接。如今段祺瑞自己离开，还是没人敢接。

冯国璋打算请王士珍出山。北洋系统内，冯国璋和王士珍关系最

好。王士珍人缘很好，资历很高，而且没有派系。但王士珍表示，不能夺段祺瑞的总理。冯国璋眨眨眼想到一个主意：找一个过渡总理，那样王士珍就不算夺段祺瑞的职位了。

连王士珍都不敢直接取代段祺瑞，其他人更不敢了。那些支持冯国璋的各界“贤达”，要么摆摆手，要么摇脑袋，表示不愿涉足政治漩涡。冯国璋求爷爷告奶奶无果。

眼看政府瘫痪，最后还是外交总长汪大燮勇敢地站出来担任“过渡总理”，并提出条件：一、代理一星期，二、必须得到段祺瑞同意。——等于没说。

就在这个时候，段祺瑞亲自劝说王士珍出山（理由和冯国璋一样）。

十一月二十三号，冯国璋批准段祺瑞辞职。此时距他代理大总统仅四个多月，到北京上任仅三个月。但日子并没有好转，因为和平没有到来：西南军趁机占领长沙，激起北洋军内部主战派的不满，给段祺瑞口实。

荆州、襄樊等地又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火上浇油。

所谓和平统一，带来的只是更大的混乱。

屋漏偏逢连夜雨，新上任的内阁总理王士珍不堪压力闹辞职，搞得冯国璋头焦额烂，心力憔悴，头发愈加稀疏。他终于明白了黎元洪当初的难处。冯国璋知道这一切都是段祺瑞在后面搞鬼。想到段祺瑞，冯国璋恨得牙痒，但也仅此而已。

如何解决段祺瑞呢？最好的办法是把段祺瑞请回来，那是不可能的。冯国璋开动脑瓜子，又是开会征求意见，又是苦思冥想，终于拿

出了一个自认为很妙的主意。当时世界大战，协约国都有参战督办负责军事，冯国璋想让段祺瑞担任这个职位，和外国人“督办”。毕竟不会对外派兵，所谓“督办”，就是忽悠人的大帽子。

冯国璋为自己的妙计得意，唯一担心的就是段祺瑞拒绝。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很多余，段祺瑞很快出现在冯国璋面前，两人再次笑着表示哥俩好。只是那笑容中，处处刀锋。

冯国璋笑着对段祺瑞表示：“为了咱们北洋派千秋大业，芝泉老弟委屈一下，以后参战的事都归你管。”段祺瑞扭捏一番，表示恭敬不如从命。

冯国璋想限制段祺瑞，却没想到事情会从此失控。如果冯国璋回忆往事，他的失败就是从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开始的。

七章 刀俎和鱼肉

段祺瑞的“参战督办”既不属于总统府、也不属于内阁，可以直接对各部调兵遣将、发号施令，成了高高在上的“太上政府”。如此一来，段祺瑞可以随意推行武力统一。

主战派乘机逼冯国璋下令全面讨伐西南派。冯国璋还想和平统一，故伎重演，拖。

主战派威胁，冯国璋下令讨伐荆州和襄樊。一九一八年一月份，北洋军很快攻占了这两个地方，如果继续南下，就要进攻岳州、直面

西南军。

冯国璋接到战报后立即拟总统命令：一、恢复陆荣廷的两广巡阅使（继续和平统一）；二、北军从岳州撤退，但南军不得进驻（北洋军让一步，维持一个短暂可笑的表面和平）；三、桂军从湖南撤退（南军让一步）。

结果电报还没发出便接到另一封电报：西南军进攻岳州！

岳州，即岳阳，古称巴陵或巴州，历史文化名城。

岳州，民国的伤心地。袁世凯死后，西南派和北洋军在此南北对峙，岳州生灵涂炭。

岳州，段祺瑞的绝地。他的武力统一梦想断在此地，这是后话。

岳州，冯国璋的绝地。他的和平统一梦想断在此地。

西南军进攻岳州，冯国璋再次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为了和平统一，冯国璋可谓绞尽脑汁，试图把战争局限在荆州和襄樊。主战派逼迫冯下讨伐令，如果下讨伐令，就表示南北战争全面开始，冯国璋的“和平统一”破产。不仅他自己的日子不好过，长江三督都会受到攻击。

陷入困境的冯国璋显得更加瘦小，情形比袁世凯晚年好不了多少。袁世凯受困，南方无人可用。冯国璋的老家在南方，那里有他的支持者和兄弟们。

事已至此，冯国璋反而清醒了。他明白自己在北京只是刀俎上的鱼肉，永远斗不过段祺瑞。他从来就不是任人鱼肉之人。他瞒着家人，以秀才的身份投军，就是因为不甘于平庸。他拉关系，创建派系，就

是要干一番事业。他和段祺瑞斗，就是不甘于受人摆布。虽然他不够果敢决绝，但绝不懦弱。他开始思索埋藏在心底的最后选项。他相信，一旦实施那个选项，中国的局势将发生很大变化，很多人的命运将会改变。

既然和平路线走不通，那就玩次大的。

最后的选项

一八一八年一月二十五号，代理大总统不到半年的冯国璋面容枯槁，去徐世昌家请教时局。一年之前，内外交困的黎元洪向冯国璋请教时局，冯国璋嘴里表示同情黎元洪，心里等黎元洪赶紧下台。此时徐世昌也一样，已经和段祺瑞有了默契，想取代冯国璋。

对于冯国璋的困惑，徐世昌表示自己孤陋寡闻，还是把段祺瑞叫来一起研究。随后段祺瑞到了冯国璋家，北洋三巨头一起吃晚饭。

酒菜摆好，谁都没心思动。段祺瑞和冯国璋积怨已深，话不投机半句多。

可怕的静默之后，冯国璋爆发：“你们不说，我说，我主张和平，不想要廉价的和平！西南派欺人太甚，我不想再忍。我要亲自出征，荡平西南！”

徐世昌和段祺瑞惊呆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们和冯国璋共事二十多年，知道他向来不见兔子不撒鹰，老年怎么变成愤青了？不对头！冯国璋一番慷慨陈词之后扬长而去，回总统府之后立刻命令拱

卫军司令刘询在第十五师（从南京带来的亲兵）中挑选精兵一旅，补足军火，作南行卫队，整装待发。同时召见王士珍，令他坐镇京城，维持治安。

如此这般部署之后，颁发通电：“奉大总统谕：近年以来，军事屡兴，灾患叠告，士卒暴露于外，商民流离失业，本大总统愍焉心伤，不敢宁处，兹于本月二十六日，亲往各处检阅军队，以振士气。车行所至，视民疾苦。数日以内，即可还京。所有京外各官署日行文电，仍呈由国务院照常办理。其机要军情，电呈行次核办，并分报所管部处接洽。凡百有司，其各靖贡乃职，慎重将事，毋怠毋忽等因！特此转达。”

一月二十六号，冯国璋在众人的疑虑中启程南巡。

看看这时间，二十四号上午接到西南军进攻岳州的电报。晚上发电报，说二十六号南巡。在极短的时间内整出一个旅的总统卫队，需要极大的决心。所以在那个发生什么事都正常的年代，冯国璋的“出巡”仍然惊动京城。很多人惴惴不安，二十五号上午，各界派代表发声，希望总统不要出巡。冯国璋告诉大家：“出京以一个星期为期，在此期间，国事委由内阁主持，大家不必惊惶。”下午召见陆军总长段芝贵等人，要他们协助王士珍维持一切。

尽管如此，很多人仍然相信，总统南下必有惊人之举。疑虑最大的人是段祺瑞。他和冯国璋当了一辈子朋友、同事、竞争对手，太了解冯国璋了，所以第一个猜出冯国璋心思的人便是段祺瑞。设身处地想一想，冯国璋在北京，虽然比笼中鸟黎元洪好点，却也是身处龙潭

虎穴，枪杆子远在天边，没有胜算。

扭转困境的办法只有一个：拿起枪。

枪，在南京。

如果冯国璋到了南京，那么就能以大总统的身份指挥长江三督，联合西南派，既可以在南京组建新政府和北京对持，又可以效法朱元璋北伐，打一场南北战争。不论哪一种选择，至少可以控制半壁江山。想到此，段祺瑞脊梁冒冷汗。

不错，段祺瑞猜到了冯国璋的心思。一年之前，冯国璋之所以愿意去北京，就是推销和平路线的。要动武，必然要回南京。这个想法原本只有他一人知道。他以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但还是忽略了两个问题。其一，段祺瑞对他太了解。其二，仅仅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追求快速离京南下，太过仓促。如果前戏做足，倒有可能骗过段祺瑞。当然喽，局势也不乐观，如果耽误太多时间，就要对西南用兵。如果北洋军取得快速胜利，南下就晚了。

既然段祺瑞猜出了谜底，冯国璋南下就注定变成辛酸路。

总统心酸路

冯国璋南下途中还有一个目的，游说曹锟。

段祺瑞在和冯国璋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主要原因就是忽悠了曹锟。按照实力算，北洋军阀之中除段祺瑞和冯国璋两大巨头，就数曹锟实力最强。曹锟本人能力并不突出，但有能力突出的吴佩孚相助。曹锟

助段祺瑞，冯国璋压力山大。段祺瑞日后就败在曹锟和吴佩孚手中。

按派系算，曹锟也是直系军阀，但利字当头，左右摇摆。段祺瑞掌控军权，时不时跟段祺瑞走。曹锟当时正因为副总统的问题和段祺瑞闹别扭，便抓住机会向冯国璋示好。

冯国璋对曹锟说：“仲珊，我们是同乡、同乡，我不要求你站在我这边，只要求你站在公正立场上，总不过分吧。只要你不反对我，我就不会亏待你。”

冯国璋又说：“仲珊，凡事多长心眼。不要被人家当枪使。”

想起最近老被段祺瑞和徐又铮忽悠，曹锟心里就来火。见冯国璋不仅既往不咎，还和颜悦色，曹锟有几分感动，又有几分期盼。于是羞答答地表示，以后绝不做对不起大总统的事。

冯国璋见达到目的，小睡两小时，凌晨启程南下。为了曹锟，冯国璋特意在天津停留半天，又耽搁一晚。就是那段时间，段祺瑞想明白了冯国璋的弯弯绕。

冯国璋心想，过了济南、徐州、蚌埠，那便是猛虎过山，苍龙入海。

段祺瑞，你等着。

然而很遗憾，段祺瑞的密电已经发到山东督军张怀芝和安徽督军倪嗣冲手上。

张怀芝生于一八六二年，山东人，天津武备学堂首期毕业生，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骨干力量之一。如果看这些，可能认为他会偏向冯国璋。然而再看下面，当黎元洪、冯国璋罢免段祺瑞时，他在山东表示

和北京政府脱离关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计划中，张怀芝为进攻主力，还和李纯发生对峙。所以张怀芝是段祺瑞的心腹，绝对不可能放过冯国璋。

二十七号，冯国璋的专列到达济南。为表示对大总统的敬仰，张怀芝苦留冯国璋在济南住下，至少也得留一夜。冯国璋担心夜长梦多，执意南下。张怀芝表示要“保护总统”，赖在车上不下，随专列南下。当然并不是张督军多么舍不得冯大总统，而是要执行段祺瑞的第二套方案，名为护送，实为监视。济南和蚌埠中间还有很长一段路。

段祺瑞的杀手锏是蚌埠的倪嗣冲。

自古以来，蚌埠都是南京门户。想要南下干一番事业，不论文或武，都绕不过蚌埠。

冯国璋也明白，蚌埠是最后一道坎。如果说天津的曹锟可以争取，山东的张怀芝可以虚与委蛇，那么对倪嗣冲，冯国璋基本不抱希望。当初冯国璋在南京做都督，妄图倒袁世凯而代之，就是倪嗣冲和张勋在中间搞破坏。南京会议开得如此丢脸，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倪嗣冲。抛开立场不说，仅仅是个人心理上，冯国璋就厌恶倪嗣冲。冯国璋到南京，第一个就要解决安徽的倪嗣冲。双方基本是你死我活。

所以冯国璋的幕僚们研究，要不要在蚌埠停，或者干脆直接闯过去。但一辆列车想从一个军阀的地盘硬闯过去是不可能的。但冯国璋到很淡定，表示见一见倪嗣冲也没关系。还没商量出结果，列车急刹车，冯国璋差点摔倒。定神之后，他看见了倪嗣冲。

为何急刹车？铁路恰好不太好，蚌埠站南有一段正在“维护”。

如果列车强行穿过，不排斥脱轨而出的风险。所以就不用走了。

当然倪嗣冲不会说他在铁路两边准备了炸药，他对冯大总统非常恭敬。事实上倪嗣冲对冯国璋从来都很恭敬。一年之前，冯国璋去北京代理大总统，倪嗣冲还曾在冯国璋面前表达过忠诚。尽管是大老粗，也是台面上的人物，刀子归刀子，笑脸不能少。

身为安徽督军，倪嗣冲有责任保卫大总统的安全，所以倪嗣冲带好几千人在车站。那些人既可以保卫大总统的安全，也可以让大总统停下来。

为了表达对大总统的敬仰，安徽各界人士在倪督军的带领下到车站迎接，表示自己在伟大光辉正确的大总统的领导下生活还不错。

倪嗣冲相当热情，上车给大总统请安，真挚地请大总统赏光留下。冯国璋推辞。倪嗣冲继续软磨硬泡，表面上盛情邀请，实际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模样，反正答应走不成，不答应也走不成。冯国璋没法，只能假装盛情难却，下车享受倪督军的盛情招待。

酒宴是丰盛的，招待是热情的，宾主是欢乐的，表面气氛相当融洽。

酒足饭饱之后，倪嗣冲把冯国璋引入一间小屋歇息，作陪的有天津武备学堂的老同学张怀芝、张敬尧和冯国璋的幕僚诗景云等人。

倪督军非常“有礼貌”地问冯大总统：“此次南巡意欲何往？”

冯大总统摆出太极拳：“公等为国宣劳，我特来慰问。”

倪督军满脸忧虑状：“大总统出巡，理应预先通知各地做好接待工作，一旦出现意外，下属们承担不起责任啊。”

冯国璋继续太极拳：“预先通知，铺张浪费，难以体察民间实情。”

如此温文尔雅的对话实在难为了倪督军，不如换个直接一点的方式。倪督军的笑容变冷：“总统宽厚仁德，本是好事。可是贵为一国总统，贸然出京让朝野震惊，也不妥吧。”话中带刺，地方军阀竟然开始教训起冯大总统来了。

人在屋檐下，冯国璋没办法，只能听而不闻，表示自己一切部署妥当，并非贸然。诗景云则讽刺倪督军消息灵通，对京城之事如此清楚。倪嗣冲回应：“要为总统安全负责。”

倪督军的主要目的并非为总统安全负责。“总统视察前线，理应走京汉铁路去西南，而非金浦铁路，为何舍近求远？”大老粗绕太多弯不习惯，切入正题。

旁边的诗景云看不下去了：“总统是天下的总统，先看后方，还是先看前方，自有道理。”言外之意，关你屁事。冯国璋附和说：“我久居京师，对外事知之甚少，我要亲自视察，不要再出现傅良佐那般溃败，遭人笑话。”

傅良佐是皖系骨干，冯国璋把湖南战败的责任推给傅良佐，倪都督不干了。“傅良佐非等闲之辈，若不是范国璋和王汝贤当叛徒，不会溃败。应该把他们交给军事法庭。”倪嗣冲这话，相当于当着冯国璋的面揭短。旁边的张怀芝赶紧表示赞同，并把火烧到冯国璋的心腹李纯身上：“还有李纯，纯属害群之马，应该革职问罪。”

眼看双方要吵起来，冯大总统怕闹僵不好看，赶紧浇冷水。“不要再争了，我们都已年过半百，还有什么好争斗？你们都是北洋老将，

应该团结。”

倪督军借题发挥：“谁想打仗？但西南五省不服中央，另搞一套和中央对抗，只有灭了他们才有和平。”不光声音大，还有唾沫星伴舞。

冯大总统一看这情况，心想多说无益，早走为妙，便起身告辞。

倪督军直接拦住：“总统哪里去？”

——胆够肥，敢挡国家元首的路。

冯大总统：“回南京看看。”

——够窝囊，假装看不见。

倪督军：“去南京干什么？”

——接近于审问上级，狂妄无礼。

冯大总统忍气吞声：“召开一次军事会议，研究对西南作战，请你们通往。”

——骗术太低级，步步退让，迎来对方步步紧逼。

倪督军大笑：“我的大总统，这里有吃有住，有山有水，为何劳神去南京开会呢？这里就行，这里就行。”边说便把冯大总统推坐在沙发上，并让人发电报，让李纯到蚌埠开会。

——将军指挥国家元首，这样的事不多见。

冯大总统弱小的身躯在倪督军大嗓门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弱小可怜。那个情况，他可以选择翻脸或任人宰割。如果翻脸，倪嗣冲最多就是阻止他不去南京，并不能拿他怎么样。冯国璋或许拿段祺瑞不能怎么样，对付倪嗣冲还是绰绰有余。那样不见得在大局上有什么决定

性的影响，起码可以维护个人威信。国家元首的个人威信，也是国家权力权威性的自然延伸。然而很遗憾，关键时刻冯国璋再次暴露“缺乏虎气”之缺点，任凭倪嗣冲所作所为。

事到如今，南下南京泡汤了，临时政府泡汤了，北伐泡汤了。如果李纯再被倪嗣冲骗过来，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好在李纯看出点名堂，推脱身体不适。冯国璋方才长出一口气。

会议与其说是冯国璋召开，不如说倪嗣冲召开。与其说倪嗣冲开会，不如说是数落冯国璋。

倪督军对冯大总统说：“是战是和，总统先有个主意，究竟你的主意何在？你为何不明白说出来！你和段总理已是数十年的老朋友了。可是，你只顾自己的总统地位，而不顾总理的面子，此种举动真令吾辈寒心。”

倪督军还学文人的样子，对冯大总统谈历史：“不知总统是否还记得当年在天津武备学堂当学生时候，校长不是我们安徽李文忠（李鸿章）吗？如今安徽人真倒霉了，当年卵翼出来的学生一个个都忘了本，同咱们捣起蛋来，这还了得吗！”相当于骂人了。

倪督军虽然是粗人，却也不忘记用眼泪烘托感情，一边对冯大总统拍桌子，一边大哭：“大总统，国家已经危险万分，我们北洋派也到了万分危险的时候，你看南方的势力这样嚣张，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说你是直派，说段总理是皖派，说你俩闹意见，而又造谣言说直皖两派要分。若真的分了，我们自相水火，那北洋派就完了。”听这话说的，看这眼泪流的，自家人一样，一点也不见外。

倪嗣冲软磨硬泡，好人恶人当了一遍，加上一番表演，逻辑层次不明，但意思非常明确：总统想继续干，必须和西南派决战；必须让段祺瑞复出担任内阁总理，否则不好办。

冯大总统长叹一声：“既然你们愿意去西南，我就回京吧。”声音低沉无助。

倪督军又笑了：“总统这样才合天道人心嘛。”

冯大总统也笑了，很苦。

一月三十号，冯国璋回到北京，距离出发时间刚过四天。一只狼生活在旷野中，生存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周围虎狼环伺，就面临生存问题。有狼心而缺虎气的冯国璋就是一匹生活在虎狼之中的狼，回到北京之后，更没办法了。

冯国璋又见到了讨厌的段祺瑞，很来火。段祺瑞本人老板着一张脸，一副高人一等的模样，原本就惹人烦。冯国璋认为，大总统威信扫地，皆因为段祺瑞。

段祺瑞表示要找大总统说理，冯国璋表示最怕不讲理的人。

段祺瑞：“事到如今，你还动心眼儿？”说理么？分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挑衅。

冯国璋老羞成怒：“你给我解释什么是‘事到如今’，什么是‘动心眼儿’？”

段祺瑞当然没办法解释，总不能说是我老段让大老粗挡你老冯的路吧，只能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最后的话题又落到“战”与“和”的问题上。段祺瑞再次占据上风，把冯国璋气得哆嗦却没办法。船破

又逢打头风，接下来的三件事彻底压垮了冯国璋。

其一，李纯被攻击得很惨，只能称病不出。李纯是冯国璋的家底，如果李纯出了意外，那么冯国璋就如同当年的黎元洪一样，失去一切，任人宰割。

其二，张作霖入关，威胁北京，并且建议亲家张勋出山，让冯国璋想起了黎元洪。

其三，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内阁总理王士珍不堪攻击而撂挑子，没人敢接任。

面对日益危急的局势，冯国璋发布“罪己布告”：“上年湖南事起，阁议主张用兵，国璋冀以武装促进和平，而未尝以力征誓于有众。……长沙陷落，大损国威……国璋不审傅良佐等之躁率而任用之，是无知人之明也；叛军幸胜，反议弭兵，国璋轻许之，是无料事之智也。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

三月二十三号，冯国璋被迫启用段祺瑞。段祺瑞送来一份密件，开出五个条件：

其一：参陆办迁回国务院，由靳云鹏任主任。

其二：国务院决议，总统不得更改一个字。

其三：内阁成员由总理选，不必征求总统意见。

其四：公府秘书长由总理推荐。

其五：中央（指总统）致各省电报由院方（国务院）核发。

总结概括，总统当好盖印机即可。总理为刀俎，总统为鱼肉，不要再生他念。

冯国璋愤怒了，大骂段祺瑞混蛋。然而虎落平阳被犬欺，龙遇浅水遭虾戏，何况冯国璋既没有“虎气”，也没有“龙气”。

冯国璋哭了，最后还是在密件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从此成了玩偶。

冯国璋还有两个选择。选择之一：伪装出行，秘密出行南下，或许有成功的可能。选择之二：也可以带着他的警卫部队硬拼一次，失败之后下台。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是因为那样不仅关系个人前途，也会关系到北洋系统的命运，更会引起全面战争。

那么如何解释之前的南下呢？其实很简单。如果在段祺瑞复职之前南下，王士珍还是和冯国璋在一起的，那么冯国璋到南京采取激烈手段就师出有名，名正言顺。段祺瑞复职之后，冯国璋再采用非常手段，在“责任内阁”的框架下，已经失去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

评，冯国璋虽然贪财恋权，但还是能从大局考虑问题。为了所谓的天下和平， he 可以和段祺瑞闹，也可以对段祺瑞忍让。中间有多少成分为私，多少成分为公，谁也说不准。

叹，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能区分得了“私”与“公”的距离呢？

八章 多余的人与大总统

国家权力有多层特性，其实并没有什么秘密。只要政令通行，一切都行。政令无法畅通，无论如何都不行。所谓府院之争，名义上争

权夺利，实际是政令无法畅通造成的。

要论根源，还是孙中山和袁世凯彼此不信任造成的。

要论根源的根源，还是千年农业帝国崩溃之后，多层次历史周期律彼此作用的缝隙之中，新生的民国短时间之内找不到富国强兵之策，更找不到能让多数人满意的政策。

满清遗老和革命者是死敌。能化解他们之间恩怨的，不是时间，是死神。

帝国体制和民国体制是对立的，必须时间足够长方才能分出胜负。

帝国梦和民国梦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各种信仰者之间的恩怨不会在一代人中分出高低胜负，所以只有死神和时间同时作用方能化解。

黎元洪依靠老好人的智慧，想执行休养生息策略而不得。相比之下他还算幸运，落得不错的名声，骂人狂人章太炎都不骂他。

相比黎元洪，冯国璋没少挨骂，没少受气，手握枪杆子却追求和平统一，最后被逼急了，试图南下用枪。失败之后，并没有孤注一掷，而是顾全大局退让。但冯国璋的退让并没有迎来理想中的局面，而是导致了加倍的动乱，损害了国家权力的基础力量——枪杆子。

那种局面从一九一七年黎元洪到北京代理大总统就已经注定。黎元洪认为自己能搞定一切——只要搞定段祺瑞就行。

站在府院之争的角度看，如果总统获胜，掌控大权，那便是总统驾驭天下；如果总理获胜，那便是总理驾驭天下。不论哪一方胜利，都会由双核变成单核，似乎都可以完整行使天下权力，达到政令通行

之目标。这些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都是明白的。

那么为何还要府院之争？前面给出了解释：权力实在太过诱人。但没有解释：权力为何如此诱人？物质层面看，吃香喝辣，衣食住行不用愁，光耀门楣不在话下，甚至还能光宗耀祖。精神层面找答案，干得好，可以名垂青史，被万世颂扬。尤其是历史大变更之时。

提起当年的北洋派，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上“军阀”。看到军阀两个字，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兴起某种鄙视。正是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感情，导致那段不算太远的历史却纷乱不堪，含糊不清，仿佛不值一提的样子。然而历史早就告诉我们，所有发生过的事，都有自身因果，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现实。所有在舞台上走过的人物，都有自己的价值。

北洋派那些人，不管文或武，粗或细，都经历过乱世的考验，其中不乏人杰精英。我们可以不赞成他们的行为或思维，至少要说点原因来。这是对历史最基本的尊重。

和所有人一样，他们都有缺点，贪财恋权好色是普遍现象，但不能因为这些就忽略其他方面。他们中不少人都有家国情怀，而且有相当的骨气。至少在抗战中，北洋派的标志性人物没有沦为汉奸。

段祺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制服了大总统，终于可以专心武力统一。转头一看，已经天下大乱。欧战结束，中国内乱即将开始，那是一波乱世洪流。

它冲垮了段祺瑞。

继冲垮了国家权力的力量基础之后，又冲垮了国家权力的法理性

和正义性。

站在那波洪流上方的恰好是徐世昌和曹锟，一文一武。二人都成了大总统，都中途下野。因为徐世昌毁了国家权力的法理性，曹锟毁了国家权力的正义性。

多余的人

近代史上有一位极为特殊的人物。他无处不在，看起来却又显多余。他出身并不显赫，在乱世之中登上权力巅峰，却又常常被忽略。他有文韬有武略，但后世各路专家学者对他都不怎么上心。他就是徐世昌，北洋军阀之中学历最高、存在感最弱的人，也是那个时代最精明的人（之一）。如果那时代有谁比袁世凯还精，就是徐世昌。袁世凯把武人的精明发扬到极致，徐世昌则把文人的精明发扬到极致。

徐世昌生于一八五五年，天津人，幼年丧父，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成长，品格和学问都很不错。年轻时由于家贫，无钱进京赶考，遇见正纵酒狂歌、写歪诗充门面的袁世凯，两人一见如故。袁世凯称赞徐世昌为妙人，赞助他二百两银子进京考试。

徐世昌先中举人，又中进士，按照帝国时代高级知识分子的规则，先进翰林院整理资料，坐十年冷板凳。此时袁世凯正在朝鲜独当一面。十年时间，徐世昌在京城成为帝国时代的文官精英，袁世凯在朝鲜成为武官楷模。两人的关系一直没中断。

袁世凯拿眼睛盯着天下，徐世昌拿眼睛盯着袁世凯。甲午战争之

后，徐世昌把袁世凯引荐给光绪的老师李鸿藻，让袁世凯有机会接触到“帝党”。

袁世凯练兵，徐世昌接受袁世凯的邀请，抛弃帝国核心中枢的锦绣前程，去天津小站当总办，和一帮大老粗为伍，相当于押宝袁世凯。

徐世昌在北洋军中总揽文案工作，又是进士出身，在一帮大老粗中鹤立鸡群。袁世凯需要走关系，很多时候都是让徐世昌疏通。北洋三杰和袁世凯是上下层关系，徐世昌和袁世凯更倾向于朋友关系。辛亥暴动之前，徐世昌级别一直不比袁世凯低，但他还是紧紧盯着袁世凯，配合袁世凯。因为徐世昌看到，如果朝廷衰微，掌控大权的汉人必然是袁世凯。

和袁世凯一样，徐世昌精明而务实，但成长于帝国时代，灵魂深处还是偏向帝国。因为精明，所以他参与各种运动，尤其在维新运动中和各派关系都很好；同样因为精明而务实，所以慈禧太后和光绪关系破裂时，徐世昌告诉袁世凯：“旁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线，势力薄弱；后（西太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予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袁世凯听后表示赞同，跑到荣禄那里去告状，导致光绪皇帝被囚禁，戊戌六君子被杀。但袁世凯在前台挨骂，被骂了很多年，却没人注意到徐世昌。

此后袁世凯和徐世昌成为红人。徐世昌成为（满清第一位汉人）兵部尚书、东三省总督，上朝排在袁世凯之前。慈禧死后，袁世凯回家养病，徐世昌闻风而动、赶紧请假。载沣认为他还算识时务，把他调到邮传部当尚书，还算照顾。

徐世昌把文人的精明发扬到极致，每走一步都会站在胜利者一方，把圆滑演绎到极限。武昌暴动之前，徐世昌是满清大臣，打死也不透露半点不满。所以清廷最后一次改革，皇族内阁中仅有的几位汉人便有徐世昌。武昌暴动之后，袁世凯复出，徐世昌配合袁世凯夺取满清亲贵的兵权，并主张清帝退位、和革命党和解。

清廷退位诏书最后一句“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值此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就是徐世昌加上的，给袁世凯登顶留下伏笔。

袁世凯复出、逼宫、上位，徐世昌功劳很大。

袁世凯上位之后，徐世昌按功劳可以出任国务院总理，但他不愿意如赵秉均那般立刻站在前台被各方攻击，便以忠于朝廷的名义暂时退到一边，静观其变。等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之后，逐渐揽权之际，徐世昌窥视到袁世凯的心思，终于耐不住寂寞。

杨度是较早窥视到袁世凯称帝心思的人之一。如果找一个比杨度更早窥视到袁世凯心思之人，那就是徐世昌。他太了解袁世凯了，知道袁世凯和他一样，灵魂深处倾向于帝制。

一九一五年五月份，清亡三年之后，徐世昌在袁世凯称帝前夕出山，担任国务卿，人称徐相国。然而和精明无双的袁世凯一样，徐相国失算了。国人并不接受帝制。

一看风头不对，徐相国再次退到一边，打算在袁世凯身后做点事。

这就是徐世昌，机关算尽太聪明。

然而正因为聪明过了头，袁世凯死后，徐世昌空有巨头之名，而

无巨头之实。袁世凯留的三个继承人名单中，黎元洪当大总统，段祺瑞担任内阁总理，唯独徐世昌成了空闲的多余人。就连不在候选名单中的冯国璋都代理大总统了，徐世昌还是多余人一个。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多余人徐世昌进入段祺瑞的视野。

段祺瑞认为，既然找盖印机，就应该找一个没有实力的人，好使唤。当时有人提议黎元洪复职，段祺瑞认为，不如在北洋内部找个自己人。事实证明，段祺瑞失算了。

徐世昌的选择

一九一八年十月，中华民国经历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三任总统更迭之后，举行第二次总统大选。在皖系掌控的安福国会操控下，徐世昌当选总统。

那是一场非法的行动，凡是参与其中之人，都要付出代价。

一九一八年的徐世昌已经六十三岁，功成名就，该争的都争了，该拥有的都拥有了，该享受的都享受了，为何还要担任有名无实的总统呢？要知道他两手空空，无派无枪，上台也是傀儡。名气大的如黎元洪吃足苦头，手握枪杆子的冯国璋吃足苦头，号称北洋三杰之首的王士珍在内阁总理的位置上也没坐几天。

而且徐世昌大总统的位置有天然的缺陷。前面几位都是合理合法上台的，唯独徐世昌是由皖系的安福国会选举上台。安福国会由皖系一手操办，选议员时就有很多丑闻。西南派和直系不仅不承认，而且

骂得很激烈。吴佩孚电文：“一、此次国会新选举，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国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司法机关受行政指挥而等赘疣，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等专制，酿成全国叛乱，若再以武力平内乱，是惟恐亡之不速也。二、我国对德奥宣战，若以兵力从事内争，重轻倒置，贻笑外人，日本乘我多难要求出兵，而丧权协定以成，内争不息，外患将不可图。三、内争年余，军费全由抵借，以借款杀同胞，何异饮鸩止渴……”

一旦皖系失势，徐世昌注定是非法大总统。在那个时代，连皖系头子段祺瑞都是起起落落，何况徐世昌。事实上徐世昌的结局，就是因为“不合法”被驱逐。

徐世昌上台不仅终将自取其辱，而且损害了国家权力第三个基本特征——法理性。

徐世昌无比精明，怎么会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呢？

要说权力的诱惑，徐世昌满清时代就是政府高官，袁世凯时代，当过国务卿，官瘾也过足了。事实上，徐世昌懂得分轻重是非。袁世凯掌权那会，他就避开了，因为他不想坐在火炉上烤。一九一八年当大总统，情形比袁世凯初期当总理还糟糕。

要说钱，那么不好意思，民国大总统是贴钱的买卖。所以说徐世昌当大总统，既不是为了权力（不可能有），也不是为了钱财（更不可能有），甚至还要贴上一世英名。

好吧，徐世昌的世界，很难懂。要寻找蛛丝马迹，首先要了解几

个事实。

其一：徐世昌上台之前，首先请示溥仪，得到“恩准”之后方才上任。但徐世昌并不是保皇派，袁世凯取代朝廷时，徐世昌出过大力气。

其二：当年徐世昌出山时，袁世凯正在搞帝制。当袁世凯称帝时，他知趣地躲在一边。虽有明哲保身之嫌，但可以看出徐世昌没有为帝制孤掷一注之气魄。袁世凯都没有搞定帝制，徐世昌既没有实力也没心思搞帝制。

从这两点可以看出，徐世昌并非铁杆保皇派却尊重皇帝皇权，也非铁杆帝制派但对帝制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但是当大总统，和皇帝或帝制已经没有关系。

好吧，不绕圈子了。徐世昌当大总统期间就干过两件事：一件被世人知晓但不被重视，另一件基本被遗忘。答案就在这里。

大局势和小心思

徐世昌虽然是没有派系的文人，但他跟没有从政经验的黎元洪和主意虽多但缺乏果敢的冯国璋不同。他为官多年，早已修炼成老狐狸，对北洋系统内各种派系早已心知肚明。他知道大总统宝座是一个火炉子，但他相信自己拥有堪比老狐狸的智慧，可以在火炉上架一个凳子，屁股不至于被烤焦。十月十号，徐世昌发表大总统就职宣言：

“世昌不敏，从政数十年矣，忧患余生，备经世变，近年闭户养

拙，不复与闻时政。而当国势纠纷，群情隔阂之际，犹将竭其忠告，思所以匡持之。盖平日忧国之抱，不异时贤。惟不愿以衰老之年，再居政柄。耿耿此衷，当能共见。乃值改选总统之期，为国会一致推选。屡贡惆怅，固辞不获。念国人付托之重，责望之殷，已于本日依法就职。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

“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全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达。则不得不诉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两者皆有困难。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时机，亦何至扰攘频年，重伤国脉？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阅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否则息争弭乱，徒托空言，或虞诈之相寻，至兵戎之再见，邦人既有苦兵之叹，友邦且生厌乱之心，推原事变，必有尸其咎者。此不能不先为全国告也。”

——和平统一，说得很清楚。

但徐世昌玩这一套很特殊：绝不和段祺瑞闹僵。他把直系和皖系当成两条狗，直系占上风，他支持皖系。如今皖系占上风，他支持直系。玩起最古老却有效的平衡术。他亲自拜见冯国璋，让冯国璋继续掌控从南方带过来的军队，把冯国璋感动得一谈糊涂。

徐世昌最绝的一手，是把梁士诒和梁启超原本两个死对头拉到自

己一边。

梁士诒是民国初年的财神爷，手腕通天，但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变臭。徐世昌拉住他，相当于挖安福国会的墙角，让曹锟的副总统梦破灭。曹锟很伤心，逐渐和段祺瑞决裂。之后直皖战争，皖系战败，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新直系得势，徐世昌和段祺瑞均灰溜溜走人，这是后话。但徐世昌不后悔这事。

让徐世昌后悔的是另外一件事。列强在欧战结束之前无暇东顾，日本在中国横行无忌，和日本勾勾搭搭的段祺瑞也是风光无限。欧战结束，列强再次把目光转移到东方，不希望看到日本在中国势力过大。徐世昌认为机会来了。

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徐世昌设立了一个外交委员会，邀请一帮老古董，研究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其实是想借机发展力量，制衡段祺瑞。为此，梁启超携得意门生蒋百里游历欧洲，探听欧洲政坛动向，尤其是巴黎和会的进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虽然没有派兵参战，好歹站队正确，成为战胜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欧战，除美国在战争尾声参与进去，欧洲以外的国家可以忽视。但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列强却把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让给日本，那是一种屈辱。晚清历史上有过很多屈辱，但都是战败之后的屈辱。

梁启超把巴黎和会内容密电徐世昌。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徐世昌也感到屈辱。然而很遗憾，徐世昌和所有中国人一样，无能为力。因为中国很弱，所有巨头都有后台老板。日本很强，是段祺瑞和张作霖

的后台老板。徐世昌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抗议。当然他是大总统，可以发动很多人一起抗议，就是所谓“国民外交”，把国家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诉诸舆论。他暗中鼓动学生、商人、海外华侨团体，连日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慰问电报，试图以舆论左右时局。各大报纸全天候详细报导巴黎和会的进展情况。徐世昌明白舆论的重要：“戊戌以来，每次政治上变革之功，咸归于报章鼓吹之力”。

然而这一次，徐世昌却自食其果，后悔莫及。因为他发动的舆论战没能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处境（日本依然取得了德国的权益），国内却诱发了一系列大规模游行示威。

——五四运动因此爆发。

五四运动，康梁变法之后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极为壮观，却不为徐世昌所喜。尽管五四运动之初，徐世昌正面推动过；整个五四运动过程中，徐世昌的表现还算开明。但是他非常不喜欢那场运动，正如袁世凯不喜欢共和政体一样。因为徐世昌是传统世界的人，他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均来自传统世界。他的功名利禄也是来自传统世界。他的信心和意志，同样来自传统世界。须知，溥仪皇帝在徐世昌心中都有很神圣的地位。

五四运动，就是要抛弃传统世界。休说溥仪，连孔子都不要了，连文言文都不要了。五四运动之激烈，连鲁迅的老师、骂遍那个时代所有人的章太炎都接受不了。如果抛弃传统世界，那么徐世昌也就是老古董一个。

徐世昌不喜欢段祺瑞的嚣张跋扈，不喜欢军阀粗声大气的模样，

但是更不喜欢当老古董。因为他深爱四书五经，深爱孔子，深爱格律工整的诗歌，还有看起来很不错的文言文。

那种情况下，徐世昌干了一件非常特殊，但几乎已经被后人遗忘的事：

——提倡尊孔读经，对抗新思潮侵袭。

不知内情者还以为是康有为复出了呢。

纵观徐世昌一生，行为方式并不算保守。参与戊戌变法，也算能接触新东西。支持袁世凯取代满清皇室，也不算老顽固。最终的最终，他有一颗传统世界的灵魂。

话题转回之前：老狐狸徐世昌为何会担任有名无实的大总统？

民国历史的所有总统，包括孙中山和蒋介石在内，徐世昌学历最高（进士出身）、文化素养最好（诗词字画都不错）、处理公务效率最高（翰林院十年磨练）。正因如此，他对传统世界也最为眷恋。他无法想象华夏大地上的人不再读经书、不再尊孔子。但是在现实中，他对内无法解决愈演愈烈的军阀割据，对外无法对列强说不。

他的行为是撕裂的。

他的灵魂是撕裂的。

因为那是乱世，而且国家处于下风。本人认为（仅代表我个人），徐世昌担任大总统的心思和袁世凯搞帝制时一致。袁世凯精明一世，最后不惜一切代价往帝制上走，是因为他有一颗帝国灵魂，想尽可能保留传统世界的东西。徐世昌出任傀儡大总统的根本目的，是想从根本上守护国人的传统世界观。用现代话说，追求和谐，发扬传统精神

文明。或者说得斯文一点，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梦想。

所以他诱发五四运动，却又讨厌五四运动。和他抱有同样感觉的还有很多人，老古董康有为、辜鸿铭，即将成为老古董的梁启超、章太炎，还有一大堆老官僚和大老粗。

他们接受朝廷退位、接受帝国崩溃，但如果让他们把中华帝国文化全部丢掉，不好意思，他们干不来。因为他们生在旧世界、长在旧世界、对旧世界的一切无比眷恋。他们奢华的生活、成功的人生均扎根于旧世界。

让他们不要那么多房产，让他们不要那么多佣人，让他们不要拥有那么多妻妾、不要去八大胡同喝花酒，说真的，他们做不到。

让他们不要文房四宝、不读四书五经、少空谈多干事，他们同样做不到。

所以徐世昌出山，不仅没能巩固传统，反而激发了更多矛盾，五四运动直接摧毁传统文化。读经之人更少，尊孔之人更少，西方思想入侵更深。这是思维问题。

更现实的问题，列强重新注意东方，寻找代理人。英美选中了新直系。先是直皖战争，接着第一次直奉战争，国家权力的第二层特性——基础力量——被摧毁。

日本支持的段祺瑞倒台，徐世昌变成“非法大总统”，被直系新头目曹锟和吴佩孚赶走，国家权力的“法理性”不复存在。曹锟干脆就用最混蛋的手段摧毁了国家权力的最后一个特征——正义性。此后北

洋系统土崩瓦解，袁世凯的粉丝全面失势，孙中山的粉丝崛起，民国进入第二段——暴力时代。这是后话。

评，徐世昌以书生身份走上民国大总统之位，试图在乱世之中保留一些文化传统，他失败了，也必然是失败的，但他是勇敢的。他是一个勇敢的多余人。

九章 曹锟的世界

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的世界，都相对容易理解，他们的成长、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目标、他们实现目标的战略战术，甚至他们的灵魂都是清晰的，可以触碰的。

徐世昌的世界，难懂。

曹锟的世界，让人似懂非懂。恶人的世界容易懂，好人的世界容易懂。如果一个人身上聚集了好人和恶人的全部特性，就让人似懂非懂了。曹锟就是这样一个人，口头禅“妈个巴子”，但又喜欢附庸风雅，喜欢用文言文发电报。

曹锟生于一八六二年，天津人，出身贫寒，没钱没关系没背景，凭借自身努力步步高升，直到民国大总统。这么介绍曹锟，简直是励志典范，绝对正能量。然而曹锟的每一步都让人很无语，满满的负能量。

先看正能量

曹锬的爸爸是船工，一个人工作，养活一大家子。好在他爸爸比较开明，勒紧裤腰带也要送孩子念书。所以曹锬年幼时念过几年私塾，斗大的字认识几箩筐。

曹锬是与众不同的，他爸爸让他学造木船，不干；让他学做农活，不干。他要赚钱，就去做生意。没有本钱能干嘛呢？卖布，不需要太多成本。然而他家连买手推车的钱都没有，曹锬就挑着布匹走村串巷，成为一个年轻的小货郎，虽然可以时不时勾搭下临村寡妇，但很累很苦赚不了几个钱，比如今摆地摊还不如。虽然锻炼了身子骨，见了些世面，但内心很苦。

一八八二年，二十岁的曹锬选择投军。那时的曹锬有两样本钱：外表忠厚，内心机敏。他看似有些浑，但多年小货郎的经历，相当于早日进入社会大学进修，炼出察言观色的本领和机敏的心思。虽然在社会上没有出人头地，但在军营大老粗中，曹锬还算出众，被管带郑谦看上。正因如此，天津武备学堂开学时，曹锬成为第一届学生，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王占元等人成为同学。

曹锬个人素质很不错，每次操练都能名列前茅，但涉及到几何和物理等理论考试，经常吃鸭蛋。然而曹锬有股牛劲，爱钻研。毕业时，综合成绩已经名列前茅。表面上还是很浑很憨厚的样子，却已经成为那个时代大兵中的精英，前途无量。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

曹锬很不幸，赶上甲午战争，随马玉昆进入朝鲜，赶上平壤血战，

未当孬种。他见识了英雄的左宝贵和狗熊叶志超，最后不得不跟随残兵败将跑回国内，狼狈无比。

曹锟也很幸运，战后赢得袁世凯的信任，成为新建陆军的骨干、袁世凯的心腹。

训练中的曹锟堪称佼佼者，不论为兵还是为将，成绩都是名列前茅。配上他忠厚的外表和机敏的心思，总能赢得领导信任，从郑谦到袁世凯，莫不如此。所以郑谦不仅推荐他去武备学堂，还把女儿许配给他；所以袁世凯把曹锟的第三师视为心腹御林军。

战场上的曹锟也是佼佼者，比起那年代遍地的豆腐兵，曹锟至少不当孬种。相比武备学堂其他同学和北洋新军其他同事，曹锟的战绩并不差。比方说甲午战争中，比起跟随叶志超的王士珍和跟随聂士成的冯国璋，曹锟的表现并不差，没有玷污军人的头衔。

曹锟带兵赢得相当的尊重。那个时代有一个特色，军方大佬常常遭到心腹大将反水。前期的段祺瑞、冯国璋，中期的张作霖、吴佩孚，后期的冯玉祥、李宗仁，都遭遇过类似的尴尬。曹锟并无军事天才，战场上也是大大咧咧，军事成绩主要靠吴佩孚。但吴佩孚没有反对过曹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自己能打仗固然重要，但是能吸引天才帮自己打仗，同样重要。细细品味，还真有点刘邦将将的味道。

从这些层面看，曹锟是一个好士兵，一个合格的将军，勉强算一个合格的统帅。但这仅仅是一个层面而已。

再看负能量

人性都是自私的，总是在有形无形之中本能地做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乱世尤其如此。

所谓人性自私的表现，无非争权夺利博虚名。

所谓乱世，无非是文人肆无忌惮地博虚名夺利，武人肆无忌惮地争权夺利。

民国为史上最乱的时代之一，也是文人博虚名夺利之巅峰，武人争权夺利之巅峰，所以能看见各种肮脏事。理解了这一切，便可以理解那个时代。这一切在曹锟身上都有体现。

民国大总统中，黎元洪贪权，冯国璋贪权爱钱，曹锟贪权爱钱又好色。

先说贪色吧。那个年代的军阀都好色，比方说张宗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女人；再比方说张作霖，看上人家便强娶回家。曹锟是另外一个类型，他去当兵，并非如冯国璋那般想干一番事业，主要是调戏妇女被打，很丢脸。

曹锟原本在家乡有一个老婆，比曹锟大几岁，淳朴能干事，默默地在曹家老去死去，曹锟对她很敬重。第二个老婆是伯乐郑谦的女儿，很漂亮很有才，但很有个性，得知曹锟还有一个大老婆时，不顾曹锟百般呵护，竟然郁郁而终。第三个老婆生于富贵之家，曹锟对他也很不错，很遗憾多年无子，在曹锟找到第四个老婆之后才生孩子。第四个老婆是舞台名角，很有个性，一直陪曹锟走到最后。如此看来，曹锟对每个老婆都很好。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民国那帮大老粗中，曹锟

对待老婆的态度值得表扬。但这并不意味着曹锟不好色。去八大胡同吃花酒，那是最基本的，到处找妓女也不稀奇。

稀罕的是，在段祺瑞和冯国璋斗得你死我活之际，曹锟为了一个名叫花蓓蓓的佳人花了十万。那个年代，基本公务员每月只有几块钱，十几块钱，还不一定能按时领到。北大教授一个月几百块算高工资。袁世凯拉拢章太炎，也才给一万块活动经费。

更稀罕的是，曹锟为妓女一掷千金之事闹得沸沸扬扬。徐世昌当大总统之后，曹锟原本想当副总统，为此花了不少钱。但是投票当天，部分国会议员直接去胡同喝花酒，打死不去投票。扬言给钱太少，还不如对妓女好。闹得副总统没选出来，也算是天下奇闻。

再说贪钱。

那个年代的军队都是豆腐兵。凡是上战场，尤其是对外战争，基本上一败涂地，再败涂地，三败还是涂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没人能杜绝将军喝兵血。

所谓喝兵血，具体方式有两种，吃空饷和扣军饷。

吃空饷，就是团长吃五百人空饷，师长吃五千人空饷。如此这般。一支十万人的队伍，至少空缺几千人，多则空缺一两万人，如何打仗？

扣军饷，相当于层层剥皮。大兵军饷本来就少得可怜，层层盘剥之后，更是食不果腹。所以逃兵永远都有，砍手、割耳朵、剥皮都没用，离战场越近逃跑越多。

曹锟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布贩子到家资万贯的大财主，都是靠军队积累的。当年曹锟当第三师师长时每月收入如下：第三师有一万两百

人，上报一万两千五百人，两千多人的空饷，每月净赚一万五千块。师部每月给各个旅团营部发军饷，要扣除百分之十做活动经费，收入一万八。此外还有挂在第三师名下领军饷的地方部队两万人，每月叩饷三万。逢年过节发动商家、下属、社团送礼，另外还能利用军队放高利贷而无需担心对方不还钱。

是不是很黑？当然是。但这里还是要表扬下曹锟，他算比较克制的。所以他手下的队伍，战斗力还算可以。那个时代有多么可悲，由此可见一斑。

如此积累钱财二十年，已经是家财万贯。但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吴佩孚因为军费问题头焦额烂，急得团团转，曹锟竟然舍不得拿出几十万。等到冯玉祥叛变，战争失败，曹锟沦为阶下囚的时候，万贯家财瞬间蒸发大半，曹家由盛而衰。

由此可见，守财奴也不好当啊。等曹锟领悟到这一层，他已经成为玩偶，复起无希望，只能灰溜溜地到天津住公寓去，如同前清遗老那般。

至于曹锟爱权这事，是摧毁国家权力最后一个特征——正义性——的根源。这个先放一放，后面再仔细说。这样一个曹锟，一个奇特的混合体，汇集了那个时代的大兵、将军、统帅的优点和缺点，也算是奇葩。

奇葩绽放需要很多条件。那个时代各种人都有，曹锟脱颖而出得益于袁世凯和段祺瑞。

曹锟和袁世凯

曹锟发达的关键在于得到袁世凯的信任。

曹锟一辈子经历各种混乱、各色人物，他都能应对自如。他为很多人效力，但从头到尾，只对袁世凯一人完全忠心。曹锟有忠厚的外表和机敏的内心，原本就很复杂。袁世凯更复杂。只有更复杂的袁世凯才能识别并驾驭复杂的曹锟。两个很复杂的人走到一起，机缘使然。

平壤血战之时，溃败之中的曹锟当了一把英雄，在混乱之中解救了一美女（朝鲜使臣之女）。为报答救命之恩，那女子以身相许。她打算带着家传宝贝、满清皇帝御赐的金瓯永固杯，和曹锟一起到中国生活。然而很遗憾，她在战火中损命，曹锟带着宝贝回国。彼时，袁世凯抓住时机赢得编练新军的机会。曹锟看到，袁世凯的新编陆军充满机遇。

一八九五年，已经三十三岁的曹锟拜见三十六岁的袁世凯，表示愿意追随。

虎背熊腰的曹锟给袁世凯留下不错的第一印象。但接下来如何，还要看表现。两人谈到甲午战争，逃亡回来的曹锟慷慨陈词：大丈夫本应战死疆场、为国捐躯，而我却随败军归国，非常惭愧。如此得知大人练兵，特来投奔云云。如此一番话说得大气凛然，语气中饱含深情，热泪在眼眶里打转，配上他忠厚老实的外表，相当有感染力；再配合一些肢体动作，如此这般表演一番，相当成功。

袁世凯表示，收下你这个人。

曹锟趁机献上金瓯永固杯。袁世凯眼睛直了，收下杯子。

一八九六年三月份，新建陆军人事任命之时，毫无背景的曹锟担任第一营帮统。由于营管带只是挂名兼任，曹锟实际上相当于主管第一营。如果把曹锟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看成行贿受贿，不仅低看了曹锟，更低看了袁世凯。

曹锟爱财，却愿意把金杯送上，就是要谋长远利益。至于袁世凯看曹锟，如同宋江看李逵，只对自己死心塌地。要谋长远利益，曹锟必须在练兵上出成绩。曹锟也是那么干的，曹锟训练的队伍，每次评比中都是名列前茅。

要想把曹锟变成忠于自己的“李逵”，必须施展高人一等的御人术。

曹锟投奔袁世凯不久，被仇人左彬检举揭发说他在朝鲜谋害使臣私贪财物，闹出来可能会没命。换成一般人，可能会撒手不管。但袁世凯从中看到一个机会：可以彻底收服曹锟。

袁世凯把曹锟叫到跟前，问他宝物怎么来的。曹锟吓得屁滚尿流，跪在那里把事情前前后后说了一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恳求袁世凯维持正义。袁世凯表示这事很棘手，曹锟赶紧磕头，用力地磕，把脑门磕红一大片，一边磕头一边表示愿意为袁世凯粉身碎骨。

袁世凯看剧情进展得差不多了，表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袁世凯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曹锟回营之后，给袁世凯立长生牌位，进香祈福。

每次队伍集合，曹锟都要训话：“兄弟们，我们吃谁的饭？”

“袁大人！”

“我们为谁卖命？”

“袁大人！”

“对，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再生爹娘，我们要听他话、跟他走、得荣华富贵。”

此后袁世凯和曹锟的关系升级为宋江和李逵的关系，加强版的。袁世凯远比宋江有大略雄才，曹锟远比李逵精明强干。宋江只希望与朝廷和解，袁世凯想的是匡扶天下。李逵只知道喝酒砍人，曹锟除了喝酒抽大烟，还能练兵带兵。袁世凯喜欢奴才，但不喜欢愚蠢的奴才，而曹锟并不愚蠢，即使拍马屁，也是恰到好处。

所以袁世凯选择精锐的第三镇（袁氏御林军）统帅时，放弃段祺瑞（桀骜不驯、难以驾驭）和冯国璋（眼后有眼，心后有心），而选择曹锟（死心塌地）。曹锟在那个位置上找到吴佩孚——日后飞黄腾达之关键人物。

袁世凯不好做的事，都由曹锟做。比方说南北议和，孙中山派使团接袁世凯去南京就任，结果使团在北京遭遇“兵变”。那就是曹锟让人搞的。

袁世凯当皇帝，西南护国军讨袁，只有曹锟一人真心为袁世凯排忧解难，打算在四川和蔡锷拼命。当致命的“二陈汤”出锅，袁世凯已经众叛亲离。曹锟还想调兵灭了他们，为袁世凯解围，李逵对宋江的忠心程度也不过如此。

只是袁世凯突然死去，把曹锟悬在了空中，上下不得，几乎陷入绝境。要知道袁世凯当时可是墙倒众人推，曹锟是将倾的袁氏大厦的

一根独木，惶惶不可终日。

绝望之时，段祺瑞出现了，给曹锟解围。曹锟由此开启了和段祺瑞的恩怨。

段祺瑞对曹锟有恩情，但不如袁世凯的恩情大。袁世凯对曹锟可谓再生父母，段祺瑞只是拉了曹锟一把。所以曹锟对段祺瑞谈不上忠心，只是彼此利用的关系。此时曹锟已经羽翼丰满，无需再依靠忠心得到什么。他的欲望已经很大，段祺瑞能满足他时，便可以合作；不能满足他时，便兵戎相见。

曹锟的运气

按照派系划分，北洋系统中直系力量最强，曹锟是直隶人，也算直系。但是很遗憾，直到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胜利之前，直系一直被皖系压制。

直系从不是铁板一块。王士珍算直系，但他从不是冯国璋的人。曹锟更不是冯国璋的人。确切地说，直系创始人应该有两个：冯国璋和曹锟。他们有很多相同之处，又有很大的不同。

冯国璋和曹锟都是那种心眼很多的人。区别在于，冯国璋看起来就很精明，曹锟看起来则忠厚老实。冯国璋刚进北洋武备学堂，就知道依靠文绉绉的手段拉关系；曹锟的方式比较豪放，喝酒吃肉交朋友。北洋新军时代，冯国璋依靠各种精细而隐秘的手腕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圈子，就是日后的直系；曹锟依然是以大大咧咧的方式构建自己的势

力范围。

曹锟和冯国璋，表面上是直隶人，实际是潜在的竞争关系。尤其是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冯国璋从来都是相机行事，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曹锟对袁世凯忠心不二，但也没有妨碍自己的发展。护国战争爆发之际，冯国璋和西南派沆瀣一气，在曹锟眼中简直是叛徒行径。如果灭了蔡锷，曹锟和冯国璋极有可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袁世凯死后，曹锟和段祺瑞合作让冯国璋很难受。除了段祺瑞在关键时刻拉了曹锟一把，更主要的是曹锟长久以来就对冯国璋很不爽。那是一个乱世，各种派系关系一团乱麻。但乱世中的曹锟非常幸运，从平壤溃败反而得到稀世珍宝就能看出来，从跟随袁世凯就能看出来。袁世凯死后，曹锟的幸运还在继续。

徐世昌上台之后，冯国璋和曹锟和解。冯国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直系的大旗让给曹锟，让羽翼丰满的曹锟如虎添翼，去折腾段祺瑞。冯国璋死后，李纯自杀，冯国璋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基本落在曹锟手中。冯国璋那一系，之后又发展出一个孙传芳，显赫一时，但最后成了蒋介石的垫脚石。

要论幸运，那个时代或许只有黎元洪可以和曹锟相比，或许曹锟比黎元洪更幸运。曹锟有吴佩孚，可以在战场上打胜仗。论军事才能，吴佩孚在北洋军内首屈一指。正因为吴佩孚，曹锟在直皖战争中打败了段祺瑞，又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打败了张作霖。更幸运的是，吴佩孚对曹锟从来忠心耿耿。这事后面再说。

但运气很好的曹锟和黎元洪的结局一样：都是被人家赶下台。因

为他们贪权。

曹锟的欲望

曹锟很贪，贪色贪钱贪权。前面说过曹锟贪色贪钱，这里说说贪权的事。

曹锟贪权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围绕着袁世凯贪权，第二阶段围绕自己贪权。曹锟贪权很有特点，尽管他胃口很大，但总是有所保留。别人有的，他都要有。但暂时拿不到也没关系，可以等一等。曹锟的军队，围绕着袁世凯打造，除了袁世凯，那支军队只听曹锟指挥。所以袁世凯死后，曹锟瞬间成为军事巨头。曹锟想要到大总统的位置上坐坐，看见当年的同学同僚们轮番上大总统宝座，曹锟心里很不服气。

别人去得，俺曹锟怎么就去不得？俺练兵不比他们差，打仗不比他们差。

曹锟的军队是北洋精锐，加上吴佩孚作战有方，胜仗也就接踵而来。曹锟胃口越来越大，段祺瑞忽悠他也就越来越难。实际上段祺瑞能忽悠曹锟的牌只有一张——副总统。曹锟想学冯国璋，手握重兵当副总统，转正过一把大总统的瘾。

段祺瑞最怕这个情况，冯国璋眼中还有“大局”，曹锟眼中只有他自己。所以段祺瑞对曹锟只是忽悠，忽悠不下去了，直皖战争爆发。曹锟和吴佩孚打败段祺瑞，掌控北京政府实权。曹锟有了直接担任大

总统的本钱，但因为还有张作霖，曹锟咽下口水，克制欲望，表示支持徐世昌。

第一次直奉战争打败张作霖之后，曹锟认为不需要克制了，直接把徐世昌赶走，想自己坐到大总统的宝座上，吴佩孚却主张迎接黎元洪复职。曹锟心里虽有一百个不爽，也没法，因为仗是吴佩孚打赢的。可怜的黎元洪第二次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成了曹锟的玩偶。

就在那时，曹锟的运气达到巅峰：府院之争没有了，强势的段祺瑞没了，黎元洪是玩偶。只要取代了黎元洪，曹锟就可以恢复民国大总统的绝对权威。如此大好局面，比袁世凯南北议和时还好，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梦寐以求的。

曹锟的贪婪也同时达到了巅峰：眼里只有大总统的位置，把大好的形势变成大坏。

那是一个天下瞩目的位置，想坐上去的每个人，从发型到服饰到走路姿势，都会被放大。每个举动，都会被骂或被赞。即使白璧，也会被挑出瑕疵。曹锟即使心思还算机敏，怎么看都是大老粗。更糟糕的是，他的言谈举止更像大老粗。最糟糕的是，他看着大总统宝座，一系列动作却粗俗不堪，如同野猪进了菜园子。套用一句话，吃相太难看。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曹锟虽然粗俗，但并不粗野。

吴佩孚返回洛阳之后，曹锟看着大总统宝座，口水再也咽不下去。他毫不客气地挥舞硕大的拳头，摆出一系列动作，展示实力。那套动作虽然粗俗不堪，却十分有效。因为曹锟一直混军事，政治势力很小，

所以那套动作可以简化为一个字——钱。

那是史上最直观、最壮观、最有趣的权钱交易。

十章 买与卖

老油条和大老粗

权力非常迷人，尤其是大总统的位置，只要坐上去，不论多么烫屁股，都舍不得下来。当初黎元洪被段祺瑞和张勋整得心灰意冷、眼泪汪汪、发誓赌咒不玩了。五年之后得到机会，还是义无反顾地回来了，而且不想走。如何让黎元洪走人呢？

在当时的体制下，理论上和责任内阁，要弄倒总统，首先要弄倒内阁总理。黎元洪复出没多久，已经更换了四个内阁总理，当时的内阁总理叫张绍曾。一个大军阀在不用枪杆子的情况下，要如何弄倒内阁总理呢？要账。

北洋政府最缺什么？钱。它欠了很多钱，对外欠列强的钱，新老帐加在一起是天文数字；对内欠公务员的钱，常常发不出工资。所有这些账目中，有一种账很危险：欠大兵的钱。只要有人鼓动，就会乱套。

曹锟找到学弟王怀庆（天津武备学堂二期），商量一番。王怀庆也是老军阀，却是那个时代的风向标，从清廷到袁世凯到黎元洪、冯国

璋、徐世昌，王怀庆从来都没有失势过。他跟谁合作意味着谁走红，堪称老油条之中的精品。王怀庆找到冯玉祥，说张绍曾如何偏向把兄吴佩孚（张绍曾和吴佩孚有八拜之交），导致其他部队没钱，大兵挨饿。

冯玉祥当时被吴佩孚打压得很惨，军饷很久没发了，大兵饿肚子。讨军饷既可以解决自己部队的问题，又能恶心吴佩孚，一举多得。“自古皇帝不差饿兵，现在兄弟们快饿死了，权贵还在挥霍无度，我们要以牙还牙！”

说干就干，冯玉祥带着一帮大老粗闯入内阁会议室，抓住财政总长刘恩源要钱。

刘恩源哆哆嗦嗦地表示没钱，冯玉祥表示不行。刘恩源没法：“可以预开支票。”

财政总长如此表态，按道理应该差不多了。然而那个年代的预开可能是遥遥无期。冯玉祥不满意：“第一，必须在三日之内兑现（避免赖账）；第二，必须把分配方案公布出来（免得分配不均，有人吃肉有人喝汤）。”

但那年头给军费，财政总长说了不算，都是军阀下面争，按照实力大小、亲疏远近分成三六九等。所以刘恩源表示，再研究一下。王怀庆表示，不行！

刘恩源急了：“国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长期借债不还，信誉已失……”

王怀庆：“不想听婆婆帐，三天发军饷。”

刘恩源表示，我要辞职。一帮大老粗在内阁开会时间把财政总长逼得要辞职，也算是奇观。更奇葩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冯玉祥一看刘恩源耍花招，暴怒，立刻拿出杀手锏。

“你不要拿辞职吓唬老子！你是财长，在职一日，就要给钱，再搪塞，别怪老子不客气！”冯玉祥掏出一个小本子，“高在田团长从你部领一万元军费，却开五万元收据；龙济光领两万元，开十一万收据，还要继续揭么？”

刘恩源软了：“误会误会……”

高在田恰好就在旁边：“误会？单据还在我手里。”

好吧，开支票，不用等了。

那可是内阁会议上，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也不见得如此精彩。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绍曾第二天开内阁会议，左右不见刘恩源到场。会议开始，刘恩源打电话过来，原来是被蒋雁行带着另外一帮大老粗堵在家里，而且还带着铺盖，准备在刘部长家里长住。

蒋雁行在电话里喊：“总理，我们已经被欠薪两年，要吃饭穿衣养老婆。”

张绍曾赶紧说好话：“我们在开会研究，宽限几日。”挂了电话之后，张绍曾气得半死。然而张总理还没来得及发脾气，蒋雁行就带着人来了，而且还拿着枪。当然他不是拿枪指着张总理，而是指着自己的脑袋，表示自己活不下去了，要在总理面前自杀。张绍曾好不容易把蒋雁行打发掉，参谋长张怀芝（皖系军阀投靠曹锟）又来大闹一番。

好吧，张绍曾崩溃了，拔枪要自杀，幸好被拦下来。

黎元洪看到电报稿之后，非常生气：“简直是政治娼妓！”气还没消，讨薪大部队抵达总统府，嚷着要见总统。秘书长金永炎试图阻止，被推开。黎元洪好不容易把大老粗打发走，非常疲惫。他知道曹锟等不及了，决定不合作，要把总统府迁到天津，结果半路上被王承斌拦下，遭受一番屈辱，拔枪自杀，幸好被拦下来。

这就是曹锟的办法，一番讨薪风暴，吹翻了内阁，吹走了黎元洪。大总统的位置空了。

本钱

前面说过，曹锟虽然粗俗，但并不粗野。能用钱解决问题，绝不用枪。

大总统代表国家元首，需要国会议员合法程序选举。既然能选举，可以用选票解决问题，就不必用枪。模板是现成的，当初袁世凯当选大总统，搞帝制操控投票，曹锟都是其中一份子。曹锟虽然一直在带兵，但有样学样的本事还是一流的。

在别人看来，议员代表全天下的利益，为天下老百姓谋福利。在曹锟眼中，议员就是一张选票，每张选票都有一个价钱。为拉拢议长吴景濂，曹锟咬咬牙，狠砸四十万（比当初袁世凯砸梁启超还多一倍）。为拉拢议员，曹锟本着买卖公平的原则，给议员们每人每月多发两百块津贴，对重要人物，每月多发五百。

议员有五六百人，仅此一项，每月要十几万。这些钱对曹锟而言

是九牛一毛，但曹锟是出了名的守财奴，如此出血已经算大度了。但出血的结果却是骂声一片，因为曹锟在驱赶黎元洪时破坏了游戏规则。与此同时，孙中山和张作霖合作，在南方高价收买议员，搞破坏，议员纷纷离京。曹锟急了，给北京军警下令，不准议员离京。如此一来，离京的议员更多了。曹锟很纳闷，俺老曹待他们不薄啊。

代总理高凌霨告诉曹锟，其实也不难，只要给更多钱就行。

曹锟咬咬牙：“妈个巴子，跟老子作对，给更多的钱！”

当然给钱也不是办法，关键要赶紧坐上总统宝座。吴景濂告诉曹锟：“当总统最大难题是经费问题。按照规则，总统选举至少要五百八十三人投票，每张选票五千，就要将近三百万。加上出席费、车马费、招待费等等各种应酬和筹备，加在一起需要千万以上。”

曹锟倒吸一口冷气，看着大家。钱怎么弄，怎么弄？

吴景濂吞吞吐吐地建议曹锟预先“垫资”，曹锟的脸变得比猪肝还难看。干儿子李彦青说出了一席足以让人笑出早饭的话：“老帅功勋盖世、德高望重，做大总统理所当然，这些钱理当国家支付，哪有自己掏腰包的道理！”足以竞争世纪最佳笑话奖。

实事求是地讲，曹锟拿出一千万不成问题。当时曹锟有二十五个师，每个月喝兵血就有五十万。他名下还有各种公司，从纺织厂、饼干厂、到珠宝古玩店，好几十家，油水很足。问题是曹锟舍不得。冷场之际，有人给出方向，王承斌有办法。

王承斌前身是清末宗社党成员，一直不被信任，曹锟给了他机会。王承斌和吴佩孚不和，被吴佩孚打压，恨吴佩孚，怂恿曹锟当总统。

和曹锟那几位无能的兄弟干儿子不同，王承斌是曹锟身边最精明能干的角色之一，除了吴佩孚和冯玉祥，就数他了。黎元洪带着总统印信出走，王承斌带人拦截列车，把黎元洪羞辱一顿，截下总统印。黎元洪说历史会记住他，他幽默地回应，百年后再说。

见了曹锟，王承斌赶紧端正态度，上前请安。曹锟则堆满笑脸，让烟让茶，夸王承斌能干。王承斌很快冷静下来，肯定有难啃的骨头。

曹锟笑着对王承斌说：“听说你想为大选筹款？”

王承斌正等着这句话，马上把准备好的马屁奉上：“卑职见老师迟迟不能登上大位，心里急，想为老师分忧，报答老师知遇之恩。”

曹锟表示很感动，但也很疑惑。毕竟一千多万，天文数字。内阁总理都没办法。

接下来王承斌得意洋洋地说出一番话，把曹锟高兴得手舞足蹈。王承斌告诉曹锟，他有黑白两条策略可以筹足选举经费。

策略之一：把大名、顺德、广平一带和毒品有关的相关人等抓起来，组织特别法庭审问。先把油水不大的“小鱼”枪毙几个，立威。再按照油水多少，责令他们缴纳赎金，几千、几万、几十万不等。抓两三百人，五六百万到手。这叫“捉财神”，既得利益，又得民心。

——看来贩毒也不容易啊。

策略之二：把直隶境内一百七十县，分成大、中、小、三个档次，每县分摊几万。责令按期付款，过期罢官。这叫“借军饷”。

——就是搜刮百姓。

如此一来，竞选费用搞定。王承斌，够狠。

价格

本钱筹足，剩下就是买卖了。

买卖双方：当时最具实力的大军阀曹锟和代表全国百姓利益的议员们。

买卖标的：国家元首之位置。

自古以来，买卖别的没关系，买卖官爵是要挨骂的。买卖村长，要被全村骂。买卖县长，要被全县骂。买卖国家元首，就要等着被各行各业骂。

对于曹锟掀起的买卖，各界也不含糊，该骂就骂。

对于各界的骂声，曹锟很恼火，也不计较，买卖照做。随着曹锟出价越来越高，之前离京的议员纷纷回京，试着和曹锟做买卖。

吴景濂告诉议员们，以后每人出席一次会议两百块；即日起每位议员的津贴、车马费加在一起，每月六百；参与大选投票，每人五千；大选之后另有酬谢。凭良心讲，这是很高的价格了，要知道那时候的基层公务员每月也才几块钱。十年以后，北大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每月才八块钱。但吴景濂的声音很快被淹没了。

按照普通人的想法，如此赤裸裸地买卖国家元首的位置，应该被正义之声淹没才是。握有选票的议员们，理论上恰好是正义之声的代表。然而议员声音如下：

先付款还是先选举？

如果先选举，你们会不会赖账？

如果先选举，能不能先付一部分定金？

你们哪来那么多钱？能不能由外国银行支付？

每个议员价码是不是同等？

曹锟玩妓女都舍得花十万，难倒我们堂堂大议员还不如妓女值钱？

如此这般，把吴景濂问得晕头转向，疲于招架。议员们宣称，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抵制大选。吴景濂慌了神，赶紧研究对策。曹锟得知情况后，眉头一皱，关门，上王承斌。

王承斌告诉议员们：大家入场时，支票和选票按人头同时发放，不存在先付钱还是后付钱的问题。至于能不能付得起帐？王承斌把银行底单带着，当场验证。至于会不会赖账？王承斌告诉大家，曹锟当选大总统之后，还需要抬轿子的，无需担心。

——成交！

交易

一九二三年十月五号，大总统选举。众议院墙外，似曾相识的一幕又出现了，军警林立，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王怀庆亲临现场指挥，凡是入场议员，均要验明正身。

上午八点，议长吴景濂准时出现在众议院。但是众议院的议员们只有稀拉拉一部分，远远达不到法定选举人数。议员们在消极抵抗，

内心在挣扎。毕竟他们都曾饱读诗书，都曾热血澎湃过，都曾豪情满怀地想为天下做些事。尽管要和魔鬼做交易，尽管傲骨已经被乱世打断，但终究还是有过傲骨，还有残存的良知。

吴景濂立刻干了两件事：第一，宣布到会议员不得退出（当然也没法出去），直到开完会为止。第二，赶紧通知王承斌，让他想办法。

王承斌的办法如下：挑选可靠议员和军警一起去拉同乡好友，每人至少拉一人回来，如同传销组织那般。当然待遇比传销好多了，拉一人，辛苦费五百块。同时宣布，只要进场投票，就有五千块，因为选票可以暗箱操作。

上百辆汽车同时出动，折腾到下午一点钟，拉了五百九十三人，开会。

过程很快结束，曹锟得四百八十票，当选。

这就是曹锟的买卖。

从买卖本身看，公平公正公开，合理合法，童叟无欺。曹锟甚至还吃亏了，因为有一百多人收了他的钱，没有投他的票。曹锟也没追究。还有人收了钱，如辜鸿铭，直接离京躲了起来。曹锟手下前往质问，辜鸿铭也不说话，抡起拐杖就打。曹锟也没办法。

从正义的角度看，这一幕非常荒谬。因为那买卖不仅仅关系到曹锟和五百九十三名议员，还关系到神州大地上每一个国人。四亿国人，就这样被愚弄了。

可悲么？确实！但是放在历史周期律第三或第四个层次看，也正常。

历史和人一样，有阴暗面也有阳光面。

中国历史很长，写满各种各样的往事，其中不缺杀戮流血、不缺薄情寡义、不缺寡廉鲜耻、不缺阴谋诡计、不缺战败的耻辱，但是公然买卖国家元首的事，只发生过一次。

中国历史上不缺奸细、卖国者，但都是个人的事。买卖国家元首的位置，相当于买卖国家的灵魂，罪不容诛。

曹锟入驻大总统府邸之后，比起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没有强势的内阁总理制约他。但他基本上没过一天好日子，外界的骂声从没停止。

曹锟没有处理政事的经验，面对大堆的公文，脑袋顿时变成膨胀的气球。他也没有自己的政治团队，身边的兄弟干儿子们基本打着灯笼找不到亮点，贪污受贿敛财倒是好手，干正事不会。要说曹锟没干正事，那也冤枉。曹锟在保定办了一所综合性大学——河北大学，自任董事长。曹锟实践了一个非常先进的教育理念：教授治校。他从不干涉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用人秩序，对教授们毕恭毕敬以师礼相待，发给教授的工资超过手下的师长、旅长。但这些细节不足以弥补曹锟对国家权力之正义性的破坏。

为反对曹锟，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结成三角联盟。

尤其是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对关内虎视眈眈，终于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八号，曹锟当选大总统一年又二十天，直奉双方大军在战场犬牙交错之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囚

禁他的人正是帮他阻截黎元洪夺总统印、筹钱收买议员的王承斌。何其讽刺？！

王承斌带来冯玉祥的命令：“限曹锟二十四小时内宣布辞职，交出总统印信，迁出新华宫，否则后果自负。”读完之后就让他准备辞职电报。

曹锟抚摸着总统印信。几十年的奋斗追求、万贯家财转眼打了水漂。想到伤心处，哭了起来。但没有人会在乎他的泪水。

评，曹锟并非罪大恶极之人，却比罪大恶极之人更可恶。他破坏了国家权力的正义性。

正义是一个很空洞的东西，但确实是存在的。在哪里？人心中。

没有人能在破坏国家权力属性之后全身而退。如果曹锟不完蛋，那么好吧，中华民族将完蛋。中华民族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却扛过所有灾难，永不会完蛋。

结语

看看袁世凯死后的民国四位大总统，黎元洪毁了国家权力的权威性，冯国璋毁了国家权力的武力基础，徐世昌毁了国家权力的法理性，曹锟毁了国家权力的正义性。国家权力的四根支柱完全毁掉，任何政权都要垮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民国“大”总统已经说完，那么权力构架是否说完了？答，没有。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集权国家，民国因为孙中山和袁世凯各怀

心思，变成双核，大总统和内阁总理。大总统名义上是国家元首，内阁总理掌握实权，所以每个大总统都要和内阁总理争权夺利。如果说大总统更换得勤，那么内阁总理换得更勤。

因为四个人都和一个人连在一起，四层国家权力属性的毁灭都和一个人连在一起。

他就是段祺瑞。

黎元洪毁掉国家权力的权威性，是因为和段祺瑞争权，引起府院之争。

冯国璋毁掉国家权力的基础力量，是因为继续府院之争。

徐世昌毁掉国家权力的法理性，是因为不想做段祺瑞的玩偶。

曹锟之所以能当大总统，是因为段祺瑞战败。曹锟之所以可以胡作非为，是因为没有一个像段祺瑞那般强势的内阁总理约束他。曹锟失败之后，各方面又把段祺瑞抬出来收拾残局。

段祺瑞，袁世凯之后，北洋系统内部影响力最大的人。只有把段祺瑞和内阁总理的事补充完整，才能完整诠释那个时代。

如何评价段祺瑞呢？段祺瑞败在吴佩孚手上，但段祺瑞死的时候，吴佩孚送上挽联：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本人认为，吴佩孚的挽联恰到好处。

第三篇 总理和怨妇

序

既然民国实行双核，既然处于核心的大总统是玩偶，那么处于另一个核心的内阁总理如何呢？先不要急着下结论。

辛亥暴动之后，南北和谈，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关系很好。甲午战争之前，袁世凯为逃脱失败的耻辱在战前跑回国内，朝鲜的烂摊子就托付给了唐绍仪。与此同时，唐绍仪和孙中山关系也不错。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理论上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然而很快，唐绍仪便干不下去了，带着一肚子怨气辞职。

袁世凯又任命陆徵祥为总理。陆徵祥是外交家，一介书生、性格温顺、举止得体，超然各派系之外。然而很遗憾，风度翩翩的陆总理到国会竟然没有准备发言稿。讲话信马由缰，却不提施政方针。更离奇的是，连内阁成员名单都讲不清。议员一片哗然，陆总理狼狈不堪，赶紧辞职不干，重操外交本行去也。

民国第三任内阁总理为赵秉均。他原本是袁世凯心腹，近代警察的创始人，也能办事。刚刚上任不久，宋教仁被刺杀，矛头指向赵秉均。为了平息矛盾，赵秉均只好辞职。两年后死得不明不白，和宋教仁案一样扑朔迷离。

之后是名士熊希龄组阁。他只干了一件事：在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文件上签字。

随后外交总长孙宝琦代理了一段时间，辞职。

随后内阁总理改为国务卿。徐世昌担任国务卿，一看苗头不对，赶紧辞职到一边去。袁世凯又把陆徵祥喊回来代理国务卿。之后不久，袁世凯死。

袁世凯时代，总理走马灯似地换，前后六人，平均每人在位半年。如果说袁世凯太强势能折腾，那么好吧，袁世凯死后，大总统沦为玩偶，内阁总理又如何呢？答曰更换频率更快，每任期限不到半年。怎么回事？

看看内阁总理们，他们来自不同行业，性格不同，办事方式不同。

唯一相同之处便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每个人都在内阁总理的位置上遭受屈辱，带着一肚子怨气走人。

曹锟依靠吴佩孚战胜段祺瑞之后，靳云鹏担任内阁总理。他的工作就是讨好张作霖和曹锟。所有工作都是谈军费问题，给曹锟多少军费、张作霖多少军费。尽管如此，也常常摆不平。某次曹锟弟弟、精于吃喝嫖赌抽的直隶省长曹锐抱怨军费分配不公平，点名批评内阁。

靳云鹏好歹军阀出身，看见曹锐的熊样就来火，说：“各省截留国税，一味索要军饷，这家没法当。谁不高兴，来试试当家人的酸甜苦辣。”

曹锐倚仗曹锟，看不起靳云鹏，沉下脸说：“靳云鹏，我只是提军费分配不公，管你什么困难。不困难要你总理干什么？”看这态度，

够嚣张。

靳云鹏来气：“我总理怎么？还不想当呢！”

曹锐跳起来嚷嚷：“那就滚蛋！”

靳云鹏回击：“你才滚蛋！”

曹锐爆发：“呸，你根本不配当总理！”抄起杯子就往靳云鹏脑袋上扔。幸好靳云鹏在战场上锻炼过，躲过迎面而来的袭击物。但杯子的碎片和水到处都是，弄得在场军阀狼狈不堪。眼看两个老家伙要肉搏，军阀王占元赶紧把他们拉开。会议不欢而散。这就是当时总理的待遇。

黎元洪复职之后，半年就更换了四位内阁总理。第一任内阁总理组阁不到两个月，就被曹锟轰走了。黎元洪没办法，又把老资格的唐绍仪请了出来，结果仅仅一个月就被迫下台。怎么办呢？当时大名人胡适有个奇特的理论：中国之所以落后腐败，是因为好人不掌权。如果好人掌权，一切会变好。大总统黎元洪已经是老好人了，又把老好人王宠惠拉出来当总理，各部长都是无党派的“好人”，结果啥事都办不了。

这是内阁总理么？分明就是受气的小媳妇。确切地说，是怨妇。

所有二十多位内阁总理，只有段祺瑞一人说话有用。但段祺瑞也是怨妇。

要理解段祺瑞，必须首先理解那个时代。要理解内阁总理和怨妇之间的关系，要把目光放远点，放到中国之外。要理解那个时代，必须首先理解日本的崛起。要理解日本的崛起，必须回顾历史周期律最

后一个层次，核心物力转移律。因为近代中国的历史并不全是中国人的历史，因为中国人只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承受者，而非主宰者。

一章 特殊的战争

被遗忘的思潮：人种论

按照历史周期律第四层之核心物力转移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哪个民族占得先机，就会繁荣兴旺，高端大气上档次；哪个国家占得先机，就会处于食物链顶端，肆意掠夺，对别的国家指手画脚。

英国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文明传承，借助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风潮，第一个进入工业世界，大不列颠岛变成大英帝国。从英伦三岛吹出的工业风暴，首先改变了西欧，再改变东欧和北美。

于是他们共同瓜分世界：非洲、美洲大陆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南亚次大陆被轻松征服。横跨欧亚大陆、曾经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蚕食殆尽。自称中央之国的大清帝国被揍得满头疙瘩。如此背景下，人种优越论——白种人至上——之风潮弥漫全球。

十九世纪后半期，遭遇挫折的华夏文明圈决定改变，日本开始搞明治维新，清帝国开始搞洋务运动。因为一些因素（详情参见前文），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了清帝国，改变了千年以来的亚洲格局，成为

亚洲话语权的主导者。按照既定的大陆政策，日本得到朝鲜半岛之后，下一步便是东北。当时日本侵略东北的阻力不是破败不堪的大清帝国，而是北方的沙俄。

信奉东正教的沙俄帝国是东方的西方国家、西方的东方国家，它本质上和欧亚大陆传统帝国一样，好比一头以吞噬土地为生的怪兽，向西受阻，转而向东扩展。清帝国稳定之时，沙俄没办法。清帝国衰落，亚历山大二世凭借俄国人特有的阴险和狡诈得到黑龙江入海口。但俄国人并不满足，还想进而吞噬东北，甚至长城以南。所以甲午战争之后，新上任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赶紧邀请德国和法国干涉，逼迫日本吐出辽东半岛。

沙俄帝国的狼子野心不输日本，转身邀请李鸿章访俄，威逼利诱他卖国，最终签订一纸《中俄密约》。条约规定两国共同防御日本，沙俄在东北获得种种便利。墨迹未干，沙俄便凶相毕露：在陆地上修建中东铁路和支线；太平洋舰队闯入旅顺，强租旅顺和大连，得到梦寐以求的不冻港。如此贪婪，比日本过犹不及。

更过分的是，沙俄趁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大规模向东北调兵遣将，占领沈阳、锦州、铁岭等战略要地，妄图独霸东北。

沙俄胃口太大，不仅和日本利益直接冲突，而且惹恼了英美，被迫答应撤军。但磨磨蹭蹭、磨磨唧唧，老撤不完，明摆着耍赖。俄国人的意图很明显，拖时间，等铁路修完，再教训日本。日本看到久拖之下于己不利，果断和沙俄断交。

日俄战争一触即发。

日本为什么要和俄国打这一仗？很多材料解释说为了利益：日本需要拿下东北做基地，再向南图谋整个神州大陆。又有很多材料说，日本人性格偏爱冒险，习惯以小博大，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莫不如此。这些都是对的，但还有一个因素，经常被遗忘，但很重要：人种论。这个观点有些让人不舒服，但必须正视。

工业世界的列强满世界耍流氓，叫嚣白人优越论之时，华夏文明圈的黄种精英并不认同。他们认为，通过改革创新，白种人能做的事，黄种人也能做到。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就是这种思潮的实践。

明治维新之前，改革派的大旗是“尊王攘夷”。

——很老土的一个节目，国人几千年前的旧玩具，日本人却玩出了新花样。

第一条是华夷论：宣扬日本为“中华”，冠绝世界各国。之前日本学者称中国为（中）华，日本为（东）夷。现在要颠倒过来：“夫中国（指日本）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理，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绵。”日本为（中）华，其他地方为（西）夷。

——论据，中国皇帝经常更换，日本天皇没换过。至于天皇当了那么多年花瓶摆设的事，那就不提了，选择性失明，没看见。皮厚到如此地步，服。

第二条为大义论：中国的主体是儒家，日本也一样。儒家主张君无德，有德者就可代天放伐并放逐暴君。并且引用《易经》原话“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由于天皇从来没有变过，所以德行很高，可以去讨伐别人。

——不得不再次佩服日本人牵强附会的本领：能把儒家学说和日后的军国主义扯上关系。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精英认为，战争的终极较量是人种战争，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最终会有一场大决战，传统的中国已经被蒙古和满清灭掉了，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日本人将代替黄种人和白种人决战。

但日本本土狭窄，资源很少，必须征服华夏大地，方可与列强一战。日后日本侵华战争，提倡大东亚共荣圈，都是出于这个思想。

日本这个计划分成两步，亲华和侵华。

当日本势力不足，那就亲华，提倡中日亲善，同文同种；实力够了，那就挥舞屠刀，割走一块。甲午年，日本的实力够拿下朝鲜半岛，毫不犹豫开战，并且在旅顺屠城。一九三一年，实力够了，发动九一八事变，割占东北。一九三七年，实力够了，侵吞华北。

一九零零年，实力不够，八国联军中的日军表现得很文明，赢得国人好感。鉴于沙俄贪得无厌，清政府开始亲日，派遣大批留学生去日本。留学生们大部分成了革命者（同盟会成员），少部分在辛亥暴动之后成为革命者，如黎元洪。日俄战争期间，国人偏向日本。清政府虽然宣布中立，却暗中帮助日本，赶走沙俄。吴佩孚和张作霖都在日俄战争中给日军当过间谍。

日俄战争

战争双方：日本和沙俄。

日本的优势之一：毕其功于一役，无后顾之忧。

优势之二：英美支援。当时英俄还是死对头，英国正想方设法从海上封堵俄国，支持日本在远东和俄国死磕。美国想插手东北的事，跟英国一起支持日本。

优势之三：享受半主场优势。

沙俄的优势：体积大，资源、兵员占优势，理论上绝对力量更强。劣势很明显：力量大部分在欧洲，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贯通，在远东运输能力有限。海上霸主英帝国偏向日本。

战争形态：陆战和海战。陆战焦点：争夺旅顺。海战焦点：对马海大战。

一八七七年，萨摩藩武士忍受不了大久保的无情，发生叛乱。战败后西乡隆盛死去，战后大久保被刺杀，日本陆军和海军玩内斗，分别沿着两条平行线前进。

陆军落在长州藩巨头、高杉晋作和伊藤博文的同学山县有朋（有日本陆军之父之称）手上，一直以德国陆军为榜样，战力越来越强。海军落在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手上，一直以英国海军为榜样，日渐壮大。

山县有朋重用长州藩老乡木乃希典。此人号称日本陆军军神，冷酷无情，嗜杀成性，标准的军国主义者。甲午战争中，陆军表现最出色而残忍的就是木乃西典的队伍，迅速登陆，攻克旅顺要塞，屠城。

西乡从道重用老乡山本权兵卫。海军作战计划出自山本权兵卫，

击溃北洋舰队。他提拔了东乡平八郎，收养了山本五十六，影响力贯穿日本海军始末。

他们是日军精英中的精英，沉默寡言，机智深沉。日俄战争，他们再次成为主角。

战争以典型的日本方式展开：一九零四年二月八号夜，山本权兵卫的得意干将东乡平八郎的舰队向旅顺境内的沙俄太平洋舰队开火，不宣而战！那情形相当于十年之前甲午战争开幕式的翻版和三十七年后太平洋战争开幕式的彩排。当时沙俄军官正在旅顺城内举行宴会，拍舰队司令夫人的马屁。炮声响起，舰队司令部得到的答案是下面正在进行实弹射击。第二天看见军港内的废铁，俄国人才明白日本开战了，恼怒程度和三十七年之后的美国人一样。

随后日军在木乃西典的指挥下登陆辽东半岛，进攻旅顺。满清时代，旅顺号称东亚第一要塞，结果甲午战争中被木乃西典快速攻破。十年之后，旅顺成为俄国在远东的据点。此时木乃西典想重复十年前的荣光，指挥优势兵力进攻旅顺。拿下旅顺，拿下沙俄在东方的战略核心，就能从岸上打击太平洋舰队，重演甲午战争歼灭北洋舰队的辉煌。甲午战争中，日军因为攻克旅顺，海陆两路夹击歼灭了残存的北洋舰队。然而进攻不顺，日军伤亡惨重。但在此后的拉锯战中，日军的补给优势展示出来，俄军则越来越混乱。但俄军的战斗力远非甲午年的淮军可比，日军没能在陆地上取得决定性优势，双方还是要在海面决定胜负。

决定性一战发生在对马海峡（朝鲜海峡一部）。沙俄眼见日本战力

凶猛，从欧洲抽调波罗的海舰队前来支援。然而舰队从欧洲到亚洲绕了一大圈，孤军远行，万里（三万公里）迢迢。按照国际法，交战国舰队不得在中立国补充物资。沿途都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补给困难。俄罗斯舰队如同瞎子走进大森林，草木皆兵，看见船只就开火。

一九零四年十月份舰队启程，直到一九零五年三月份才到新加坡。舰队司令大病一场，要辞职（未准），副司令生命垂危，官兵已经到了极限，时不时有人自杀，时不时有兵暴，战斗力大减。一九零五年五月份，沙俄太平洋舰队和黑海舰队汇合，驶向海参崴。途中要经过对马海峡，东乡平八郎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东乡平八郎生于一八四八年，萨摩藩鹿儿岛人，自幼研武修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均有涉猎，为明治维新时代推崇经世致用的典型人物，一生崇拜倡导“知行合一”的明代大哲学家王守仁。

明治维新大幕拉开之际，东乡平八郎尚且年轻，没能参与其中。他进入军队时，倒幕运动已经结束。好在他加入的是海军，避开了内战，并且在战争中站队正确。战后陆军落入长州藩手中，天皇为搞平衡，在萨摩藩中重点发展海军。东乡平八郎很快崭露头角，得到山本权兵卫的赏识、提拔，并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色，逐渐成长为日本海军的栋梁。日俄战争爆发，东乡平八郎指挥日本舰队狩猎俄国舰队。

五月二十七号，日本舰队发现并咬住俄国舰队。日军气势高昂，如同猎人。俄军士气低落，是猎物。下午一点半，猎人和猎物接近。东乡平八郎告诉日军将士：“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各员一层奋励努力。”并指挥日舰抢占有利位置。

两点十一分，海战开始。战争过程如同大东沟海战的翻版。在东乡平八郎的娴熟指挥下，日军在转移穿插中利用速度和火炮射速的优势牢牢掌控主动权。日军集中火力对付俄军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几分钟之后便把它打坏。俄军失控，如同甲午战争“定远号”起火后的北洋舰队。接下来的故事很简单，就是日军击沉俄国军舰，再次击沉俄国军舰，再次击沉俄国军舰。俄舰溃逃，日舰追击，把它们击沉或解除武装。

沙俄舰队的下场和十年前的北洋舰队一样，基本全军覆没。东乡平八郎成为第一个指挥亚洲舰队战胜欧洲舰队的亚洲人，第一个指挥黄种人舰队战胜白种人舰队的黄种人，日本海军由此跨入列强行列。

东乡平八郎一战封神，成为日本海军的象征。庆功宴会上，几位美国年轻的海军向他举杯庆祝，其中一人——尼米兹——在二十年后成了日本海军的掘墓人。

但日军并没能取得甲午战争中那般彻底的胜利，因为俄军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比起腐化的清军，还是顽强很多。木乃西典最终攻下旅顺，日军却伤亡惨重。此后日俄在奉天再次举行大会战，日军依然是惨胜。木乃西典是典型的日本军人。明治天皇死时，木乃西典一直为他守灵。天皇入土那天，木乃西典和妻子双双自杀，追随天皇到地府，上演近代版的愚忠戏码。于是木乃西典成为军国主义忠君之典范，有了自己的神社和雕像。

沙俄向远东增援困难。日本因为力量限制，难以把俄国势力赶出远东。双方举行谈判。日本取代俄国在东北的利益，俄国人退到库页

岛以北。

真正受损失的是中国人。因为战争的目的，就是争夺东北黑土地。人类历史起起伏伏，在历史周期律之中交叉上演的各种节目都是以土地为基础。这个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有三块：一块在北美密西西比河流域，另一块在东欧乌克兰平原上，第三块就在黑龙江流域。那是地球的粮仓，人类至宝，也是豺狼虎豹争夺的对象。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根据中国人的描述：“自旅顺迤北，直至边墙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大都因粮于民。菽黍高粱，均被芟割，以作马料。纵横千里，几同赤地。”根据日本人的描述：“（东北人）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一位留日青年被日俄战争刺激，决定弃医从文，用笔代替手术刀，拯救国人之灵魂。他就是鲁迅先生。

日本的胜利，意味着亚洲人也可以战胜欧洲人，黄种人也可以战胜白种人。国人从中看到了希望，试图学习日本强大之经验。

由于日本力量不足以甩开列强、撕裂中国，暂时隐藏大陆政策。

所谓大陆政策，就是征服东亚，主要是征服中国。所谓征服中国，分两步走：亲华和侵华。

实力不够，亲华，拉关系，找代理人。

实力够了，侵华，撕破脸。

先推行具备迷惑性的“亲华”政策，分别寻找段祺瑞和张作霖为

代理人。中日进入相对友好时期，其实还是狼与羊的故事。

狼与羊

经过战争洗礼、跻身列强的日本更为坚决地推行大陆政策。日本上下形成一股社会习俗：男子长大从军或入军校，女子做护士或报务员。总而言之：当兵光荣。所谓中日友好不过是暂时的，日本只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而已，如同一匹披着羊皮的狼。

中日友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朝廷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试图以日本为师。革命党跑到日本，吸收了那些留学生。日本则两面通吃，一边跟朝廷友好，一边帮助孙中山搞革命。孙中山每次武装起义，都会动摇一点朝廷的根基。

终于在辛亥年，朝廷倒塌。日本还在隐忍。因为列强还在。

日本的耐心在三年之后收到回报：欧战爆发，英法俄被德国拖在欧洲战场，只有美国人有心思在东方转悠。但那时的美国在亚洲实力有限，不足以单方面制衡日本。恰好袁世凯想趁机搞帝制，日本不失时机地送上《二十一条》，同时又和孙中山签订了《中日盟约》。

袁世凯没法，咬牙忍了。没想到搞帝制不成，郁郁而终，临死还不忘说“为日本去一大敌”。袁世凯死后，日本看上段祺瑞。

段祺瑞也想利用日本人实现自己的目的。

北洋巨头都经历过甲午战争，都吃过日本人的苦头。

大东沟海战之时，黎元洪在广甲舰上，很英雄地投水自杀，未遂，

成了战败的狗熊。

冯国璋跟随聂士成参战，受叶志超连累，灰头土脸回国。

曹锟虽然上演英雄救美的戏码，战败之后，连滚带爬回国。

最惨的是王士珍，直接跟随叶志超那样猪一样的上司，连展示血性的机会都没有，窝囊就不用说了。日后他清心寡欲，完全没了棱角，号称北洋之龙，却只想安稳过日子。

看到了吧，所谓北洋军阀，其实就是一帮甲午战争的失败者。当然一次失败没有什么可怕。比方说英国在敦刻尔克撤退，为日后反击保留火种。比方说麦克阿瑟丧家犬一样从菲律宾逃走，最后到东京当太上皇，都是很励志的。北洋巨头不同，甲午战争在他们心中都留下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楚，对日本有愤慨，又有敬畏。几位当上大总统之后，有意无意之中，都在小心翼翼地回避日本，既不冲突，也不合作，敬而远之。他们和段祺瑞冲突的基本理由之一：段祺瑞和日本人合作，卖国求荣。

段祺瑞没有直接参与甲午战争，没有亲身体会溃败的痛楚，他和袁世凯一样，站在相对局外的立场目睹了战争。处于类似地位的还有张作霖（那时候张作霖只是士兵）。事实上整个北洋时代，只有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三人试图利用日本。

袁世凯试图利用日本实现帝制。段祺瑞想借助日本支援，武力统一全国。张作霖试图利用日本支持逐鹿中原。日后接受日本《二十一条》成了袁世凯卖国的证据。日后向日本贷款打内战，成了段祺瑞被骂的证据。张作霖也险些被郭松龄用类似的理由掀翻。

有趣的是，当初段祺瑞坚决反对《二十一条》。

那么段祺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答曰，一个特殊的人。

二章 特殊的段祺瑞

段祺瑞整天板着一张脸，喜欢训人，如同一个过时的老学究，看起来让人厌烦。

段祺瑞经常生气，鼻子能气歪，脸色会根据气愤程度变成猪肝或生铁等不同颜色。尽管很有特色，却不是让人喜欢的特色。

段祺瑞不如黎元洪善于当好人，不如冯国璋心眼多，不如徐世昌有学问，不如曹锟善于吃喝玩乐。但却比他们更有魅力，更受尊重，掌权时间更久，更有希望干一番事业。

乱世巨头们，之所以被称为巨头，有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掌大权。

掌权的巨头们也有分别，除了出身、长相、个性不同之外，还要看是以权谋国还是以权谋私。尽管以权谋国未必成功，是否以权谋私则看得出来。

贪财好色如命的曹锟就不用说了，大老粗一个，开了几十家公司，家产几千万。他身边个个是贪污受贿投机钻营的好手。干儿子李彦青澡堂搓背出身，跟着曹锟，除了搓背之外，就是负责帮曹锟找女人。曹锟用十万元嫖妓，就是李彦青的杰作。曹锟打败段祺瑞之后，精于吃喝嫖赌抽的曹锐都能当直隶省长，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典范。

至于谋国，曹锟闲来无事也会想想，但要等到酒足饭饱大烟抽够，把自家女人哄好（曹锟对女人很不错）之后。

冯国璋的眼界很不错，有自己的主见，心思机敏，可惜也是个财迷。当初为了敛财，竟然涉足烟土生意，和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黎元洪虽然善于当好人，名声也不错，但并不意味着不谋私。当初他在宴席上感叹大总统不是人干的，每月贴钱。在场的冯玉祥则说，大总统旅长出身，哪里来那么多钱？虽然很煞风景，却是实话。黎元洪上升途中，投资了不少实业，赚了不少钱。蒋介石带领北伐军打到山东，要没收黎元洪的中兴煤矿。黎元洪找人疏通，蒋介石大手一挥，向中兴煤矿摊派了一百万债券当军饷，相当于间接敲竹杠。

段祺瑞掌权比他们任何一个都长，一辈子没有房产。袁世凯回河南养病之前，赠送了一栋房子给段祺瑞。那房子是袁世凯和房主打牌赢的，但房主没给房契。袁世凯死后，房主的儿子拿房契找段祺瑞要房。段祺瑞二话没说，搬家走人，继续租房。以段祺瑞的实力，有很多种办法不还房子。如果段祺瑞想要房子，很多人愿意送给他。段祺瑞晚年生活潦倒，是蒋介石给的生活费，和另外几位对比鲜明啊。

按照段祺瑞的地位，给他送礼的人要排长队，但他不收礼。当然也有例外，最亲近的下属和友人送来礼物，他会挑选一两样不值钱的留下，其余退还。据说只有一次例外，冯玉祥送来一个大南瓜，段祺瑞全部收下。对比冯国璋用行贿受贿拉关系的方式带出直系，段祺瑞用不收礼的方式拉出皖系，确实不简单。

不仅如此，段祺瑞对家人管理很严格，他的姨太太想替亲戚谋差

事，把他鼻子给气歪了。他的儿子段宏业在亲戚家长大，有人要在政府部门给他安排职位，段祺瑞不答应。胞弟要求安排职位，段祺瑞一口回绝，给点钱让其回家做点买卖。北洋巨头中，唯独段家平平静静，没有因为段祺瑞掌权而鸡犬升天。对比曹锟，天上地下。

为官角度看，段祺瑞堪称楷模。从晚清到民国，段祺瑞算是异类。

如果评价官品，近代史上的大人物中，段祺瑞可谓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可以和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相比。

个人品德方面，段祺瑞不抽烟、不喝酒、不嫖娼、不赌博、不贪污、不算卦，人称“六不”总理。唯一的个人爱好是下围棋。但人品很好的段祺瑞，治家却很失败。他痛恨抽大烟，他的姨太太却背着 he 抽大烟。在他下台到外地疗养之际，北京的姨太太们却打扮得花枝招展去看电影、听戏、划船、逛市场到深更半夜，四处招蜂引蝶。段祺瑞发现情况之后，索性把三姨太和四姨太休掉。他不肯给段宏业谋职位，段宏业却到处吃喝嫖赌抽，时不时娶妓女当姨太太，混得“民国四大公子”的头衔，把段祺瑞的老脸丢光。

正如人品很好的段祺瑞治家失败一样，官品很好的段祺瑞治国同样不理想。如何不理想的？那就仔细看看吧。

执着之人

段祺瑞，合肥人，生于一八六五年，比袁世凯小六岁，比孙中山大一岁。那一年，太平天国刚刚灭亡，曾国藩决定解散湘军；江淮地

区的捻军还在折腾，李鸿章的淮军在镇压捻军之中迅速成长壮大。段祺瑞的爷爷是淮军中的一个中级军官，随军奔波，生活有保障；他的爸爸在家种地，老农民一个。段祺瑞从小跟着爷爷在军营中念书学习，同时接触各位嗓门粗大、作风粗俗的叔叔大爷们。他从小就很坚强。

天有不测风云，段祺瑞爷爷死了，段家衰落。段祺瑞不仅念书难，吃口红烧肉都难。但军营生活磨练了段祺瑞的意志，他没有消沉，反而奋起。正如袁世凯落魄时试图从军改变命运一样，段祺瑞也想像爷爷那样从军改变命运。那年头军队是半私人性质，想当兵，需要投奔某人。段祺瑞有位族叔叫段从德，在山东当小军官。段祺瑞打算投奔他，干一番事业。

一八八二年，十七岁的段祺瑞口袋里揣着一块银元，从合肥徒步去山东投军。那年头并不太平，到处大王旗。那年头交通不便，没有导航，一切靠打听，两千多里的路程，足够很多人命丧黄泉。一个小孩子怀揣一块大洋出去，相当有种。段祺瑞步行两个多月，大洋用完就乞讨，一路风餐露宿，形同乞丐，好几次差点饿死在路边。

此次远行相当于个人小长征，对段祺瑞影响极大，可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段祺瑞，执着之人。

世界就是这样，会给每个人设置各种坎，迈过去的人都成了所谓的成功者。

段祺瑞找到段从德，仅仅成了一名军人，可以吃饱饭，可以舞刀

弄棒，有了安身立命之地。他从小就爱这些，现在更加珍惜。离开军营，他什么也不是，可能要继续当乞丐。所以他刻苦训练，努力读书，样样出色。

段从德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两年之后，天津武备学堂开幕，段从德找关系帮段祺瑞弄到一个报考资格。段祺瑞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入学。那一年他二十岁，素质过人，个性好强，为人骄傲，眼高于顶，得罪人的事没少干。

在那里，他遇见王士珍、冯国璋、曹锟、倪嗣冲、张敬尧等未来的朋友或敌人。因为心高气傲，和同学们相处得并不好，把老油条曹锟气得拿起大拳头要揍他。

在那里，他成为当时最杰出的炮兵学员。

在那里，他遇见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李鸿章。

李鸿章的事就不用说了。武备学堂的学子个个视其为偶像，段祺瑞和李鸿章又是同乡，李大人在他心中的身影更为高大，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像李大人那般名扬天下。但段祺瑞进入李鸿章的视野却很晚。

一八八九年，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前夕，李鸿章前来视察。师生为了让李大人看见成绩，安排各个科目的学生进行表演。马兵、步兵、工程兵表演时还好，李大人很满意。为了让李大人更满意，炮兵表演内容要打水面移动靶。但天公不作美，风雨大作，表演难度很大。一般情况，如此天气之下，训练就取消了。但在李大人面前，谁也不敢说天气不好，不玩了这种话，只有硬着头皮上。一切凭天意吧。

第一炮不中，李大人皱眉头。

第二炮不中，李大人脸色阴沉。

接连好几炮不中，李大人扔掉望远镜，起身走人。

好几年心血，大把的银子，培养了如此一帮饭桶，李大人很受伤。

现场管带赶紧下跪：“中堂大人息怒，请再稍坐片刻，待再看一个学员打炮。”

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段祺瑞。第一炮，命中，现场欢呼。第二炮，命中，现场欢呼。接连好几炮命中，现场连续欢呼。李鸿章再次扔掉望远镜：让那小子来见我。

那年代乡土情结很浓，李鸿章的别号叫李合肥，袁世凯的别号叫袁项城。当李大人得知小段也是合肥人，心头一热。当李大人得知小段还是淮军将领的后人，心头又一热。李鸿章仿佛看到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青年才俊，一个可以继承自己衣钵之人。

那届毕业生中，段祺瑞成绩最优等。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写道：“臣亲临考验各项操法，一律娴熟，试以炮台工程做法及测绘，无不洞悉要领，因择其屡考优等生，飭令回营转相教授。学生之著者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王占元、雷震春、张怀芝、曹锟、李纯、蔡成勋。”看看这些名字，日后均为一方之霸主，段祺瑞名列第一。

其他同学都留校任教或下军营，李鸿章安排段祺瑞和另外四人去德国继续深造炮兵。当时德国陆军世界第一，日本人都在模仿。段祺瑞在德国苦学两年，境界再一次上升。两年之后，其他四人回国，李鸿章特命段祺瑞转入克虏伯炮厂实习。克虏伯家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

的军火制造商世家，生产的各种武器都是世界一流。只要有战争的地方，就有克虏伯。

李鸿章对段祺瑞的良苦用心，已经超过父亲对儿子。李鸿章一辈子对自己的几个儿子也没用如此多的心思。学成归来的段祺瑞，已经是那个时代国人中的尖子。

李鸿章看见段祺瑞，二话没说，先摸摸他的后脑勺，看看脑门后的大辫子还在不在。如果不在了，表示小段中了革命党的毒，再有才也不能用。所幸段祺瑞只顾学习，没思想革命党。李鸿章松了口气，把小段放在威海搞教育。

如果没有甲午战争，李鸿章得以善终的话，衣钵传人最有可能是段祺瑞。

段祺瑞还没来得及施展，甲午战争来了。段祺瑞没有参加甲午战争，但比任何参与之人更痛苦。因为他是一个执着之人，他心高气傲，自尊心极强。同时他的个人前途也陷入困惑期。战争之前，段祺瑞有心跟李鸿章干事业。甲午战争表明，李鸿章无法带领中国战胜日本。

放眼神州大地，还有谁能带领中国制衡日本？只有一个人曾经在十年前战胜过日本，他便是袁世凯。

段祺瑞想到了袁世凯。袁世凯也想把段祺瑞拉入麾下，发电报让他立刻到小站报到。

段祺瑞和袁世凯

接到袁世凯电报之时，段祺瑞正在老家办喜事。三十来岁的大龄青年了，讨老婆不容易，所以段祺瑞有些惆怅。深谙御人之道的袁世凯立刻又发来第二封电报：“婚姻是人生大事，办完婚事再来不迟。”而且还送上一百两银票做礼钱。段祺瑞很感动。

洞房花烛夜刚过，段祺瑞立刻去天津小站见袁世凯。那一年段祺瑞三十岁，空有一身才华，未来得及施展；袁世凯三十六岁，正准备大干一番，求贤若渴。此后袁世凯给予段祺瑞各种关怀，让段祺瑞体会到人情温暖。段祺瑞在饭店请同僚吃补婚宴，原本没敢惊动袁世凯。袁世凯不请自到，喝杯喜酒走人，临走时结了所有账单。若干年之后，段祺瑞夫人过世。袁世凯把自己的养女嫁给了段祺瑞，并且以送养女的名义送了段祺瑞一栋房子，解决了段祺瑞居无定所之困境。袁世凯的这些投资，得到超额回报。

新建陆军是中国军事进代化的开端，标志之一便是炮兵的诞生。

袁世凯委任段祺瑞为炮兵统带，也就是中国第一任炮兵司令。从那以后，北洋之虎，虎啸深山。

袁世凯腾飞的起点是小站练兵，段祺瑞腾飞的起点是炮兵管带。

之后袁世凯和段祺瑞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合作，一起改变各自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

对段祺瑞而言，袁世凯是一棵大树，可以遮风避雨；袁世凯是一条大腿，可以抱着行路。袁世凯是一个不错的领导，能力强且有魄力；袁世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善解人意。

对袁世凯而言，段祺瑞业务能力超强，是个强有力的助手；性格

果敢、做事不会畏首畏尾；有担当、明人不做暗事；有眼光、能看到时局走势。

一个人过于成功，总会树大招风。袁世凯的崛起伴随着各种危机。

因为袁世凯是汉人，朝廷是满人的。满人不想看见汉人拥兵自重，不想看见王莽或曹操出现。每到关键时刻，总是段祺瑞起到关键作用。

慈禧太后临死之前被满族权贵鼓动，要削袁世凯的兵权，北洋新军内乱成一团。袁世凯不甘心，其他人没办法。向来骄横的段祺瑞告诉袁世凯，要交出兵权，还要主动交，以消除慈禧太后的疑心。段祺瑞说出两条理由，化解了袁世凯的心病。

理由之一：北洋军是翘楚，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让满清权贵睡不着觉。袁大人已经站在风口浪尖，硬顶不交，会招来更大的麻烦，更大的风暴。主动交出去，降低慈禧太后的疑心，可以化解风暴。

——这个袁世凯懂得，其他人也懂。

理由之二：北洋军虽然交给朝廷，但北洋将士都是袁大人的兵，忠于袁大人，满清权贵搞不定北洋军。如果他们能搞定，就会自己去练兵。只要袁大人还在，北洋军还是袁大人的北洋军，只是挂在别人的名下而已。

——袁世凯笑了。随后他主动上书朝廷，说把北洋军交给陆军部管辖，躲过一劫。

满清末年，慈禧太后是唯一能压住袁世凯的人。只要她还在，袁世凯只能听话。但袁世凯一生最大的危机却在慈禧死之后。新上任的摄政王载沣想除掉袁世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一帮早已退化

的爱新觉罗家族遗少围在他周围。他们认为袁世凯是王莽、曹操那样的人物，必须除掉。他们甚至提出效仿康熙除鳌拜的方法搞掉袁世凯。

他们的看法很对。对摇摇欲坠的大清朝廷而言，袁世凯比王莽和曹操更危险。但王莽和曹操的出现，是因为朝廷宗室垃圾无能。如果王莽生在汉武帝时代，会是人臣楷模。如果曹操生在光武帝时代，会是一个治世能臣。所以他們要杀袁世凯，注定难成功。

首先军机大臣领班、满清权贵标志的庆亲王奕劻就反对杀掉袁世凯。老人家既是老官僚也是老财迷，从袁世凯那里收了很多银子。杀掉袁世凯，他自己也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找到载沣侄子理论：“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起来造反怎么办？”

想想彪悍的北洋新军，载沣的热血冷了一半。但北洋军真的会为了袁世凯造反么？载沣很疑惑，段祺瑞给出了答案。

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十四号，光绪皇帝死；十一月十五号，慈禧太后死；十一月十六号，袁世凯奉召入宫，局势难以预料。袁世凯入宫之前，密令段祺瑞议事。当时段祺瑞在保定，到袁家时，袁世凯已经入宫，袁克定正六神无主。

段祺瑞问：“大帅可有什么口谕？”

袁克定答：“走的很仓促，没有留下什么话，只是说了句有芝泉在就可放心。”

段祺瑞说：“原来如此。”然后离开袁家。袁克定满脸迷茫。

为避开朝廷耳目，段祺瑞去东交民巷一个法国人开的酒店里住下，思索对策，完毕回保定，病了。肉体凡胎，生老病死原本正常，但段

祺瑞那次生病就很不正常。他的同事、学生分别前来探望。他们可不是普通人，都是北洋将军，军服标准，军刀闪亮，军靴啪啪响。他们离开时面容凝重，似乎有大事要发生。

数日后北洋新军决定举行冬季军事演习：各镇都将派人马参加，北洋各军事学堂也将参加，教官、学员整装待发。名义演习，实则厉兵秣马，看似一副备战的模样！最关键的是，北洋军如此举动，作为上级的陆军部却毫不知情。

与此同时，谣言满天飞，说这是北洋军要犯上作乱。紫禁城的权贵们如坐针毡。段祺瑞从容操控着一切，他就是要让北洋军搞点动静出来，给朝廷增加压力。怎么搞动静呢？听说李纯的队伍里有大老粗因为赌钱打了起来，还动了枪。

段祺瑞给李纯打电话：“听说你队伍发生兵变。”

李纯解释说：“不是，是赌博。”

段祺瑞说：“就是兵变，你要马上率部镇压，我也会带兵增援，规模越大越好。”

李纯反应过来：“是兵变，大人放心，我马上集合队伍去镇压。”

载沣明白了，杀袁世凯，北洋军确实可能造反。北洋军造反，确实很可怕。所以袁世凯生病了，回老家疗养。历史给了载沣三年时间，可惜他没有抓住。直到武昌暴动，满清权贵依然无法指挥北洋军。自己不争气，怪不了别人。

段祺瑞和袁世凯相处二十年，从人生低谷迈向高峰。其中十八年时间，他们合作得很好。段祺瑞从孤傲的年轻人变成北洋军第一号人

物，关键时刻帮助袁世凯解决了很多问题。

辛亥暴动之际，是段祺瑞率领前方北洋将领逼迫朝廷退位。

宋教仁遇刺之后，南北大战一触即发。袁世凯想到段祺瑞。民国成立之后，总理走马灯似地更换，段祺瑞一直是陆军总长。赵秉均辞职之后，袁世凯让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组织军人内阁应付战争。那是段祺瑞第一次当总理，也是最奇怪的一次。段总理几乎不理内阁的事，只管陆军部，专注于战争。

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之际，段祺瑞坐在北京统筹全局：北洋军兵分三路长驱南下：一路以段芝贵、王占元、李纯沿京汉路南下，指挥湖北、江西方向作战；另一路以冯国璋、张勋、雷震春率军沿津浦线南下，直捣南京；第三路以倪嗣冲为总指挥，由汴梁、周家口经颍州等地直攻安徽。

战争过程没什么可说的。前后几十天时间，北洋军全线胜利。战后王占元占据湖北，李纯占据江西，冯国璋占据江苏，卢永祥占据浙江，倪嗣冲占据安徽，投靠袁世凯的龙济光占据广东。除西南几个省，中国均为北洋军控制。段祺瑞的声望达到一个高峰。

袁世凯兴致勃勃地搞帝制。西南几个省揭竿而起，成了袁世凯的命门。不仅如此，还成了北洋系统土崩瓦解的催化剂，成了段祺瑞的命门。这是后话。

按照中国特色传统，段祺瑞羽翼丰满，会变成袁世凯眼中的一颗钉子。袁世凯想办法削弱段祺瑞，主要旗子是蔡锷和蒋百里。

袁世凯费尽心思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原打算让他编练国防军，

削弱、甚至制衡北洋军。然而很遗憾，蔡锷跑到北京，除了结识小凤仙，什么都没干。原因很简单，北洋元老处处刁难，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蔡锷只能依靠喝花酒打发时间。

袁世凯让蒋百里到保定军校当校长。蒋百里制定了一系列看似行之有效的强军计划，得到袁世凯的首肯，结果就是搞不下去。因为保定军校是段祺瑞的天下，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蒋百里性情刚烈，一怒之下，拔枪自杀（未遂）。

如果袁世凯铁了心支持蔡锷和蒋百里，新军也能搞成。然而很遗憾，袁世凯很忙，忙着称帝，搞得蔡锷跑回云南搞护国军。

三章 廉价的共和

从君权走向民权，从帝国走向民国，从帝国梦走向民国梦，关键就在“共和”二字。它是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词汇，凡是和这个词扯上关系的自然都是英雄，基本上都在史书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造就共和之人，更是了不起。孙中山之所以名气如此大，今日依然威望崇高，就因为他一生都在试图“造共和”。袁世凯原本有机会成为开天辟地的人物，就因为他推动了“共和”，后来之所以被人骂，就是因为背离了“共和”。

段祺瑞有“三造共和”之美称。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高到有点不真实，有点搞笑，又有点可悲。“一造共和”已经很牛了，悠悠青

史也没有几人。“造”三次，太夸张。

把“共和”看成陈年老醋，段祺瑞就是酿醋师。但段祺瑞酿的醋，却一直存在那里，被人遗忘，无人问津。原因很简单，段祺瑞的醋，不纯不香，水分太大。

当初辛亥暴动，袁世凯复出，南北议和，清王朝垮台已成定局。就在那个时候，冯国璋指挥北洋军，拿下武汉三镇中的两镇，想一鼓作气荡平武汉。然而（袁世凯）内阁来了一道电令：“命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冯国璋很不爽，心想自己拼命打仗，眼看就要成功，却让段祺瑞摘桃子，不公平。接下来内阁又来了一道电令：“湖广总督段祺瑞为第一军军统，冯国璋改任第二军军统。”冯国璋愤怒了。过几天内阁再来电令：“著冯国璋回京统领禁卫军，著段祺瑞兼统第二军军务。”冯国璋抓狂。

冯国璋回到北京后清醒过来。因为段祺瑞并没有摘桃子，而是直接停下了。

事实上大多数北洋将领对朝廷或多或少都有感情，视革命者为叛逆。典型的如张勋，二次革命攻入南京，如同野猪进入菜园子，什么事都干，那情形类似于攻入天京的曾国荃。直到最后，张勋抱着爱新觉罗家族的大腿舍不得放。正常情况如冯国璋，想要报效朝廷，干掉革命党。食君之禄，替君分忧嘛。非典型状况就是段祺瑞，北洋军中对朝廷最为冷淡之人。

按道理说，段祺瑞出身淮军，又是李鸿章看好的人，应该对清朝，段祺瑞非常骄傲，看不起

无能之人，对于无能的组织也没有兴趣。朝廷在甲午年和辛丑年的丑陋表演让他嗤之以鼻。同样的原因，他也看不起孙中山。这是其一。其二，段祺瑞是北洋将领之中唯一有留学经历之人，对世界主流有清晰认知：君主专政已经过时，逐渐灭亡。其三，段祺瑞虽然一直在军界，行事风格有明显的军人烙印，但他有政治家的思维，能看清大局走势。这点从他的“官品”中能看出来，他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别的将领都在贪污自肥时，他洁身自好，就是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段祺瑞到前线之后，便对冯国璋留下的参谋长、保定军校毕业生张联棻说：“馥卿（张联棻的字）啊，你对眼下的时局有什么看法？还想继续当朝廷的官儿吗？”

张联棻吓了一跳，心想段老师是朝廷大员，不想当官，难道要谋反不成？赶紧打太极：“联棻是个当兵的，不懂政治。”

段祺瑞很直白：“军人也要懂政治，要知道时势，不能做糊涂事，不能当糊涂官！”

张联棻赶紧表态：“跟段老师走。”

有媒体问段祺瑞对当今中国政体变革有何看法？身为大清帝国湖广总督的段将军笑着回答：“中国未来的政体要由中国民众决定，我辈军人亦当服从民众之意愿！”好吧，专制帝国的封疆大吏，竟然能说出国体要由民众决定的话，不明者还以为是革命党呢。

南北和谈的主要执行者便是段祺瑞。段祺瑞抵达汉口之后立即下令停止炮击，大规模的武力进攻停止。南北之间角力从战场转向地下：枪炮声不见了，私底下的使者、信函、电报往来不断，用和平方式决

定中国之命运。

段祺瑞明白，武昌暴动实际上是南洋军和北洋军厮杀，内战。他认为双方一直这么打下去，非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成果将化为乌有，最后甚至可能南北分裂，永无宁日，列强可能还会乘机瓜分中国。所以他派小舅子吴光新到北京找到袁世凯表明心迹。

吴光新说：“袁大人，眼下前线虽平静，但部队人心浮动，革命党都渗透进来。”

袁世凯故作惊讶：“竟有这等事？”

吴光新说：“是啊，大人，人心思变，段军统也没有办法啊！”吴光新强调人心思变。

袁世凯作悲天怜人状：“眼下南北双方正在谈判，不知何时能消弭干戈，免得生灵涂炭。”实际就是催促吴光新，你小子快把段祺瑞的想法说出来。

吴光新说：“眼下南方坚持以共和为谈判先决条件，不知大人之意如何？”

袁世凯作痛苦状：“我辈世受国恩，如今竟然保不住大清宗庙，真是愧对先人哪！”

吴光新再次强调：“人心思共和，这也不是大人的错啊，大人海内瞩目，日后定是天下领袖，万民景仰啊！”接近亮出底牌。

袁世凯捅破窗户纸：“段军统是什么意见？”

吴光新给出答案：“军统说一切听从袁大人的吩咐！”吴光新也给出保证。

袁世凯嘱咐：“一切要小心谨慎，要忠于朝廷。”

和袁世凯达成默契之后，段祺瑞心中有数了，便进一步行动。他让靳云鹏、廖宇春、夏清贻三人和革命军联系，共谋推翻朝廷，让汉人（袁世凯）掌权，共造共和。

廖宇春和夏清贻到上海拜见南军参谋长顾忠琛。顾忠琛找到老领导黄兴，黄兴表示：“原先各省都想推举我担任临时大总统，我一直推辞不干，就是要把位置留出来给袁世凯。”

协议达成之后，靳云鹏奉段祺瑞之命北上谒见袁世凯。袁世凯照例首先表示愤怒，接下来再问段军统意下如何。靳云鹏把段祺瑞的看法告诉袁世凯，袁世凯再次惊讶地表示：“军心怎么变化到这个地步？你们要将我置于不忠不孝的地步吗？让我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篡夺人家的江山，我是绝对不会干的！”靳云鹏又说整个北洋军都主张您当大总统。袁世凯乐了，脸上却挂着悲伤，装着迫不得已的样子表示：“你们这些手握兵权的人都这样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要你们别让我以后没脸见人就行了啊！”好吧，装得还挺像陈桥驿兵变时的赵匡胤。

但朝廷不愿意轻易退位。满清权贵组织宗社党，试图等待另一个曾国藩出现。他们扬言要刺杀袁世凯。蒙古王公返回本部落，打算起兵勤王，火药味十足。就这样拖到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在南京当选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很受伤。

那种情况下，北洋军前线指挥官，湖广总督段祺瑞出场了，他给朝廷写了一封信，说前线部队官兵心向共和，与革命党暗中密谋，军

心不稳。时间是一月二十三号。这是逼宫的前奏。两天之后，段祺瑞致电内阁，指责朝廷宗室弟子误国，要求共和。

眼看朝廷还在磨唧磨蹭。一月二十六号，段祺瑞联合北洋将领五十人，以四十万北洋将士的名义要求朝廷赶快“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朝廷宗室彻底傻眼，再也没有人叫嚣战争了。对付袁世凯一人，尚有胜算。对付几十万北洋军，只能祈祷努尔哈赤、多尔衮、玄烨、乾隆等人灵魂附体了。

隆裕太后没办法，只能授权给袁世凯，让他和南方和谈。为了让朝廷赶紧退位，段祺瑞再次联合北洋主要将领写了一封更为激烈的逼宫电报：“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致因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颍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赤裸裸的武力威胁：朝廷再不退位，段将军的大炮已经对准北京城了。当年曾国藩兄弟不敢采取的步骤，被袁世凯和段祺瑞实施

了。

君主退，共和生。

这便是段祺瑞“一造共和”。但这中间水分很大。坦白讲，段祺瑞武力威胁虽然关键，但真正的主角还是袁世凯和孙中山。没有孙中山十年如一日地闹，袁世凯没有机会。如果不是袁世凯抓住机会施展翻云覆雨之手段，段祺瑞也没有机会逼宫。之所以得到“造共和”的美誉，是因为别人只有这么一次，段祺瑞还有两次和三次。

二造共和

袁世凯走上人生顶峰之后，开始冷淡段祺瑞。

原因之一，段祺瑞已经羽翼丰满，北洋军内遍布段祺瑞的门生故吏。蒋百里自杀就是段祺瑞尾大不掉造成的典型事件。

原因之二，段祺瑞心高气傲，桀骜不驯，不是受人摆布之人，越来越难以驾驭。日本送来《二十一条》，袁世凯为搞帝制，已经从心理上接受了，其他人没意见，但段祺瑞硬顶。

原因之三，也是最难得的一件事，段祺瑞虽然是军人，却有很不错的政治视角。这也是袁世凯忌惮的地方。所以袁世凯称帝，段祺瑞不认。

当袁世凯搞帝制，段祺瑞苦口相劝：“总统，祺瑞自小站跟随总统，鞍前马后，将近二十年，总统知遇之恩，祺瑞没齿难忘。如今，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祺瑞无知，赤诚可鉴，望大总

统三思。”这话可谓掏心掏肺。袁世凯嘴里虚与委蛇一番，心里却在思索用别人取代段祺瑞。

袁世凯因为称帝需要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之时，陆军总长段祺瑞请假两个月。袁世凯立刻准奏。假期将满之际，袁世凯撤了段祺瑞的职，把王士珍哄到北京担任陆军总长。

段祺瑞的叔叔劝说：“老头子向来器重你，可你在帝制问题上却一直顶牛，他怎能不生气呢？何况，总统、皇帝还不是一回事，你何必太认真？”段祺瑞皱着眉（鼻子没有气歪）说出一生中最幽默的一句话：“那可不是一回事。项城做总统，见面只要敬礼、拉拉手就可以了，如果做了皇帝，见他就得磕头，话也得跪着说。我最恨这种长人变矮子的把戏。”

长人变矮子，大概是君主和民主之差别最形象的描述了。

袁世凯登基，段祺瑞没有参加。袁世凯封功臣，没有段祺瑞的份。段祺瑞给徐树铮写的信中感叹：“项城作孽啊！”段祺瑞认为：“恢复帝制，必将弄出大乱子来！”

事实果然如此。首先是西南乱起来，然后是冯国璋和西南各省眉来眼去。袁世凯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只好把段祺瑞请出来收拾残局。段祺瑞和冯国璋的旗帜一样：反帝不反袁世凯。冯国璋在南京另搞一套，段祺瑞在北京另搞一套。

段祺瑞提出先决条件：必须实行责任内阁制。和当年袁世凯在武昌暴动之后的反应一个样，就是要掌握实权。袁世凯让步。

段祺瑞上任之后便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撤政事堂改国务院，废

国务卿改国务总理。

——相当于把袁世凯用两年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更改的机构扳回。袁世凯忍了。

段祺瑞又提出裁撤统率办事处、总统府机要局、军政执法处三机关，并收容模范团、拱卫军为陆军部。

——相当于把袁世凯的心腹势力连根拔起。袁世凯气得浑身发抖。

段祺瑞主张和平解决当前局势。西南护国军坚持袁世凯隐退下野。袁世凯不甘心，给段祺瑞使绊子，暗中指示曹锟、倪嗣冲等人公开电请武力解决西南。南京的冯国璋鼓动陈宦和汤芑铭造反，段祺瑞鼓动陕西陈树藩造反。如此“二陈汤”把袁世凯活活气死。袁世凯可以说败在了段祺瑞和冯国璋手上，而非蔡锷之手。

所以袁世凯的病才来得如此之快，死得如此之快。在袁世凯看来，他完全败在了自己人手中。其实袁世凯大可不必抱怨。玩政治如同赌博，坐上去就要做好亏本的准备。愿赌服输嘛。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抛弃以前的怨恨，通令全国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一天，学校停课一天，文武官吏停止宴会二十七天。段祺瑞亲自率各部总长轮流守灵。

在段祺瑞的操办下，以失败者形象退出舞台的袁世凯享受了“国葬”之荣耀。袁世凯陵墓占地一百四十亩，耗时两年，耗钱七十五万，外形仿明清帝陵，规格并不比一般皇帝差。

顺便多说一句，袁世凯的陵墓称“袁林”，是一个四不像。按照游戏规则，皇帝的墓地号称陵，王侯的墓地称为“冢”，平头老百姓

墓地叫“坟”。只有传说中的“圣人”之墓才叫“林”。中华帝国以来，被后人尊为“林”的只有关羽（关林）和孔子（孔林）两人。袁世凯何德何能超凡入圣？没人知。

段祺瑞所谓“二造共和”，简而言之，气死袁世凯。此次水分也很大。因为西南有蔡锷的护国军，南京有冯国璋，京城内部也有黎元洪抗命。最关键的在于，段祺瑞“造共和”之后，并没有真的“共和”起来，战争依然在继续。这个问题先放一放，看看水分最大的第三次“造共和”。

三造共和

“一造共和”的对象是满清朝廷，“二造共和”的对象是袁世凯，“三造共和”的对象变成了张勋，档次越来越低，作用越来越小。

北洋将领并非铁板一块，派系众多，矛盾重重。尤其在对待朝廷的问题上，态度五花八门。人是复杂的动物。尤其在历史周期律之第三层和第四层交替之时，人的灵魂备受考验。清末民初，帝国转向民国，国人的灵魂在帝国梦和民国梦之间反复摇摆。袁世凯堪称民国建立时的第一功臣，最后还是没有经得起帝国梦的诱惑。冯国璋心眼很多，辛亥暴动之际还想一举荡平武汉，为朝廷建功立业呢。

北洋将领之中，段祺瑞对满清朝廷感情最淡，张勋对满清朝廷感情最深。所以段祺瑞威逼清廷退位。所以袁世凯死后，张勋认为机会来了，还要搞复辟。后人认为张勋是大老粗，其实他有一颗忠于帝国

的灵魂。事实上张勋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要知道张勋的辫子军只有几千人，进攻偌大的北京城，简直是杯水车薪。但是张勋直接进入了北京城，给他打开城门的是号称北洋之龙的王士珍。民国初年，王士珍和徐世昌一样，以满清遗民自居，甚至不愿意当民国的官，不愿领民国的工资。

张勋复辟本质上是被利用了。段祺瑞就是要利用张勋扳倒黎元洪。所以当张勋雄赳赳气昂昂进北京时，天津的段祺瑞表示没看见。当张勋把黎元洪赶走，段祺瑞睁开眼睛，在天津马厂誓师、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

段祺瑞请梁启超代写了一篇讨逆檄文。梁启超用他的大笔蘸狗血，把张勋描绘成一个活脱脱的小丑。梁启超写道：“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谨痛哭流涕申大义于天下曰：呜呼，天降鞠凶，国生奇变。逆贼张勋，以凶狡之资，乘时盗柄，竟有本月一日之事，颠覆国命，震扰京师，天宇晦霾，神人同愤。该逆出身灶养，行秽性顽，便佞希荣，渐跻显位。自入民国，阻兵要津，显抗国定之服章，焚索法外之饷糈，军焰凶横，行旅裹足，诛求无餍，私橐充盈，凡兹稔恶，天下共闻，值时多艰，久稽显戮。比以世变浚迫，政局小纷，阳托调停之名，明为篡窃之备，要挟总统，明令敦召，遂率其丑类，直犯京师。”

段祺瑞的讨逆军兵分两路，分别以段芝贵和曹锟为东西两路统帅，吴佩孚为前敌司令，沿京津、京汉铁路向北京进逼。张勋装模作样地调兵遣将，和段祺瑞决战。记者问张勋：“段祺瑞来讨伐，你怎么办？”张勋拍胸脯保证：“至死力战”。记者又问：“若战败，怎么办？”张

勋再次拍胸脯：“断不他往！”

比起前两次“造共和”，第三次成本低得多。张勋和段祺瑞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张勋的辫子军无力也无心思作战。段祺瑞派一架飞机到皇城转了一圈，丢了几枚简陋的炸弹。据说第一枚炸弹伤了一个太监和几条狗，第二枚炸弹炸毁一个缸，第三枚炸弹投到了故宫的消防水缸里，未爆炸。这样就把辫子军吓得对着皇城屈膝弯腰撅屁股躲避，摆出一个狗钻洞的造型，忘记射击（当时飞机很简陋，离地面只有三百米）反击。

段祺瑞另派一架飞机到张勋住宅，丢了两枚简陋的炸弹。第一枚丢到了鱼池里，弄出一堆水花，吓了张勋一跳；第二枚丢到屋檐上，炸出一个大洞。张勋懵了，赶紧打电话去荷兰使馆，请求洋大人派轿车来，接他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政治避难”。

至于地面接触，吴佩孚勇猛异常，轻松击溃辫子军。

段祺瑞再一次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三造共和”完毕。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所谓“三造共和”，仔细一看都是水分，但足以让段祺瑞在那个时代鹤立鸡群。因为其他人，要么对共和漠然不知，要么没有机会，要么有了机会不知道如何利用。

袁世凯之后，蒋介石之前，段祺瑞是决定中国走势的那个人。所有人要么是段祺瑞的朋友，依靠段祺瑞升官发财；要么是段祺瑞的敌人，被段祺瑞打败或打败段祺瑞。

就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段祺瑞成为一名“怨妇”。

那么该如何评价段祺瑞呢？答案，谋国者。

所谓谋国者，无非就是想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失败。

所谓谋国者，便是毕生把国放在首位之人，通过谋国而谋自身。谋国的最基本条件之一是和平。袁世凯当选大总统之后，原本已经实现基本和平。但袁世凯走错一步棋，天下再次混乱。谋国者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但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独特的标签。

段祺瑞谋国，就是失败的典型案例。讨伐张勋之后，原本是赶走满清皇室、彻底联合各派整合国家的大好良机。段祺瑞却什么都没做，仍然以军人的思维看待问题，回过头准备以武力讨伐西南派。常言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段祺瑞却把战争和政治分开。

四章 段祺瑞谋国

按照惯例，为什么是段祺瑞？

要知道北洋系统内和段祺瑞地位相当之人还有王士珍、冯国璋、徐世昌几人。论威望，王士珍和徐世昌并不比段祺瑞差。论实力，冯国璋不比段祺瑞差。段祺瑞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出身差别、个性差别这些不算，最关键的在于政治见识。

北洋三杰之王士珍才华过人、威望很高，但对满清朝廷有无法割舍的感情，张勋复辟前后，王士珍的表演堪称丑陋。对于一个被历史

淘汰的老古董，无论多少才华都难以让其复活。王士珍对满清的感情，说穿了就是政治见识的缺陷，或者说是理智被感情淹没。

北洋三杰之冯国璋，有手腕有野心，但缺乏坚定的意志和政治远见，关键时刻总是退缩，政治上经常因为犹豫而失分，最后完败，郁郁而终。

段祺瑞性格坚强，敢作敢为，名副其实的北洋之虎。

段祺瑞身上最可贵的品质在于政治眼光。从武昌暴动开始，段祺瑞坚定地反对和帝制有关的一切，所以他反对满清，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所谓“三造共和”，捞足政治分数。因为他看到了大局走向，即帝制正在灭亡。这得益于他欧洲留学的经历。

个人角度看，段祺瑞决心在帝制灭亡中扮演重要角色，所以他的“官品”很好。官场好比一滩污泥，能出污泥而不染，绝对是奇葩级别。为此他刻意培养自己的势力。

论个人军事素质，段祺瑞是那个时代的翘楚，也就吴佩孚、蒋百里等少数几人可以和他比。但段祺瑞不像军人、不像将军，更像教师。

北洋新军时代的段祺瑞，编写军事训练教材，亲自指导各种军事训练。南北比赛，段祺瑞为北洋军总指挥。所以北洋将领大多数在段祺瑞手下干过事。又由于段祺瑞人品和官品都很棒，所以那些大老粗们对他比较信服。

随后段祺瑞掌管保定军校，相当于蒋介石之于黄埔军校，后期北洋精英都是他的门生故吏。有些人没有见过他的面，比方说吴佩孚，比方说蒋介石，也称他为老师。当时整个军界，遍布他的门生故吏，

所以段祺瑞在军界影响力巨大。

但段祺瑞的缺陷同样很明显：因为为人孤傲，整天板着一张老脸，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让人望而生畏，缺乏亲和力；因为一直在军界，缺乏行政系统内的历练，缺乏政客必要的圆滑，到处得罪人。最大的缺陷在于无法处理派系关系，缺乏容人之肚量。

当初袁世凯让蒋百里去保定军校当校长，虽有在段祺瑞的地盘掺沙子之嫌疑，但绝不是坏事。论军事素养，蒋百里绝对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如果要在那个时代找一个军事家，很多人都会选择蒋百里。原因无他，因为蒋百里真的很出色。

蒋百里生于一八八二年，宁波人，父亲早亡，家境贫寒，依靠自身努力赢得读书的机会，凭借自身努力拿到朝廷的留学经费，又因为对时局不满成为革命者。蒋百里就读日本士官学校，那是中国留学生能就读的最好军校（蒋介石向往而未能毕业的学校），并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被视为未来的大人物。蒋百里留学德国，又以优异成绩毕业，得到德国军界高层（如鼎鼎大名的小毛奇）的赞赏，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兼备东西方军事留学背景之人。蒋百里的梦想就是借鉴德国和日本的军事长处，为中国培养新人才，强化中国陆军。

这样一个蒋百里，可以说和段祺瑞追求一致，原本应该是段祺瑞的知音。然而就因为他是袁世凯任命的，便不容于段祺瑞。陆军部主管教育的人叫魏宗翰，是段祺瑞的心腹，有机会就说蒋百里那一套不行。蒋百里搞了一个计划，魏宗翰说：“没钱。”

“这个计划很重要。”

“就是没钱，要不你自己筹钱。”

“袁大总统同意了。”

“那你找大总统要钱呗。”

蒋百里立志报国，学成之后却报国无门！他绝望了，决定用最后的行径控诉黑暗的官僚体系。六月十八号凌晨，蒋百里把全体师生聚集起来训话：“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职责，是我对不起你们……”然后拔枪自杀。好在当时学生拉了一把，子弹偏离心脏位置，自杀未遂。

对蒋百里个人而言，值得欣慰的是，失去事业，却收获了一份爱情。在他受伤住院时期，得到一位漂亮的日本护士的爱慕，两人结为夫妻，成就一段佳话。他们一起生了五个漂亮的女儿，三女儿蒋英嫁给了一个青梅竹马的男孩。他叫钱学森，也是海外留学，学成之后怀着一腔热血归国，终于成为新中国导弹之父，共和国上空的星星。

连一个蒋百里都容不下，段祺瑞的胸襟和眼光成反比，和袁世凯相差甚远。不论蔡锷或蒋百里，不论是否有才，凡是威胁到段祺瑞地位的，一概反对。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因为这些缺陷，段祺瑞把谋国变成派系斗争。当然喽，政治派系有争斗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段祺瑞总是把派系斗争演变为个人之间的算计。

算计黎元洪

袁世凯通过二次革命解决革命党之后，回头一看，还有巨头黎元洪在武汉。对黎元洪当然不能动武，但黎元洪不愿意离开武汉。怎么办呢？袁世凯想到段祺瑞。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八号，袁世凯给黎元洪发了一封密电，说有要事相商。黎元洪接到电报之后抓耳挠腮，想办法推辞之际，陆军总长段祺瑞到了武汉。两人之前有过接触，彼此并不陌生。但两人身世背景、成长背景、知识结构相差甚远。黎元洪在社会大学中不断遭受挫折。段祺瑞虽然也吃过很多苦，但自从进入军营之后一直是优等生。黎元洪一直用老好人智慧生存，段祺瑞一直很嚣张。

段祺瑞到湖北，黎元洪好酒好菜招待。两天之后的十二月十号，段祺瑞要回北京，黎元洪前往车站相送。出于礼节上的敬重，黎元洪亲自把段祺瑞送上火车。黎元洪上火车之后，段祺瑞下了火车，黎元洪却没能下来！火车拉着黎元洪去了北京！

段祺瑞在站台上冲黎元洪潇洒地挥挥手，哈哈大笑。黎元洪这才明白自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袁世凯的密信和段祺瑞的行动都是为了让黎元洪离开武汉老巢，去北京受罪。段祺瑞这样算计黎元洪，有些卑鄙，但很有效。但这只是开始。黎元洪离开之后，段祺瑞在武汉当了一个月都督，把黎元洪的军队该遣散的遣散，该收编的收编，把黎元洪的家底折腾干净。

——典型的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这种手法偶尔用一次可以，用多了，就会造成更多麻烦。然而很遗憾，这种手段是段祺瑞的常态，因为他是军人。

从那以后，黎元洪失去了军队，失去了湖北的地盘，成了袁世凯手里的玩偶。王占元带领北洋军坐镇湖北，之后段祺瑞继续回北京当陆军总长，还抽空去瀛台看望黎元洪。看就看吧，举止神态中毫不掩饰蔑视之情。

这就是段祺瑞，似乎从来不懂得隐藏缺点。在他心里，黎元洪在军界没什么作为，全凭旷世好运气。但是他没想到，政治如同过山车，谁也不知道高峰和低谷在哪里。

袁世凯称帝失败，段祺瑞等来梦寐以求的机会——成为北洋系统当家人。

段祺瑞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欲望，个人不去吃喝嫖赌抽，当官不去贪污受贿。二十年的等待、期盼、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段祺瑞可以选择自己当总统，但是他必须忍着。摆在段祺瑞面前的第一件事是和平。

和平的前提是让西南派闭嘴。段祺瑞对西南派没有好感，但眼下必须和平。西南护国军反对袁世凯搞帝制，只有把局势拉回到二次革命以前，西南派才会闭嘴。二次革命之前，还是《临时约法》时代。按照《临时约法》，副总统黎元洪要转正。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号那天，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在袁世凯遗体前开会，商量要不要让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手里拿着毛笔，苦

思幂想没有好主意，最后把笔向地上一甩说：“好吧，去接他来吧！”
他瞧不起的黎元洪成了国家元首。

既然形势比人强，那就认了吧。段祺瑞第一个去黎元洪家拜访，黎元洪出门迎接。

黎元洪的客厅内出现了极富画面感的一幕：客厅内有一张长方形的楠木桌子。黎元洪坐在主位，毫无表情，如同木偶泥菩萨。段祺瑞坐在客位，神情冷峻。那情形根本不像未来的大总统和内阁总长会面，而像传说中的武林高手对决。

段祺瑞向黎元洪鞠躬，表示我看你来了。

黎元洪答礼，表示我知道你看我来了。

整个会面持续四十分钟，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说一个字，没有发出任何声调。

黎元洪看着段祺瑞，面无表情，如同木偶泥菩萨。这个人把我从湖北骗到北京，肢解了我所有的军队，让我成为袁世凯的政治俘虏，任凭玩弄。现在他亲自出台，想继续玩弄我。

段祺瑞看着黎元洪，神情冷峻。这个人的运气总是很好，一无所有也可以当国家元首。好吧，就让他当木偶泥菩萨，当盖印机器吧。如果不听话，推倒不迟。

段祺瑞告退，黎元洪送客。然后黎元洪成为大总统，段祺瑞成了责任内阁总理。

责任内阁，原本是宪政天才宋教仁的毕生追求，如今在段祺瑞手上实现了。

责任内阁，原本是孙中山给袁世凯布下的绊马索，如今成了段祺瑞对付黎元洪的工具。此时的孙中山还在日本让同志们按手印效忠自己。

和平与战争

段祺瑞和黎元洪的分歧主要有两件事，要不要武力统一，要不要对外开战。

所谓对外要不要开战，这个其实没必要讨论。凡尔登战役之后，欧洲战局已经明朗，德国战败已成定局。世界新秩序重建，地球村重新站队。任何一个国家谋一个战胜国的头衔都非常重要，可以说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段祺瑞坚决主张对德参战。尽管段祺瑞之前对黎元洪很多事干得不地道，但这事黎元洪不应该反对。黎元洪其实也明白那回事，只因为段祺瑞主张参战而反对。没办法，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斗争，对人不对事，为了反对而反对。

黎元洪虽然当了大总统，虽然没有实力和段祺瑞对抗，但也不会和段祺瑞合作。原因之一，之前段祺瑞算计黎元洪太狠。

对内要不要武力统一，可以说各有道理。

黎元洪虽然是老好人，却有自己的政治主见。他认为中国应该修生养息，无为而治，如同汉朝初年。段祺瑞认为，眼下的和平只是表面的。只要西南派还在，国家就留有隐患。所以要想和平，必须彻底征服西南派，武力统一。

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平统一，让国民修生养息，通过政治问题解决分歧当然是理想手段。若不能，再武力统一，方才完全。如果两人密切配合，应该是黎元洪先出面搞和平，搞不成方才由段祺瑞动武。然而很遗憾，两人一开始就不是一路人。

单论武力，不论是袁世凯时代还是段祺瑞时代，北洋军对西南派都具有压倒性优势。如果北洋军团结一致，西南派没有任何机会。袁世凯原本可以把北洋军团结起来，所以蔡锷被迫进京。袁世凯走错路，西南派才有机会。段祺瑞以军人的思维认为，既然恢复了《临时约法》，那么讨伐西南派将易如反掌。但现实角度看，他有两个障碍，一明一暗。

正是那两个障碍，让大权在握的内阁总理段祺瑞变成一个“怨妇”。

明显的障碍：段祺瑞让黎元洪当盖印机，黎元洪不愿意。这个障碍并不致命，因为黎元洪除了手中的印章之外一无所有。要推倒他，不难。

但是就在段祺瑞试图推到黎元洪时，黎元洪先下手为强，解除了段祺瑞内阁总理的职务。要知道段祺瑞心高气傲、眼高于顶，大权在握，不可一世，还想大干一番事业、想要主导国事，竟然被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给解雇了！情何以堪啊。

段祺瑞愤怒了。

恰好张勋在徐州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段祺瑞看穿了张勋的小心思，让小扇子军师徐树铮到徐州煽风点火一番。张勋去北京，段祺瑞看不见。黎元洪倒台，段祺瑞胜利。但段祺瑞从此走上“怨妇”

之路。

因为阻挡段祺瑞武力统一的障碍在暗中。暗中的障碍有两个，其中一个很俗气，钱。

打倒西南派不难，难在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寸步难行。于国家而言，钱有时候是罪恶，有时候又是福祉。我们希望金钱是福祉，但中国近代史上，金钱是罪恶。当古老的农业帝国面临新生的工业帝国疲于招架之时，剩下的都是眼泪。所谓鸦片贸易，说穿了，就是钱。所谓割地赔款，还是钱。其他所有不平等条约，说白了，都是钱。

清王朝为什么垮台？因为没钱。袁世凯为什么寸步难行？因为没钱。到段祺瑞主政，财政已经接近崩溃。正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没钱怎么办？借。

从满清政府到袁世凯政府，都在借钱。能押的税收，都押了。能卖的资源，都卖了。过程都是很窝囊、很委屈，受够白眼，吃足亏。比方说二次革命前夕，袁世凯政府与英、法、德、俄、日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两千五百万英镑，借期四十七年，利息五厘。

但借款合同规定：钱的用途由五国银行团指定。是不是很窝囊？

五国银行团还指派外国顾问和会计监督中国的财政开支。是不是很委屈？

这笔债是按九折出售，八四折实收，袁世凯政府理论上（注意这个词）拿到手的钱只有两千一百万英镑。是不是很吃亏？但还没完，扣除洋大人的旧债和赔款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袁世凯政府拿到

手只有八百二十万英镑。为了这八百万二十万英镑，中国人连本带利要还六千七百八十五万英镑！什么叫黑？什么叫耻辱？什么叫吃人不吐骨头？这就是！整个民国，不论是袁世凯政府，还是段祺瑞政府，还是后来的蒋介石政府，都是这么过日子。段祺瑞时代尤甚。

段祺瑞掌权之时，欧洲在打仗，没心思管中国的事儿。能借钱的国家只有一个日本。那个时代的日本经过日俄战争之后十年的修生养息，战争中夺取的东西已经消化掉，“亲华”的戏份已经结束。从给袁世凯送上《二十一条》开始，日本再次开始“侵华”。

日本人做事很仔细，干一件事之前会做好准备工作，做足前戏。如果说鸦片战争前后的英国人是有组织的强盗，那么日本人就是冷血的杀手。他们行动之前会潜入对方的世界，带着笑脸，说尽好话，然后再亮出刀子，出其不意地割下一块肉，干尽坏事。

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力量全面侵华，所以日本人的策略是渗透。具体办法就是借钱给段祺瑞政府，换取各种特权，慢慢把中国东北变成殖民地。日本人给这种办法起了一个非常艺术的名字——“菊分根”，即像菊花分根移植一样，将资本输入中国。

段祺瑞明知日本狼子野心，却假装不知道。他主张：“应该将中国关于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同日本商量，何者中国自办，何者中日合办，何者让日本人办。一方面日本帮助中国，一方面日本亦获得利益，不必支支节节，遇事麻烦，以达到中日亲善之目的。”

——量中华之物力，结日本之欢心。

两年之内，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八次，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

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从此日本在东北慢慢落地生根。其恶劣性质已经超出袁世凯的《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发生在一九三一年，实际上日本从一九零五年日俄战争期间在东北站稳脚跟，向段祺瑞政府输出资本时就已经开始运作。

——这是断子绝孙的行为。

就凭这一点，说段祺瑞是汉奸，并不太冤枉。

当初慈禧太后表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没能拯救满清朝廷。段祺瑞这是“量中华之物力，结日本之欢心”。但这就是段祺瑞的思维，他认为只要有钱有武器就能征服西南，实现武力统一。典型的军人思维。但段祺瑞一心为国谋划，终究不是汉奸。

这就牵扯到段祺瑞面临的第二个暗中障碍：人。

西南派之所以能立足，并非武力强悍，而是政治因素。确切说，是因政治问题导致的内乱。

所谓政治问题，便是历史周期律之下的体制变更。这个内乱是多层次的。

国家层次的内乱，比方说北洋系统和西南派对立，是一个大层次。

中层次之乱，在于派系内部不统一。北洋军阀派系之间各种明争暗斗，西南派之间各种明争暗斗，革命党之间各种明争暗斗。谁也别想征服谁。

最小层次之乱是个人内心摇摆不定。比方说那些成为老古董的大师们，灵魂都在挣扎。至于普通人，习惯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甚至都麻木了。

所以段祺瑞从军人角度思考问题就显得很傻很天真。所以黎元洪毫不犹豫地反对他。把黎元洪推到之后，换成冯国璋，段祺瑞方才明白自己的缺陷。因为冯国璋也反对他。

段祺瑞和冯国璋

段祺瑞比冯国璋年轻六岁，喊冯国璋为四哥，相当亲昵。

如果说段祺瑞和袁世凯是二十年的交情，那么段祺瑞和冯国璋有将近四十年的交情。他们同为天津武备学堂一期毕业生，他们一起小站练兵，他们一起追随袁世凯。尽管成长背景和为人处世的方式相差甚远，但在相识的前三十年，他们的关系相当融洽。

小站练兵时代，他们两家相距很近，孩子不分谁家，该教育教育，该责骂责骂。冯国璋生病时，段祺瑞亲自给他煎药。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干了很多大事，他们跟随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弄翻清王朝。当袁世凯称帝，他们又一起气死了袁世凯。袁世凯死后，他们再一起看着张勋把黎元洪拱下台。

一九一七年七月，两人相识三十二年之后，各自走上人生巅峰，不可避免地走向对立。因为他们走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一个是大总统，一个是总理，把国家权力舞台看成自己的卧榻。段祺瑞利用张勋扳倒黎元洪之后，发现一个似曾相识的问题：老友冯国璋以副总统的身份手握重兵坐镇南京。段祺瑞记得若干年之前，袁世凯无法容忍黎元洪坐镇武汉。此时的冯国璋远比彼时的黎元洪更强大，即使武力

征服西南派，冯国璋也是一个麻烦。而冯国璋之前便和西南派眉来眼去。

所以不论是否武力统一全国，都要把冯国璋调离南京。冯国璋向来心眼多，袁世凯末期，耗尽心思也没能把冯国璋调出南京。黎元洪尽管手无寸铁，也想把冯国璋调出南京，也未成功。但段祺瑞仅仅给冯国璋发了一封电报便成功了。

那电报只有四个字：四哥快来！

之前冯国璋还在犹豫，要不要离开老巢去北京代理大总统。权力的诱惑是一方面，接到段祺瑞的信之后，三十年的一幕幕在眼前浮现，冯国璋心头一热，收拾行囊，带着老婆孩子去了北京，没想到就此陷入权力缠斗中，不可自拔，再也无法回到南京。

冯国璋到北京之后，也不同意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府院之争再一次升级。冯国璋和黎元洪一样，免掉了段祺瑞内阁总理的职位。段祺瑞再一次感到很受伤，怨气很大，决定扳倒冯国璋。但冯国璋不比黎元洪，有枪有地盘，又是北洋元老。

为此段祺瑞和他的小扇子军师徐树铮耗尽脑细胞，要尽手腕，方才如愿以偿。

五章 手腕和决心

冯国璋罢免段祺瑞之后，任命王士珍当内阁总理。他和黎元洪当

初的想法一样，试图以北洋元老取代段祺瑞，安抚北洋将领的情绪。只是黎元洪人微言轻，王士珍不买他的账，还在张勋复辟时打开北京城门。冯国璋不同，本身就是北洋三杰，而且和王士珍关系极好。如果冯国璋一辈子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王士珍。但王士珍仍然不敢取代段祺瑞。关键时刻，段祺瑞亲自上门，说服王士珍出任内阁总理。段祺瑞从不是慈善家，他已经决定不顾一切代价扳倒冯国璋。之所以劝说王士珍，是因为段祺瑞知道王士珍淡薄名利，不愿意在权力中央纠缠，一旦遭遇攻击，必然辞职。

冯国璋不仅罢免了段祺瑞的总理之位，还试图从英美那里寻求支持。之前黎元洪也试图以英美抗衡支持段祺瑞的日本。思路很对，但时机不对，世界大战分赃尚未完毕。

段祺瑞为冯国璋做了两手准备，武一手，文一手。

北洋将领之中，要么是段祺瑞武备学堂的同学，要么是天津小站的同事，要么就是保定军校的学生。由于段祺瑞长期位居陆军总长的位置，几乎所有人都做过段祺瑞的手下。特别是打击孙中山二次革命期间，段祺瑞基本指挥过所有人。上一次黎元洪罢免段祺瑞，就被督军们弄下台。段祺瑞决定让冯国璋尝尝苦头。

冯国璋虽然也是北洋元老，在督军中的威望却不如段祺瑞。因为冯国璋虽然心眼多，喜欢搞关系，但一直偏安南方、不在高位，不能给大老粗们谋福利。而且冯国璋自己爱财，平时舍不得花钱。段祺瑞虽然自己古板，不贪污受贿，但对别人贪污受贿却假装看不见。尤其对那帮大老粗，段祺瑞还能给他们创收。比方说段祺瑞主张对德绝交

宣战，大老粗们的小心脏砰砰乱跳，自己那点水平在国内横也就算了，到国际上打仗纯属丢人现眼。但段祺瑞告诉他们，参战可以不用出兵。大老粗们立马来劲了，跑到国会叫嚣参战，跑到总统府威逼黎元洪。因为即使不出兵，他们也可以想办法搞钱扩军。

段祺瑞主张武力讨伐西南，实际上也是给督军大老粗们创收。打仗是搞钱扩军的绝佳时机，仗打不打先不说，首先把钱搞到手、多买点枪支弹药准备日后抢地盘才是正道。

段祺瑞离职之后去了天津，徐树铮到处活动，找各省督军开会。徐树铮找到倪嗣冲，感叹咱们安徽人被欺负了；找到卢永祥诉苦：总理被人家拿下了。如此这般跑一圈，督军大老粗们的反应出奇一致：谁敢欺负段总理，饶不了他！

督军团最重要的人物是曹锟。

段祺瑞和曹锟

前面说过，曹锟之于袁世凯如同李逵之于宋江。袁世凯称帝，蔡锷起兵护国，真正铁了心支持袁世凯的只有曹锟。如果不是冯国璋教唆陈宦叛变，四川局势不好说，蔡锷未必能拿曹锟怎么样。宋江死时，李逵跟着死了。袁世凯死后，把曹锟闪在半空。

曹锟因为对袁世凯忠心而用力过猛，自己实力大损。黎元洪上台之后宣布和平，冯国璋当了副总统，曹锟想死的心都有了。当时如果不是吴佩孚聪明，在前线搞点小动作，曹锟很有可能光荣登上“帝制

祸首”通缉榜。那样的话，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就在那个时候，段祺瑞伸出温暖的手：下令把曹锟调回保定，担任直隶督军和第三师师长。曹锟高兴得手舞足蹈，向北京方向撅屁股作揖。所有总督之中，直隶总督最重要。担任直隶总督的有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晚清支柱李鸿章、志在天下的袁世凯。其实段祺瑞心高气傲，看不起布贩子出身的曹锟。当初在武备学堂，段祺瑞把曹锟气得要动拳头。但段祺瑞看中了曹锟对袁世凯的忠诚，想收归己有。所以趁他危难之际，给了他一份大礼。然而段祺瑞忽略了一点。袁世凯对曹锟相当于再生父母，而此时曹锟身边已经多了一个谋略和野心都不输段祺瑞的吴佩孚。

吴佩孚正是段祺瑞的克星。

府院之争起，段祺瑞倒黎元洪时想到曹锟，特意登门拜访：“仲珊兄弟，你是北洋元老，袁大总统生前让我特别关照你，所以我把你从四川调回来，让你当督军。我们都是一起过来的人，咱北洋基业岂能落入外人之手？”段祺瑞一番话说得曹锟心里热乎乎的。最后段祺瑞告诉曹锟，把黎元洪弄下台，考虑曹锟当副总统。曹锟很来劲。

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之后，副总统没了下文。曹锟如同泄了气的皮球，把心思转到女人身上，娶了第四个老婆，整天哄小娘子开心。

段祺瑞和冯国璋又把府院之争升级。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冯国璋玩和平统一。段祺瑞的心腹，人称小扇子军师的徐树铮前来拜见。曹锟原本一肚子怨气，想把徐树铮晾在一边。然而徐树铮和段祺瑞风格一样，军人思路，简单致命。

徐树铮告诉曹锟：“现在冯国璋主张和平，他的兄弟李纯执长江三督之牛耳，一旦实现和平，李纯成了直系新领袖，你这个直隶巨头元勋只能唱配角。”那个时代的人很有意思，段祺瑞瞧不起布贩子曹锟，曹锟瞧不起鱼贩子李纯，绝对不能容忍李纯爬到自己头上，表示会仔细思考徐树铮的建议。

徐树铮告诉曹锟：“你是洪宪旧将，当初靠芝老（段祺瑞）保护才免遭通缉，一旦实现和平，你想想吧，必然遭受排斥，到时候就没人能保你了。”曹锟耳根子软，一听这话脊梁骨发凉，赶紧求教徐树铮：“该怎么办？”

徐树铮告诉曹锟：“为主战派出力，新国会改选，让徐世昌当总统，捧你当副总统。”徐树铮很懂胡萝卜和大棒的妙处，一席话又把曹锟说得热乎乎的。曹锟打拼了大半辈子，钱也赚得差不多了，吃喝玩乐都享受了，就差权柄了。如果当上副总统，再转正，此生不白活。然而很遗憾，徐树铮说了谎，他对张作霖也说了类似的话。

天津督军团会议由曹锟主持。曹锟使出浑身本事，上蹿下跳，神气活现，把献媚讨好、哗众取宠等人际关系绝学反复施展。气氛搞得差不多了，徐树铮出面，拿出一份“秘密文件”，说这是西南派通过的五项决议：一、迎黎元洪复职，二、冯国璋下课，三、惩办战争祸首段祺瑞和梁启超，四、恢复旧国会，五、恢复湖南督军谭延闿的职位。

这份决议很虚假。西南派不会让冯国璋下课。但徐树铮之所以拿出来，就是要激起北洋督军们的愤怒，他成功了。一群大老粗又回到

一年前徐州会议的模样，撸袖子、拍桌子、高声叫嚷要给西南派一点颜色看看。他们那么容易被鼓动么？当然不是，他们精明着呢。因为是否打仗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拿钱扩军。想当副总统的曹锟尤其不遗余力：“这些南蛮子欺人太甚，妈个巴子，曹某人和他们势不两立，和他们战斗到最后一人！”

徐树铮眼见火烧了起来，顺势引导：“诸位想过没有，咱们兵力比他们多，地盘比他们大，武力统一喊那么久，为何如今不能成功？我看原因有两个：一是咱们喊得多、做得少，雷声大雨点小；二是咱们不团结，有人胳膊肘往外弯。”

倪嗣冲立马喊道：“有奸细！有叛徒！”

徐树铮趁机说：“这次要动真格，一鼓作气荡平南蛮子！要么听天由命，被人家吃掉！”

倪嗣冲帮腔：“看这次谁他妈都要装熊！”

督军会议开到这个程度，要出兵了。张怀芝说：“各出多少兵，报个数！”

倪嗣冲说：“我出一万！”

曹锟说：“我出一万！”

如此这般，有人一万，有人五千，如同凑伙食费开派对。如果在戏剧中会非常有趣，在现实中就是一场悲剧。因为当时的北洋军就是民国支柱，用兵不是政府说了算，本身就是一场悲剧。政府名存实亡，本身就是国家权力缺失的表现。如此，受损失的只有国人。

更大的悲剧在于，就算不是政府说了算，起码也有统一调度指挥。

各省督军自愿出兵，形式如同搞慈善捐款。这是军队么？怎么看都像亡国的征兆。名义上各省军费由各省承担，但军阀不是慈善家，所谓筹钱的办法只有两个：第一，无非是找更多借口搜刮老百姓；第二，截留国家税款，让原本就可怜巴巴的税收雪上加霜。如此受损的还是只有国人。

这事也造就了段祺瑞的个人悲剧。看看督军大老粗们，名义上都是段祺瑞的人，实际都不是段祺瑞的人，段祺瑞没法控制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和段祺瑞的关系，完全看心情和银子。这是段祺瑞的死穴，随后被吴佩孚击中。

眼看大局已定，段祺瑞出来了，板着那张让人望而生畏的老脸说：“很好，会议很成功，足见我北诸将深明大义，北洋大业前途光明。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西南不除，国无宁日。”这话算是给会议定下基调：进攻，灭了西南派。

事情还没完，段祺瑞又告诉大家：“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内奸不除，养虎遗患。主和派就是投降派。要战胜主和派，就要处理好总理和内阁的职责问题。”这是要对内对付冯国璋。上一次对付黎元洪，大老粗们开会完毕，跑回各自地盘闹独立，闹得黎元洪眼泪水直流。

这一次如何对付冯国璋呢？段祺瑞说：“我们不主张用独立的方式，而要用变相独立的方式，要釜底抽薪。”段祺瑞所谓的变相独立方式，是要攻击王士珍内阁，攻击长江三督，让冯国璋成为孤家寡人，灰溜溜地下岗。

然后大家鼓掌，表示赞同段祺瑞的主张。会议决定，让曹錕领兵

第一路军沿京汉铁路南下，攻取武汉；张怀芝沿津浦路南下，攻取江西；张敬尧伺机进攻湖南。如此安排，相当于把二次革命的进军路线重新来过。但进军途中出了乱子，吴佩孚在前线临阵倒戈，导致段祺瑞溃败。曹锟和张作霖夺取北京政府的权力，然后又开打。这是后话。

段祺瑞真正的杀手锏不在军事，而在政治。

杀手锏

会议之后，内阁总理王士珍不堪攻击，撂挑子不干，急得冯国璋团团转；李纯不堪攻击，称病躲了起来。冯国璋终于明白段祺瑞的厉害，想要捣浆糊，给段祺瑞一个“参战督办”的头衔，妄图用虚名打发段祺瑞。没想到段祺瑞乐呵呵地跑去上任。

心眼多的冯国璋竟然糊涂了，忘了这个世界最基本的规则是实力。没有实力，大总统也是玩偶。有了实力，叫花子也能称王。段祺瑞直接把“参战督办”变成谁都管不着的“太上政府”，把冯国璋气得吐血。冯国璋眼看斗不过段祺瑞，试图跑回南京组织新政府，在蚌埠被倪嗣冲赶了回来，好生无趣。

但段祺瑞担任“参战督办”绝对不是为了气冯国璋，而是要彻底解决冯国璋。因为那个位置既不属于总统府也不属于内阁，可以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一边操控战争，一边彻底解决国家权力问题。从黎元洪到冯国璋让段祺瑞明白了一件事：理想的盖印机是不存在的。

任何一个人走上大总统的岗位，都不会甘心当盖印机。与其和机

器较劲，不如直接和厂商沟通。大总统的生产厂商是国会。段祺瑞认为，想要一个听话的大总统，不如要一个听话的国会。有了国会，就能生产出各种功能的大总统，这款不行换一款，直到满意为止。

当然这个招数也不新鲜，当初袁世凯就玩过。宋教仁之所以死得不明不白，就因为他在国会中占据优势。如何制造一个听话的国会呢？很简单，找听话的人即可。

说起国会，各种扯不清。

话说段祺瑞“二造共和”的成果之一便是恢复国会。但在府院之争时代，国会中一部分笔杆子倒向黎元洪。黎元洪解雇段祺瑞，请来张勋。张勋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段祺瑞赶走张勋“三造共和”，却很烦那群笔杆子，就没有恢复国会，搞了一个临时参议院。失业的笔杆子们，部分南下投靠西南派，部分倒向冯国璋继续和段祺瑞作对。

段祺瑞和冯国璋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西南派组织军政府，推选无人无枪的孙中山为大元帅。尽管一无所有，孙中山依然志向远大，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如何“非常”呢？因为人数不够，凑合开了。

如此情况下，段祺瑞让徐树铮和王揖唐（那个时代典型的亲日分子，凡事向日本看齐，日后成了汉奸）组建新国会。只要把国会弄出来，冯国璋自然就完蛋。

如何制造一个国会呢？对一般人是非常高端的，对高端的人，也就一般。

既然要重新搞国会，首先要有个地盘。徐树铮和王揖唐就在安福胡同找了一个地方，搞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名义上，俱乐部是供上流

人物吃喝玩乐的地方，实际上徐树铮是借吃喝玩乐的名义联合各路人马，筹备国会。那是中华民国第二次组建国会，号称安福国会。

国会，名义上代表国家制定政策，为百姓谋福利；更多时候也就是打口水官司的。这个世界有很多仗，每场仗都难打，最难打的便是口水仗。要控制国会，赢得口水仗，必须找到同类，就是那种和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人。所谓利益相关，通常指两种人。

第一种人，就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共同体。对皖系军阀而言，之前国会那些人背景太复杂，胃口太大，口味太刁，难以满足。但是有一类人绝对不会背弃皖系而去，那便是交通系。交通系又分成旧派和新派。

旧派以梁士诒为首。此君在袁世凯时代手腕通天，筹钱功夫出神入化，人称财神爷。正因如此，梁士诒卷入袁世凯称帝的粪坑，光荣走上帝制祸首通缉榜，惹得一身臭。正因如此，革命派和西南派均不待见他，他必须和皖系合作，方才有机会咸鱼翻身。所以梁士诒的旧交通系成为安福国会中的一支力量。

新派以曹汝霖为首。此君在五四运动中被尊为汉奸，实际在日本侵华中保持了气节，相反当初喊他是汉奸的学生倒有几个当了汉奸。曹汝霖一直和皖系合作，可以算自己人。曹汝霖的人，正是安福国会的基础。但是曹汝霖的新派和梁士诒的旧派是对头。因此徐世昌当选大总统之后，梁士诒押宝徐世昌，让段祺瑞很不爽。

第二种人是精神利益共同体。这个词看似矛盾，实际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行。精神上有共同追求，但又不是以实际利益彼此相连。有

和皖系关系如此奇特之人么？

谈到精神，就要谈到大师们。那个时代的大师们，都是玩笔杆子、打口水仗之能手。他们从清末开始用笔杆子打官司，谈论要不要君主立宪，清朝灭亡了，还在吵。袁世凯时代又在围绕共和问题用笔杆子打官司，袁世凯死了，还没完。所以国会没完没了。

到徐树铮组建安福国会那会，大师们基本上都处于沦为老古董的前夜。康有为已经被淘汰，老迈不堪，行将入土。杨度已经随袁世凯死去而沉沦。章太炎基本逮着谁骂谁，对段祺瑞从不客气。真正有活动能力的人，只有梁启超一人。

那么梁启超和段祺瑞有何精神利益呢？

其实梁启超和冯国璋关系也不错。当初蔡锷起兵反袁，就是梁启超做冯国璋和蔡锷之间的桥梁。对德绝交，黎元洪不同意，段祺瑞想让副总统冯国璋施压、又担心冯国璋不肯。段祺瑞让人找到梁启超，梁启超亲自说服冯国璋出面。

原因很简单。梁启超自诩为政体维护者，维护所有现有政体。段祺瑞号称“三造共和”之人，也是共和政体的标志。从袁世凯时代开始，梁启超就是政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首先组建民主党，随后组建进步党。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在段祺瑞政府中担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有了梁启超，就算有了脸面。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二号，新国会组建完毕，为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成员有参议员一百六十八位，众议员四百零六位，其中大部分是安福俱乐部成员。稍后的总统大选中，段祺瑞中意的徐世昌毫无疑问

当选，冯国璋灰溜溜下台。

那个时候，皖系力量到达最高点，段祺瑞的威望到达最高点。

就在那个时候，段祺瑞却辞去内阁总理职位。关于这事，很多人有很多种解释，但本人认为，没有一种人探索到段祺瑞的心思。

段祺瑞的世界

如果北洋军荡平西南派，那么段祺瑞的历史地位将堪比民国任何一位巨头。然而很遗憾，他的缺陷再一次显露出来。

安福国会原本就是皖系暗中操作，很多人不认同。比方说孙中山就不认同，一次又一次地搞护法运动，还要北伐。西南派更不认同。他们原本就站在北洋政府对立面，是否认同并不是很重要。原本就要兵戎相见，口水官司可以放在一边。

重要的是要得到北洋系统内部的认可。北洋系统内部认可，就可以齐心协力扫平西南派，那么安福国会就合法了。北洋大佬徐世昌是既得利益者，没什么反对。冯国璋是失败者，垂头丧气，没什么心思反对。还有谁呢？曹锟。

段祺瑞忽悠了曹锟很多次。曹锟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上当，皆因为迷恋最高权位。段祺瑞一次又一次地允诺曹锟副总统的位置。想要内部平安，必须让曹锟安心，给他副总统当。但是副总统选举时出了问题：议员纷纷跑到妓院喝酒也不愿选举，王揖唐到处找人也没用。大家对曹锟很不爽，说曹锟玩妓女舍得花十万，对议员太吝啬。

这一幕看起来很搞笑，实际很诡异。

那个时代逛妓院是正常消遣。议员们因为反对候选人而逛妓院，也太搞笑了。安福俱乐部大部分是皖系成员，靠皖系吃饭。即便梁启超的研究系，也要和段祺瑞合作。如果皖系真的要选曹锟，肯定能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段祺瑞不想选曹锟。除了嫌弃曹锟布贩子、没文化之外，更主要是因为曹锟是统兵大员，如果当选副总统，日后就是冯国璋第二。段祺瑞虽然扳倒了冯国璋，自己也搞得心力憔悴。

所以副总统职位空缺。

段祺瑞以为可以糊弄曹锟，但曹锟身边的吴佩孚不好糊弄。段祺瑞好不容易战胜冯国璋，好不容易战胜曹锟，想要扫平西南。

计划原本很顺利：吴佩孚带人攻占岳州，随后进入长沙，声名大振。

关键时刻，吴佩孚停了下来，发布一番“和平通电”；然后就停在那里不走，继续“和平通电”。就这样，前线的吴佩孚和段祺瑞玩起了电报大战。内容从国内战争，到对日借款，无所不包，把段祺瑞搞得非常狼狈。这些内容不致命，致命之处在于，前敌主帅和最高统帅如此撕破脸皮对着干，仗还怎么打？

与此同时，各大媒体都在反对内战，抗议对日卖国。巴黎和会不公正的结果，五四运动余波未平，舆论对内战不利。

但是仅凭一个吴佩孚，还不足以让段祺瑞辞职。

吴佩孚敢于造反的根源在于世界大局变了：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欧洲列强回过神来，日本在远东一家独大的格局被打破。日本支持的

段祺瑞日子也不好过。

段祺瑞不乏大局观，便辞去内阁总理职位，由皖系大将靳云鹏接任。从那以后，内阁总理再一次变成怨妇，更替速度堪比交际花换衣服。

其实段祺瑞可以不用辞职。但他必须避开混乱的政局，抓紧时机实施内心深处的愿望。他相信，只要实现那个愿望，他又可以如同“造共和”那般威风凛凛，挽回局势。

每个人心中都有隐秘的愿望。黎元洪试图以老好人的智慧于民休养生息。冯国璋试图回南京另组建政府。段祺瑞是谋国者。尽管他的思维是军人思维，但他有一个完整的构架，除了“武力统一”中国的愿望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对外。

段祺瑞辞职之后仍以“参战督办”的身份编练西北边防军。所谓边防军，就是原来的参战军，是段祺瑞担任“参战督办”时编练的军队。段祺瑞对德绝交，原本只想帮中国谋得一个战胜国的头衔，怎么突然开始训练西北军了？

原因很简单，随着世界大战的进展，沙俄崩溃。段祺瑞看到一种可能：乘机收回北方疆土，正如当年沙俄趁清政府混乱把它们抢走一样。所以要编练西北军。

段祺瑞的目的只实现一半：收复外蒙古。

那是段祺瑞和他的小扇子军师徐树铮一生所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北洋政府时代最伟大的一件事，整个民国时代除抗日战争胜利之外最长脸的一件事：收复外蒙古。

第六章 被遗忘的大事件

晚清七十年，最可叹之处便是失去国土上百万平方公里，尤其是黑龙江出海口的丧失，让中国失去资源无数、失去直面太平洋的机会。

如果段祺瑞的计划能实现，他将晋级到伟人行列，胜过民国所有人。

中华民国在大陆三十八年都在打仗，除八年抗战之外，其余三十年都在内战。首先北洋军和革命党打，然后北洋军内战，再然后是国民党打北洋军阀，再再然后是国民党内战，最后国共内战。如此长时间的内战，自然是民生凋敝，生灵涂地。最可叹之处便是失去外蒙。

有外蒙时，中国地图是一片枫叶，失去外蒙，成了如今大公鸡的模样。外蒙上下都是宝，上有广袤之大草原，下有各种矿产。此外还有说不清的恩怨纠纷。

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体制性探索之后，始皇帝统一帝国，以农耕为核心的中华帝国一直在历史周期律第二个层次中平稳运转。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内，南方从事农耕的农民和北方草原上的牧民征战不休。农民世界在王朝轮回，牧民世界在民族轮回。千年之后，轮到蒙古人。

欧亚大陆上，曾经的蒙古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上马弯弓、下马屠城，创造过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帝国，把欧亚大陆强势容纳在一起，其范围包括东欧的基督教之东正教世界，中

亚的伊斯兰世界，东方的华夏文明。然而因为人口太少和蒙古人的性格问题，很快便内战、分裂，逐步收缩，撤退。

朱元璋崛起之后，蒙古人失去亚欧大陆上最富饶的（华夏文明辐射）地区。随后在朱棣的打击下，蒙古人在东亚一连串的失败撤退，元气大伤。真正给蒙古人带来致命打击的是发源于东欧的斯拉夫人和东亚的女真人。斯拉夫人崛起，占领了昔日蒙古帝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女真人的崛起，从东方打压蒙古人的生存空间。

一六三三年，清朝入关十一年前，二十一岁的多尔袞统兵西进，灭蒙古察哈尔部，获得蒙古人的传国玉玺（中国历史上两枚最有名的传国玉玺之一，另一块为秦始皇用和氏璧雕刻的传国玉玺）。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人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选择斯拉夫人，要么选择女真人。经过一番扯皮之后，蒙古人决定倒向东方。

一六三五年，部分蒙古人（黄金家族后裔）归附满清，为内蒙古。

满清入关之后，黄金家族别支噶尔丹试图东侵。经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用兵，前后百年时间，终于把噶尔丹部打残，先后控制外蒙古和新疆。

一六九六年外蒙归附满清。满清强势之时，沙俄从彼得大帝到叶卡特琳娜二世均没办法。满清衰落，一个西伯利亚总督不费一枪一弹拿走黑龙江出海口，随后窥视外蒙和新疆。中亚豺狼阿古柏在沙俄的支持下已经在新疆建国，外蒙也摇摇欲坠。

关键时刻，老将左宗棠在剿灭陕甘回乱之后抬棺西行，剿灭阿古柏，收复新疆，同时震慑外蒙古。左宗棠死后，满清又是一系列惨败，

从甲午战争惨败到八国联军进中国，外蒙再一次离心离德。辛亥暴动之后，沙俄再一次怂恿外蒙独立，号称“大蒙古国”。袁世凯政府态度强硬，最终让外蒙取消独立，但承认外蒙“自治”，并允许不派军队进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袁世凯称帝前夕，中、俄、蒙三方又共同签定了一个“恰克图协定”，重申中俄声明文件中的一切条款，中国对外蒙主权失去控制。

袁世凯死后，中国日渐混乱，原本没有解决外蒙之机会。但沙俄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崩溃，新生的苏联实力还比较弱小，蒙古王公失去依靠，害怕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日本乘虚而入，策划组成一个包括内、外蒙古及其他地区（如布里亚特）的大蒙古国（那时候日本还没有力量策划满洲国）。如此情况下，蒙古很多王公又怕日本乘机侵占，酝酿重新归属中国。

但是当时的中国内战不休，大总统徐世昌只是玩偶。军阀们只对吃喝嫖赌抽有兴趣，不爽就打内战，开疆扩土的事，没那兴趣，也没那胆识。唯一有兴趣的人只有段祺瑞。

段祺瑞唯一能用的人，只有他的小扇子军师徐树铮。

早就应该介绍徐树铮，一直没有，就因为他是特殊的一个，应该放在特殊的地方。

如果在北洋政府时代选择一个英雄，必然是徐树铮。

段祺瑞与徐树铮

徐树铮，生于一八八零年，江苏萧县（现属安徽）人，据说三岁能识字、七岁能读书、十三岁考中秀才，有神童范儿。八国联军进中国，十八岁的徐树铮去山东投奔袁世凯不成却碰到段祺瑞，段祺瑞很喜欢徐树铮。十年之前李鸿章碰到段祺瑞，很喜欢，让他去德国留学，比对亲生儿子都好。段祺瑞让徐树铮去日本士官学校进修，比对亲生儿子都好。

徐树铮遇见段祺瑞，如同遇见再生父母。段祺瑞遇到徐树铮，如同遇到心肝宝贝。徐树铮一生为人狂傲，唯独对段祺瑞毕恭毕敬。段祺瑞对所有人都板着脸，老婆孩子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唯独对徐树铮言听计从。

从性格上讲，徐树铮类似杨度，他们都看不上革命党。不同之处在于，杨度恩师王凯运是大儒，徐树铮直接走进军校。从行事风格看，徐树铮也类似杨度，剑走偏锋，不稳，但很致命。区别在于，杨度在政界，徐树铮在军界。

徐树铮为人冷傲，再配上一张有些苍白的冬瓜脸，绝对让人印象深刻。

徐树铮计谋百出，诡异多变，很有谋士之风采，人称小扇子军师。

段祺瑞“一造共和”，逼宫电文就出自徐树铮之手。段祺瑞号称铁面无私，却因徐树铮得罪人不知凡几。当初段祺瑞让徐树铮当陆军次长，袁世凯皱起眉头：“这个姓徐的面冷气傲，眼中带煞，怕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想换个人。向来对袁世凯很恭敬的段祺瑞直接顶回去：“小徐对大总统很忠心，也很能干，这陆军次长一职很适合。”

日后袁世凯称帝，徐树铮冒死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上袁大元帅书》，信中写道：“天下初定，誓血未干，而遽覩非常，变更国体。民信不孚，干戈四起，大局之危，可翘足而待。惟有速下罪己之令，去奸谀之徒，收已去之人心，复共和之旧制，国势可定。若再迟疑瞻望，多延时日，是直授人以柄，自召天下之兵，非策之得也！”

当初段祺瑞去湖北瓦解黎元洪的势力，把黎元洪诱上列车之后，自己跳下来。黎元洪为什么没有跟着下车呢？因为徐树铮拿枪抵住了黎元洪的腰。黎元洪当大总统时只对段祺瑞提出一个条件：内阁秘书长不能让徐树铮干，因为黎元洪实在不想看见徐树铮。段祺瑞哈哈大笑：“徐树铮是有点性子急，但为人直爽，军人脾气嘛，大总统不必与之计较。”段祺瑞的理由也很简单：“都像徐秘书长这样做，要免去多少扯皮现象。”黎元洪则表示：“段总理这样一味纵容徐树铮，怕是今后要捅出大娄子的。”日后正是徐树铮嚣张跋扈，成为府院之争的导火索。那个时候，又是徐树铮到山东游说张勋，坚定了他复辟的决心，扳倒黎元洪。

徐树铮和段祺瑞一样，优点缺点格外明显之人，同样是有谋国之心之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同时也给中国送来千载难逢的机遇：彻底解决外蒙古、甚至收复黑龙江流域故土的机遇。

段祺瑞编练西北参战军，让徐树铮担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全权负责。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八号，徐树铮兼任边防军司令。为应对西北局势，他已经预先调集八十辆大型卡车（今天不算啥，当时是大手笔），作为日后运兵之用。

谋略

当时局势异常复杂，苏联虽弱，但沙俄的影响犹在。外蒙的政教领袖为活佛哲布尊丹巴，实行喇嘛专权，还想依靠俄国人，对宗主国很排斥。

十月二十四号，哲布尊丹巴给徐世昌写信：“大总统钧鉴：顷据库伦陈都护使声称，给予请求取消我外蒙自治公文，并编造蒙古以后遵行条件六十余条，与各赛持私室传观会议等情。本处当以如果大总统知悉此事，宜暂候如何平定谢米诺夫所招之乱党，并招集本蒙古各王公扎萨克会议，解决内患等情，函至大总统去后，今蒙古各扎萨克大致尚未到齐，间有来者，不但不愿取消自治，希望仍旧存在，即库伦所有众蒙古喇嘛民人所属人等一闻知此举，亦议论沸腾。”还是要继续“自治”。

日本野心勃勃，已经开始试探性调兵，部分王公被收买。不管是日或俄，中国政府都不敢惹。徐树铮不仅要面对日本和俄国势力，还要面对北京政府内部羁绊。库伦都护使陈毅是个书生，好高骛远，妄想自己搞定外蒙，不愿意和徐树铮分享情报。内阁总理靳云鹏虽然是皖系，却看不惯徐树铮，不想他建功立业，处处使绊子。

徐树铮带领西北军第三旅褚其祥部（约八千人）入蒙，先由宣化（北京与张家口之间）徒步至多伦（张家口北四百八十公里处），乘上备好的大卡车，向库伦进发。

库伦，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前身。多伦到库伦约两千里，因道路难走，耗时五六天。

十月二十九号，徐树铮带着大队人马到距库伦一百四十里的叨林停下来。他决定首先解决日本人。徐树铮电话驻库伦的日本武官松井中佐：“根据我派驻库伦的办事人员报称，贵国派驻库伦的武装部队多达两千余人，是否真有此事？”

其实徐树铮早已侦查明白，驻库伦日军只有一百多人，但他还是想用欺诈的办法证实一下。松井果然上当：“你的情报是不确实，我驻库伦部队只有一百二十人。”

欺诈得逞，然后是威逼。徐树铮告诉松井：“我并非准备与你们对垒作战，你们的驻军数目多少都与我无关！我所要问的是：你依据中日两国何项条约，公然在中国领土内的库伦驻军？”松井明白上了当，也没法，只好发挥强词夺理的传统：“这是我国政府因为库伦地方不靖，怕外交人员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派来少数军队，以策万全，并无其他用意。”

眼见松井强词夺理，徐树铮也不客气，以通牒的语气说：“两国之间，凡在任何一方面有所措施，而又牵涉到对方国家的利益时，必需根据事实，征得对方国的同意行之。你们现在驻军库伦，既无条约依据，又未得到中国政府同意，显然是违法行为。就请你在三小时之内，

将你们的武器送缴我驻库伦的办事处。超过时限，后果自负。”意思很明白：赶快投降，缴枪不杀。很霸道，但很解气。

松井没办法，玩起太极拳：“阁下的要求苛刻，非我的权责所能答复，必须假以五天时限，等向政府请示后再作答复。”妄图拖延时间。

徐树铮以斩钉截铁的口吻答道：“此事的根本错误，系出于日方，阁下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负责人，当然有责任替政府认错，并且也有责任改正这种错误。现在就请你拿出‘负责’的勇气，作一肯定的答复吧！”松井无言以对。

半小时之后，库伦办事处来电话：“日本武官松井，已将驻库伦军队的武器全部缴来。”徐树铮耀武扬威地开进库伦。当时那个大环境下，政府没什么自信，肉食者面对洋大人基本患有软骨病。徐树铮一番口舌就让日军缴械，干得非常漂亮。

世人骂皖系卖国。如果真的卖国，徐树铮绝对不敢这么干，段祺瑞绝不会让他这么干。他们与日本合作是与狼共舞，但维护国家利益也不含糊。这是他们和汪精卫之流的本质区别，也是谋国者和卖国者的本质区别。

徐树铮，好样的，给你赞一个。

徐树铮自己也认为干得很棒，心血来潮，露出秀才本性，赋诗“早发叨林”：

冲寒自觉铁衣轻，莫负荒沙万里行，
似月似霜唯马啸，疑云疑雨问鸡鸣。

中原搅辔信孤愤，大海回澜作夜声，
且促毡车趁遥曙，沉沉闾阖渐清明。

——很有边塞诗人的感觉。

好吧，我本秀才，无奈成了军人。

功勋

徐树铮缴了日本人的械，断了部分王公依靠日本的念想，剩下的就是解决主要问题，沙俄扶持的活佛哲布尊丹巴了。徐树铮很懂得武力威慑的意义：对于善变多疑的人，要用绝对力量震慑之。徐树铮让大卡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军人从库伦城穿过，驶入西郊红城（袁世凯时代建的军营），士兵不下车，再绕出去，开进来。如此这般反反复复，给人一种大兵来临之感。加上红城规模宏大，足以容纳五个师的兵力，搞得蒙古人认为还是中国故乡靠得住。可以说徐树铮刚亮相便博得满堂彩。蒙古人视他如神明，尽管他只有四十多岁（看上去更年轻），而且长着一张不讨人喜欢的冬瓜脸。

四十年前，左宗棠收复新疆用了数年时间，大小数十战。徐树铮收复外蒙，前后仅二十二天，不费一枪一弹。

二十二天的时间内，他有十四天在学习：恶补蒙古语。徐树铮请来翻译，交代左右：“在我学习蒙古文之时，非有特别重要事故，概不会客。”他知道喇嘛们多疑，担心翻译出现误会，决定用蒙古话和

他们交流！

用现代思维看，那个举动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要知道现代众多学子，苦读十年尚且说不了几句外语。要两周掌握一种语言，除非奇迹发生。然而奇迹就是发生了。

十一月十四号，徐树铮会见蒙古“总理”巴特玛和众喇嘛，就用蒙古语交谈！

奇迹是如何实现的？不要忘了，人家原本就是神童，很小就能应对写满“之”“乎”“者”“也”的经史子集，放现在也是学霸。

巴特玛既是总理，又是喇嘛领袖之一，是哲布尊丹巴身边最重要的几个人之一，平时走路眼高于顶，蒙古王公都得让他几分。徐树铮认为，擒贼先擒王。要摆平外蒙，必须摆平哲布尊丹巴。要摆平哲布尊丹巴，必须摆平巴特玛。

徐树铮不仅是学习天才，也是玩弄权术的天才。年纪轻轻就把胡萝卜和大棒玩得滚瓜烂熟：一边对喇嘛们表示尊重，给胡萝卜；另一边请他们去观赏军队操练，展示大棒。

目的只有一个：让蒙古撤销“自治”，回到祖国的怀抱。

很多喇嘛对徐树铮的做派很不爽，但碍于徐树铮大棒在手，也没办法。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号是一个大日子。那天蒙古高层开会，决定前途归属问题。具体情况如何，参见徐树铮给北京政府发的电报即可。

电报一：“寒（十四）日到巴特玛寓所议商条件，因仍为去喇嘛权

利，树铮坚持欲定条例非简略不可，详细办法可另订办事章程，或不定条例，但由佛率众具请撤治，一切办法统待另商，或派人随树铮入京详定。渠狡展良久，逼之去谒佛。树铮寻又严词诘谕，谓祸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渠情状极畏惧，大约一二日内，可见定夺矣。制树铮。删（十五）”

电报二：“删电计达，今日巴特玛召集喇嘛王公全体会议，议定先由活佛盖印，率众具呈自请撤治；一切条件办法，概从另定。飭人求，今晚不必再逼，日内定即办妥。树铮允以不逼，但仍须从速办结，由活佛派大员随树铮入京，觐谒大总统致贺云云。恐其夜长梦多，故必严促其速定也。仅此报呈，伏祈察核。制树铮。删二”

电报三：“删二陈报蒙员会议情形，并求树铮今晚不必往逼，系都护派人来告，谓蒙员托其转达。电发后，有人询巴特玛何以会议未散，匆匆先归？答云：昨徐公限定晚六时晤面，故早归待之。树铮即往晤，始悉所定办法稍有不同，都护是传闻之辞。活佛签名盖印，向无此例；由官府各部长签名盖印，声叙会议公决，活佛允准，请为代陈政府。查清室逊政，亦由太后谕内阁与民国大员交接，并非帝后自须具名。夜郎虽小，帝制自娱，佛不具名，亦于外无嫌，慨然允之，并致昨晚鲁莽歉意。其公文旦夕即定也。仅此陈明，伏乞察核。制树铮。删三”

——尘埃落定。

十一月十七号，外蒙自治政府请求撤消自治的呈文送给筹边使：“外蒙自前清康熙以来，即隶属于中国，喁喁向化，二百余年。上自

王公，下至庶民，均各安居无事。自道光年间，变更旧制，有拂蒙情，遂生嫌怨。迨至前清末年，行政官吏秽污，众心形益怒怨，当斯之时，外人乘隙煽惑，遂肇独之举。嗣经协定修约，外蒙自治告成，中国空获主权之名，而外蒙官府丧失利权。迄今自治数载，未见完全效果，追念既往之事，今人诚有可叹者也。”

十一月二十二号，徐世昌代表中国政府发布明令：“核阅来呈，情词恳挚，具见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及王公喇嘛等，深明五族一家之义，同心爱国，出自至诚。应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所有外蒙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应受之尊崇，与四盟沙毕等应享之利益，一如旧制，中央并当优为待遇，俾其享共和之福，垂于无穷，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

继六百多年前蒙古人南下之后，继两百多年之前归附大清之后，蒙古再一次选择自己的归属问题、再一次选择归属中国。只是六百年前他们是征服者，两百年前他们是被征服者，这一次，他们是自愿。虽然徐树铮大军压境，但依然是自愿。

那是北洋政府最为光鲜亮丽的一天。

十一月二十九号，徐树铮离开库伦回北京，顺便给孙中山发了封电报。孙中山给回电：“比得来电，谗知外蒙回，四内响应。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忻鼓舞之不已。”把徐树铮比作陈汤、班超、傅介子，并不算吹捧。因为徐树铮用的时

间更少，成绩更大。

十二月二十七号，徐树铮以活佛册封专史的身份回到库伦，受到各界热烈欢迎。他给库伦送去两样东西：象征北京授权的七狮金印和一道册封诏书。

诏书说：“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赞助取消自治，为外蒙谋永久治安，仁心哲术，殊堪嘉尚，着加封为外蒙古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以昭殊勋。此令！”

徐树铮不仅会使用计谋，还能搞行政管理。蒙古人没有银行，徐树铮开办银行。蒙古人没有蔬菜，徐树铮找到合适的地方种植大白菜。蒙古人没有公路，徐树铮帮他们修筑公路。与此同时，徐树铮还创建报刊、发扬中华文化。

徐树铮经营外蒙，堪比左宗棠经营新疆。

徐树铮，英雄。为了和那个年代的英雄区别开，在英雄前加个定语：民族英雄。

徐树铮是中华民国前半期唯一的民族英雄。

如果中华民国内部安定，按照那个态势发展下去，蒙古不用多久就可以如同内蒙一样，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趁沙俄解体、苏联羸弱之际，可以伺机收复外东北。

华夏大地三江（珠江、长江、黑龙江）一河（黄河）向东流。看看如今的生态版图，珠江入海口的三角地区是南方经济核心，长江入海口的三角地区是中部经济核心，黄河入海口的渤海湾地区是中北部的经济重地，唯独差了一个黑龙江入海口。如果黑龙江入海口在中国，

就能极大释放东北的能量，海参崴就可以变成类似深圳的地方。外东北的资源将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加速中国在历史周期律第四个层次内的启动速度，加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而很遗憾，他们没有那么做，而是分别为各自的利益打内战。南方的孙中山正在准备第二次护法运动，准备北伐；洛阳的吴佩孚正在前线撤退，并准备代表直系和段祺瑞决战；张作霖准备入关占地盘。他们不仅未能拿下外东北，还丢了外蒙，而且给豺狼日本留下可乘之机。华夏大地生灵涂地。可恨！

接下来的大乱中，除孙中山赢得身后声名之外，其他人在动乱中输得精光，包括历史地位和身家性命。可悲！可怜！

但这就是历史周期律第二层的节奏，任何政权的历史趋势都趋向灭亡。身在其中的任何一人都是可怜的。乱世人命贱。

七章 悲剧

英雄的结局

英雄很不容易当。从陈胜、吴广到黄巢到李自成，结局均不好。

近代英雄同样不容易当。彼得大帝为改革杀了自己的太子，解放黑人的林肯总统被刺杀，推动明治维新的伊藤博文被刺杀。

民国时代，发出千年怒吼的金兆龙郁郁而终，无人问津。打响射

落大清王冠第一枪的程定国被革命党装入麻袋沉入江底。这是低级别的。

高级别的张振武和蒋翊武均死在自己人手中。

更高级别的陶成章被蒋介石刺杀，宋教仁死得不明不白。

最高级别的黎元洪在大总统的位置上成为玩偶。级别是独一无二的孙中山，也是居无定所，长期光荣地躺在通缉榜上，没有立足之地。那么民族英雄徐树铮又如何呢？

徐树铮没有时间经营外蒙。接下来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徐树铮逃到上海，投奔皖系卢永祥。吴佩孚让孙传芳等人进攻浙江和上海。卢永祥通电下野，徐树铮试图继续作战，却被上海工部局软禁，后赴海外流亡兼考察，写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时间是一九二四年。

随后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先胜后败，段祺瑞再度出手，徐树铮回国，试图再兴波澜。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号，徐树铮进京向段祺瑞汇报考察结果，并讨论时局。在他进京之前，很多人就劝他“切勿进京”或“暂缓进京”，段祺瑞也好几次提醒他。

但徐树铮不以为意，还是去了北京，结果发现北京形势很不好，便于十二月二十九号南返。死神正在前方。那天中午，段祺瑞突然在书架上发现一个纸条：“又铮不可行，行必死。”段祺瑞赶紧派人拿纸条去车站追，徐树铮不以为意，依然南下。

其实想杀徐树铮的人、能杀徐树铮的人只有一个，也是传奇般的

人物，也很有种，也算英雄。他便是囚禁曹锟、把溥仪赶出紫禁城的冯玉祥。

冯玉祥要杀徐树铮有两个理由，私怨和公理。

所谓私怨，便是六年之前，徐树铮杀掉了冯玉祥的舅舅陆建章。徐树铮抵达北京的第一天，冯玉祥命鹿钟麟拘禁徐树铮在政府担任要职的老朋友曾毓隤、姚震等人，断了徐树铮的手足耳目。与此同时，冯玉祥还从手枪队中挑了二十人，由发誓要报杀父之仇的陆承武带领，化装入京，伺机行刺。但陆承武一直没能得手，暗杀计划又变为在徐树铮赴天津途中进行。

鹿钟麟于是向冯玉祥请示：“徐贼一走，从此多事。如决心干掉他，仍可用电话命令张之江执行。”冯玉祥当即命鹿钟麟转达张之江，用工兵队埋地雷炸车。

张之江当时担任冯玉祥部第五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接到命令后找参谋长黄忠汉商量，决定“先礼后兵、截车抓人”，然后命第七混成旅代旅长兼参谋长彭仲森执行命令。

半夜十二点十五分，徐树铮专列抵达廊坊车站，黄汉忠和彭仲森在等他。黄忠汉手持张之江的名片上车，对徐树铮说：“张都统特开欢迎会，请专使下车。”

徐树铮感到不妙，应付说：“极感盛意，只是我此时有些头晕，不能下车，请张都统谅解。”并派代表代替自己赴会。先礼不成，便后兵。彭仲森的人蜂拥登车，立刻将徐树铮和随员、跟差等，尽数架下列车。

徐树铮临危不惧，冷冷地对众士兵说：“我徐某不劳诸位费心！”

徐树铮下车之后，随即被拥到离车站不远处被枪杀。

年仅四十五岁。

一代英雄，死得不明不白。

事毕，张之江立即电话报告鹿钟麟，鹿钟麟又立即报告冯玉祥。

冯玉祥命鹿钟麟转令陆承武当夜赶往廊坊，承认自己替父亲报仇。

十二月三十号，冯玉祥安排人向上海《时报》发出“徐树铮专车被炸”的新闻。同时陆承武向各大报馆发电报：“先君建章公，曾以微嫌，竟遭徐贼残害。承武饮泣吞声，于兹七载，本月二十九日，遇徐贼于廊坊，手加诛戮，以雪国人之公愤，藉报杀父之深仇……”

后人回顾那件事，注意到所谓私人恩怨，往往忘记最重要的公理。

但那个时代的公理，不像如今这般。

那么那个时代何为公理呢？

所谓公理

段祺瑞得知徐树铮被杀，禁不住痛哭失声：“断我股肱！断我股肱！”段祺瑞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十几岁便徒步两千里去当兵，各个层次都是名列前茅，人品和官品均无可挑剔。唯独在得知徐树铮被杀时放声大哭。当时的段祺瑞执政北京政府，理论上相当于大总统兼任内阁总理，却无法保徐树铮一命，只能像怨妇一样哭泣，何其悲哀。

那么起于行伍、北洋练兵，掌控北洋军几十年的段祺瑞怎么只有

哭的份？

答案还要从很久之前说起。当初李鸿章在天津开办武备学堂，学生主要来自两个地方：李鸿章的老家安徽和最重要的省份直隶，那便是皖系和直系形成的土壤。日后袁世凯小站练兵，骨干仍然是安徽人和直隶人。由于段祺瑞和冯国璋过于出色，分别成为皖系和直系的核心。

袁世凯死后，名义上是府院之争，实际上是皖系和直系明争暗斗。黎元洪两次担任大总统，两次拉拢直系不成而下课。冯国璋担任副总统，就受到皖系倪嗣冲和张敬尧的牵制。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最终没斗过段祺瑞，把直系大旗让给了曹锟。

两派终于从暗中较量升级为兵戎相见。

直系和皖系彼此较量的过程中，张作霖在东北从黑道走向白道、完成从流氓到大流氓到大英雄的蜕变，一统东北，很有些努尔哈赤当年的味道。奉系由此形成。

三股势力都想问鼎天下，都试图逐鹿中原，都一败涂地。

那个时代所谓的公理，就是扩充实力消灭异己，赢得天下之权柄。可悲的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有不择手段的手段用尽，目的依然没有达到。只有民生凋敝，生灵涂炭而已。

然而皖系风光那会，也没能实现目的，最后一败涂地。因为皖系背后有个影子，日本。段祺瑞利用日本的支持战胜了黎元洪和冯国璋，试图武力统一中国，把皖系推向鼎盛。就在那个时候，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支持直系。段祺瑞和徐树铮收复外蒙，直接损害了日本的利益。

奉系张作霖又想入关，便和直系联手。所以皖系在直皖战争中惨败。

直系依靠吴佩孚战胜了皖系。但吴佩孚和段祺瑞从行事风格和主张都一样，所以战争还在继续。直系原本可以压倒奉系，但关键时刻，冯玉祥临阵倒戈，直系惨败。

张作霖的招数和段祺瑞一样，试图利用日本人实现宏图伟业，最后还是倒在日本人手中。

怎么样，很乱是不是？其实也不乱。

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节点：一九一八年，徐树铮杀陆建章。

但是必须指出，皖系不仅仅是安徽人，直隶人也不全是直系。皖系的徐树铮当时就属于江苏人，傅良佐是湖南人。王士珍虽然是直隶人，却不属于直系。陆建章和冯玉祥虽然是安徽人，却归了直系。冯玉祥虽然归了直系又摧毁了直系。

历史节点

一九一八年夏天，德军元气耗尽，失败在所难免。恰在那时，段祺瑞改造国会完毕，把冯国璋赶走。段祺瑞和徐树铮看到，列强必然再次干预中国，必须赶快实行武力统一，结束国内战争，并伺机解决外蒙和外东北。

用军人思维看，有一个人是巨大障碍，就是陆建章。

陆建章生于一八六二年，安徽蒙城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北洋军系的精英分子。

当初袁世凯得势，陆建章为总统府警卫军统领兼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主要差事：杀人。很多革命党都死在他手上，比方说张振武，江湖人称屠夫。由于杀人水平很高，白朗起义时，袁世凯让陆建章去陕西，成为督军。在那里，陆建章充分发扬军人敛财之手段，增加税收那是最基本的，高端项目则是贩卖文物，偏门项目则是贩卖大烟、开设妓院。陆建章一边敛财，一边搞特务活动，常常以搜捕革命党为名到处干坏事。

袁世凯称帝，陆建章极为活跃，因劝进有功而被册封为一等伯爵。

从各方面看，陆建章都不是好人。因为他太过分，激起陕西各界反抗。陈树藩看到陆建章丧失人心，便取而代之。为了让陆建章屈服，陈树藩以陆承武的性命相威胁。陆建章没法，只好让出陕西督军之职。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看上了陈树藩。于是陆建章虽然是安徽人，却决定和段祺瑞为敌，先投靠张勋，后投靠冯国璋。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恶人必然很无能，好人必然很厉害。其实不然，陆建章虽然不是好人，却很能出点子。加上他对段祺瑞和陈树藩的恨，总能想出办法让皖系难受。冯国璋和段祺瑞斗争，很多让段祺瑞难受的主意均来自陆建章。比方说陆建章指使冯玉祥在关键时刻发表“和平通电”，就把段祺瑞的鼻子气歪。

一九一八年，在冯国璋失败的情况下，陆建章出主意把曹錕推出来对抗皖系，并试图联络督军团开会，对抗段祺瑞。徐树铮认为，必须除掉一肚子坏水的陆建章。

闻陆建章北上，徐树铮便打电话邀他叙叙旧。见面后，眼高于顶

的徐树铮以晚辈自居，对陆建章很尊重，陆老长陆老短，把陆建章搞得晕晕乎乎。随后徐树铮邀陆建章去后花园散步消遣，陆建章也没有在意。徐树铮利用那个机会掏枪打死陆建章。

随后徐树铮给了政府一份报告：“迭据本军各将领先后面陈：屡有自称陆将军名建章者，诡秘勾结，出言煽惑等情。历经树铮剴切指示，勿为所动。昨前两日，该员又复面访本军驻津司令部各处人员，肆意簧鼓，摇惑军心。经各员即向树铮陈明一切，树铮独以为或系不肖党徒，蓄意勾煽之所为，陆将军未必谬妄至此。诂该员又函致树铮，谓树铮曾有电话约到彼寓握谈。查其函中所指时限，树铮尚未出京，深堪诧异。今午姑复函请其来晤。坐甫定，满口大骂，皆破坏大局之言。树铮婉转劝告，并晓以国家危难，务敦同袍气谊，不可自操同室之戈……”段祺瑞接到报告之后叹息：“又铮又闯祸了。”

陆建章不是好人，但轮不到徐树铮去杀。而且徐树铮杀人的方式很不地道。更致命的是，陆建章的谋划成功了，曹锟成了直系新领袖。最致命的是，陆建章的外甥冯玉祥是血性男子，有仇必报。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也非弱者。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五年之后，冯玉祥和陆承武杀徐树铮报仇，理由和徐树铮杀陆建章一致。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答曰，牵扯到一批奇特的人，怪人。看他们的行为，不像人，更像怪兽。他们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军阀。

正是军阀造就了近代乱象。如果是内阁总理和大总统争权导致政令不通，导致大总统沦为玩偶。那么军阀横行则让内阁总理变成怨妇。

他们是时代的怪兽，和那个时代的大师们一样，在体制被动更迭时闹出种种闹剧。

第四篇 军阀和怪兽

序 不合时宜的英雄

那是最乱的时代。

那个时代并不算遥远，却很陌生。对那个时代的批判足够多，骂的足够多，但理解却不够多。对那个时代的个体，批判够多、谩骂够多、甚至有些赞扬和宽容，但理解不够多。

许多人许多事至今依然一团乱麻。为了把他们描述清楚，本人分别从大师、大总统、内阁总理、军阀四个角度阐述。经过分析，本人发现他们每一种人对应一种特征：大师对应老古董，大总统对应玩偶，内阁总理对应怨妇，军阀对应怪兽。

四类人中，前面三种人作为个体，虽然也遭到各种形式的批判、谩骂，但也有各种赞扬。比方说赞扬梁启超的学问，比方说赞扬章太炎的风骨，比方说赞扬黎元洪老好人，赞扬段祺瑞的人品和官品，如此这般等等。但是对军阀，从来都是批判或谩骂，没有其他。

本人没有为军阀们翻案的意思。但本人认为，善恶皆有因果，都需要去理解。

那个时代之所以乱，就是因为大师们毫无例外地沦为老古董，大

总统毫无例外地成为玩偶，内阁总理均沦落为怨妇，军阀则沦为怪兽；是因为帝国崩溃之后，新的秩序难以建立。除了外部列强侵袭，根本原因就在于军阀们。他们肆无忌惮地抢地盘，无法无天。

从军阀的行为上，很容易找到许多兽性，如狼的贪婪狡诈，豹子的残忍，狮子的无情。横行无忌这些事是最基本的，少一点烧杀抢掠就算阿弥陀佛了；强抢民女回家当老婆都是比较有节操的行为，多约束一下大兵就不错了；坑蒙拐骗这些事也不说了。

这些都是明显的兽性。主流世界观把军阀们看成反面教材，属于阻碍革命力量的老顽固，需要革除。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个定论是对的。

要了解军阀们的行为，必须了解他们的共同点：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基本出身寒微，一步一个脚印爬出来。学历最高的吴佩孚，仅仅是秀才，相当于如今的高中生。他们经历过战场考验，精于尔虞我诈，从个体角度看，他们都是精英级别。当年讨伐，如今批判，这一切都不能否认他们曾经是英雄。不合时宜的英雄也是英雄，没必要把所有英雄都披上道德的外衣。

所谓怪兽，后人往往把目光焦距在“兽”，而忘记了“怪”。比方说搞复辟的张勋，杀人如麻，行为怪异。但事实上他有一颗属于帝国的灵魂。理解了这一切，便见怪不怪。为说明一个问题，再看一个例子。

一九二零年十月十一号，四十六岁的大军阀李纯中弹身亡。据多方证据分析，系自杀。李纯当时为长江三都之首，身家千万，坐镇南

京，为何自杀呢？

李纯出身鱼贩子，早年家境不好，和曹锟类似。因二姐夫当兵吃饭，随之入军营，成为天津武备学堂第二期一员，毕业后到北洋陆军。李纯文化程度不高，但很会为人，爱财的冯国璋和不爱财的段祺瑞均看他很顺眼。因为是直隶人，又被冯国璋提携，成为直系军阀标杆。

冯国璋进攻武汉，李纯是攻坚力量。二次革命，李纯在江西战胜李烈钧，担任江西都督。冯国璋去北京担任大总统，李纯改任江苏都督，坐镇南京，替冯国璋掌控长江流域。冯国璋终于没能斗过段祺瑞，郁郁而终。但李纯和曹锟合作，打垮了段祺瑞的皖系。本应该大捞特捞，大享受特享受之际，怎么就开枪自杀了呢？才四十六岁，正当盛年。

据各路专家分析，李纯自杀的原因之一是身体不好，导致精神恍惚。这个观点很扯。那个年代的军阀是从死人堆爬出来的，会因为身体不好自杀？而李纯自杀前只是摔过一跤，受了点小伤而已。而且他的遗书写得条理清晰，怎么看都不像精神有问题。

专家分析李纯自杀原因之二，因财政厅长任命问题导致报纸口诛笔伐，不堪舆论重负而死，更扯。当初进攻武汉，李纯被报纸骂得狗血淋头都没去自杀，会在一九二零年玩这个？

李纯死前留下五封遗书。其中四封是交代家事和江苏省政事，都是很现实的。但第三封遗书却写得相当耐人寻味：

和平统一，寸效未见。杀纯一身，爱国爱民，素愿皆空。求同胞

勿事权利，救我将亡国家，纯在九泉，亦含笑感激也。

李纯别言

十月十日（自杀前一天）

本人认为，这封遗书恰好道出李纯的精神世界。按照后世的印象，军阀基本上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干的那类人，怎么会与“爱国爱民”、“和平统一”这般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呢？答曰，因为那是事实，只是被遗忘了。

李纯是冯国璋的铁杆，镇压革命党，勇往直前；和段祺瑞死磕，不当孬种。李纯之所以支持冯国璋，是因为坚信“和平统一”。吴佩孚战胜段祺瑞之后，却重走了段祺瑞的道路。

李纯眼见“和平之路”无望，倦了，心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魂和选择，好比王国维选择投水自尽。军阀也是人，也有自身追求，也会厌倦，也会自杀。

如何解析这个过程？必须从吴佩孚开始。

一章 乱世奇葩

吴佩孚生于一八七四年，山东蓬莱人。他爸爸是小商人，很早就送儿子去念私塾。但是在十岁那年，他爸爸死了，吴佩孚母子成了孤

儿寡母。这点和蒋介石的童年有些相似。不同的是，吴佩孚最后考上了秀才，算小知识分子，蒋介石年轻时则爱捣蛋。

当时清朝还在，吴秀才还是有前途的，至少混饭吃没有问题。不幸的是吴秀才患上了当时的流行病——抽大烟，而且烟瘾很大。一八九七年某日，二十三岁的吴秀才去烟馆抽大烟，结果普通包房没了。烟瘾大发的吴秀才想去包厢抽两口霸王烟，结果和富翁发生了冲突，然后成了通缉犯。吴秀才只好离家出走，到天津靠测字忽悠人。鉴于年轻斯文相，怎么看都不像有道行的高人，忽悠不了几个人。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投笔从戎。

然而吴秀才身子骨文弱，怎么看也不像大兵，经常被欺负。羊入狼群的吴秀才也不反抗辩解，忍。大家看他又弱又呆，就喊他吴傻子。好在上司还算有人性，看他没有战斗力，就让他当个跑腿的勤务兵。有一天，吴秀才为巡抚营幕僚送文件，指出文件里用错了一个典故。那幕僚很惊讶，一问之下，不得了，眼前的勤务兵竟然是秀才，知识分子啊，不得了，不得了，赶紧和吴秀才结拜为兄弟，时不时把吴兄弟请回家吃饭。到底是知识分子待遇好啊。

那幕僚叫郭旭栋，也是个落魄秀才。正是在郭旭栋的举荐下，吴佩孚去了保定军校进修，军校校长正是段祺瑞。军校毕业之后，吴佩孚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人。

青年时代的吴佩孚虽然勤学好问，却也满身缺陷。但是进入军营之后却变成另外一个人，改掉了所有恶习，变成一个五好青年。那年头的军营是一个大染坊，经常把白的染黑，很少能把黑的漂白。吴佩

孚这般，绝对是异数，就凭他戒掉大烟这一点，毅力和意志就非同一般，堪比段祺瑞年轻时代千里徒步从军。

吴佩孚的转变和段祺瑞并无直接关系。两人虽然一辈子恩怨，却仅仅见过一次面，还是在日本侵华前夕。当时段祺瑞已经很老了，吴佩孚上前施礼，段祺瑞没认出来，经旁人提醒方才反应过来。吴佩孚的恩人是曹锟。

吴佩孚和曹锟

吴佩孚毕业之后去了东北，出于爱国情结，在日俄战争期间给日本当间谍（沙俄想侵占东北）。据说吴佩孚被俄国人抓住，拷问了几个月，硬是没开口。战后曹锟去东北，遇见吴佩孚。当时曹锟是东北最高军队长官，袁世凯的心腹。彼时吴佩孚已经从军十年，依然不得志，因为他是一朵奇葩，和段祺瑞一样的奇葩。

吴秀才从军之后，虽然军事素质练习得还不错，但不修边幅，不像军人。不像军人也就罢了，书生气还特别浓。他为人孤傲，整天板着一张脸，仿佛别人欠他五斗米，这点也和段祺瑞很像。军队大老粗喜欢的粗话黄段子，都和他无缘，也就谈不上混事业。闲着没事拿本《周易》在那里研究，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模样。更关键的是，他很清高，不行贿不受贿，也就没法搞人际关系。所以吴秀才虽然很有才华，却没有得到重用。

曹锟也是运气很好的人。按照运气指数，曹锟是那个时代运气第

二好的人，仅次于黎元洪。曹锟的好运气来自两个人：袁世凯和吴佩孚。曹锟认准袁世凯，便一路追随到底。袁世凯给了他钱和地位。他之所以能坐到大总统的位置上，皆因吴佩孚。

曹锟到东北之后听说吴佩孚很不错，突然闯入吴佩孚的营帐，只见一个眉目清瘦、衣冠不整的人在看书。吴佩孚茫然地看着曹大帅，经人介绍后方才记得行军礼，却发现没戴帽子，赶紧改为鞠躬，逗得曹锟哈哈大笑。

就这样，二人开始了二十年生死与共的生涯。那么书生气很浓的吴佩孚怎么会和贪财好色爱权力的曹锟合作那么久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曹锟是个混不吝，但又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混不吝。混江湖出身的曹锟本就善于和各种人打交道，他自己不喜欢看书，但对有知识的人很尊重，对书不离手的吴佩孚更是关怀体贴。

跟随袁世凯那么多年，御人之术还是学到不少，曹锟想考验一下吴佩孚，就让他去测绘中俄边境的兴凯湖。除客观环境恶劣之外，还要在俄国人眼皮底下完成任务，风险很大。曹锟问吴佩孚要带多少军队，吴佩孚说，十八人足矣。曹锟很吃惊。一个半月之后，吴佩孚圆满完成任务。曹锟更为惊讶，二话不说，让吴佩孚担任炮兵第三标一营管带。

北洋军主要由步兵、马兵、炮兵构成，但炮兵地位最高。那个时代，炮兵是新兵种，军费比步兵高一倍，军官薪水比步兵高一倍，升职空间很大。可以说曹锟给予了吴佩孚最大的信任。要知道曹锟贪财又好色，要知道吴佩孚既不会给曹锟送钱，也不会给他送女人，还时

不时提意见。不仅如此，吴佩孚还无意中把已经引起曹锟色心的张佩兰娶了，好色的曹锟居然毫不介意。如此用人不疑，少见。

曹锟对吴佩孚的信任得到超额回报，好几次遇险，均得吴佩孚出手相助。

袁世凯称帝，蔡锷起兵，曹锟率军进入四川对抗护国军。

冯国璋和段祺瑞给袁世凯送了致命的“二陈汤”，曹锟被闪在半空中。当时曹锟很伤心，他想不明白，大家既然都靠袁世凯吃饭，为何要反对袁世凯。段祺瑞伸出温暖的大手之前，曹锟以为自己完了，急得眼泪直流。就在曹锟六神无主之时，吴佩孚告诉曹锟，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所谓明修栈道，就是与北洋军维持关系。所谓暗度陈仓，就是和西南护国军“暗通曲款”，同时和段祺瑞虚与委蛇。不论形势如何发展，自己都会立于不败之地。

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转正，大权落到段祺瑞手中。曹锟原本痛恨段祺瑞，不想与之合作。吴佩孚再次告诉曹锟，赶紧准备一副上等围棋给段祺瑞送去。段祺瑞别的礼物不要，对围棋则爱不释手。加上段祺瑞本来就要拉拢曹锟为己所用，便趁机把曹锟调到直隶当督军。

换成一般人，走上直隶督军的位置一定会非常满意。曹锟也很满意，开始寻欢找乐子。当时的曹锟并不出众，不要说对比段祺瑞和冯国璋，就是对比皖系的倪嗣冲、张敬尧和直系李纯、王占元，都没有优势。按照曹锟那一套，绝对不可能在日后的军阀中脱颖而出。曹锟之所以可以在数年之后战胜段祺瑞和张作霖，号令天下，关键在于吴佩孚给他做了一个规划。正如刘备之所以能三分天下，关键在于诸

葛亮给他做了一个计划。

吴佩孚告诉曹锟：要争霸天下，需要走好接下来的两步。第一步，用数月时间练兵，把第三师恢复到以前的水准。曹锟表示同意。

第二步，用数年时间，扩军备战，把第三师扩编为六个混成旅，为原来的三倍。曹锟张大了嘴巴，表示不敢相信：刚刚死里逃生。能当上直隶总督已经是造化，扩军的事，想都没想过。但练兵扩军太有诱惑力了，曹锟清楚地记得，袁世凯就是练兵起家，他自己也是练兵起家。所以惊讶过后，曹锟敞开胸怀，放手让吴佩孚去干。

练兵也需要钱。曹锟自己爱财如命，不肯出血。中央财政处于崩溃边缘，即使有钱，段祺瑞也不可能给曹锟去练兵。吴佩孚决定自己筹钱，并对此胸有成竹，招数如下：

招数之一，让曹锟找借口向中央要钱，能要多少要多少。——哭穷。

招数之二，在曹锟的地盘增税。——搜刮民脂民膏在所不惜。

招数之三，控制京汉铁路北段收税。——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耍流氓。

招数之四，截留税款。——中央收的税，直接截下，耍流氓。

——什么叫军阀？这就是。要命的是，吴佩孚还属于军阀之中品味较高者。

——中央财政为何崩溃？原因在此。

当然喽，曹锟虽然练兵起家，但如今已经跻身权贵行列，拖着一身横肉享受锦衣玉食，自然不能再去干练兵那种苦活累活。没有关系，

吴佩孚愿意代劳。

吴佩孚告诉曹锟，他将从整顿军纪抓起。吴佩孚提出五条：不得松懈；不得无故请假；不能向民众吃拿卡要；要保护驻防区内的老百姓；要剿匪。曹锟对此表示全力支持，让吴佩孚放开手脚去干。提出这么几条不难，难在执行。吴佩孚执行得很好。

吴佩孚的心思

纵观曹锟和吴佩孚二人。文韬武略，吴佩孚都要胜过曹锟一筹。那么吴佩孚为何一心忠于曹锟，而非像那个时代其他军阀那般另起炉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也很不容易。

很容易之处：北洋军系内，保定军校毕业的吴佩孚只是小字辈，想要有所作为，必须有靠山，漂泊那么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靠山，自然要抓住。

很不容易之处：为何要找一个相对庸碌的曹锟为靠山呢？普通人的想法，靠山么，总是越硬越好。有才之人，通常需要一个庸碌的靠山，方得尽情施展。昔日韩信在项羽手下没有机会，到刘邦那里一飞冲天，就是这个道理。

吴佩孚依靠曹锟的好处：曹锟发达之后精于享受，把练兵的事交给吴佩孚。那么吴佩孚就可以利用练兵的机会安排自己人，发展自己的势力。吴佩孚并没有把练兵之地选在保定，而是选在河南洛阳。

河南是中原之地，任何想要大干一番事业之人不能忽视的地方。

由此可以看出吴佩孚的雄心。但北洋军在河南一直很薄弱。吴佩孚选择在洛阳练兵，大的形势看，虎踞中原。小的形势看，天高皇帝远，北洋元老管不着。即便是曹锟，也管不着。这便是吴佩孚的高明之处。

就是在洛阳，吴佩孚羽翼丰满，成为赫赫有名的中州王。

更高明之处在于，吴佩孚虽然远离曹锟，却一直忠于曹锟。毫无疑问，没有吴佩孚，曹锟不可能在那个时代的军阀之中脱颖而出。曹锟是船，吴佩孚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吴佩孚没有颠覆曹锟，而是选择两人合作，水涨船高。

如果吴佩孚颠覆曹锟，那么他将暴露在众军阀的攻击火力之下；躲在曹锟身后，他可以安心练兵，干一番事业。对于军人而言，所谓干事业，自然要拉出一支队伍打天下。要在兵、将、帅各个层次过关，或者更高一层，比方说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军。

可以把军人的事业分解出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变成优秀的指挥官。一个优秀的指挥官要具备如下素质：不一定指挥千军万马，但一定要指挥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唯有如此，方能进一步前进。

第二步，要打败那个时代的强者。

第三步，征服天下。

对吴佩孚而言，曹锟的知遇之恩，让他有机会拉出一支自己的队伍。第二步就是要掀翻那个时代的强者。那个时代的强者有两个：段

祺瑞和冯国璋。吴佩孚既没有能力挑战段祺瑞，也没有能力挑战冯国璋。他选择等待机会。

机会很快来了：冯国璋在和段祺瑞的斗争中失败，北洋军分裂，曹锟扛起直系大旗，吴佩孚有了和段祺瑞较量的本钱，这是其一。其二，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在远东地区一家独大的局面即将被打破，段祺瑞的靠山摇摇欲坠。最关键的是其三，吴佩孚找到了段祺瑞的破绽，足以给段祺瑞致命一击。

吴佩孚和段祺瑞

段祺瑞是那个时代的奇葩，吴佩孚也是。那个时代的两朵奇葩，有很多可比性。

段祺瑞官品很好，不贪污、不受贿、为官清廉。吴佩孚也是。

段祺瑞人品很好，不去吃喝嫖赌。吴佩孚也是。

段祺瑞一辈子摆弄军事，军人思维沉淀在政治中。吴佩孚也是。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吴佩孚是段祺瑞的翻版。现实意义上看，吴佩孚是段祺瑞的命中克星。当初吴佩孚在保定军校，和段祺瑞并无交往。吴佩孚下军队之后，段祺瑞曾经短暂当过吴佩孚的领导，还把吴佩孚提拔为基础军官，但因为地位悬殊，二人也无交往。

吴佩孚跟随曹锟之后得到机会，一路上升。袁世凯死后，曹锟和吴佩孚给段祺瑞立了不少战功。段祺瑞讨伐张勋，曹锟在保定通电响应。段祺瑞让曹锟担任西路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先锋。吴佩孚一马当

先，从丰台一口气杀进天坛，击溃辫子军，一战成名，成为北洋后起之秀中的翘楚。段祺瑞被冯国璋罢免，在天津召开督军团会议，气氛很热络，大家凑份子出兵。征伐西南主要有三路人马：曹錕、张敬尧、张怀芝。三人都是精于吃喝嫖赌抽的军阀典型。但曹錕不同于张敬尧和张怀芝，有吴佩孚替他打仗，到前线转了一圈便回了直隶。

他们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岳州。

岳州是民国伤心地。自从蔡锷起兵反对袁世凯之后，岳州就是西南军和北洋军的对峙之地，生灵涂地，百姓遭殃。冯国璋全力推行“和平统一”，为此不惜和段祺瑞翻脸，罢免段祺瑞。但就在那个时候，西南军进攻岳州，给段祺瑞“武力统一”以口实。

无奈之下，冯国璋只好让段祺瑞复职，败给段祺瑞。所以说岳州是冯国璋的绝地。

但是赢了冯国璋的段祺瑞同样倒在岳州。三年之后，直皖战争中输得一塌糊涂的段祺瑞一定后悔，早知如此，就应该在吴佩孚拿下岳州之后给他湖南督军。

三军进入湖南，张怀芝整天想的不是打仗，而是担心自己山东的地盘被别人抢去。张敬尧一心想占地盘，无心打仗。所以张怀芝和张敬尧基本靠不住，打仗只能靠吴佩孚。吴佩孚当时的级别仅仅是师长，第一次担任总指挥，既气愤又兴奋。

气愤的是张敬尧和张怀芝两个老狐狸出工不出力，如同猪一样的队友。

兴奋的是终于迎来大展身手之机会。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先打下地盘者为王。只要拿下湖南，混一个都督也不错。虽然有猪一样的队友，但对手同样不高明。西南派内部同样矛盾重重。陆荣廷虽然实力最强，但他的地盘在广西，无意在湖南和北洋军拼命，同时对云南的唐敬尧和四川的各种军阀没办法。吴佩孚认为，自己的能力足够拿下岳州，占领湖南。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三号，夜，吴佩孚进攻岳州。

这是吴佩孚此次南征唯一的硬仗，也是他独当一面的开始。经过一番策划部署之后，吴佩孚在大营中拿起他心爱的《易经》，翘起二郎腿，等待好消息。

当天夜里，吴佩孚的人马占领岳州。接下来几日，吴佩孚连克数城，势不可挡。

三月二十六号，吴佩孚挺进长沙。在此之前，守军已经望风而逃。

吴佩孚用十几天的时间拿下半个湖南，赢得通晓兵法韬略、能征惯战之美名。

按照游戏规则，湖南督军应该是吴佩孚的囊中之物。吴将军变回吴秀才，喜滋滋、乐呵呵地吟诗，耐心等待中央政府的任命公文。公文很快到了吴佩孚手上，主要有两条，其一让吴佩孚继续南下，扫平两广；其二，让张敬尧担任湖南督军兼省长。

眼看自己种的桃子被别人摘了，而且是被张敬尧摘了，吴佩孚气得吐血。张敬尧是吴佩孚痛恨之人。由于吴佩孚作战给力，张敬尧在平江一线取得一些胜利。但张敬尧的部队如同一群禽兽，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最可恨的是，张敬尧不仅没有约束部下，还下令“三日不封刀”，三天之后方才假惺惺地贴出安民告示。由于张敬尧很过分，湖南人反应激烈，把张敬尧驱赶了。其中有一位身材修长、长相朴实的书生表现突出，但他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逐渐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他就是日后彻底终结乱世之人，他叫毛润之。

与此同时，冯国璋又派密使找到吴佩孚，给了他一些密信，内容都是张敬尧等人弹劾吴佩孚的各种罪状。吴佩孚看后反而不生气了，他决定报复、让段祺瑞和张敬尧付出代价。

其实段祺瑞也知道情形，但没有办法。张敬尧是北洋元老，也是皖系干将，资历很老。吴佩孚虽然很能干，但终究是曹锟的人。曹锟势力已经很大，再把西南给吴佩孚，那么曹锟和吴佩孚将比冯国璋更可怕、更难对付。但接下来，段祺瑞被吴佩孚气歪了鼻子。

段祺瑞明白曹锟本人并无大能耐，完全依靠吴佩孚。只要能把吴佩孚拉过来，曹锟不足为虑。段祺瑞也有从第三师挖人的历史。比方说卢永祥，原本是曹锟部下，就被段祺瑞挖去做心腹了。所谓挖人，说穿了也就是给好处。所谓好处，要么给真金白银，要么加官进爵。对一般人而言，真金白银或加官进爵并无区别，两者可以转换。吴佩孚不是一般人。

段祺瑞首先让徐树铮去湖南游说吴佩孚。徐树铮和吴佩孚均是那个时代的稀有品种：秀才出身，转为出色的军人。徐树铮长于机变谋略，吴佩孚精于排兵布阵。两人能说会道，经常忽悠各种人。两人见面之后，首先说了一翻热络话，表示彼此仰慕许久。

吴佩孚请徐树铮检阅军队，徐树铮表示很满意。两人彼此吹捧一番。

吴佩孚表示军队缺少武器装备，徐树铮表示包在我身上。两人成了兄弟。

吴佩孚需要金钱和武器，徐树铮许他两广巡阅使的头衔，级别在督军之上。吴佩孚还在湖南，必须首先打下两广。所以说这个允诺相当于空头支票。

然后两位秀才对彼此很满意，临别之前还彼此赠诗。但很显然，一个徐树铮无法搞定吴佩孚。段祺瑞又亲自和吴佩孚通话，勉励他南征立功。

段祺瑞当时是国务院总理，中华民国现实意义上的一把手。而吴佩孚只是一个小小的师长。段祺瑞向来眼高于顶，对封疆大吏都是板着脸。破例亲自和吴佩孚通话，而且用和蔼的语气，已经算是天大的面子了。可惜吴佩孚是要里子不要面子的人。如果早几年拉拢吴佩孚，段祺瑞或许可以成功。此时吴佩孚羽翼逐渐丰满，而且还找到了段祺瑞的破绽。

段祺瑞的破绽是什么呢？虚。

段祺瑞级别很高（国务院总理）、权力很大（责任内阁制）、地位尊贵（三造共和），但很虚。权力的基础是枪杆子。段祺瑞起于练兵，纵横江湖很多年，缔造皖系，实际上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没有自己的嫡系枪杆子。张敬尧之流都是猪一样的队友，段祺瑞依靠他们其实是死路一条。当初袁世凯面对西南派尚且不能应付。袁世凯还有曹錕

甘于卖命，段祺瑞只有徐树铮，徐树铮也没有自己的嫡系队伍。所以吴佩孚认为，可以放心对付段祺瑞。打败段祺瑞，他就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二章 历史和战争

历史周期律的每一个层次都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要触及很多人的利益。所谓历史周期律其实并不神秘，就是利益阶层更替而已。农耕帝国面对新兴的工业帝国没有招架之功，所以与之相关的权贵要么勇于革新（如日本），要么腐化堕落退出历史舞台（如满清）。但因为袁世凯巧取天下，旧时代的权贵没有被清算，依然掌控社会资源。袁世凯死后，局势依然如此。华夏依然是地主的华夏，农民生活如牛马，工商阶层的力量依然微弱。

所以相对于中华帝国，中华民国的改变仅局限于政治，就是原来的皇帝变成了大总统（内阁总理），原来的满清皇室变成了军阀政客。区别在于，原来的皇帝是上天选定的，为九五之尊，现在理论上大家都有份。

袁世凯称帝之前，冯国璋拉着段祺瑞给袁世凯拜年，对袁世凯行跪拜大礼，段祺瑞已经不乐意。二人接下来又去拜访袁克定，也行跪拜大礼，袁克定坦然受之。段祺瑞气歪了鼻子，冯国璋内心骂娘。此后二人反对袁世凯称帝。如果袁世凯称帝成功，他们依然要跪拜袁克

定。袁世凯称帝失败，他们均得到执掌最高权柄之机会。军阀们表示，既然民国可以人人当家作主，那俺们也可以闹一闹，尝试一下当主人的快感。

理论上大家都有份，实际怎么分呢？最原始而直接的办法：实力为王。所谓实力，便是枪杆子。段祺瑞战胜冯国璋之后，有实力争夺最高权力的只有两个人，张作霖和吴佩孚。

因为吴佩孚的胜利，曹锟接过直系大旗，成为反皖系首领。

徐树铮和吴佩孚分别之后，一边帮助段祺瑞筹划安福国会选举，把徐世昌推上大总统宝座；一边破坏曹锟和吴佩孚的反皖计划，为此不惜杀掉陆建章，再次用副总统引诱曹锟。

与此同时，吴佩孚则转身和西南派秘密谈判，并签订密约。七月三号，吴佩孚不打算再隐藏，亲自到衡阳出席“和平会议”。段祺瑞惊呼，吴秀才造反了。

徐世昌当选大总统之后，吴佩孚表示异议：“总统选举必须出于真正民意。我国旧国会分子固属不良，而新国会议员不但由金钱运动而来，且西南五省均不选送，似此卑劣不全之国会，安能为全国民意代表？公若就职，民国分裂由公始。师长等不敢为公贺，且将为民国吊。公若趁此未就职之前，毅然为和平表示，出任调人领袖，敦促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先解决时局以谋统一，国会议员另行改选，将来总统舍公莫属，此则师长等所为预贺者也。”

——此时已经站在西南派的立场说话，和段祺瑞唱反调。

单凭一个吴秀才造反，也不是太致命。致命的是，大局对吴秀才造反有利。国外局势：世界大战结束，英美回过神来，再次有机会干涉东方，日本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段祺瑞妄图利用日本一统天下的时机错过了。

段祺瑞想要武力统一，关键在钱。军阀们告诉段祺瑞，继续征伐西南的战争费用是一千五百万。政府财政早已枯竭，段祺瑞只好再次向日本人借钱，并推行币制改革。但西方列强表示反对，说这事儿要和他们商量。日本不敢过分招惹西方国家，借钱的事也就黄了。

段祺瑞明白，直接推行武力统一的道路行不通了，便辞去内阁总理，让徐树铮编练西北军，谋取外蒙，增加自身威望，然后再解决国内问题。然而就在同一时刻，国内局势依然一团糟。国内各界反对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五四运动爆发。

段祺瑞主张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扮演反面角色，冲淡了收复外蒙之功勋。

吴佩孚则抓住机会通电全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充分发扬秀才的文字功底，说得可谓情真意切、大义凛然。要说吴佩孚本人对类似的运动感兴趣，那也是瞎扯。因为不久之后，吴佩孚便血腥镇压工人罢工。吴佩孚的目的便是给段祺瑞制造难堪：“此一国耻事件的来由，全系段祺瑞和日本人所签订的卖国条件有以致之。”

看到了吧，军阀之间只讲目的，不讲手段。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事在对待徐树铮身上得以充分体现。

目的和手段

五四运动结束之后，徐树铮收复外蒙，明显大功一件，孙中山都忍不住称赞。军阀们却视而不见。曹锟因为没当上副总统很伤心，决心反对段祺瑞到底。曹锟在直隶的力量加上长江三督的江苏、江西、湖北，共四个省。再加上张作霖的东三省，共七省，号称七省反皖大联盟。当初反对袁世凯，也就西南五省而已。

反对某人当然需要理由。当初西南派反对袁世凯的理由是反对帝制。段祺瑞是再造共和的英雄，大节无亏。但要反对一个人，总能找到理由。当初段祺瑞和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的旗帜是反帝制不反袁世凯。如今反皖联盟的军阀们表示：不反对段祺瑞，他们要“清君侧”，反对段祺瑞身边的小人徐树铮和徐树铮拉出来的安福国会。

反对帝制，袁世凯就完了。拿掉徐树铮、解散安福国会，段祺瑞就完了。

为什么要反对徐树铮？两个字，利益。

徐树铮虽然成了民族英雄，但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为皖系争利益。他杀直系的人（陆建章），挖直系墙角（拉拢吴佩孚），打压直系（引张作霖入关），挖张作霖墙角（拉拢张作霖部将张烈臣）。徐树铮收复外蒙之后，以西北王自居，堵住了张作霖的扩张空间。

张作霖和曹錕本来是两雄不并立，竟然为了对付徐树铮联合起来，二人认为“此人万万不可得志，此人若得志，吾辈将无噍类矣”。

既然反对，总该有人打头阵。这事落到了吴佩孚头上。

一九一九年秋天，就在徐树铮带兵进入蒙古之时，吴佩孚厌倦了和段祺瑞的电报战，决心付诸实际行动。他给北京政府打电报，要求撤防北归：“于役湘省，两载于兹，迭请撤防，未承允准。”为了增加感染力，最后加上“北望叩首，涕泣哀恳”八个大字。

吴佩孚的电报请曹錕代转。大老粗曹錕觉得力度不够，倒干胸中墨水加上平生最有文采的两句话：“战死者既作泉下之游魂，生存者又作异乡之饿殍。”

对这样的电报，段祺瑞并不陌生。他“一造共和”之际，就是利用类似的招数给北京政府发电报，逼得朝廷无奈退位。如今吴佩孚也来这么一手，可谓学到了段祺瑞的精髓。

和当年的段祺瑞一样，吴佩孚不仅发电报，还有行动。他和西南派联络，把防区让给西南派，让他们给一百万撤军费用。西南派表示，只能凑六十万，先付三十万，另外三十万开拔时付清。吴佩孚表示，成交。

对于吴佩孚的行为，段祺瑞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他一边密令张敬尧在湖南阻截吴佩孚北上，一边指示吴光新担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这两手看似毒辣，却起到相反的作用。吴光新没什么才华，却把河南督军赵倜逼到了吴佩孚那边，七省反皖联盟变成八省。

吴佩孚抓住机会大做文章：“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与共戴天。”同时指责皖系贪婪，为赵倜打抱不平“吴光新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夺不餍。法纪荡然，人人自危”最后把矛头对准安福国会：“政府近年来举措设施，无一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景慕者则排挤之。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所不肯为者，而政府悍然为之！曾亦思武力权威，较满清、项城为何如？全国之大，能否为一系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徒见其心劳而日拙也……愚我总统、总理勿为安福所利用，立飭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并宣示决不轻易赵督，以弭战祸。”

——收了钱，当了好人，打击了对手，一箭三雕。吴佩孚，高！

吴佩孚充分发挥才华，再接再厉：“湘鄂一役，几经剧战，各将士出死入生，伤亡者原宜悯恤，劳瘁者亦须慰安，迭据各旅长等呈请，或患咯血，或患湿疾，悲惨情状，目不忍睹。今戍期已久，日望北旋，大有急不能待的状态。断非空言抚慰，所能遏止……”

由于战斗力超强，吴佩孚最后一封请求撤防电报成了那个时代的反内战檄文：“远戍湘南，瓜期两届，三载换防，不可谓速。阅墙煮豆，何敢言功。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即属一家，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

——这个电报说出了国人追求和平的心声，但却是内战的开始。

吴佩孚执意北上，段祺瑞部署张敬尧阻截。只可惜张敬尧不是（敢强行阻截冯国璋）倪嗣冲，畏首畏尾。吴佩孚大摇大摆回到河南，直皖战争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段祺瑞也在积极布置：密令驻守济南的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作好动员准备，俟机北向进攻德州，或者西向侧击郑州。但此时皖系全面被动。

政治上：世界大战都结束了，没有人愿意继续打仗，武力统一大失人心；日本因为“侵华”而名声臭了，皖系的后台正是日本。

外交上：英美掌控话语权，支持直系。日本暂时无法与之对抗。

军事上：张敬尧、段芝贵之流劣迹斑斑，傅良佐、吴光新之流不足依靠，只有一个徐树铮值得信赖，却是众矢之的。相比之下，张作霖、吴佩孚都是世之枭雄，直、奉内部悍将（如萧耀南、郭松龄）云集。但在武器装备上，皖系军队占优势。

民国第一战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暴动，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一九一六年的护国战争，一九一七年的张勋复辟，一九一八年的南北战争，军事角度看，它们都不值一提，直到一九二零年的直皖战争，才有一些战争的味道，堪称民国第一战。

这场战争持续了多久呢？三天。加上前戏和高潮余韵，也就五天，比前面任何一场不像战争的战争都短，过程更是极富有戏剧性。

一九二零年六月十七号，徐树铮从库伦回北京，任定国军（西北边防军改为定国军，段祺瑞任总司令）副司令、协助段祺瑞作战。段祺瑞十七岁当兵，经历了各个层次的磨练，成绩都是优良，虽然在政治舞台沉浮，但始终是个军人。他在辛亥革命之时便可独当一面，二次革命之时为北洋军统帅，讨伐张勋又是总司令。徐树铮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优等生。很多人都想不明白，两人怎么会败得如此迅速彻底。他们自己更不明白。但看了战争过程，所有人都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皖军号称定国军，直军号称讨逆军。

战区分成东西两路：东路在京奉（北京到沈阳，奉军入京路线）铁路沿线；西路在京汉（北京到武汉，直军入京方向）铁路沿线。七月十四号，战争开打。

皖军东路司令官为徐树铮，对付曹錕，兼防备张作霖；皖军西路司令为段芝贵，前敌总指挥为曲同丰，对付吴佩孚。西路是双方主力军的战场。直军主将吴佩孚就不用介绍了，介绍一下吴佩孚的对手段芝贵和曲同丰。

段芝贵也是安徽合肥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北洋元老，由于极能搞关系，变成袁世凯的干儿子（仅比袁世凯年轻五岁）。至于军事水平，甚得荫昌的真传。他把指挥部放在火车上，摆好大烟枪和麻将，甚为个性。关键是火车头对着北京方向，随时准备跑人。

曲同丰曾是保定军校教官，和段祺瑞同处一个船上。他是山东人，和吴佩孚同乡，也是吴佩孚的老师。某种意义上讲，直皖战争就是曲同丰和吴佩孚的师生对决。

战争开打，曲同丰老师依仗武器优势向吴佩孚同学所在的高碑店进攻。从七月十四号到十六号，师生二人打了两场，都是曲同丰老师占优势。吴佩孚同学示弱两场之后退出高碑店，向侧翼迂回。曲同丰老师准备直捣保定，生擒曹吴，以立不朽的大功。

七月十七号，战争进入第四天，吴佩孚同学率领直军精锐绕到曲同丰老师前敌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强行突击。曲同丰老师毫无准备。枪声突起，吴佩孚同学带人冲入指挥部，向曲同丰老师行了一个军礼，请老师北上保定见曹锟。

曲同丰被擒的消息吓坏了段芝贵，于是西路军总司令直接开火车去北京，辞职。

段祺瑞和徐树铮把这么两个人放在西路对阵吴佩孚，天知道脑子是怎么想的。

七月十八号，战争第五天。曲同丰被押解到保定见老熟人曹锟，进行“献刀典礼”。

胜利者曹锟一身戎装站在大厅中央。

败军之将曲同丰也是一身戎装，在直军将领的陪同下，迈着铿锵有力的脚步进来，解下悬挂在腰中的军刀，双手捧献曹锟，朗声说：“鄙人今天愿意向贵经略使投降，特将军刀献上，宣誓决不与贵军为敌。”

曹锟双手接刀后，再还给曲同丰，以胜利者姿态和悦地说：“本使今天愿意接受贵司令投降，贵司令作战勇敢，本使深为敬佩，特将军刀发还，仍请佩带。本使当按照优待俘虏条例，予贵司令以最优待

遇。”

然后，两人握手叙旧，把酒言欢。

酒足饭饱之后，曲同丰通电劝告边防军弃暗投明，共起讨“贼”。

曹锟通电：“为通告事，昨段军曲同丰等现已解到保定，见面时曲等将军刀自行除下，双手捧向锟云：鄙人等今愿在贵使麾下投降。并宣誓云：彼等俘虏期间，对于本军之宗旨决不有所违背之举动。由锟将刀双手接受，并云：本使兹承受执事之投降，阁下等勇敢可钦，仍举军刀给还佩带，并得享受军事惯例待遇俘虏之自由，除少数畏怯军人及有污军人资格者外，其余均按级受本军优待云云。此种军人俘虏，将来当归正式法庭审理。除飭前方军队查照此种待遇俘虏军例外，并严令全军勿得因段祺瑞近有悬赏谋取锟等性命，致生报复之念，而违背军人在战争外应保持人道之主旨，此令。”

看到这些之后，还有人认为皖系溃败可惜么？

七月十八号，徐世昌颁布停战令：“前以各路军队因彼此误会，致有移调情事，当经明令一律退驻原防，共维大局。乃据近日报告，战事迄未中止，群情惶惧，百业萧条，嗟我黎民，何以堪此？况时方盛暑，各将十躬冒锋镝，尤属可悯。应责成各路将领，迅飭前方，各守防线，停止进攻，听候命令解决，用副本大总统再三调和之至意，此令！”

段祺瑞气歪了鼻子。数十年英明毁于一旦，皖系毁于一旦。段祺瑞为人高气傲，体验到绝境之中黎元洪和冯国璋的感受，想自杀，幸好左右看护严实。但段祺瑞终究是一个刚强之人，敢于直面困境。

七月十九号，段祺瑞通电辞职，既不逃天津，也不奔租界，自愿承担一切责任。

从此以后，北洋军名存实亡，四分五裂。

一八九五年袁世凯创建北洋军，原本是为了振兴大清王朝。此后民国诞生，北洋军一直未接受过真正考验，没想到第一次真正的战争便是内战火拼。

异常

纵观直皖战争，徐树铮对上酒囊饭袋曹錕原本占优势，怎奈被张作霖牵制，难有大动作。得知西线失败之后，徐树铮离开廊坊回京探消息。徐树铮刚刚离开，他的西北边防军不战自溃，被张作霖收编。这是直皖战争中最为紧要的一幕。为何？其实很简单。当初为了对付冯国璋，徐树铮和张作霖搞关系，在奉军担任副司令，以奉军的名义领军饷五百多万，再用那些钱编练西北军。张作霖一辈子搞别人，没想到被徐树铮搞了，大为震怒，差点干掉徐树铮。事实上徐树铮编练的西北军是从张作霖那里挖过去的墙角，当徐树铮离开，西北边防军很快被张作霖诏安，也属正常。

所以说，直皖战争，很搞笑。

如果徐树铮带人在西线对抗吴佩孚，那么战局不会结束得如此之快。老谋深算的段祺瑞和精明的徐树铮怎么就没看到这一点呢？其实他们可以看到直军中吴佩孚才是攻坚主力，但仍然把徐树铮放在了东

线，归根到底还是忌惮张作霖。因为奉军入关会直接威胁北京城。直军和皖军同出一脉，输赢都好说。奉军张作霖则是土匪出身。但段祺瑞和徐树铮还是错估了张作霖，张作霖的狡猾程度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军阀。

张作霖入关，并不是要和谁拼命，而是要占便宜。段祺瑞退位之后，张作霖赶紧跑到北京，把皖系要员的金银财宝和各个机构的资金席卷一空，再把皖系军械装备搜刮一空。

当然张作霖不仅仅爱占便宜。他的占便宜，是为了打仗。皖系失败后，张作霖和曹锟变成儿女亲家。但在对待皖系的问题上，张作霖主张宽大，实际是想收编皖系势力为己所用。由于张作霖咄咄逼人，把曹锟逼到了墙角，曹锟被迫反击，把吴佩孚逼上段祺瑞的老路。

所以不是段祺瑞和徐树铮算计不力，而是张作霖太人精。

张作霖，世之梟雄。

三章 梟雄模范

问世间梟雄为何模样？可爱又可恨。

所谓梟雄，既能像英雄一样建功立业、引人侧目、让人敬仰，又不守英雄之道、不在意世人唾骂，心思反复无常、行事反复无常。

如果把民国当成一出戏看，张作霖是最有趣的角色（之一）。

那个时代有趣的人很多，爱骂人的章太炎、拖着大辫子的张勋、

贪财好色的曹锟、爱生气的段祺瑞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在那么多有特色的人中间，张作霖依然过于另类。

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军阀一样，张作霖精于吃喝玩乐找女人。但其他军阀多半在吃喝玩乐找女人中迷失，经常干些禽兽勾当；张作霖在吃喝玩乐之际，不忘宏图大志。即便曹锟，如果没有吴佩孚，也将堕落。即便有吴佩孚，曹锟也因为找女人而使副总统梦泡汤。张作霖找过很多女人，光老婆就有六个。但张作霖的老婆素质都不错，要么淳朴善良、要么知书达理、要么温柔娴淑，各有特色。张作霖竟然可以把六个老婆的关系理顺，她们给张作霖生了一大堆儿女，让张作霖和其他很多军阀成为儿女亲家。

张作霖生于一八七五年，人称胡子，又称张大帅。他喜欢别人喊他大帅，讨厌胡子。

和那个年头的武夫一样，张作霖出身寒微。他的祖上闯关东到东北，曾经阔过（小地主），后中落。按照那个情况，张作霖应该和他的小伙伴们一样，面朝黑土背朝天讨生活；但是很显然，张作霖偏离了轨道。他读过几天私塾，大字认识几箩筐。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张作霖念的是社会大学，社会大学的第一课来自他那既爱面子又爱赌博的爸爸张有财。因为爱面子，张有财一棍子打死了乱搞男女关系的大儿子（那事对张作霖刺激很大）。因为爱赌，张有财被人打死。张作霖报仇成功之后，成为通缉犯，开始逃跑。那年张作霖十三岁。

年轻的张作霖想混口饭吃，就去学木匠，不成；卖包子，不成；

学兽医，不成。好吧，不是学技术的料，那就去当兵了。那年张作霖十九岁。

那并不是好年头，因为那是甲午年。

北洋军和甲午战争的关系斩不断理还乱。缔造北洋军的袁世凯虽然避免了战败，却在经营朝鲜十年之后逃走，目睹了溃败。早期巨头冯国璋、曹锟、王士珍均在战败中灰头土脸地跑了回来，黎元洪更是跳海自杀，他们的身份都是军官。唯有张作霖是大兵，还没经历过训练就上战场，俗话说就是当炮灰的。好在张大兵虽然年轻，却已经久历江湖，足够机警，练就了胆大心细的本事。他虽然没去朝鲜，却也没当孬种，甚至亲自侦查日军的情报。淮军统领宋庆觉得这小子不错，把他提拔为护卫。张作霖很高兴，开始梦想日后的幸福生活。

然而很遗憾，打完仗，军队要开进关内，张作霖舍不得黑土地，便趁月黑风高夜溜走，舍弃原本可能高升的前途，可见另类。

当然喽，张作霖不是那种诚实的人，当了逃兵却自我吹嘘为战争英雄，大摇大摆回老家娶老婆生孩子，一副衣锦还乡的模样，同时重操旧业当兽医。家有娇妻，又有一技之长，按道理说应该满足了。然而已经见过大世面的张作霖觉得生活过于枯燥，很烦。血液里躁动的因子如同洪水般泛滥。他决定改变。

怎么改变呢？其实乱世之中只有两条路，要么当兵，要么当土匪。既然当兵不行了，那就落草为寇吧。那个时代，在东北当土匪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清王朝逐渐衰亡，日俄势力渗透，兵匪一家亲，土匪多如牛毛。

二十一岁的张作霖成为一名胡子，由于精明强干，很快成为一个出色的土匪。然而张作霖再次感到生活枯燥，很烦。打家劫舍、快意恩仇固然刺激，但终日在山野之间，没有前途，说不定某日成了某位剿匪英雄升官发财的梯子、丢了脑袋。

古往今来凡是有志向的土匪，都想从黑道变身白道，把自己洗白。宋江就是典型。当了土匪的张作霖依然很另类。

于是张作霖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机会（义和团闹革命，盛京将军逃亡）接受朝廷诏安，再次成为一名军人。那年，张作霖二十六岁，已经有了两位老婆。

从那以后，张作霖成为北洋军一员，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另类军阀

北洋军骨干来自天津武备学堂和保定军校。张作霖根本就没念过军校，甚至关内都没去过几次，他的人生经验来自社会大学。所以他无比精明，很有些袁世凯的感觉。所以他和北洋政府的每一任大佬关系都很好。

武昌暴动那会，张作霖在奉天（沈阳）镇压革命党。袁世凯赏识他，提拔他，封他为中将师长兼东三省防务督办。张作霖高兴了好一阵子，以为自己是东北王了，没想到却被袁世凯忽悠了。之前都是张作霖忽悠别人，这次被忽悠，除了暗骂一声“妈个巴子”，也没办法。说到底他不是北洋嫡系。然而张作霖终究是张作霖，他会靠自己的本

事立足。袁世凯征剿革命党之前咨询军方意见，特意把张作霖喊到北京。当时张作霖仅仅是师长，为袁世凯召见的级别最低之人（之一）。张作霖跑到北京，见袁世凯之前，首先到八大胡同逛了一圈。

张作霖见袁世凯相当于小梟见大梟。机警的张作霖见到袁世凯，第一个动作便是下跪磕头，如同见到皇帝。动作麻利，姿势标准，表演到位。

袁世凯扶起张作霖：“雨亭，这是干啥，现在是民国，不兴这个了。”

张作霖立刻进行第二轮表演，赶紧摇头：“我是个粗人，在我心里，大总统就是皇上，皇上就是大总统。”

袁世凯对此很满意，夸张作霖“忠心可嘉”。张作霖抓住机会，拿出二十年拍马屁的本事，把袁世凯狠狠吹捧了一番。袁世凯给了张作霖不少东西，但始终不给张作霖最想要的那个位置——奉天督军。不仅不给，还老派各种老油条去烦张作霖。尤其是段芝贵，把张作霖搞得很烦。

但张作霖不是一般人，想要的东西一定会到手，他利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机会把段芝贵赶走，终于得到奉天大权，成为独霸一方的人物。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又把奉天省长的位置给了张作霖。那是一九一六年。

那年张作霖四十一岁，已经在江湖上混了二十多年，接受诏安十五年。三百年前（一六一六年），黑土地上的努尔哈赤入驻奉天，建立后金，随后东征西讨，窥视关内。和努尔哈赤相比，晚了三百年的

张作霖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当过兵、当过匪、当过大盗。他们都是极端的现实主义者，有奶便是娘。

参见张作霖的行事，很有努尔哈赤的影子。如果选择一个偶像，张作霖的偶像就是努尔哈赤。他们的最终目的都一样，都是要入关，逐鹿中原，争霸天下。所以张作霖不理睬给他省长的黎元洪，但很重视手握实权的段祺瑞，一心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之事业。如果支持黎元洪搞和平，就不好扩张地盘了。支持段祺瑞，就可以带来机会。

张作霖再一次押宝正确。他的主要对手冯德麟因支持张勋复辟而离职。张作霖和张勋虽然是儿女亲家，却没有支持张勋复辟。

正如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还要征战一样，成为东北王的张作霖其实名不副实，吉林督军孟恩远就不是他的人。张作霖要赶走孟恩远，怎么办呢？张作霖想到徐树铮。因为孟恩远是陆承武的岳父，徐树铮杀掉了陆建章，两人算是找到共同话题。但孟恩远也不是善类，坚决不同意，双方剑拔弩张。

与此同时，日本人找借口调兵到吉林，态度强硬。内外压力之下，孟恩远被迫离开，从此东三省完全落入张作霖手中。时间是一九二零年，张作霖四十五岁。

如果说张作霖和努尔哈赤有何不同，那便是张作霖晚生了三百年。努尔哈赤时代处于世界变迁的前夜，只要练成一支精锐骑兵，便可以干很多事。努尔哈赤身边没有日本人。张作霖时代，世界早已进入工业时代，传统帝国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强大的日本已非张作霖能抗衡。但张作霖可以依靠自己的精明利用日本，利用日本逼走孟恩远。

所以日本押宝段祺瑞之时，也在东北培养张作霖，妄图依靠张作霖控制东北。

既然张作霖和段祺瑞都想利用日本人干一番事业，怎么会闹崩了呢？

按照当年努尔哈赤家族的路线，如果能直接入关，争霸天下，那当然很好。如果暂时不能入关，那么只能先搞定关外。当初努尔哈赤入关不成身先死，皇太极和多尔袞便向西征服蒙古，对明朝实行半包围。张作霖坐镇东北，一双精明的小眼睛盯着关内，暂时也找不到好办法。凭借他的实力，一时片刻还不足以征服关内。

徐树铮收复外蒙刺激了张作霖，张作霖向西发展之路被堵死。为拓展空间，张作霖一咬牙和一向看不上眼的曹锟、以及颇为忌惮的吴佩孚合作，对段祺瑞实行“清君侧”。同时段祺瑞和徐树铮收复外蒙也损害了日本的利益。所以直皖战争，以段祺瑞和徐树铮迅速战败而告终。

直皖战争中真正的胜利者有两个：吴佩孚和张作霖。

吴佩孚名声鹊起，和曹锟并列为直系双核。

张作霖跑到北京收集了一大堆钱财装备。这些都是次要，最大的收获则是被任命为蒙疆经略使，管辖热河、绥远、察哈尔。什么意思呢？长城以北，从新疆到东北，都是张作霖的天下了，其势头和入关之前的爱新觉罗家族颇为类似。张作霖要入关，必须面对命中注定的冤家、直系主心骨吴佩孚。

冤家路窄

这个世界充满冤家，比方说刘邦和项羽、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是顶级大冤家。他们之外还有各种层次的冤家。张作霖和吴佩孚，就是那个时代的冤家。

张作霖比吴佩孚小一岁，是同一代人，但在年龄之外的其他方面，他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生活习惯上，张作霖精于吃喝嫖赌，吴佩孚不吃不喝不嫖不赌。

为人处世上，张作霖老于人情世故，吴佩孚孤傲清高。

知识结构上，张作霖大字不认识几个，粗话连篇；吴佩孚手不释卷，行军打仗都带着书，而且是《周易》那种让人望而生畏的东西。

这样两个人，没有任何共同点。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绝对不会成为朋友。如果是同事，他们出了办公室就会忘记彼此。他们一个生在关外、一个生在关内，生活中没有交集。之所以成了冤家，只因为这个世界很小。很小的世界上，往往是冤家路窄。

日俄战争爆发，张作霖一开始跟着俄国人混，眼见俄国人不行了，又跟着日本人混，再一次站在胜利者一方。能在两大流氓之间从容应对，张作霖，有你的。吴佩孚也在给日军当间谍，而且被俄国人抓住，又逃脱，同样表现优异。吴佩孚，有你的。

因为给日本人当间谍，他们的世界开始有交集。可以说两人因日本人而识。二十年之后，张作霖死在日本人手上。三十年之后，吴佩孚死在日本人手上。两人又因日本人而终。张作霖和吴佩孚的遭遇，

恰好是中日关系的反映。

日俄战争结束，曹锟进入东北，挖掘出吴佩孚。张作霖也在曹锟手下干事。为了进一步发展，张作霖把矛头对准昔日的道上兄弟，联合吴佩孚帮助曹锟剿匪。他们共同经营一个项目：围剿大土匪金寿山。张作霖级别比吴佩孚高，作风霸道，看见文绉绉的吴佩孚就来火。吴佩孚自认科班出身，自命不凡，不把草莽出身的张作霖放在眼里。两个人与其说合作战斗，不如说斗气。不要说剿匪，差点都被对方气个半死。

事实上张作霖和吴佩孚都不是那种心胸狭窄之辈，为何如此敌对？答案很有趣：他们都知道彼此很出色，能感受到彼此的威胁。他们都是有雄心壮志之人，对于弱者可以敞开胸怀，面对强者则分外警惕。好比猛虎，都有自己的地盘。

最后为了完成任务，二人只好合作。吴佩孚排兵布阵，张作霖勇敢冲锋，终于重创金寿山。此后论功行赏，张作霖领首功，吴佩孚不服气，二人就此结怨。

此后吴佩孚跟随曹锟去了关内，张作霖在关外发展。原本天各一方，各不相见。但他们并没有忘记彼此。袁世凯失败之后，吴佩孚对曹锟说，当今天下需要当心三人，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曹锟明白段祺瑞和冯国璋的可怕，却不晓得为何要在意土匪张作霖。吴佩孚告诉曹锟，东北条件得天独厚，张作霖乃世之枭雄，日后必然威胁中原。张作霖时刻注意关内局势，他那狡猾的眼睛越过曹锟、盯住吴佩孚。

十年之后，正如吴佩孚预料的那样，张作霖成为东北王，窥视中原，为奉系领袖。吴佩孚在关内征战，声名鹊起，成为直系主心骨。偌大的一个天下，瞬间变得很小。二人必须再次打交道，要么朋友，要么敌人。

直皖战争中，二人的共同目标是段祺瑞。段祺瑞倒下，只剩下直系和奉系。张作霖和吴佩孚狭路相逢，如同狮子和猛虎相遇，对抗逐渐升级。

战后分赃会议。曹锟按照直系既定方针，主张严惩皖系骨干。张作霖则眯起眼睛对亲家曹锟说：“多个朋友多炉香，少个敌人少堵墙，得饶人处且饶人嘛。”随后又唠叨了段祺瑞一大堆好处。会议刚开始就卡壳。内阁总理（张作霖的另一个亲家）靳云鹏也在一旁帮腔，建议宽容为先。

张作霖实际是想拉拢皖系残余势力对付直系。吴佩孚得知张作霖的目的，愤然而起，慷慨激昂：“夫差因放纵勾践而有亡国之痛，项羽在‘鸿门宴’优柔寡断而落得乌江自刎，今天姑息养奸，他日养虎遗患。”矛头直指张作霖。

张作霖看着吴佩孚，内心知道对方是劲敌，脸上却装作不屑一顾的模样，表示吴师长（吴佩孚当时还是师长）没有发言权，不要大放厥词。吴佩孚针锋相对，表示战争是本师长打赢的，你只是摘桃子而已。吴佩孚把奉系人马抢钱、抢装备、抢地盘的光辉事迹翻出来。张作霖回敬，你也抢了不少。吴佩孚表示，我抢理所当然，你抢是坐享其成。

两人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会场气氛很尴尬。

张作霖转向曹锟说：“曹仲珊，你要是没能力约束部下，直接把权力交给吴大人算了。”曹锟没法，把吴佩孚赶出会场。吴佩孚则咬牙对张作霖说：“走着瞧！”

吴佩孚要召开“国民大会”，以“国民自决”的方式修改宪法。张作霖再次表示很愤怒，又怪曹锟太过放纵吴佩孚。曹锟也觉得吴佩孚太过任性，再次斥责他。吴佩孚很失望，带人回洛阳，继续埋头练兵，决心在战场上和张作霖一较高下。

吴佩孚离开之后，张作霖和曹锟又恢复了“亲家”本色。两个老男人，左一个哥俩好，右一个兄弟亲。曹锟耳根子软，全然不是张作霖的对手，吃亏不少。精明狡猾的张作霖得到了想要的一切（除谋划亲家张勋复出担任安徽督军没成功），奉系势力延伸到京津地区，没费一枪一弹。由于拉拢皖系比较成功，奉军一部甚至进驻上海。张学良作为民国四公子之一，尽情在上海滩潇洒，收获便是和日后宋美龄的关系打下根基。

分赃过程极为快活。比方说某日分赃顺利，曹锟带着张作霖等人去天津行乐。行程安排如下：首先去“鸭子楼”吃烤鸭，再去什锦斋吃八大碗（元宝肉、烩三丝、独面筋、海杂拌、拆全鸡、熘鱼片、烩虾仁、清汤肉丝），接下来是同福楼、泰华楼、太白楼……这些只是吃。吃的过程中，还可以看戏，看完戏还能看风月，风月场中还能抽大烟。

最快活的是曹锟。虽然分赃吃了点亏，却又花一大笔钱搞了一个

头牌，肆无忌惮地享受人生。但好日子没过几天，黑云便压向平津上空。

张作霖要天下。

世间枭雄永不满足，只要还存在一天，就不会有和平，直到他赢得天下或被消灭。

张作霖的策略如下：利用亲家靳云鹏的关系，他的奉军可以比曹锟的直军领更多的军饷。他在北京政府中安插了更多奉系的人。奉军咄咄逼人，势力渗透到天津。保定的曹锟坐不住了。

对于希望安于现状的曹锟，张作霖一直是好哥俩、好亲家。曹锟想继续过好日子，派人去东北求和。张作霖还是好话说完，便宜占尽。

对于好战分子吴佩孚，张作霖全力打压，用尽手腕离间曹锟和吴佩孚。让曹锟身边酒囊饭袋般的亲戚朋友吹风，说吴佩孚要取代曹锟。吴佩孚对张作霖当然也不客气，时不时拆穿张作霖的虚伪面纱。张作霖不再伪装，叫嚣要和吴佩孚干仗。吴佩孚排兵布阵，等待张作霖。因两人对立，内阁总理换了好几任，均带着怨妇情绪下台。

曹锟一再退让，换来张作霖步步紧逼。直奉战争一触即发。

曹锟再也没心思享受了，躺在那里扳手指头对比奉系和直系的力量。奉系在东北修养多年，兵多将广。直系连年征战，兵疲将乏。关键时刻，“北洋之龙”王士珍出现在曹锟面前。他是北洋元老，又是曹锟老乡，心里还是向着直军。毕竟曹锟是北洋嫡系，张作霖只是旁枝。

王士珍叼着烟斗对曹锟说：“开战赢了，一切好说；战平，也就

眼下局面，不用退让；战败，可以退到河南，卷土重来。如果继续退让，直系会树倒猢猻散。”

曹锟表示，敌强我弱。王士珍说，你有吴佩孚。

曹锟立刻叫来秘书，给吴佩孚发电报。电报内容很犀利：“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怎么办呢？开打！

四章 次危机

话说中华民族几千年，面临危机不计其数。尤其是近代，满纸眼泪。

最大的危机，便是一九零零年险些被列强瓜分。一九零零年之后，国人的生存环境并没有改善：自己的事，自己不能做主。各派军阀表面上很热络，打打闹闹停停，大王旗变幻不定，但没有一个军阀可以不受列强影响、自主行事。

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是列强的代理人，悲。

如此下去，中华民族将没有翻身之日。所以国人虽然度过了一九零零年的千年低谷，但分裂的风险依然存在。风险的巅峰，便是直奉战争。

三百年前，努尔哈赤统一东北之后，爱新觉罗家族又经过大约二十年的征战方才统一长城以北，经过三十年的政治积累方才进北京。

张作霖成为东北王之后两年，触角便延伸到北京，四年之后便掀起争霸天下的战争。此战把局势导向未知。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一号，吴佩孚联合直系将领通电骂张作霖：“蠢贼不除，永无宁日。为民国保庄严，为华族存人格，凡我袍泽，责任所在，除暴安民，义无反顾。敢布腹心，惟海内察之！”

四月二十五号，张作霖通电骂曹锟：“诗云：‘慎尔出言’，愿吾哥三复之，无听市井无赖之狺狺狂吠，犹掀髯大笑，以为得计，则非弟所敢知矣。”

同日，吴佩孚再次联合直系军人骂张作霖：“国民苦胡逆张作霖久矣。曩以国家多故，犯而不校，启大盗自新之路，存上天好生之德，涵育包荒，以有今日。斯因父老昆仲夙昔所怨责，而佩孚等所内疚神明者也。狼子野心，非我族类，德不能化，语不能感，矫命乱纪，犯阙称兵，罪恶贯盈，末日已至。长此容忍姑息，既无以拯国民水火之苦，更无以答友邦希望之诚。用敢厉兵秣马，整饬戎行，直揭罪魁，昭告中外。张作霖包藏祸心，窥窃神器，盗取图谋统一之名，阴行破坏统一之实……”

四月二十七号，奉系将领通电骂吴佩孚：“南北和议，始终停顿。推原祸始，实吴佩孚一人阶之厉也。国家要素，全在纲纪，军人天职，只有服从。当吴佩孚拥兵衡州之时，或乘胜进攻，或停战议和，皆不失为正当办法。乃以未得湘督之故，竟倒戈相向，合力谋驱湖南张督，而吴氏于政乱纪之行为，倒行逆施之举动，遂至肆无忌惮，层出不穷，虽罄南山之竹，亦不足书其罪恶矣。”

奉系集中火力攻击吴佩孚阴险狡诈、破坏团结统一，勾起人民对战争的怨愤。吴佩孚则把张作霖比喻成关外豺狼，让人联想起满清当年的罪恶。双方你来我往，如同演戏。既有小孩子过家家之天真，又有泼妇骂街之风采。

骂归骂，两边都没闲着。吴佩孚调兵遣将，张作霖率奉军入关。终究要用枪杆子分胜负。

奉军兵力十二万，兵强马壮，总司令张作霖，战将孙烈臣、张学良、郭松龄等。

直军兵力十万，久经沙场，总司令吴佩孚，战将王承斌、张国溶、张福来等。

战场分东西两路，沿津浦铁路和京汉铁路展开。战斗围绕在长辛店、固安和马厂展开。

六天

四月二十九号，直皖战争之后两年，民国第二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开打，耗时六天。

战场如同直皖战争的翻版。双方把主力集中在西线的长辛店。奉军集中炮火轰击直军，吴佩孚严令直军前敌指挥董政国坚守阵地、疲惫奉军。如此形态持续了一天一夜。

四月三十号，吴佩孚下令直军转守为攻，继续消耗奉军。形势最危险的时候，吴佩孚把亲兵全投了进去。关键时刻，直军的战争经验

和吴佩孚排兵布阵的水平发挥了作用。吴佩孚一边从正面顶住奉军，另外组织一支精兵绕到奉军后方展开攻击。奉军腹背受敌，弹药所剩无几，逐渐吃力。

接下来几天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双方都在捏造战报吹嘘自己，边打仗边吹牛。张作霖俨然以战胜者自居，每天都有告捷电报发表；吴佩孚则对外发电报，说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派张锡奎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省督军。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终究会水落石出。

五月四号，直军后援赶到，直冲到丰台，奉军张景惠仓促退出，于是直军赢得长辛店大捷。战争平衡由此打破。奉军第十六师停止战斗，倒戈。当年冯国璋北上，从南京带了一支人马去北京充当总统卫队。冯国璋下野，徐世昌让冯国璋继续统领十五师和十六师。冯国璋死后，两个师被皖系收编。直皖战争，皖系把十五师摆在前线，结果十五师倒戈。皖系战败，部队被奉系改编。此次战争，奉系把十六师摆在前方，结果十六师倒戈，奉军西路军溃败。

固安方面的奉军获悉长辛店失守，西路奉军溃败，军心大乱，相继溃退，向天津逃窜。

东路奉军小胜，不幸的是张学良受伤，难以有效指挥。得知西路溃败，也开始溃退。张作霖试图挽回颓势，怎奈大势已去。

好吧，张作霖终究不是努尔哈赤。

五月五号，徐世昌下令奉军退出关外：“前以直隶、奉天等处军队移调近畿一带，迭经令飭分别撤退，乃延不遵行，竟至激成战斗。

近数日来，枪炮之声不间昼夜，难民伤兵，络绎于道，闾阎震惊，生灵涂炭，兵凶战危，言之痛心。特再申令，着即严饬所部，停止攻击。奉天军队即日撤出关外，直隶各军亦应退回原驻各地点，均候中央命令解决，务各凛遵！此令。”

奉军十二万入关，人员损失大半，装备全部丢光。十年来辛辛苦苦占便宜，一朝丢光，怎一个惨字了得。张作霖恨得牙痒。吴佩孚，你等着。

次危机

一九二二年，张作霖四十七岁，在东北已经混了三十年，接触到各个层次的人物，虎踞一方。从纵横东北算起，也有二十年的时间。此前都是他欺负别人、算计别人。他的目的最终都能达到，所以成了东北王，好像天生的赢家。为何直奉战争吃亏如此之大？

枪杆子决胜之前，态势已经发生逆转。

张作霖唯利是图，极端精明，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之所以入关和直系决战，除身后有日本人支持之外，还有段祺瑞和孙中山相助。张作霖的如意算盘：奉军和直军决战；同时孙中山北伐，段祺瑞联络旧部，从长江流域瓦解直系。

然而很不幸，张作霖精明过了头（或者说不够精）。孙中山被陈炯明拖住，朝不保夕，北伐不成。段祺瑞嘴里和张作霖交好，却没有行动，皖系人马基本消极应对。

更为不幸的是吴佩孚处境的转变。战争之前，直系一团糟。曹锟想继续享乐，吴佩孚孤掌难鸣。但开战之后，曹锟把大权交给吴佩孚。为支持吴佩孚，曹锟把他那不争气的兄弟曹錕的师长给罢免了。直军团结如一人，吴佩孚信心大增。

张作霖发现了局势的变化，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这些均不是主要原因，根源在于，之前张作霖看似威风凛凛，实则有致命缺陷：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考验。张作霖从小混混到东北王，经历过不少战争，甚至还有甲午战争那样的外战以及日俄战争那样的洋鬼子战争。但是作为三军统帅，张作霖没有经历过考验，因为他过于精明。

三百年前的努尔哈赤，每一寸地盘都是夺下来的，都经历过血腥争夺。张作霖不是，他利用北京政府内乱，利用日本人的帮助，走了捷径。

这世界，并非所有事都有捷径可走。

走捷径，有时候不见得是好事。

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指挥大规模战争的经验为零。相比之下，吴佩孚则一直在指挥战争。论搞关系交朋友，吴佩孚不如张作霖。论吃喝玩乐，吴佩孚不如张作霖。论排兵布阵，张作霖不仅不如吴佩孚，甚至连段祺瑞都不如。段祺瑞因为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而被击溃，张作霖因为过于精明而被击溃。

当然喽，胜败乃兵家常事，大不了重新开始、从头再来。比起段祺瑞，张作霖占据地理优势。即使输了，也可以退到关外修生养息。张作霖也是那么做的，退回关外，宣布东三省遵循“联省自治”。

——危机来了！

厌倦的国人

袁世凯原本从清王室手中和平接过权力棒，结果走错一步棋，导致天下分裂。袁世凯死后的主旋律还是统一，和平统一或武力统一，都是统一。

所谓“联省自治”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统治本省；第二层是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建立联邦制国家。”就是各省管好自己的事，不要干涉别人。

——不再是统一，而是实行分权联邦制。如美国。

想法虽好，现实却很残酷。正如每个人都有自身独特的过去和现在一样，国家也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所有脱离历史和现实的设计都是空中楼阁。美国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中国也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美国可以实行联邦制，中国不见得可以。

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集权制。凡不能集权的时代，均四分五裂、战火连连。

现实世界中，集权的清政府和民国都不足以抵御列强，分散之后更没有机会。因为中国的落后处于历史周期律第四层，想要重新崛起，必须在工业上赶上来。想要发展工业，必须集中力量，必须从集权开始。民国的的问题，恰好是集权不成功，军阀无法无天。

更现实的问题是，“联省自治”相当于分家，每个督军和省长分一块地盘而已。如此分家，中国将永无宁日，永无翻身之机会。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联省自治”呢？答曰，国人倦了。

数千年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处于文明前沿。近代落后挨打，国人痛彻心扉。有志之士前仆后继，试图拯救国家，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帝国后期，有洪秀全试图上帝主义中国化；曾国藩和李鸿章试图工商业主义中国化；康有为试图君主立宪中国化；更有孙中山立志用暴力手段推翻帝国。

民国到来，有宋教仁试图推行政党政治、并为此付出生命；有袁世凯和杨度重拾君主立宪制、并为此付出政治生命；更有段祺瑞的再造共和与武力统一的追求；以及黎元洪、冯国璋等人和平统一之追求。

如此折腾，半个世纪过去了，代表少数民族的爱新觉罗家族退出了，汉人精英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死的死、下岗的下岗，国家依然没能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

如此过程中，大师们沦为老古董，大总统沦为玩偶，内阁总理如同怨妇。至于声名狼藉的军阀们，除了战争就没有别的。大家不禁纳闷：如此乱局，何时是尽头？

既然统一玩不转，那就试试其他办法。按照惯例，每一种政治思潮都起于知识分子的头脑。

五四运动大潮冲击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头脑。梁启超敏锐地感觉到时代在变，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在不可避免地消失，于是他一拍脑袋想出“联省自治”的主意：“一、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

国，故主张国民总须在法律上取得最后之自决权。二、同人确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中央权限，当减到对外维持统一之必要点为止。三、同人确信地方自治，当由自动，故主张各省乃至各县各市，皆宜自动地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

梁启超就是梁启超，脑袋里总有新东西。当他看到清政府不行，试图政改；当他看到集权困难，马上想到分权，总是试图走在时代前列。然而这次他输了，输得很惨。

刚开始大家没把梁启超的话当回事。因为当时大家只是反对皖系的武力统一，希望直系和平统一。然而当直系战胜皖系之后，发现战争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倦。

连军阀都厌倦了。位列长江三督之首的李纯自杀就是活生生的案例。李纯是冯国璋铁杆，和皖系斗了一辈子，以为没了皖系就能和平。结果皖系输了，时局更乱。

李纯位高权重、衣食住行不愁，尚且看不到出路。普通人更短视，厌倦之下只求安慰。首先厌倦的是湖南人。袁世凯死后，南北对立，湖南为前沿。湖南人饱受战争之苦，尤其是湖南都督张敬尧，好事不干，专干坏事。所以湖南人不顾一切驱赶张敬尧，并达到了目的（年轻的毛泽东崭露头角）。复职的谭延闿决心改变现状。

谭延闿生于一八八零年，家庭条件很不错，受教育程度很不错，幼时聪慧，学习勤奋，被视为奇才。他十三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最后一科），天生学霸；同时练就一手好字，号称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为素质教育之典范。孙中山打算把宋美龄

介绍给他，谭延闿婉拒，转而当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月老，为人处世第一流。

辛亥暴动之后，谭延闿数次担任湖南督军或省长，深知湖南矛盾重重，曾经提出“湘人治湘”，但始终没能解决湖南问题，得知梁启超的“联省自治”之后，奉为至宝，以为找到了解决问题之法门。一九二二年一月份，谭延闿主政的湖南颁布《湖南省宪法》。一时之间，群起响应，隐隐然有维新变法再现之势头。一时间诸如“各省区自治联合会”、“自治运动同志会”、“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等如同春雨之后的竹笋，纷纷冒尖。

当初这个口号确实很有吸引力。

对军阀和地方大员而言，“联省自治”意味着自己的权力增大，意味着自己老婆孩子炕头热的待遇更稳固，所以他们乐于如此。所以湖南之后，西南各省纷纷跟进。

对大师们而言，“联省自治”意味着一次政治尝试，成了可以引领潮流、留名千古，输了也可以留下一笔。比方说梁启超，总想站在时代最前沿当弄潮儿。然后章太炎、胡适等新老大师跟进，表示支持，在舆论上形成气候。

对热血青年而言，“联省自治”是一种新生的东西，可以避开骚乱和战争。比方说尚未认识到枪杆子重要性的毛泽东，驱逐张敬尧很卖力，也支持“联省自治”。

然而稍微想一想就能明白，“联省自治”不可能实现。外有列强环视，尤其是日本，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当时中国合力尚不足以应对，

各省分开搞更是任人宰割。大师们一支笔什么都能写、一张嘴什么都能说，能否实践则是另外一回事。至于热血青年，冷却下来之后也不会再说。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随后拿起了枪杆子，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为集权抛头颅洒热血。

至于军阀，确实有人努力去实践。比方说广东的陈炯明，就把它当成一种政治理想去实践。绝大多数军阀，只是想把它当成加固自身权力的一种工具而已。所以那种情况下，有担当、想统一之人看不见出路。所以主张“和平统一”的李纯自杀。

一句话说完，所谓“联省自治”，虚有其表。

持明确反对意见且很有实力之人有三个：孙中山和吴佩孚明里反对，张作霖暗地反对。

孙中山是革命派的象征，虽然屡屡失败，但视野还是有的，看到所谓“联省自治”虚有其表，坚决北伐。然而孙中山的北伐之路被陈炯明阻断，导致蒋介石的崛起，这事后面说。

但事实证明，孙中山和吴佩孚均没有力量统一中国。不仅如此，两人反对“联省自治”，理论上应该联手合作，实际上吴佩孚始终敌视孙中山，和陈炯明暗通曲款，支持他反对孙中山。孙中山则暗中拉拢冯玉祥，导致冯玉祥临阵倒戈。是不是很乱？

那么“联省自治”怎么又消失了呢？因为它只是一剂春药，能让厌倦的国人兴奋一时，随后便是更严重的厌倦。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无法解决各省军阀的问题。

军阀是各省的土皇帝，欺男霸女无法无天。更为无法无天的是，

他们还时不时找借口横征暴敛。最无法无天的是私自截留中央税款。省长在他面前只是傀儡。如果不能解决督军问题，所谓“联省自治”不过是给军阀提供一个军人专政的借口。

刚开始时大家信心满满，认为能解决问题。新派大师胡适写到：“我们的朋友陈独秀是反对联省自治的……他自己断定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在于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我们要很诚恳的替他指出：他所举的只是纠纷的现状，并不是纠纷的根源；只是乱，并不是乱源……胡适认为，“今日只是督军总司令的权大，而地方的权极小”，“军阀的权限所以大到这个地步，是因为地方没有权”，“裁制军阀与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联省自治的联邦制”。“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能充分发展他的潜势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

张作霖很快就给了胡大师一个响亮的耳光。

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张作霖退回关外，响应“联省自治”之口号，给了各路“联省自治”吹捧者以希望。然而张作霖只知“自治”，不知中央。

中央政府下令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任命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张作霖指示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和沈阳各团体通电不接受这种“乱命”。

张作霖改称奉军总司令，并发表对外宣言：“……对于友邦人民生命财产力加保护，所有前清及民国时期所订各项条约，一概承认，此后如有交涉事件，请逕行照会滦州本总司令行辕。自本月一日起，

所有北京政府订立关于东三省、内外蒙、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

——好吧，独立了。

所谓保护友邦人民生命财产，所谓承认前清和民国条约，主要是保护日本的利益，和卖国并无区别。要知道被轰下台的段祺瑞都没有如此过分。如此举动，把那些自命清高的大师们和热血青年们气个半死。但这些还不是全部。

张作霖此举虽有卖国之嫌，却是与狼共舞。他想获得日本的支持，并达到了目的。两年之后，在日本的支持下，张作霖编练新式陆军，并且增加了海军和空军，实力大增。与此同时，直系因为曹锟贿选，曹锟和吴佩孚闹矛盾，实力并没有增加。痛定思痛之后，张作霖决定再次入关，和吴佩孚一决雌雄。吴佩孚，你等着。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号，张作霖统帅六路奉军入关。比起两年前，奉军实力增加了一倍。比起两年前，张作霖和孙中山与段祺瑞的三角同盟更为牢靠。比起两年前，孙中山痛定思痛之后完成第二次创业——创建黄埔军校，正让蒋介石带领黄埔子弟兵东征陈炯明。

比起两年前，张作霖手中又多了一张秘密王牌，他将给吴佩孚一个大大的惊喜。

俺老张又回来了。所谓联省自治就是个屁。

五章 宿命轮回

两年之前，吴佩孚以少数兵力杀得张作霖丢盔卸甲。如今他指挥的军队已经多于张作霖，结果又如何呢？谁也没有想到，局势以一种偶然又必然的方式进入宿命轮回之中。

九月十七号，张作霖入关两天后向吴佩孚宣战，吴佩孚乘车进入北京城。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次没有无聊烦人的电报战，直接开打。

大敌当前，分裂的直系再次团结起来。曹锟以最热烈的方式迎接吴佩孚，并且极为和蔼地说：“子玉，辛苦你了；我老了，一切请你作主。”随后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特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以四照堂为总司令部。吴佩孚立即上任，立即在四照堂点将，直系诸将对吴都表示极端的恭顺。但暗潮正在涌动。

在吴佩孚看来，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最终目的不是如何战胜张作霖，而是如何彻底解决张作霖。让张作霖退回关外，过两年又来，很烦。

吴佩孚把直军分成四块：第一军司令猛将彭寿莘，沿京奉铁路出发，对付山海关、九门口一线，正面抗击奉军；第二军司令王怀庆（老油条），出喜峰口，向平泉、朝阳方向；第三军司令冯玉祥，出北古口，向赤峰方向；后援军司令为张福来。

这是明牌。按照这个牌路，彭寿莘正面抵抗拖住奉军，王怀庆策应，足以消耗奉军有生力量。冯玉祥如果进展顺利，绕道赤峰，还可

以威胁奉军侧面。这是吴佩孚用兵的基本原则。他总是喜欢正面拖住对手，再出奇兵。直皖战争如此，第一次直奉战争如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依然如此。那么奇兵在哪里呢？在海面。

吴佩孚暗中调渤海舰队集中在秦皇岛，然后向北进攻葫芦岛，另出奇兵绕海道由营口登陆直捣沈阳！奉军倾巢而出，老巢空虚。如果威胁沈阳，奉军必然方寸大乱。吴佩孚如此部署，很有点霍去病出奇兵扫匈奴老巢，李靖出奇兵端突厥大帐的味道。

部署完毕，吴佩孚端坐四照堂，喝酒写诗，等待好消息。

如果成功，便能一次性解决奉军。然而无论多么精妙的部署都需要有人实施。吴佩孚遗漏了两点。霍去病和李靖都是冷兵器时代的顶级将帅，各自时代的王者。直系虽然很强，但并没有人强到霍去病和李靖那个层面。尤其是海军，自从甲午战争之后，一直退化。这是第一。第二，冷兵器时代的中国是中央帝国，汉唐时代更是雄视东亚。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一直活在日本的阴影下。张作霖的后台老板恰好是日本人。

所以吴佩孚的奇兵没起作用，被阻挡了。给张作霖提供情报的正是日本人。

只能靠正面绞杀了。

所以吴佩孚期待的好消息没能出现。吴佩孚没法在北京喝酒，诗也写不下去了。因为前线战事吃紧，两军犬牙交错，奉军表现超出吴佩孚预期。

重新武装的张作霖已非两年前初次统帅大兵的菜鸟大帅，作战思

路清晰丰富了许多。

奉军首先对直军薄弱环节、热河方向的王怀庆第二军进攻。奉军的作战思路：新锐李景林和兵痞张宗昌由北镇出发，经朝阳、凌源进入喜峰口。王怀庆是个老军阀，也是兵油子，搞关系有一手，喝兵血也很在行，打仗却不怎么样。他的直辖队伍缺额多、训练差、军队生活腐化，不堪一击。整个第二军只有在长城冷口一带的董政国（绰号董二杠子）师可以和奉军匹敌。热河方向虽然不是主战场，却关系到锦州的安危。

锦州是连接关内外的节点。自古以来，牧民想入关，要攻破锦州；农民想安稳过日子，必须守住锦州。日后国共争霸，共军拿下锦州，国军失东北，再失华北，再失全国。所以奉军在热河方面占据优势，可以确保主战场安稳。

山海关方向是两军主战场。奉军并不和谐，士官系的姜登选和大陆系的郭松龄经常闹得鸡飞狗跳。郭松龄要进攻九门口，姜登选不赞同，郭松龄一气之下撂挑子走人。张学良赶紧让部队停下来，独自策马扬鞭追郭松龄，上演一段张学良版本的“月下追韩信”。如果直军情报工作出色，大可以利用这个做文章。

郭松龄回到部队之后，为了证明自己正确，也为了将功补过，亲自率三个步兵团和一个山炮营，昼伏夜出，突袭九门口，以最快的速度向守军发起猛烈攻击。直军全线崩溃，退出九门口，奉军一鼓作气占领了北戴河和秦皇岛。

直军危急！

如此情形，换成清末民初大多数统帅，都会收拾细软、带着小老婆撂挑子跑人，但吴佩孚没有。他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统帅之一，号称吴大胆，哪儿危险去哪里。

十月十号，吴佩孚扔下酒杯和毛笔，从四照堂去前线。吴佩孚的出现，大大鼓舞了直军士气，直军奋起反击。在吴佩孚的指挥下，直军化整为零，一度夺回九门口。

更让直军头疼的，奉军不仅丰富了作战套路，而且武器装备升级，尤其是空军，几十架新式飞机让直军吃尽苦头。饶是如此，直军依然在吴佩孚的指挥下稳住阵脚，战场达到一种恐怖的平衡。双方犬牙交错，谁也别想胜利。

二十几万华夏男儿，为了军阀的野心，在数百里战线上殊死搏斗。

战争变成了消耗战，对直军不利。吴佩孚的特长在于闪电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战前动员，直军不如奉军。后勤准备，直军不如奉军。拼消耗，直军处于劣势。

即便到了此时，直军如果团结一致，打赢的概率依然很大。直军还有两支精锐，冯玉祥和王承斌。吴佩孚让王承斌去帮王怀庆，理论上足够对付张宗昌和李景林，稳住热河一线。如果冯玉祥出现在赤峰，插到奉军侧后方，依然可以打破战场平衡。

局势把冯玉祥推到前沿。然而冯玉祥行军二十多天，却不见动静。

吴佩孚眉头拧得越来越紧。张作霖笑了，他的秘密王牌就是冯玉祥。

关键时刻，冯玉祥决定干一番大事业：临阵倒戈。

冯玉祥与张作霖约定，张作霖不入关，就在山海关与直系军队作战，而冯玉祥在内部发动倒戈。如果双方军队发生遭遇，就对天鸣枪，冯军缠红布臂章，奉军缠黑布臂章。

时间倒退两百八十多年，吴三桂自己和李自成在关内作战，让多尔衮在旁观战。如今多尔衮的角色换成张作霖，但冯玉祥没有当成吴三桂，因为他没有选择在山海关前和吴佩孚作战，而是做了更为致命的决定。

十月二十二号，冯玉祥返回北京，空虚的北京城向冯玉祥敞开怀抱。冯玉祥不费一枪一弹，包围总统府，囚禁曹锟。王承斌没有去支援王怀庆，而是去看望曹锟，索取大总统印信。一年之前，他帮助曹锟向黎元洪索取过总统印信。

吴佩孚腹背受敌，直军溃败！

“北京政变”爆发，民国三十八年唯一一次政变。当然这玩意也谈不上新意，任何朝代兴衰，基本都要经历的历史节目，只是演员不同、演技有差别而已。十二年之后，张学良在西安也玩过类似的节目，只因为没有把蒋介石怎么样，仅仅是“西安事变”。

正如西安事变改变了民国进程一样，北京政变也是。后人对西安事变了解的足够多，对北京政变的了解则不够深入。

北京政变后果之一：最后一支北洋嫡系瓦解。从一八九五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北洋军历经三十年兴衰荣辱，最终进入垃圾桶。冯玉祥把自己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效忠孙中山。从那以后，孙中山和他的粉丝在和袁世凯粉丝的对峙中占据优势，直到四年后完胜。

北京政变后果之二：冯玉祥把爱新觉罗家族赶出紫禁城，完成辛亥暴动未能完成之事业；冯玉祥把紫禁城对外开放收门票，然后拿钱支援工人运动。五卅运动中，很多共产党人脱颖而出，典型代表为刘少奇。

北京政变后果之三：历史再一次走向拐点，进入“暴力时代”。

偶然与必然

如何解释“北京政变”呢？套用一句俗话说，这是偶然，却又不是偶然。

满清退位，袁世凯依靠北洋军赢得统治权，晋升大总统，还不满足，还要当皇帝。段祺瑞和冯国璋反对，袁世凯失败。这是偶然么？当然不是。只有反对袁世凯，他们才有机会执掌大权，荣登大位。

段祺瑞担任内阁总理，掌控实权还不满意，要把大总统变成盖印机，推广武力统一。眼看有成功的希望，吴佩孚临阵倒戈，宣布和平，撤军，开战。偶然么？当然不是。如果段祺瑞达到目的，吴佩孚就没有成功的希望。同时吴佩孚认为段祺瑞跟日本人合作是在卖国求荣。

赢得直皖战争，有张作霖制衡，曹锟勉强维持徐世昌为大总统。赢得第一次直奉战争，曹锟和吴佩孚直接让徐世昌走人。吴佩孚把黎元洪迎回北京，曹锟忍了一段时间，直接把黎元洪拱下台，自己贿选当总统。但直系军事大权落到了吴佩孚手中。

曹锟在北京当大总统，吴佩孚在洛阳当中州王，直系分裂为保定

和洛阳两派。曹锟依然信任吴佩孚，吴佩孚依然忠于曹锟，但直系还是分裂了。因为他们身边各有一帮人，有利益集团。在中国，政治利益集团，往往是不可调和的。

曹锟名义上当老大，但吴佩孚才是主心骨。他有雄兵数十万，直属部队控制着直隶、陕西、山东、河南、湖北等省的地盘。全国十八省督军、总督代表机构就设在洛阳。

吴佩孚五十岁生日，赶往洛阳的达官显贵和各国使节就有七百多人。连以“康圣人”自居的老古董康有为都亲自出面，撰写了一副水平极高的祝寿对联：

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

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

康圣人这马屁拍得震天响，把吴秀才乐得心里开了花。

当然吴佩孚有乐呵的理由。洛阳成为那个时代三大政治军事中心之一，比张作霖的沈阳和孙中山的广州更有影响力。连章太炎那样的狂人，都跑到洛阳和吴佩孚合作。

吴佩孚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北京政府扩建国会场地，要拆除三大殿。吴佩孚一通电文“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维一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阻止。所以曹锟才说：“只要洛阳打个喷嚏，北京天津都要下雨。”

当时苏联为寻求外交空间，派人到中国找吴佩孚谈合作，而非孙中山。美国《时代》以吴佩孚做封面（中国第一人），介绍说吴佩孚是时代最强者。因为吴佩孚的强大，张作霖、孙中山和段祺瑞结成同盟反对他。

张作霖要入关争霸，最大的障碍就是吴佩孚。

那么吴佩孚能逃脱那个时代“失势香、得势臭”的规律么？看看之前的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无一例外地倒在这个规律下。理论上可以，只要能完成武力统一即可。第一步要再次战胜入关的张作霖。关键时刻，冯玉祥倒戈，偶然么？是偶然，也是必然。

说偶然，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比方说个人恩怨什么的。这个后面谈。

至于必然的理由，有些复杂。

吴佩孚反对段祺瑞和日本狼狈为奸，支持五四运动，赢得爱国将军之美誉。然而接下来很快便镇压工人运动，制造血案。

吴佩孚一生有“四不”：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这几条，看似和洋人没有关系，实际并非如此。吴佩孚控制的地盘，正是英美利益所在的长江流域。英美支持吴佩孚，是因为吴佩孚保证了他们的利益。吴佩孚敢和段祺瑞开战，是因为段祺瑞依靠日本，损害了英美利益。所以英美支持吴佩孚，吹捧吴佩孚，让他上《时代》封面。

吴佩孚反段祺瑞，有现实成分和理想成分。冯玉祥反对吴佩孚和吴佩孚反对段祺瑞出于同样的目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宿命的轮回。

不仅如此，日后冯玉祥又遭遇韩复榘、石友三的反复背叛。如此宿命轮回，直到那个年轻人去井冈山途中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之后方才破解。

冯玉祥的事

冯玉祥，生于一八八二年，安徽人，在直隶长大，出身贫苦，十四岁当兵吃饭，一晃六年，没干出成绩，倒是练就了一副高大魁梧的好身体。绝大多数当兵吃饭的人都变成了兵油子，冯玉祥则是把当兵作为一份人生事业，犹如年长几岁的张作霖和吴佩孚。

冯玉祥是军人，没念过几年书，但喜欢读书，有时彻夜不眠。晚上为了不影响他人睡觉，就找来个大木箱，开个口子，把头伸进去，借微弱的灯光看书！好吧，想想那样一个画面，励志程度堪比“凿壁借光”！如果画成图画或拍成电影，肯定很感人。

冯玉祥读书很广，从古书（如《贞观政要》）到时事报纸，无所不包。冯玉祥担任旅长时，每日早晨读英语两小时，学习时，关上大门，门外悬一块牌子“冯玉祥死了”；学习完毕，门上字牌则换成“冯玉祥活了”。很有趣，也证明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不是么？

一个武夫，能有如此上进心，别的不说，我们的民族挺过近代低谷就是有道理的。

一九零二年，张作霖再次被诏安之际，冯玉祥转投新建陆军。由于体格强壮、吃苦耐劳，加上舅舅陆建章提携，由基层一步步上升为

中级军官，娶了老婆、成了家，算是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但是冯玉祥依然保持吃苦耐劳的作风，没有丝毫腐化堕落的迹象。因为他关注国家命运，认为军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连为一体。他讨厌国家衰弱，朝廷无能。

辛亥暴动之后，北方的革命党也在谋划滦州起义，如果成功，将直接威胁北京城，威胁朝廷甚至袁世凯。冯玉祥和李大钊一起加入同盟会，参与滦州起义。由于吴佩孚告密，起义失败。英豪吴禄贞送命，冯玉祥丢官。这便是冯玉祥和吴佩孚两人恩怨的起点。几年之后，袁世凯让陆建章扩军，陆建章重新启用冯玉祥，让他当营长，驻扎京西三家店。

冯玉祥依然是冯玉祥，依然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命运连在一起。

冯玉祥多次亲自下去招募士兵，英雄如孙连仲、吉鸿昌，叛徒如石友三，都是冯玉祥亲自招募来的。他的招兵标准：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龄十八岁到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他还学曾国藩的样子，派下级军官回家乡招募亲戚、乡亲、朋友及其子弟入伍。

冯玉祥练兵，除陆军正式操典外，还加设铁杠、木马等体育训练器具，以增强士兵体魄。同时限制体罚，制定“八不打”：“一、长官生气时，不许打士兵；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吃饱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并加强士兵纪律教育：“老百姓是我辈主人翁，应加敬重，不当蛮横”。

冯玉祥是旧时代军人中的极品，冯玉祥的队伍是旧时代的极品。

这样一个冯玉祥注定是不安分的。他看不上朝廷，所以参与革命暴动。

正是这样一个极品不安分的冯玉祥终结了北洋嫡系。

其实冯玉祥很不喜欢张作霖，正如张作霖不喜欢冯玉祥一样。两个人风格就完全不同。冯玉祥囚禁曹锟，但曹锟身上有的缺点，张作霖一样都不缺。对比曹锟，张作霖野心勃勃，破坏力更大。如果天下落到张作霖手里，绝不会变得更好。

所以当张作霖拉拢冯玉祥时，冯玉祥并不怎么理会他。冯玉祥之所以和张作霖合作，是因为吴佩孚和孙中山。

吴佩孚也是旧时代军人的典范，练兵统兵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但吴佩孚和段祺瑞一个德性，恃才傲物、眼高于顶，习惯于用军事眼光看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吴佩孚和冯玉祥很像。他们都很老土，都很古板，都很爱学，都很能吃苦，都把国家的事和自己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他们应该成为并肩作战的战友、知音。然而很遗憾，他们兵戎相见。原因不难理解，除了这些之外，他们还有信仰和灵魂。

吴佩孚骨子里就是一个老传统，他的知识和才学均来自传统世界。

吴佩孚的办公室门前有一块大石磬，是他从黄河中心淘出来的“中流砥柱石”。每要做重大决策，都要亲手击磬，如果声音大振，则为大吉。然后还要用七枚铜钱预测凶吉。吴佩孚行军打仗，智慧取决于《孙子兵法》和《易经》。看到国家衰亡，便想用传统方式救治。

总之一句话，吴佩孚有一个古老的灵魂。

吴佩孚是一个生活在近代的古代军人，是“不懂政治的曾国藩。”

冯玉祥没有吴佩孚的文化底子，但也有自己的信仰。他羡慕英美的强大，信仰基督，号称基督将军。他的第一任妻子病故之后，大总统曹锟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他对来说：“我是个穷小子出身，大帅厚爱令我受宠若惊，如大帅千金不嫌弃，过门后须做到三条——第一，不许穿绫罗绸缎，只穿粗布衣裳；第二，会纺纱织布；第三，精心抚养前房子女。”曹家小姐自然不会接受，随后他娶了基督徒李全德。他的部下张之江曾自费印《圣经》一万部，分赠军中同志，冯玉祥称他为大主教。张之江曾修造大教堂一所，每逢礼拜日，实行“军教主义”，并自称为“真救世军”，不知情者还以为是洪秀全转世。

冯玉祥看到国家衰亡，对传统的一切很不满，希望摆脱那一切。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冯玉祥把“勿忘国耻”四个字印在馒头上给士兵吃。袁世凯称帝，冯玉祥在前线和蔡锷暗通曲款，拒绝为袁世凯继续卖命。

所以两人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同样志在救国，方式却完全相反，正如袁世凯和孙中山一样。从滦州起义便能看出，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参与起义，倾向传统的吴佩孚跑去告密。当然脱离现实谈魂魄，那是瞎扯。正真让二人决裂的还是现实问题。

当初段祺瑞刚愎自用，逼得直系和奉系联合反对皖系。吴佩孚是段祺瑞的翻版，又以“关（羽）夫子”自居，不仅把张作霖、孙中山、段祺瑞逼得建立反直大联盟，又在直系内部得罪了很多，连拜把兄弟张福来都被逼到对立面，和冯玉祥一起对付他。

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和河南督军赵倜暗中勾结。吴佩孚在前方打仗，冯玉祥解决了赵倜，立下大功。论功行赏，冯玉祥担任河南督军，驻扎开封。但冯玉祥解决赵倜时，顺便把吴佩孚放在赵倜身边的“眼线”一并解决了。督军府成员，凡吴佩孚推荐之人，冯玉祥一律不用。为刁难冯玉祥，吴佩孚让冯玉祥筹八十万军费，以后每月固定二十万。冯玉祥硬顶回去“我没有这么高的搜刮压榨的本领，不能遵办。”

吴佩孚过五十大寿，权贵争相送礼，冯玉祥只送了一坛子清水。

吴佩孚看到了冯玉祥的野心和实力，视其为心腹之患，决定旧怨加新怨一起算。吴佩孚找机会把冯玉祥赶出河南。失去地盘，队伍很可能瓦解。绝境之中的冯玉祥到北京找曹锟通融。曹锟看到吴佩孚逐渐强大，就收留了冯玉祥，作为牵制吴佩孚之筹码。

冯玉祥在北京帮曹锟干了不少事。驱赶黎元洪的过程中，冯玉祥带头索要军费，把财政部长、内阁总理折腾到散架。但也正是那个过程中，冯玉祥看到了上层的腐化和堕落，看到曹锟的贪得无厌和无能。正如之前对满清和袁世凯失望一样，冯玉祥再次决定改变。

其实北京政变之前，冯玉祥有过很多异常征兆。吴佩孚点将之后，冯玉祥要先拿军饷再出战，吴佩孚极为震惊。大敌当前讨价还价，分明靠不住。当然吴佩孚也不厚道，让冯玉祥走的路是一条行军绝路：路途遥远，荒山野岭，补给困难，军队素质不过硬的话就玩完了。

冯玉祥走走停停，时不时来个折返，等待机会。等到吴佩孚和张作霖犬牙交错之际回北京，包围总统府，给吴佩孚致命一击！

第六章 理想和现实

看看冯玉祥干的这些事：吃清朝的米，革清朝的命；领曹锟的军饷，囚禁曹锟；和吴佩孚称兄道弟，临阵反戈一击。分明就是“倒戈将军”么！按照现代主流观点，冯玉祥是爱国将军，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军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冯玉祥身上始终都有一种叫“理想主义”的色彩。段祺瑞反对袁世凯时，也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再造共和”之后，便刚愎自用，死守武力统一。吴佩孚反对段祺瑞时，也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做大之后同样死守武力统一。冯玉祥不同，理想主义色彩从没丢失。

但世界总是现实的，从清政府到北洋政府都是现实的，所以冯玉祥一路“反”下去。有没有人坚持理想？当然有，那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有一个绰号叫孙大炮，就因为他总是提出一大堆不切实际的幻想，比方说“修建二十万公里铁路”。但幻想总是有魅力的，总能吸引一批人，冯玉祥就是被孙中山吸引的人之一。所以辛亥暴动，冯玉祥参与起义。

但因为孙中山屡战屡败，没有立足之地，一直没有接触冯玉祥的机会。但孙中山就是孙中山，屡败又屡战，如同打不死的蟑螂。袁世凯死后，因为北洋军内耗严重，孙中山逐渐在广州得到一片地盘，影响越来越大。

一九二零年，吴佩孚反段祺瑞前夕，就在吴佩孚拉拢陈炯明反孙中山时，孙中山也在挖吴佩孚的墙角，让秘书徐谦拜会冯玉祥。当时冯玉祥的身份是师长，驻扎汉口，跟随吴佩孚和西南军对垒。徐谦既没有给冯玉祥带去军阀最需要的枪，也没给世人都想要的钱，仅仅给冯玉祥送去一样东西——孙中山写的《建国大纲》，还请冯玉祥提意见。在那个书里面，孙中山把他的大炮放得漫天响，比方说“把武汉建设成东方的芝加哥”。冯玉祥看了之后热血沸腾，对孙中山的钦佩如滔滔江水。当然喽，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铲除军阀。

铲除谁呢？就是孙中山对立面的那些人。随后孙中山和张作霖、段祺瑞联合，对付直系，那就要铲除直系，确切说是铲除吴佩孚。在孙中山看来，吴佩孚和陈炯明勾勾搭搭，影响自己的北伐事业，绝对不是好东西。

一九二三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孙中山派人告诉冯玉祥，准备动手。冯玉祥告诉孙中山，等待有利时机。与此同时，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劝他不要犹豫。当时国共合作，李大钊和冯玉祥交情很深，李大钊的“共产主义”比孙中山的“大炮”更具理想主义色彩。李大钊结合苏联的成功案例帮助冯玉祥分析了一番局势，冯玉祥再次热血沸腾：“原来革命可以这样取得成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事情就这么定了。虽然从曹锟那里领军饷，却认为他不是好人，把他抓了。

当冯玉祥完成一系列动作，自己脱离北洋、变身国民革命军，才发现理想中的局面并没有到来，现实反而更混乱了。冯玉祥原本支持

黄郛（蒋介石拜把子兄弟）出任临时内阁总理，向南联系革命党，向北联络张作霖，改造时局。没想到张作霖根本看不上黄郛，而是拥戴段祺瑞出山，南方的孙中山也没话说。长江流域残存的北洋军实力还在，他们只可能接受段祺瑞。

没法子，段祺瑞再次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他的权限包括总揽军民政务，统率陆海军。由于不设内阁总理，实行民主集权制，段祺瑞的这个临时执政相当于大总统和内阁总理的合体，理论上是民国三十八年职权最大的职位。如果袁世凯死后就有这么一个职位，就没有府院之争，民国必然会少很多兵灾之祸，国人必然少遭罪。但如今，这个职位却无法带来和平，因为国家权力的四层特性已经被糟蹋殆尽。

冯玉祥行动之前曾经和张作霖、段祺瑞有过密约，倒直系之后蛋糕如此划分：奉军不得入关；段祺瑞不得任用安福系旧人；国民军赞助各派在天津召集会议解决时局。

直系刚刚垮台，奉军就开到天津。

段祺瑞刚刚复出，安福系旧人就活跃起来。

段祺瑞理论上拿到全权，实际还是受气的命。张作霖要南下争地盘，冯玉祥要消灭吴佩孚，这些都要触犯南方的利益。没了南方的支持，段执政是干不下去的。

所以就职之后，领导班子还没健全，段祺瑞赶紧发表了一个又臭又长的通电，把曹锟骂一顿，表示自己不得已被各方拥戴出山，以后提倡和平。

数年之前段祺瑞还在迷信武力统一，如今再度上台，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实际上处于当年黎元洪和徐世昌的位置上，只能提倡和平，锐气丧尽，如同老妇。

为了所谓的和平，段执政召开善后会议。按照游戏规则，每次战争之后都要开这么一个会，实际上就是分蛋糕。如何善后呢？就是发电报，给革命巨头孙中山发电报，给被曹锟赶走的黎元洪发电报，给赋闲的北洋巨头王士珍发电报，给爱骂人的古董章太炎发电报，给名流唐绍仪发电报，给各省乡绅权贵发电报……

总之，给所有有能量的人发电报，造成一种大和谐、大团结之景象。对段祺瑞而言，如此卖力，也算难为他了，想当年人家可是眼高于顶的。也许是老了吧。

但是他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可。首先孙中山就反对善后会议，认为类似的会议传统标签太浓厚，不能代表全国各党派和各阶层，不是一个解决国事的机构。孙中山当时正在推行“新三民主义”，搞得红红火火，黄埔军校搞得红红火火，而且吃够了军阀的苦头。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至于善后会议条件，则其组织方法，并非以人民团体为基础，故本党总理于一月十七日复电临时执政府，提出两条件：其一，善后会议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诸代表。其二，善后会议，虽可讨论军制财政诸问题，而最后决定之权，当还于国民会议。并声明如临时执政府能容纳此两条件，则对于善后会议，当表赞同。此为本党总理对于临时执政府最大限度之让步。”孙中山和段祺瑞之

间分歧巨大。

对内，孙中山主张召开国民会议，段祺瑞主张召开善后会议。

对外，孙中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段祺瑞主张接受那些条约。按照当时的局面，中国不可能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列强可不是搞慈善的，强行废约只能引来战争，结果要么失败，如同慈禧太后那般引来八国联军入侵；要么如同毛泽东那般，在朝鲜对抗“联合国军”。孙中山和段祺瑞既不会如慈禧那般窝囊，也没有毛泽东强力。但彼时彼刻的毛泽东还在拿笔杆子，正代理汪精卫的国民党宣传部长之职位，宣扬国共合作。共产党一些人（如李立三）嫌他和国民党走得太近，国民党中一些人嫌他太刺眼，经常在经费上刁难他，最后还欠他一笔工资，至今未归还，呵呵。

孙中山之死

当然孙中山和段祺瑞的这些差异原本可以谈。孙中山北上，就是准备和段祺瑞谈这些。然而很不幸，孙中山北上之后染病，一病不起。

孙中山人生最后时刻还在念叨：“我这次放弃两广，直上北京，为了谋求全国的和平统一。统一的方法是召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现在一病不起，将和你们永诀，生死本无所惜，不过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革命的目标和主义不能完全实现，深为遗憾。甚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能早日实现，则我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最后三个词：“和平、奋斗、救中国。”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号，那个时代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一代巨匠孙中山逝世。

评，孙中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尽管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他的某些行为并非合理，但总体上是一位纯粹的革命者。正如陈炯明的挽联：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情私谊，全凭赤心知。

对帝国而言，他是终结者，洪秀全之后破坏力最大的人物。

对民国而言，他是开创者，是国共两党共同的旗帜。

一九三八年，国共再度携手，毛泽东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写对联：

国共合作的基础为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帝国转向民国，孙中山和袁世凯贡献最大。但两人又不同。如果把历史看成一辆破车，孙中山在前面，拉着往前走；袁世凯在后头，边扶持破车，边被破车拉着走。孙中山力量有限，拉着破车前行，又有袁世凯在后面拖后腿，举步维艰，很辛苦，很心酸。

正如蔡元培挽联：

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

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但是没有袁世凯扶持破车，破车便会散架。辛亥年间，若非袁世凯手腕巧妙，不知乱成什么样。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十年不得要领，破车逐渐解体。

孙中山再死，局势更乱，更为不可收拾。正如柳亚子挽联：

树弱小民族解放先声，列宁而还，公真健者；

与帝国主义奋斗救世，斯人已往，谁其嗣之？

孙中山死时，蒋介石带领黄埔子弟进行二度东征，即将拿下陈炯明的惠州老巢，随后带领国军北伐、分裂，再北伐、再分裂，随后主导国民党和共产党分裂、战争、合作、分裂、战争，转进台湾。如今国民党百年老店奄奄一息，随时有关门倒闭之风险。孙中山若泉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

盲动

段祺瑞政府给予孙中山国葬的待遇，全国各机关下半旗三日致哀，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拒绝。段祺瑞要去哀悼，被警告不要去。梁启超前往悼念，遭到国民党员围攻，若非汪精卫解围，可能被暴打一顿。

孙中山死后，冯玉祥失去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双重依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既有报复吴佩孚、抢地盘的军阀习性，也有希望依靠孙中山、支持孙中山改变国家现状之理想。

冯玉祥刚刚控制住北京的局势，就赶紧给孙中山发电报：“中山先生大鉴：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友军，勘定首都，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希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续桐溪、刘守中、蒯定煜、凌毅、李石曾、李含芳、岳维峻、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邓宝珊……叩。”

看看这个电报，把冯系将领名单全部加上，相当于把政治筹码全部押在孙中山身上。孙中山死了，冯玉祥不仅在政治和心理上失去靠山，连自身也遭受威胁。

张作霖看不上冯玉祥，因为冯玉祥成了他的新障碍，正如之前看不起吴佩孚一样。冯玉祥虽有理想，但政治水平一般，处处标榜艰苦朴素，搞关系水平不怎么样。

能搞关系的张作霖和段祺瑞走得很近，排挤冯玉祥。张作霖处处占便宜，分得江苏、安徽、山东、直隶四省督军位置，相当于从北京向南到长江口，都变成了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冯玉祥仅仅得到西北边防督办，相当于之前徐树铮的位置。冯玉祥很不满。

历史无数次证明，占便宜不见得是好事。

时局如板凳，至少需要三条腿才稳当。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军事上吃亏。经过两年韬光养晦，终于战胜吴佩孚。但在东北说一不二，不代表能玩转全国。

江苏原本是直系地盘，冯国璋和李纯经营了十几年，根深蒂固。张作霖去占地盘，理应找一个能力强的人。但张作霖只考虑搞关系，功课不够，把杨宇霆派到江苏，把张宗昌派到山东，把姜登选派到安徽。张宗昌是军阀糜烂派的典型，只知道吃喝嫖赌抽。杨宇霆能力尚可，初到江苏立足不稳，又无法让江苏人信服。如此情形成就了孙传芳。

孙传芳，生于一八八五年，山东人，幼时家贫，看够世人白眼，受尽人间冷暖。后因姐姐嫁给北洋军军官，得到当兵的机会，为人聪明、刻苦用功，遂得到深造之机会。孙传芳首先加入保定军校，和叶挺、邓演达等人是同学，随后到日本士官学校进修，和冈村宁次等人当同学。学成归国跟随冯国璋干事业。冯国璋去北京之后，孙传芳在王占元身边施展才华。

冯国璋死后，孙传芳依靠曹锟和吴佩孚，驻福建。直皖战争，孙传芳从福建向北，帮助浙江都督进攻卢永祥，后成为浙江都督。杨宇霆在江苏不得人心，孙传芳抓住机会驱赶奉军。

杨宇霆战败，姜登选不支。奉军远离根据地，接连败退。张宗昌退到徐州。孙传芳成为东南霸主，比当年长江三督更有派头。冯国璋当年也不过如此。

张作霖辛辛苦苦占便宜，却碰得灰头土脸，四省地盘转眼丢失大

半。但这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形势发展，使得他差点步曹锟和吴佩孚的后尘。

扬宇霆和姜登选在南方的失败，张作霖并没放在心上，毕竟胜败兵家常事，毕竟最重要的直隶督军还在手中。张作霖没想到，就是这个直隶督军，差点要了他的命。

入关之前，张作霖原本答应把直隶督军的位置给王承斌。直隶督军原本是直系的大本营，冯玉祥和王承斌都是直系出身。奉系掀翻直系，王承斌出了很大力气。然而李景林推进到直隶之后，直接把王承斌的部队缴械；再阻拦王承斌和张作霖见面；然后又是一番花言巧语坐上了直隶督军的位置。对此冯玉祥非常不满，想要张作霖的命。

张作霖知道冯玉祥不满，却不知内部炸了锅。

话说奉系内部也是派系重重。跟随张作霖打江山的为老派，如张作相、吴俊生、汤玉麟等人，基本都从黑道转向白道，都有当土匪的历史。这些人之外是新派，又分三六九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高材生，为士官派，代表人物如扬宇霆、姜登选；讲武学堂出身的为大陆派，如郭松龄。士官派和大陆派矛盾很深，比方说郭松龄和姜登选就是死对头，看扬宇霆也很不爽。二人吃了败仗却没受到惩罚，郭松龄心里非常不平衡，终于酿成大祸。

段祺瑞不同意袁世凯称帝，反对。吴佩孚看段祺瑞不爽，起兵反对。冯玉祥看吴佩孚不爽，临阵倒戈。因为他们身上都有很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郭松龄的性格类似于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眼高于顶，为人孤傲，凡事喜欢较真。

张作霖让姜登选、扬宇霆担任都督，已经让郭松龄不爽。二人吃败仗不受惩罚，郭松龄认定奉军已经堕落。如果想拯救奉军，张作霖必须下台，让张学良上。

郭松龄生于一八八三年，东北陆军讲武学堂毕业，在外面混了一圈，又回到讲武学堂当教官，为人刻板严谨，但很正直；干事一丝不苟，如同老学究，却又有抱负；带兵可以和士兵同甘共苦，作战奋勇当先。

郭松龄既是张学良的老师，也是张学良的副手。张学良对他非常钦佩，非常信任。张学良常说：“郭松龄就是我，我就是郭松龄。”郭松龄死心拥护张学良，可谓相得益彰。两人好到睡一张炕，在一间房办公。两人有时也会吵架，吵完后就抱头痛哭，哭完和好如初。

凡是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军人，多半是敢想敢干。郭松龄认为奉军堕落之时，便是暴走之时。当初段祺瑞反袁世凯，理由是反对“长人变矮子”。当初吴佩孚反段祺瑞，理由就是反对给日本当走狗。张作霖为扩大势力，继续和日本做交易。郭松龄对冯玉祥大将韩复榘说：“国家殆危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不惜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是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随后郭松龄和冯玉祥签订密约：

一、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擅订祸国条约，以图进攻国民军，此事他誓死反对。

二、奉张进攻国民军时，他即攻张。他的部队改用“国民军第四

军”或“东北国民军”番号。

三、他愿率部出兵，专门开发东北，决不与问关内之事。

四、河北、热河，拟请划归李景林。

这个条约相当于支持郭松龄当东北第一人。完毕之后，郭松龄迅速改编部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号，郭松龄发表了几篇反对张作霖的通电，往张作霖脑门上浇了几大盆狗血。随后从山海关起兵，以拥戴张学良的名义讨伐张作霖，自称东北国民革命军，星夜出击北上。

郭松龄掌控东北军精锐，起兵之后取得一系列胜利。

胜利之一：击败老派的张作相，由汤河进占秦皇岛。

胜利之二：击溃张作霖固守锦州之兵，东北门户大开。

张作霖的脸色凝重，逐渐体会到一年之前吴佩孚的痛苦。吴佩孚失败之后还能退到河南，东山再起。如果张作霖失败，只能出国流浪了。

然而张作霖很幸运，十二月二十二号，郭松龄便兵败被杀。

郭松龄和冯玉祥签订密约，但李景林夹在两者之间，一直在观望。日后李景林和冯玉祥打起来，冯玉祥就无法支援郭松龄。

郭松龄以张学良的名义起兵造反。张作霖让张学良阻截。郭松龄准备不足，没能迅速攻进沈阳，只能依靠火车推进。张学良一边打一边退一边破坏铁路一边和郭松龄叙感情。奉军将士得知张学良在对立面时，士气逐渐低落，逐渐瓦解。

另外日本支持张作霖。

郭松龄的选择，没有政治，只有军事冒险，完全是盲动。

但事情没完，更大的动乱即将到来。

七章 转折和暴力

中国的事和中国的人

古代中国，不论战或和，都是自己的事，自己的选择，是中国的历史。数千年最大的悲哀便是近代。因为中国的事，中国不能做主，必须加入列强的因子。所有这一切，都因为农业帝国落后，被工业帝国打压欺负。

所有屈辱中，来自东方日本的那份最为致命。

之前说过，日本文明是华夏文明的分支。唐宋之后，两者逐渐隔离。中国这边推行科举制改革，实行人人治国。日本依然停留在武士时代，幕府将军掌权。所以日本虽然是岛国，却是大陆文明，一直奉行大陆政策，希望能在陆地上寻得立足之地，但一直没能成功。

因为日本民族单一，缺少外来文明的冲击，所以没能像英国那般从大陆文明转变成海洋文明。所以日本一直奉行大陆政策，一直梦想登上大陆。正常情况都没能成功。不正常的情况是，工业文明入侵东方之时，枝叶型（子）文明的日本转型较快，在明治维新后期完成政治体制转型；主干型（母）文明的中国转型慢，洋务运动没能触及政

体改革。

所以中国输掉了甲午战争，输掉了数千年以来在东亚的天然主导权。日本赢得甲午战争，赢得登上大陆的机会。此时日本认为，应该征服中国，然后代表黄种人和白种人决战。

日本的战略分两步走：亲华和侵华。

势力不够时亲华。比方说八国联军进中国，日本兵的表现堪称模范，宣传亲华。

所谓侵华，又分两步，从逼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到扶持段祺瑞和张作霖，都是要在中国境内寻找代理人，扩大势力。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段祺瑞独大。

大战之后，英美回过头支持直系。段祺瑞并不受日本摆布，趁机收复外蒙，损害了日本的利益，被抛弃。所以张作霖入关，牵制段祺瑞，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失败。

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战败，不仅是张作霖不敌吴佩孚，也是日本被英美压制。但日本不甘心失败，很快重新武装张作霖，让他卷土重来。张作霖赢得第二次直奉战争，却差点倒在郭松龄手上。日本很失望。

两年之后，张作霖再次在关内遇挫，败给蒋介石的北伐军，逐鹿中原无望。日本试图控制张作霖，但张作霖和段祺瑞一样，不甘心受摆布。日本人开始策划侵华的第二步，亲自上阵。他们首先干掉张作霖，威胁张学良。张学良和张作霖一样，同样不甘心被日本摆布，宣布改旗易帜。日本忍了三年，制造九一八事变，控制东北，再向华北

推进，再向华中推进，再向华南推进，然后一夜回到解放前。

日本，华夏上空的一道黑幕。

变数之数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赢了，但很勉强。如果拼硬军事，张作霖未必拼得过吴佩孚。与其说吴佩孚败在张作霖手上，不如说败在冯玉祥手上。

冯玉祥临阵倒戈，击溃吴佩孚，却落得里外不是人。想当年袁世凯反清王室，为众望所归之英雄。想当年段祺瑞反袁世凯称帝，那是再造共和之英雄。想当年吴佩孚反段祺瑞，八方风雨会中州。冯玉祥怎么了？

因为冯玉祥是那个时代的变数。冯玉祥反吴佩孚不是问题，问题是，反吴佩孚之后太过理想化，让很多人不爽。须知袁世凯代替清王室，基本是精英变更，换汤不换药。段祺瑞虽然自身清廉，却不反对别人贪污受贿。吴佩孚也一样。冯玉祥支持孙中山，又把皇帝赶走、紫禁城卖门票支持工人运动，又让共产党人到他的队伍里做政治工作（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那意思相当于要动所有权贵的奶酪。

要革所有人的命，又没有那实力和决心，砸人家饭碗，自然要被围攻。

在冯玉祥眼中，张作霖比吴佩孚还要可恶，吴佩孚好歹个人品行还算不错。所以他支持郭松龄反张作霖。因为郭松龄至少人品还算不

错，没有吃喝嫖赌抽的嗜好。

至于段祺瑞，冯玉祥原本希望他和孙中山愉快合作。没想到段祺瑞还是老一套，对外软弱，对内没有丝毫改变。原来的安福国会成员再一次活跃。冯玉祥认为，拥段祺瑞出山是一个错误。好在段祺瑞如同掉光牙齿的老虎，没什么危险。但有一个人很危险，就是徐树铮。

徐树铮虽然是民族英雄，却也是老派人，对革命者那一套很排斥。徐树铮又是出色的军人和谋略家，只忠于段祺瑞一人。如果段祺瑞是老虎，徐树铮就是老虎的爪子。

直皖战争之后，徐树铮游历欧洲，和当时的欧洲红人墨索里尼订立协议。皖系已经有日本支持，再和欧洲搭上关系，力量将会进一步壮大。这是其一。

其二，徐树铮很传统，排斥革命，反共，反苏联。当时的共产党比孙中山更具备理想主义色彩，冯玉祥和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是好友。杀徐树铮后，冯玉祥去了苏联。

其三，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的势力主要在西北，那里原本是徐树铮的地盘，徐树铮在那里还有很高的威望。如果徐树铮再起，必然威胁冯玉祥的根基。

至于陆建章的仇恨，只是原因之一。

谢幕

冯玉祥杀徐树铮之后，日本人杀张作霖之前，老古董康有为死。

一九二七年三月八号，帝国时代最后一位思想家过七十岁生日。他收到两样礼物。

其一是溥仪皇帝赠送的一块匾和一件玉如意，康有为非常高兴，写了一篇《谢恩折》，印了很多份，送给朋友们，表示本老古董还在，还是忠于爱新觉罗家族。

其二是梁启超的一副祝寿对联：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觴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

把康有为捧得和孔子一样高。师徒二人原本已经闹崩，如今又和好如初。原因很简单：他们都老了，都变成了老古董。他们已经被时代忘记，便想起抱团取暖。在和孙中山长达数十年的较量中，他们赢得了历史地位，但政治上还是输了，很彻底地输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孙中山的继承者蒋介石联合南方势力北伐，横扫残存军阀如卷席。

三月十九号，康有为去朋友家做客，食物中毒，两日后死亡。虽然死在民国，其实他是帝国的人，帝国时代的大师，民国的古董。

北洋政府崩溃之后，梁启超失去了依托，很寂寞。他病了，到协和医院看病，查得一个肾出了问题，要动刀切除。结果出现失误，把好肾切掉，留下坏肾。梁启超身体垮了。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号，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病逝。照例有很多人

送挽联，很有趣，很有道理。如章太炎挽联：

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
恢诡譎怪，道通为一，逮梟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但本人认为，这些挽联均没有找准定位，这里便不再引用。

本人认为，近现代中国史上有三次文化大革命。康有为和梁启超掀起的戊戌变法为第一场文革，对象为精英阶层，功能相当于把精英的脑袋从帝国思维中拉出来。但康有为和梁启超又不同。康有为以不变应万变，灵魂不动如山；梁启超以变应变，灵魂变动如水。

然而不论梁启超如何“善变”，最后还是落伍了。他死之时，蒋介石已经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中国，他已经没了用武之地。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号，蒋介石第二次北伐即将胜利之际，老好人黎元洪在天津逝世。鉴于地位特殊，南京政府为其举行国葬，黎元洪得到应有尊荣。

黎元洪死后第二天，发生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死于非命。三年之后，日本撕开面纱，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国失去东北，蒋介石头焦额烂。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七号，奇才杨度逝世。早期民国大师们均是传统立场，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只有杨度例外。杨度感叹蒋介石不肯当皇帝之余，自己却从立宪派变成共产党，和周恩来单线联系。此时蒋介石正和毛泽东较量，他们之间的交锋比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更

为精彩，也更为可悲。因为就在那个过程中，日本已经从东北向华北挺进。

武夫的节操

日本狼子野心，但没有到最后撕破脸的时刻，还在到处找代理人。他们找到很多阿猫阿狗，但北洋巨头们均拒绝合作，节操还是值得赞赏。然而很遗憾，他们均没有看到日本的败亡。

第一个丧命的是孙传芳。北洋巨头中，孙传芳崛起最晚。蒋介石北伐之后，孙传芳失势。九一八事变之后，孙传芳隐居天津。老同学冈村宁次多次登门拜访，让他当汉奸。孙传芳拒绝，出家。因他一生得罪仇人甚多，最后死在施剑翘手中，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号。

施剑翘是施从滨的养女。施从滨战败被俘，被孙传芳杀掉。施剑翘决心为养父报仇，历时十年，备尝艰辛，终于如愿以偿，也算民国一段奇事。当然施剑翘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的背后有蒋介石的蓝衣社暗中相助。因为孙传芳是蒋介石的仇人，也是整个国民党的仇人。报仇之后，施剑翘在各位国民党元老力保之下出狱。

孙传芳死时，日军的触手已经伸到华北，对北洋巨头威逼利诱，主要对象为段祺瑞和吴佩孚。因为他们两个能力强，在北洋系统内名声还不错。

北京政变之后，学生运动再起。军警镇压，发生一二八事变，鲁迅那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因那次事变而作。据说段祺瑞到现场之

后长跪不起，为表达悔恨，终身吃素。

九一八事变之后，土肥原贤二拜访段祺瑞，让他出面在华北组织政权。然而一生亲日的段祺瑞直接拒绝。蒋介石担心段祺瑞当汉奸，对段祺瑞各种拉拢。蒋介石知道段祺瑞清廉，便时不时送生活费，并通过各种方式让段祺瑞南下。

蒋介石在保定军校待过一年，算是段祺瑞的学生，但那会两人关系并不和谐。段祺瑞是旧派，蒋介石号称孙中山的继承者，蒋介石北伐终结了北洋政府。但是在中日逐渐恶劣的大环境下，蒋介石还是遣密使向段祺瑞诚恳地表示“随时就商国事”。段祺瑞放下恩怨：“我已老了，不中用了。如介石认为我南下于国事有益，可以随时就道。”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号，段祺瑞到南京。蒋介石命令所有在京少将以上军人，一律过江迎接段祺瑞。很多人都是保定军校毕业，也是段祺瑞的学生，也是日后的抗战中坚。段祺瑞心头暖烘烘的。过江之后，段祺瑞第一眼看见蒋介石同学。随后在何应钦同学陪同下，段祺瑞拜谒中山陵，算是了却了之前和革命党人数十年的过节。段祺瑞曾说：“他（蒋介石）和我下的那盘棋（北伐），他赢了，赢得有风度；我希望他和日本人下，也要赢才好。”

然后段祺瑞接受采访表示：“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不愧真正的军人，有种。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号，段祺瑞因胃溃疡复发在宏恩医院逝世，

遗嘱如下：

余年已七十有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生平不喜多言，往日曲突徒薪之谋，国人或不尽省记。今则本识途之验，为将死之鸣，愿我国人静听而力行焉！则余生虽死犹生，九原(墓地)瞑目矣。

国虽微弱，必有复兴直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

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余生平不事生产，后人宜体我乐道安贫之意，丧葬力崇节简，殓以居士服，毋以荤腥馈祭。

此嘱。

——这是北洋巨头中格调最高的遗嘱，也是所有执政者之中格调最高的遗嘱之一。这是一份谋国者之遗言，很多话至今适用。这份遗嘱和段祺瑞的一生是匹配的。

当时的蒋介石正去西北督促张学良剿共，西安事变即将爆发。

当时的日本狼子野心完全暴露，加紧在华北制造事端，加紧寻找代理人。既然段祺瑞不在，就把主要精力用在吴佩孚身上。和孙传芳一样，吴佩孚也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死对头。蒋介石对段祺瑞礼遇有

加，对吴佩孚就不怎么样。

吴佩孚也没私人积蓄，所以吴佩孚一直在北方，确切说是落到日本人手中，死在日本手中。

段祺瑞离开北方之后，土肥原贤二把目标锁定在吴佩孚身上，劝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拒绝：“自治者，自乱也！”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人让吴佩孚做北平维持会会长，遭拒绝。

汪精卫叛变之后，土肥原贤二觉得汪精卫地位虽高，但仅限于国民党内，在北方影响力有限。如果在北方找一个有威望且精于军事的人和汪精卫搭档，就完美了。吴佩孚就是那个人选。土肥原贤二再次以“中国王”引诱吴佩孚，再次遭拒绝。

土肥原贤二让汪精卫出马。汪精卫厚着脸皮给吴佩孚写信，表示愿意和吴佩孚一起共建“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吴佩孚原本就眼高于顶，战败不进外国使馆，一看汉奸也好意思来搭讪，火大，当面把来人大骂一顿。

汪精卫很震惊、很愤怒，但事还要继续办，便另派汉奸副官找吴佩孚。副官说王总裁要和吴大帅好好谈谈，吴佩孚再次火大：“什么汪总裁？那汪汪乱叫的东西能称总裁吗？荒唐！”副官很不满：“请大帅不要侮辱汪总裁。”吴佩孚火力升级：“一个出卖祖宗舍弃人格的人还用得着别人去侮辱么？不过是要做石敬瑁式的儿皇帝，僭称什么总裁！”随后喊人把那副官打出去。那一刻，仿佛章太炎附体。

汪精卫没法，再派人。吴佩孚骂够了，表示既然汪精卫想谈，那就谈谈吧。汪精卫屁颠屁颠跑到北京，找了好几个地方，吴佩孚都表

示不合适。汪精卫终于明白，被老军阀耍了，人家根本不愿意和自己见面，只好气鼓鼓地返回上海。

碍于日本人的压力，汪精卫只好再次派人找吴佩孚。这次是伪政府骨干周隆庠（日本九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亲自出马。吴佩孚再次章太炎附体：“谁跟汪精卫合作，这人必定下贱。”周隆庠一听，知道没希望，想走。吴佩孚让他等下，抄一幅文天祥的《正气歌》给他，说：“捎给汪精卫吧，让他当镜子照照自己。”

汪精卫不成，日本人只好亲自出马了。一个叫川本大作的特务到吴佩孚身边，表示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向吴佩孚请教学问。吴佩孚戏弄他说，想请教学问要先拜师。川本二话不说，戒斋沐浴更衣拜师，成为吴佩孚弟子。川本对吴佩孚非常恭敬，但在无形之中对吴佩孚的幕僚拉拢策反，用心非常恶毒。

川本很成功，策反了吴佩孚身边的主要追随者，让他们轮番去烦吴佩孚。

川本很失败，始终无法攻陷吴佩孚。川本能做的就是鼓动各种阿猫阿狗上门游说，甚至把遗老江潮宗搬出来。吴佩孚当兵时，江潮宗已经是营长，级别比同时期的曹锟还高，张勋复辟之前还当过几天内阁总理。江潮宗试图倚老卖老，吴佩孚直接开骂，老匹夫，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熬过了最初的黑暗，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局走势对日本越来越不利。吴佩孚的处境越来越糟，要么汉奸，要么死。

吴佩孚选择决死也不当汉奸。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号，吴佩孚牙疼，日本特务给他介绍了一个日本医生。一番“治疗”之后，吴佩孚病情恶化。十二月四号，川本撕开“学生”的面纱，强行给吴佩孚“治疗”。吴佩孚气绝身亡，据说被割断了动脉，也有说被注射了毒药。

从段祺瑞的死到吴佩孚的死，日军占领了半个中国。但经历国军在正面战场的徐州会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规模战役之后，以及共军在敌后成千上万次小规模游击战之后，日军再无力向前，战败已成定局。

吴佩孚是日本最想拉拢的北洋巨头，也是死得最惨的北洋巨头。吴佩孚死前一年，曹锟逝世。他同样拒绝日本三番五次的拉拢诱降。他到死都不相信，中国会干不过日本。

看看这些人，不论亲日还是仇日，均选择拒绝和日本人合作。比起被日本吓破胆的王揖唐、汪精卫、周佛海等人，风骨可见一斑。

他们生于老旧的帝国时代，他们的灵魂是老旧的，不适合新时代，因此他们造成民国前半期所有的战乱和灾难。但面对外来入侵者，他们诠释了国人应对艰难的决心。

这个过程中，中国局势围绕着一個人——蒋介石——而动。

民国三十八年都是乱世。

蒋介石主导局势之前，仅仅是乱世。

蒋介石主导局势之后，演变成暴力时代。

何解？

答案参见下篇，《暴力时代：乱世蒋介石》。